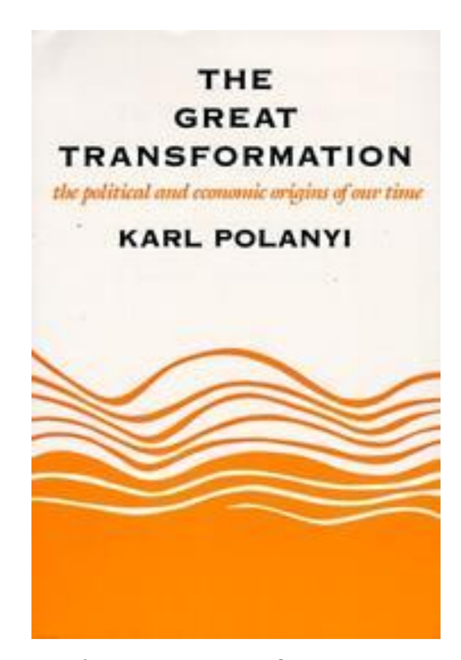


近代西歐的政治

和經濟的源頭

（共享版權中譯本）

自學書院　馬景文　2013 年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Karl Polanyi[1], 1944

[1] Polanyi 中譯有「波蘭尼」，「博蘭尼」。原文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968 年第八版）。

目　錄

譯言

Block〈導讀〉

序

第一部　國際體系

第一章　百年和平

第二章　保守的 1920 年代，革命的 1930 年代

第二部　市場經濟的興衰

（一）血汗工廠

第三章　生活環境與進步

第四章　社會與經濟體系

第五章　市場模式的演變

第六章　自發調節市場與虛擬商品：勞動力、土地和金錢

第七章　1795 年史賓漢蘭制度

第八章　前因後果

第九章　赤貧主義與理想國

第十章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發現

（二）社會的自我保護

第十一章　人、大自然和生產組織

第十二章　自由主義信條的誕生

第十三章　自由主義信條的誕生（續）：階級利益和社會改變

第十四章　市場和人

第十五章　市場和大自然

第十六章　市場和生產組織

第十七章　自發調節被削弱

第十八章　破壞性的緊張關係

第三部　巨變

第十九章　民選政府和市場經濟

第二十章　社會變化齒輪中的歷史

第二十一章　複雜社會中的自由

附錄一：評論選譯

附錄二：經濟行為及社會結構：鑲嵌之困惑

附錄三：閱讀參考

譯言

Karl Polanyi 的大作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名氣遠不及 Smith 的《國富論》、Keynes 的《通論》和馬克思的著作。

隨著這幾年市場經濟在西方國家連連出事，學者少不免要從先人智慧中找尋指引。Polanyi 有些觀點確實點出市場經濟和自由經濟主義的弊端。蒙塵多年，*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於 2001 年再版發行(Beacon Press)，加上 Joseph E. Stiglitz 和 Fred Block 大力推薦，逐漸為人注意，是許多大學課程的指定讀物，尤其這幾年來特別受到中國內地學者的關注。

據查中譯有正、簡體各兩本：

(1) 黃樹民譯《鉅變: 當代政治, 經濟的起源》遠流出版社，1957 年；
(2) 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合譯《鉅變: 當代政治, 經濟的起源》遠流出版社，2007 年；
(3) 刘阳、冯钢合譯《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07 年 5 月)；
(4) 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1 月)。

隨帶一提，我沒有看過這些譯本，但曾參考英國馬克斯主義中心 http://www.marxists.org 以 Creative Commons 條款發表的中譯本（譯者沒有具名），可惜譯文錯漏不少，我零星借用了大概十份之一。

既然坊間有現成譯本，何苦還要發表新版本？上文提到的譯本是現有版權制度的產品，讀者購買書本後，享有閱讀和有限度引述譯文（按學術標準）的權利。這無疑，也實屬必要，保護了作者、譯者和出版社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卻在某程度上窒礙了資訊流通和文化知識的發展。

Creative Commons[2]這民間「保留部份版權」制度既尊重作者權利（保留署名權和指定衍生作品不得作商業用途），又方便流通（不限制非商業形式分發）和鼓勵創作（可允許二次創作的衍生作品）。傳統版權制度和 Creative Commons 的最大距離當然是金錢收益。創作人個人情況不同，無謂以金錢衡量作者對文化文明的貢獻。但一般而言，教學資材方面更注重廣為傳播，為民所用而不是金錢收益，所以 Creative Commons 在教育範疇的發展最快最廣。

[2] 一詞四譯：(中國內地）知識共享、(香港）共享創意、(澳門）創意共用和（台灣）創用 CC。

這個**《巨變：近代西歐的政治和經濟源頭**[3]》譯本以 Creative Commons 的條款發表：保留署名權，歡迎各位分發但不得作商業用途，允許衍生作品（必須以相同的分發和禁止商業用途條款發表）。

為方便讀者欣賞這本有獨特之見的好書，建議依次先看斯蒂格利茨：为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序，繼而是本譯本的 Fred Block〈導讀〉；然後看正文。譯本也選譯了幾篇書評和文章供讀者參考（見附錄一）。

Karl Polanyi 被譽為「經濟人類學[4]」大師。大家往往視之為是「人類學」的流派，極少在經濟學範疇佔顯著地位。Polanyi 點題的《巨變》是指沒有市場的古代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過渡到 19 世紀的謂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是為前所未見的「巨變」。

《巨變》重見天日，網上搜到的中文評論幾乎全是以本書的論述引證中國經濟改革後的下一步：社會改革。在網上搜證，彙集了一些資料。為方便各位先看原文，中文論述全放在書後的〈附錄三〉。

馬景文
自學書院
2013 年 11 月



[3] 選用這書目，並非要刻意與其他譯本有區別，而是考慮到一些關鍵字詞的確切意思。原題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的 *Our Time* 當然可譯為「當代」，但這是 1944 年的作品，譯為「近代」更能標示年代之不同。點明「西歐」是特顯本書的論述只是集中討論西歐各國的情況。

[4] economic anthropology

《巨變》導讀[5]

Fred Block

引言

一位著名的經濟史學家評論《巨變》的影響時提到：「有些著作拒絕離場。」說得好。Polanyi 的傑作雖然是在 1940 年代初期書成，其相關性和重要性與日俱增。當今書海茫茫，只有少數的保質期是多於幾個月或幾年；幾十年來，《巨變》仍然新鮮奪目。要了解全球社會在二十一世紀初面臨的困境，這是必不可少的參考。

《巨變》恆久如新，有很好的解釋。本書大力批判市場自由主義，即是國家社會和全球經濟可以而且應該通過自發調節的市場組織。

1980 年代以來，尤其冷戰在 1990 年代初結束之後，市場自由主義學說已主宰全球政治；學說有不同標籤：〔英國〕戴卓爾[6]主義、〔美國〕列根主義、新自由主義和〔世界銀行〕華盛頓共識等。原著於 1944 年首次出版，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加劇，模糊了 Polanyi 論點的重要性。在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捍衛者之間的高度兩極化辯論，沒有多少空間留給 Polanyi 的細緻和複雜論述。 因此，要隨著冷戰時代結束，Polanyi 的大作才開始得到應有的關注；這是遲來的正義。

後冷戰時期的核心辯論是關於「全球化」議題。新自由主義者堅持通訊和運輸的新科技無可避免促使世界經濟緊密集成，途徑是通過擴大貿易和資本流動以及接受英美模式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世界各地的各種各樣運動和理論家從不同的政治觀點攻擊這樣的全球化視野；有人基於種族、宗教、國家或區域認同而抵制，有人堅持以全球協調與合作作為替代願景。辯論雙方可以從《巨變》學到很多；新自由主義者和批評者會更深入把握市場自由主義的歷史和了解經濟全球化早期項目造成的悲慘後果。

Polanyi 的人生

Karl Polaniyi（1946-96）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出生和長大，一家滿門俊傑。他的兄弟 Michael 是重要的科學哲學家，著作仍廣為傳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Karl 一直是匈牙利學界和知識界有影響力的人物。

---

[5] Block, Fred *"Introduction"to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arl Polanvi* , June 2000。原文頗多腳註，大多是引文出處，譯文只保留解釋性註解。譯本略有刪節。

[6] Thatcher，各地有不同中譯；本文選用港譯「戴卓爾」，既優美又隆重。英國統治香港期間，重要人物都有官方中譯名字，一般都選得很雅。本文特多人名，除幾位家喻戶曉的知名人物譯文依循約定俗成的常見譯名，其他的一概不譯。



1920 年，Karl 在維也納任職中歐暢銷經濟金融周刊 *Der Oesterreichishe Volkswirt* 高級編輯，初次接觸 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和他更有名氣的學生 Frierich Hayek（哈耶克）的論說。當時市場自由主義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吸引力嚴重動搖，兩人試圖恢復市場自由主義在知識領域的正統地位。短期而言，他們的影響不大。

從 193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凱恩斯經濟思想為政府積極管理經濟正名，主宰西方國家的政策。[7]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Mises 和 Hayek 在美國和英國孜孜不倦支持市場自由主義，直接啟發了 Milton Friedman 等有影響力的追隨者。Hayek 在 1992 年去世，目睹蘇聯崩潰，應為他的觀點得到平反而告慰。他離世時被廣泛讚頌是新自由主義之父，啟發了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美國列根總統奉行的政策：放鬆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然而，早在 1920 年代，Polanyi 已直接挑戰 Mises 的觀點，他的核心理論始終是批評市場自由主義。

Polanyi 任職財經刊物時，目睹美國股市在 1929 年崩潰，維也納的信貸機構於 1931 年倒閉，導致經濟大蕭條和法西斯主義興起。希特勒在 1933 年掌權，Polanyi 的社會主義觀點不受歡迎，被要求辭職。他去了英格蘭，在工人教育協會（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的校外部）擔任講師。為了籌劃課程，Polanyi 沉浸英國社會和經濟史的材料。他的《巨變》融合了這些史料，結合他對 Mises 和 Hayek 當時已頗具影響力觀點的批評。

Polanyi 在 1940 年代初期〔以英語〕撰寫《巨變》，當時他是美國佛蒙特州 Bennington 學院的訪問學者，有贊助支持，可以全情投入。視野角度的變化有助 Polanyi 綜合不同流派的論點。本書的持久貢獻是把重點放在調節全球經濟的制度， 這與 Polanyi 多次流亡有直接關係。他從布達佩斯流亡到維也納，然後是英國和美國；這些經歷結合他的濃濃道德責任，使 Polanyi 成為世界公民。晚年時他寫信給老朋友：『我的生活是「世界」生活，我過著人類世界的生活。我的著作是為亞洲，非洲，為新人類而寫。』

他對匈牙利家鄉依然有很深的感情，他的「世界」生活有助他超越歐洲中心論的觀點，把握全球經濟措施的一套特定手段所培育和支持的急進形式民族主義。

[7] 原註(iv)：巧合的是《巨變》初版當年，Hayek 也發表了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前書慶祝美國「新政」限制了市場力量的影響，後者堅持「新政」改革導致美國走下坡，勢將導致經濟崩潰和極權政權。

二戰之後，Polanyi 任教美國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與學生從事資本主義之前社會的貨幣、貿易和市場的人類學研究。他連同 Conrad Arensberg 和 Harry Pearson 在 1957 年發表了《早期帝國的貿易和市場 *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其後，他的學生把他這時期的作品編錄為紀念文集[8]。

Polanyi 的論點：結構和理論

《巨變》分為三部份。第一和第三部份集中於催生當時世界大事的情景：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蕭條、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大陸興起、美國「新政」以及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Polanyi 在這幾章提出一個謎團：為何歐洲在 1815 至 1914 年這相對和平與繁榮時期之後，突然經濟崩潰和陷入兩次野蠻的世界大戰。第二部份是本書的核心；Polanyi 提出解決方案。他回顧十九世紀最初幾年的英格蘭[9]工業革命，指出英格蘭思想家如何發展市場自由主義理論以回應早期工業化的破壞，其核心信念是人類社會不應服從自發調節的市場。他解釋因為英格蘭成為領頭的「世界工廠」，這些信念順而成為世界經濟的組織原則。

在第二部分的下半部（第十一至十九章），Polanyi 強調市場自由主義產生的必然反應：各方致力保護社會，減少市場的影響。這意味著市場自由主義無法正常發揮，而管治全球經濟的制度導致國家之間和國內的關係日益緊張。和平崩潰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秩序崩潰導致大蕭條；他指出這全是試圖以市場自由主義組織全球經濟的直接後果。

第二項「巨變」是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理論的興起。《巨變》對十五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事件都有重要觀點，也提出一些原創觀點，例如互惠和再分配在前現代社會的作用，傳統經濟學的局限以及「大自然」商品化的危險。許多當代社會科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從 Polanyi 的論點得到理論靈感，有越來越多的書籍和文章是以《巨變》的關鍵引言為框架。

這本書非常豐富，嘗試總結本書只是徒勞，本文能做到最好的只是闡述一些 Polanyi 的主要觀點，這先要理解他的理論定位是獨創的。很難把 Polanyi 配對政治景觀的標準地圖。他同意凱恩斯批評市場自由主義的許多觀點，但他不是凱恩斯主義者。他一生自認是社會主義者，但與經濟決定論所有流派有深刻分歧，包

---

[8] 這段略有刪節。

[9] 野人獻曝，不厭其煩提出中譯常見的筆誤。Britain 才是「英國」，England 是「英格蘭」。英國正名是「United Kingdom of …聯合王國」，包括 England（英格蘭）, Scotland（蘇格蘭）, Wales（威爾斯）和 Northern Ireland（北愛爾蘭），各自有管治機構和語言；蘇格蘭甚至有本身的稅制，發鈔銀行和貨幣，近年有地方議會。噢，蘇格蘭足球隊有本身的聯賽，不參加英超！在一般情況下，以最大份額的英格蘭作為「英國」未嘗不可，但本書特多提到 England 的歷史事件，不應當作是影響全國的「英國」事件。

括主流的馬克思主義[10]。他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非常定義與我們對這些概念的習慣理解迥然不同。

Polanyi 的「鑲嵌」概念

解釋 Polanyi 的思想，邏輯起點是他的「鑲嵌[11]」概念，這也許是他對社會思想最為人熟知的貢獻，也為理解他的論點引起巨大混亂。Polanyi 首先強調迄今為止現代經濟思想的整個傳統是建基於經濟體系是由各市場組成這概念,而各市場的聯鎖系統通過價格機制自發調節供給和需求。

即使經濟學家承認市場體系有時要求助政府克服市場失靈,但他們仍然借助經濟是總合市場的平衡系統這概念。Polanyi 的意圖是指出這概念不同於整個人類歷史記錄的人類社會現實。他堅持在十九世紀之前,人類的經濟必然是鑲嵌在社會。

「鑲嵌」這術語表達的想法：經濟不是如經濟理論聲言的自主，而是服從政治，宗教和社會關係。[12] Polanyi 引用這術語，其意義是大於現在熟悉的意義：即是市場交易取決於信任,相互理解和依法執行合約。他利用這概念以突出古典經濟學家，尤其是 Malthus 和 Ricardo，與以往的思想家激烈決裂。歷史的正常模式是經濟服從社會，但他們的自發調節市場要求社會服從市場邏輯。

> 「最終,這也是市場控制經濟體系對整個社會組織有極其重要後果的原因：這意味著社會運作是附屬於市場。社會關係鑲嵌在經濟體系之內，不是經濟被鑲嵌在社會關係。」“（61 頁）

然而，這段落和類似的段落令人誤解 Polanyi 的觀點。人人往往以為 Polanyi 的說法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經濟成功從社會脫嵌[13]，反過來主宰社會。

然而，這誤讀掩蓋了 Polariyi 論點的獨創性和豐富。Polanyi 確有說法：傳統經濟學家希望建立經濟已實際脫嵌的社會，鼓勵政治家追求這目標。然而，Polanyi 也堅持政治家沒有而且無法實現這目標。事實上,他多次說明完全自發調節又已脫嵌的市場經濟體系這目標是理想國的任務，不可能存在。他在《巨變》開筆寫道：

---

[10] 原註(ix)：Polanyi 與馬克斯主義的關係頗為複雜，是多本專著的主題。

[11] embeddedness

[12] 原註(x)：當代學者每多引用和闡釋 Polanyi 的「鑲嵌」概念。不清楚他為何選用這術語，似乎借用採煤的比喻。他研究英國經濟史，廣泛閱讀英國煤礦史；採煤是開採鑲嵌在礦井四壁的煤塊。

[13] disembedded

「我們的觀點：自發調節市場的概念意味著鮮明的理想國想法。這樣的機制不可能存在而不會消滅人類和社會的自然物質，只會摧毀人類和把周圍環境變成荒野。」（22 頁）

為何「脫嵌」不能成功

Polanyi 認為建立完全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體系，人類和自然環境要變成純粹商品，這必然會破壞社會和自然環境。在他看來，自發調節市場的理論家和盟友都在不斷把人類社會推到懸崖邊緣。但隨著市場不受控制的後果顯現，人們抵制和拒絕像旅鼠那樣走向毀滅自身的懸崖。相反，他們脫離市場自發調節的信條，以挽救社會和自然環境免受破壞。在這意義上說，市場脫嵌是類似拉開巨大的橡皮圈。

爭取市場有更大自主權，增加了緊張程度。再進一步拉開橡皮圈，後果或是橡皮圈斷開（代表社會解體），或是經濟恢復到更為鑲嵌的位置。

這論點背後的邏輯在於 Polanyi 對真實和**虛擬商品**[14]的區別。Polanyi 認為商品的定義是在市場出售的產品。依據這定義，土地、勞動力和金錢都是虛擬商品，因為最初不是為了在市場出售而生產。勞動力只是人類的活動；土地是被細分的自然環境；而現代社會的金錢和信貸供應必然是由政府政策塑造。現代經濟學一開始就假設這些虛擬商品的行為是和真正的商品一樣，但 Polanyi 堅持這花招有致命後果，意味著經濟理論是基於謊言，而這謊言使人類社會陷入風險。

Polanyi 的說法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錯誤把自然環境和人類當作是價格將完全由市場決定的物件，這是完全錯誤的道德論點，違反了管治社會數百年的原則：自然環境和人類生活幾乎一直被認為是有神聖的維度，不可能與勞動力和自然環境服從市場的概念調和。Polanyi 反對把自然環境視為商品，預示了許多當代環保份子的論據。

Polanyi 論據的第二個層次是關於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15] 雖然經濟應該是自發調節，但國家必須發揮持續作用，調節貨幣和信貸供應以避免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雙重危險。同樣，國家要管理工人不斷改變的要求：在失業時提供救濟，教育和培養未來的勞工以及影響人口流動。在土地方面，各國政府要維持糧食生產的連續性，就要利用多種措施以保護免受收成和價格波動的壓力。在城市地區，政府管理現有土地，是利用環境和土地使用法規。簡而言之，管理虛擬商品的角

[14] fictitious commodities

[15] 原註(xiii)：Polanyi 的觀點隱含著對市場作為自發調節機制的更具體批評。製造的商品如因產量多而價格下降，可以鼓勵增加消費和抑制新生產以恢復平衡。價格機制對虛擬商品的有效影響會降低，因為不能假設會自動增加或減少供應。

色把政府放置在三個最重要的市場，市場自由主義終而完全不可能維持原來的觀點，即國家是在經濟體系之「外」。[16]

「虛擬商品」說明經濟體系不可能脫嵌。真正的市場社會需要國家積極管理市場，這需要政治決策，不能降低為某種技術或行政職務。[17] 當國家政策朝向脫嵌的方向，更大程度依賴市場自發調節，老百姓被迫承擔較高成本。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更容易失業，農民面臨來自進口的更大競爭；兩個群體的救濟福利減少，要捱日子了。政府要花更大力氣以確保這些群體能夠承受成本的增加，不致參加破壞性的政治行動。這是 Polanyi 聲言：「自由放任是規劃的…」的部份意思；要有治國之道和鎮壓力量把市場邏輯和隨之而來的風險加諸老百姓。[18]

緣木求魚的後果

自由市場理論家尋求在社會思想中脫嵌經濟，最終失敗。但市場自由主義的理想主義是非凡智慧應變能力的源泉。「現代中央銀行實際上是為了提供保護而發展起來的工具；沒有保護，市場會摧毀親兒：各種各樣的商業企業。」（168 頁）

由於社會不約而同從全面實驗市場自發調節退縮，理論家總可以不把任何失敗歸咎於設計，而是實施時沒有政治意願。因此歷史經驗不能抹黑市場自律的信條，倡導者為失敗找到滴水不漏的藉口。這最近發生在前蘇聯，試圖以「休克療法[19]」強行推動市場資本主義。最後的失敗眾人皆見。但「休克療法」的捍衛者依然歸咎政治家太快屈服於政治壓力；如堅持到底，是可以落實向市場迅速轉向的好處。

Polanyi 懷疑經濟能否脫嵌，也是他的「**雙向動力**[20]」有力論據的源頭。由於社會要脫嵌經濟不可避免會遇到阻力，Polanyi 認為市場社會是由兩種對立動力組成：自由放任動力以擴大市場範圍以及抗拒經濟脫嵌的保護性反向動力。雖然工人階級運動一直是保護性反向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Polariyi 明確指出所有社會群體都參與其事。例如，當週期性經濟衰退破壞銀行系統，企業集團堅持加強中央銀行以保護國內信貸供應免受全球市場的壓力。簡而言之，甚至資本家也時不時抗拒市場自發調節的不確定性和波動，參與各種形式的保護措施以增加穩定性和可預見性。

---

[16] 原註(xiv)：對於許多其他商品，政府參與也是市場競爭的先決條件。

[17] 原註[xv]：貨幣主義曾多次試圖建立固定規則管理貨幣供應增長以消除央行行長的酌情權，但全歸於失敗。沒有這樣的公式，退而思其次是賦予央行行長半宗教和神諭式權威以掩蓋其政治作用。

[18] 原註[xvi]：這是 Polanyi 解釋英格蘭〈新濟貧法〉的核心論點；建立勞動力市場，國家要大幅度提高鎮壓的力量。他的解釋得到後來學者的支持，但他對史賓漢蘭制度的多個觀點受到質疑。

[19] shock therapy

[20] double movement

Polanyi 堅持「自由放任是被規劃；規劃沒有被規劃。」他明確攻擊市場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指責「集體主義陰謀」針對全球市場架設防護屏障。Polanyi 持反調，認為架設屏障是社會所有組群面對自發調節市場體系難以承受的壓力時的自發和無計劃的反應。只有保護性反向運動才可以防止經濟脫嵌的災難。
Polanyi 認為，放任經濟的走向要有反向動力才可以保持穩定。例如，在 1920 年代（或 1990 年代），自由放任運動在美國橫行無阻，勢不可擋，過度投機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破壞了持續繁榮的基礎。Polanyi 同情一般的保護性反向動力，但也承認有時會導致危險的政治經濟僵局。他分析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承認雙向動力任一都不能解決危機，緊張增加，直至法西斯主義勢力日增，奪取政權，擊敗了放任政策和民主。

Polanyi 的雙向動力論點，與市場自由主義和正統馬克思主義在任何特定時刻的可能範圍形成強烈對比。市場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認為社會只有兩個真正的選擇：市場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雖然各自有南轅北轍的喜好，但都同意沒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

相反，Polanyi 堅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不是真正的選擇，只是理想國的願景。此外，他定義社會主義是「工業文明社會的內在傾向，自覺服從民主社會，從而超越自發調節的市場。」（193 頁）這定義允許市場在社會主義社會繼續發揮作用。Polanyi 認為在任何歷史時刻都有不同的可能性，因為市場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嵌入。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形式更有效擴大產出並促進創新；有些會更為「社會主義」，市場要服從民主方向；Polanyi 暗喻十九和二十世紀都有既高效又民主的替代方案。[21]

全球體制的核心

然而，Polanyi 是成熟的思想家，不會天真的以為各國都可以自由選擇調和雙向動力的特殊方法。相反，Polanyi 的觀點與我們目前的情況相關，正是因為他把管理全球經濟的規則作為他的框架核心。他對法西斯主義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興起的論點，核心是國際金本位制限制了各國的政治選擇。要理解 Polanyi 這部份說法，先要簡短介紹金本位制的邏輯；這不是題外話，因為國際資本自由和自主流動的邏輯繼續對當代市場自由主義發揮強大影響力。Polanyi 認為金本位制是非凡的智力成果；這是創新的體制，把市場自發調節的理論付諸實踐，一旦落實有能力使自發調節的市場看來是自然出現。

市場自由主義想創造一個世界，爭取最大機會擴大國際市場的範圍，但先要找到一種方法讓有不同貨幣的各國人民可以自由與對方交易。他們想到：如各國符合

[21] 原註(xx)：Polanyi 直接啟發 1980 和 1990 年代的學術思潮，分析「資本主義的品種」，發現各國的市場鑲嵌情況有非常顯著的差異。

三個簡單規則，全球經濟將有完善的全球自律機制。首先，每個國家將其貨幣價值訂定在固定的黃金數量，並承諾依照這價格買賣黃金。第二，各國的國內貨幣供應量都依據持有的黃金儲備數量，流通貨幣有黃金支持。第三，每個國家致力使人民有最大自由參與國際經濟交易。

金本位制落實了全球自律的夢幻般機制。英格蘭企業可以出口商品和在世界各地投資，有信心他們賺取的貨幣「等同黃金」。從理論上說，如某國某年處於逆差，因為國民在國外花的比賺的多，黃金流出該國儲備支付欠下外國人的債務。[22] 國內貨幣和信貸供應自動收縮，利率上升，價格和工資下降，進口需求下降，出口競爭力增強。因此，該國的赤字自動償還。沒有政府重手干預，各國的國際賬戶將達致均衡。

無需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或全球性金融機構，全球將統一成為單一市場；各民族國家各自享有主權，為了自身利益而導致他們自願遵守金本位制規則。

金本位制的後果

金本位制目的是要減少國家單位和國家政府的作用，建立一體化全球市場，但後果是完全相反。[23]

Polanyi 指出，金本位制在 1870 年代被廣泛採用，諷刺的效果是反而強化了國家作為統一實體的重要性。雖然市場自由派夢寐以求的和平世界的唯一國際鬥爭只是個人和企業超越對手的競爭，他們努力通過金本位制實現這夢想反而產生了兩起恐怖的世界大戰。

現實情況是簡單的金本位制規則為人們帶來無法承受的經濟成本。當國內的內部價格結構偏離國際價格水平，國家面對黃金儲備流失的唯一合法手段是通縮，意味著經濟會持續收縮，工資下降導致消費減少，直至恢復外部平衡。

這意味工資和農民收入急劇下降，失業率上升，企業和銀行倒閉急劇增加。不僅只是工人和農民發現這類型調整的成本極高，商界本身也不能忍受伴隨的不確定和不穩定。因此，金本位制一到位，整個社會開始串通試圖抵消其影響。第一招是各國更多利用農業和製成品的保護關稅。 貿易流量對價格變動較不敏感，各國一定程度上能較準確預測國際交易，較少受突然和意外的黃金流出影響。

---

[22] 原註[xxii]：黃金流出的機制同樣巧妙，無需政府採取行動。由於逆差國人民在國外花的比賺的多，他們的貨幣有更大供應，其價值相對於其他貨幣將下降。當幣值低於一定水平（稱為黃金點 gold point），國際銀行家就有利可圖：把貨幣換成黃金，然後把黃金在另國以較高價格出售。黃金就是這樣從逆差國流向順差國。

[23] 原註(xxiii)：Polanyi 知道金本位制的實際運作與理論有很大差異。

進一步權宜之計是在十九世紀後期歐洲列強，美國和日本匆匆建立正式的殖民地，自由貿易的邏輯一直強烈反對殖民，因為如所有生意人都有相同的市場和投資機會，帝國的成本不能抵消相應的好處。但隨著國際貿易的保護主義興起，這筆計算要倒過來。新征服的殖民地會受到帝國勢力的關稅保護，殖民國商人有特權取得殖民地市場和原材料。這時期的「帝國互爭」加劇了英格蘭和德國之間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競爭，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24]

對 Polanyi 而言，各國的遺傳密碼沒有帝國主義的衝動，而是隨著各國在金本位制的無情壓力下為了保護自身而萌生。資源從利潤豐厚的殖民地流入，可能挽救國家免陷於黃金突然流出造成痛苦的危機，剝削殖民地的海外人群可能有助保持國內階級關係不致變得更具爆發力。

Polanyi 認為市場自由派的理想主義導致他們發明金本位機制以帶來日益繁榮的無國界世界。金本位制的無情衝擊反而迫使各國鞏固自身的國家，然後是帝國的邊界。金本位制繼續對各國發揮紀律的壓力，但其有效運作受阻於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例如關稅壁壘和帝國崛起。但即使這全面矛盾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轟然倒塌，人們是如此接受金本位制致使政治家要努力恢復。慘劇再次在 1920 和 1930 年代發生，國家被迫選擇保護匯率或保護本國人民。法西斯主義就是在這僵局出現。Polanyi 的看法是法西斯的衝動是為了保護社會免受市場影響而犧牲個人自由；這種衝動是普世的，但當地的突發情況決定法西斯能否成功奪取政權。

與當代局勢相關

Polanyi 的觀點對當代關於全球化的辯論十分重要，因為的新自由主義擁抱著啟發金本位制的相同理想。自冷戰結束以來，我們一直不斷被告知，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國界已經過時，全球和平新時代已奠定基礎。一旦各國理解全球市場的邏輯並開放經濟，商品和資本得以自由流動，良性競爭將取代國際衝突，產生更多更精彩的貨物和服務。一如他們的前輩，新自由主義者堅持所有國家只需要相信市場自發調節的有效性。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全球金融體系與金本位制有很大差異。匯率和各國貨幣不再固定於黃金價格，大多數貨幣的價值在外匯市場波動。強大的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管理全球系統，發揮重要作用。但在重要差異的背後有基本的共同信念：如個人和企業有最大自由追求本身的經濟利益，全球市

[24] 原註[xxv]：Polanyi 的說法完全不同列寧的論斷；後者認為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加劇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金融資本增長的產物。Polanyi 不厭其煩指出金融資本家可以是防止戰爭的主要力量。

場會讓人人得益。正是這基本信念在背後支持新自由主義者有系統拆除對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限制，以減少政府在組織經濟生活的「干擾」。

一位極具影響力的全球化捍衛者寫道：


25

26

27

> 『在今天的全球經濟，當國家承認…自由市場的規則並決定遵從，穿上我稱之為「黃金緊身衣」。「黃金緊身衣」是這全球化時代的標誌性政治—經濟服裝。冷戰時代有毛裝（中山裝），尼赫魯夾克，俄羅斯毛皮。全球化只有黃金緊身衣。如　貴國還沒有量裁定做，很快就輪到了。』[28]

作者接著解釋黃金緊身衣要求國家收縮，消除對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限制，放寬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他還樂呵呵描述外匯和金融市場的國際貿易商這群「電子游牧族」如何執行這緊身衣的制約。Polanyi 對三種虛擬商品的分析教導我們，新自由主義對全球層次市場自發調節的觀念是危險的幻想。正如各國經濟體系依賴政府的積極作用，全球經濟體系需要強有力的監管機構，包括最後貸款人。沒有這些機構，一些經濟體系，或許整個全球經濟體系，會受到沉重經濟危機影響。但 Polanyi 教誨更根本的一點，是市場自由主義加諸老百姓的負擔是根本不可持續。工人，農民和小商人絕不會容忍經濟組織模式令他們日常經濟情況受到週期性劇烈波動，不論時間長短。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的無國界又和平的理想國要求全球數十億老百姓有無限耐性，也許每五或十年有一段長時間他們的收入只及之前的一半或更少。Polanyi 認為，指望老百姓要這樣忍耐是道德錯誤和極不現實。對他來說，老百姓無可避免會動員保護本身免受這些經濟衝擊影響。

此外，最近方興未艾的新自由主義時期目睹了世界各地人民廣泛抗議，試圖抵制全球化的經濟混亂。[29] 隨著人們日益不滿，更難維持社會治安，增加了政治領

[25] http://kolahun.typepad.com/.a/6a00e009968c0a8833013481780c2c970c-320wi
[26] http://luxurionworld.com/image/data/prod/Sahiba/AW-102-11.JPG
[27] http://www.photo-dictionary.com/photofiles/list/10950/14932Russian_fur_hat.jpg
[28] 原註[xxvi] : 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1999), p. 96. 中譯《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樹》蔡繼光譯，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9] 原註[xxvii]: John Walton and David Seddon, *Free Markets & Food Riot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4).

導為疏導不滿情緒而指責內部或外部敵人作為代罪羔羊的危險。新自由主義的理想國願景就是這樣導致不和平，加劇衝突。

例如，在非洲許多地方，結構性調整政策[30]的破壞已導致社會解體、飢荒和內戰。在冷戰時期之後，其他地方出現了激進民族主義政權，對鄰國和國內少數民族有不軌意圖。在全球每一角落，激進運動往往結合宗教原教旨主義，準備利用全球化的經濟和社會衝擊。如 Polanyi 是正確的，這些紊亂跡象預示著未來更危險的情況。

民主是替代品

雖然 Polanyi 是在二戰期間撰寫《巨變》，他對未來仍持樂觀態度，認為可以打破國際衝突的循環。關鍵的一步是推翻社會生活要服從市場機制的信念。

一旦不再受這「過時的市場心態」[31]束縛，就可以走向國家經濟及全球經濟服務民主政治的坦途。Polanyi 認為羅斯福的「新政」是這些未來可能性的模型。羅斯福的改革意味著美國經濟將繼續圍繞市場和市場活動組織，但有一套新監管機制作為人和大自然與市場力量的壓力之間的緩衝。[32]

通過民主政治，人民決定老有所養，應受到社會保障的保護。同樣，民主政治通過〈國家勞動關係法[33]〉擴大了勞動人民組織有效工會的權利。Polanyi 認為這些措施是第一步，讓社會可以決定通過民主手段來保護個人和自然環境免受一些經濟危險的威脅。

在全球層面，Polanyi 期望國際經濟秩序有高層次的國際貿易和合作。他沒有一套藍圖，但寫下清楚原則：

> 「然而，隨著金本位制的自動機制消失，各國政府可以放下絕對國家主權最具阻礙作用的特點，即是拒絕在國際經濟領域合作，而同時較為容忍其他國家依照各自意願來設計其國內機制，從而超越了十九世紀要求在世界經濟軌道內的各國政權必要一致的有害教義。」（206 頁）

[30] 1970 年代以來，西方銀行向第三世界借出大批貸款。第三世界債務從 1980 年的 5,670 億美元急增至 1992 年 14,190 億。這期間的利息償還達 7,710 億，本金償還有 8,910 億。在支付大筆利息後依然債臺高築，是因為第三世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要求下借新債還舊債。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的債務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從 1982 年的 51%急增至 1992 年的 100%。第三世界向 IMF 借錢，就要滿足 IMF 的「結構性調整計劃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有三大手段：實現市場開放、貿易自由和削減預算赤字與經常帳戶逆差。

[31] 原註[xxix]：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是 Polanyi 在 1947 年發表的重要論文的題目。

[32] 原註[xxx]：「新政」沒有怎樣保護環境，但環保份子參照「新政」的監管模式取得政治權力和贏得改革，成立環保署這些機構。

[33]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換句話說，各國政府協調一套方便高層次國際貿易的協議，但各社會有多種手段緩衝全球經濟體系的壓力。再者，沒有追求單一經濟模式的壓力，發展中國家有機會改善人民的福祉。這願景也假設有一套全球監管結構以限制市場力量。

Polanyi 的願景取決於擴大政府在國內和國際上的作用，他挑戰現在流行的看法認為更多政府參與會無可避免導致糟糕的經濟業績和國家過度控制社會生活。Polanyi 認為管理虛擬商品要求政府發揮重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沒有任何理由認真對待市場自由主義認為政府在定義上是沒有效率的說法，他也明確駁斥擴大政府必然採取壓迫形式的說法。相反，他認為：

> 「市場經濟逝去，可能是史無前例自由時代的開始。法律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可以比之前的範圍更廣闊和更普遍；監管和控制不應只賦予少數人享有自由，應該是人人自由。」（207 頁）

但他概述的「自由」概念不僅是減少經濟和社會的不公義，他還呼籲要擴大公民自由，強調：

> 「在已建立的社會，不墨守成規的權利必須在制度上受到保護。個人必須自由憑良心做事，無懼正好在社會生活一些領域中被委以行政管理任務的權勢。」（207 頁）

他在《巨變》的結語是：

> 「只要人類確實致力為所有人創造更多自由，就不必害怕權力或規劃會對他不利和破壞他以這兩者為手段建立的自由。這就是複雜社會中**自由**的意義，給予我們所需的全部確定性。」[34]（210 頁）

當然，Polanyi 對二戰後時代的樂觀看法是事與願違。冷戰到來，意味著「新政」是美國改革的結束，不是開始。有計劃的全球經濟合作讓位於相對迅速拓展市場的全球作用的新措施。

可以肯定的是，歐洲的社會民主政府，尤其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從 1940 年代至 1990 年代取得頗大成就，這些具體證據表明 Polanyi 的願景是既強大又現實。但較大規模的國家依然忽視 Polanyi 的願景，Hayek 等人鼓吹的市場自由主義持續取得上風，在 1990 年代佔據領導地位。

[34]原註[xxxii]：Polariyi 相信複雜社會要求國家壟斷暴力。「權力和強迫是那現實的部份；禁止社會有權力和強迫，是不能成立的理想。」（209 頁）。

冷戰至今已經過去，Polanyi 最初的樂觀態度可能最終得到平反。市場自由主義產生不可持續的經濟危機和專制又具侵略性的政權，這些熟悉的場景有真正的替代方案：全球人民協力把經濟服從民主政治，在國際合作的基礎上重建全球經濟。事實上，1990 年代最後幾年有明顯跡象，以這樣的跨國社會運動重塑全球經濟已經不只是紙上談兵。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活躍份子激烈抗議執行新自由主義規則的國際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世界各地團體已開始激烈的全球對話以重建全球金融秩序。這種新興運動面臨巨大的障礙，要建立持久的聯盟以協調往往有相互衝突利益的全球南北人民是艱巨的任務。

再者，這種運動越是成功，面臨的策略挑戰越是強大。能否從下而上改革全球秩序而又不致令世界經濟陷入危機和投資者恐慌，事態仍然是極度不確定，其重大意義在於全球經濟的治理結構在史上第一次成為跨國社會運動活動的中心目標。

這種跨國運動引證著 Polanyi 願景的持續活力和實用性。對 Polanyi 而言，市場自由主義的最大缺陷是迫使人類目的服務非人性的市場機制的邏輯。相反，他認為人應該利用民主管治的工具控制和指導經濟，以滿足我們的個人和集體需求。Polanyi 指出上世紀人類蒙受巨大痛苦，正是因為未能接受這挑戰。他對新世紀的預言再清楚不過。



巨變：近代西歐的政治和經濟的源頭[35]

謹以拙作獻給內子 Ilona Duczynska

[35]原文：*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arl Polanyi, Beacon Press, Ninth printing, June 1968*

〈序〉R. M. Maciver

這本傑作使該領域的大多數其他著作顯得過時或陳腐。很少見到有一些事件是一個時代的徵兆。但在這關鍵時刻出現了對人類事務的形式和意義有了新的理解。Polanyi 沒有自稱在寫歷史 - 他是重寫。他不是帶來燭光照亮陰暗的角落，也不是振振有詞公開他的私人信仰經文;他以洞察力和知識重新照亮了整個時代無可比擬改變的革命過程。

Polanyi 的直接目標是以非凡洞察力揭露深遠影響社會的特定經濟制度，即是在十九世紀已充分發揮的市場經濟。是時候以回顧性智慧來評估這一切，因為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要等到瓜熟蒂落，才可以學會任何事物的本質。有新的視角看待事件和過程，理論和行動。膚淺歷史作家筆下的偶發事件有了更深的意義，似乎只是奇怪的瑣事有了更公正的評估。市場經濟的衝擊把人貶低為勞工，自然環境淪為農地；這促使現代歷史極富戲劇性：被鎖住的社會終於掙脫枷鎖。

其他著作之前有提出但沒有開發這新方向，這方向對人和概念賦予新的比例。舉例來說，1838-48 年英國的憲章運動[36]和 Robert Owen 的先知精神，或是稍後的史賓漢蘭[37]制度的建議，Polanyi 對其歷史意義有更深入剖析！養尊處優的司法界和鄉紳以及當代最開明之士對他們不認識的〔社會〕力量貼上一些原則。我們有了新的認識，見證了經濟無情增長時意識形態之爭：一些盲目反對，一些尋求抑制其對社會結構的無情推力，一些是一心一意或頭腦簡單地歡呼經濟的每一進步。我們目睹舊社會權勢之士力挽狂瀾，被傳統束縛的耶教擁護者顯得無能和尷尬，正統經濟學家沾沾自喜簡要地解釋這一切。但前進的力量把這一切摧毀，倉促興建的防禦崩潰瓦解。我們看到新的解放趕走了新的奴役，同時我們面臨這時代的挑戰。

Polanyi 遠離馬克思的教條和對這反應的辯論。他關注現代文明的經濟過程，但沒有提出經濟決定論的任何說法。他精闢分析特定的歷史轉型：一個經濟體系被另一體系替代，並起了決定性作用。這一切的發生，不是因為經濟關係始終是原始的，不是因為在這情況下，也僅在這種情況下，新經濟的「理想體系」要求無情唾棄人類的社會地位。他巧妙地分析殖民地和工業入侵原始人社會的景況，以顯示這「理想」的意思以及為英國進口了什麼。「血汗工廠」只顧及人類的一項需求而不顧其他，無情地粉碎社會本身。因此人們要發現社會。對 Polanyi 而言，最後的字詞就是「社會」。伴隨工業革命的大悲劇，不是源於逐利資本家的無情和貪婪（儘管不乏不人道記錄），而是市場經濟這不受控制的體系破壞了社會。

[36] Chartist Movement
[37] Speenhamland

人們沒有意識到社會凝聚力的意思。人們的心靈殿堂被掠奪和侵犯。人們不理解革命性變化的社會控制帶來的巨大問題；樂觀的理念含糊其辭，短視的慈善事業與權力利益合謀掩蓋問題；認清問題的智慧還沒有浮現。

Polanyi 在提出這論點時，沒有以渴望眼神審視一些快樂的往事，也不是為反應的成因辯解。不能走回頭路，即使尋找解決辦法也不可能必然找得到。為了自身的情況和需要，我們這時代要重新確認人類生命的核心價值。傳統已然失敗，若然相信傳統，傳統會背叛我們。我們決不能放棄個人自由的原則，但必須重新建立。我們不能恢復過去的社會，即使歷史陰霾隱藏其罪惡，我們必須為自己重建社會，從過去中學習我們能夠學習的教訓和警告。也許我們也應牢記人類事務的因果關係是如此深深糾結，即使最聰明的頭腦也不能完全揭開。總要有一刻我們必須以行動為我們的價值觀作證，讓目前世界的迫切力量能夠釋放，邁向新的目標。

這本書是如此刺激和發人深省，有些論點勢必激發爭議和質疑。有些人可能懷疑市場經濟的作用是否那麼絕對，體系本身的邏輯是否嚴謹和令人信服。他們可能質疑作者的說法：「國家和人民僅僅是表演的木偶，不能自控。」有些人可能會希望對自發調節市場不同形式的「保護」有不同的評價，對促進關稅和社會立法者聯手可能感到有點不安等等。但他們必須肯定清楚認識整體論點的說服力。在地震後，在我們珍視的神廟被破壞後，我們站在新的制高點向下看，看到基礎暴露的弱點；也許我們可以學習如何以及在哪裡重建體制結構，以更好抵禦變化的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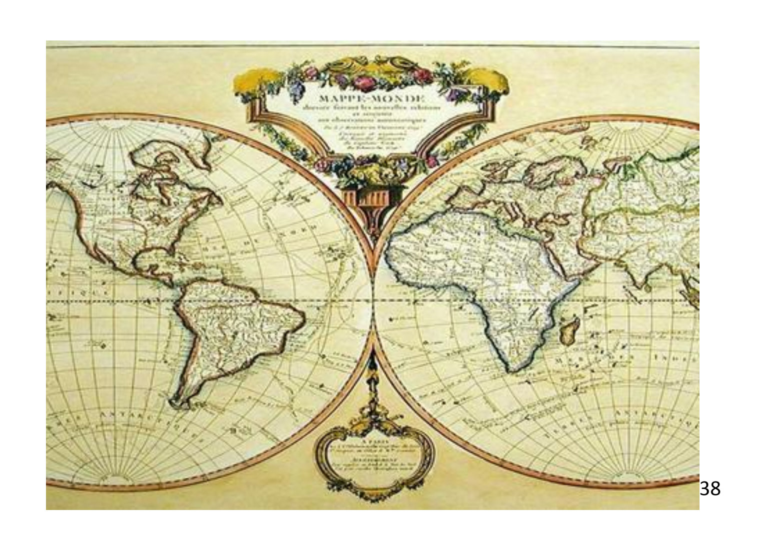
今天，最重要的是這對在未來制定國際組織的教訓。其一是這表明「通過世界貿易達致世界和平」這樣的自由公式是不夠的。如果我們滿足於這樣的公式，我們受害於簡化了危險和欺騙。國家或國際體系不可以依靠自動調節。平衡預算，自由企業，世界貿易，國際交流和維持貨幣面值，都不能保證國際秩序。只有社會可以保證；也必須發現國際社會，也必須維持體制結構和控制經濟的計劃事項。

所以這本書信息的對象不僅是經濟學家（儘管有強力的信息），不僅是史學家（雖然打開了新路徑），不僅是社會學家（但有傳達對社會的深層意思），不僅是政治學家（但有助重申老問題和評價老教條）；任何有頭腦的人想超越本人對社會教育的認識，任何人想了解生活其中的社會，以往和現在的危機，這本書是木鐸金聲，從中讀者可瞥見更深層次的信念，學習超越一般現有的不足替代品：迄今未能向前進一步的自由主義，全有或全無的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的純粹否定；因為這些主義往往希望組成一些經濟體制；只有當我們發現社會的首要重要性是作為人類相互依存的連貫效用，我們可以希望超越我們這個時代的困惑和矛盾。



第一部

國際體系


[38]

第一章
百年和平

十九世紀的文明已經崩潰。本書關注的是這事件的政治和經濟源起以及迎來的偉大變革。

十九世紀的文明取決於四個機制。首先是勢力均衡體系，一世紀以來防止大國之間的任何長期和毀滅性戰爭。第二是國際金本位制[39]，標誌著世界經濟的獨特組織。第三是自發調節的市場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物質福利。第四是自由國家。視乎分類方式，這些機制可以劃分為經濟兩項，政治兩項；以另一種方式分類，可劃分為國家兩項，國際兩項。這些機制的特性決定了我們文明史的輪廓。



這四項機制之中，金本位制至為關鍵，這項機制的衰敗是慘劇的直接原因。金本位制衰敗之時，已犧牲了試圖挽救金本位制但徒勞無功的其他機制。

但這體系的源頭和矩陣是自發調節的市場。正是這種創新導致了一種特定的文

[38] http://modelunsummer.wikispaces.com/file/view/international-relations9.jpg/239504387/471x338/international-relations9.jpg

[39] gold standard

明。金本位制只是試圖把國內市場體系擴大至國際領域；〔國際〕勢力均衡是部份建基於金本位制的超級體系；自由國家是建立於自發調節的市場。十九世紀制度體系的關鍵是管理市場經濟的法律。

我們的觀點：自發調節市場的概念意味著鮮明的理想國想法。這樣的機制不可能存在而不會消滅人類和社會的自然物質，只會摧毀人類和把周圍環境變成荒野。社會無可避免要採取措施來保護自己，但任何措施會防礙自發調節的市場，打亂了工業生活的組織，因而以另一種方式危及社會。正是這種困境驅動了市場體系的發展走進了一個明確的狀態，最終擾亂了建基於市場體系的社會組織。

要理解人類歷史上最深遠的危機，這樣的解釋似乎太簡單。試圖把文明及其內涵和精神氣質歸納為一成不變的機制，簡直是緣木求魚；選擇其中一個機制，然後以這機制的一些技術質量來爭論文明不可避免會自我毀滅，也只會徒勞無功。文明就像生活本身，是萌生於大量獨立因素相互作用，而這些因素一般不能還原為受限的機制。要追蹤文明衰敗的體制，可能似乎是徒勞無功。

但這正是本書要開展的工作。為此，本書刻意致力調整目標以切合極端獨特的主題。十九世紀的文明獨一無二，正是因為這集中在一個明確組織機制。

沒有任何解釋可以完滿解釋大災難突然而來。似乎變革的力量已經被壓抑了一個世紀，突發事件如洪流傾瀉而下衝擊人類。在超大範圍的社會轉型之上還有前所未見的戰爭類型，摧毀了多個國家，新帝國的輪廓浮現在一片血海。但這魔鬼般的暴力其實只是疊建在迅速而沉默的變化潛流，這潛流吞噬了過去，而往往不帶一絲漣漪！對大災難的合理分析必須考慮洶湧的行動和靜默的分解。

本書不是歷史著作，不是為突出事件尋找令人信服的時序，而是以人類機制來解釋事件的趨勢。本書自由選用過去的場景，唯一目的是要解釋眼前事件；本書詳細分析關鍵時期，幾乎完全忽略了之間的時段；本書涉及多個領域以追求這單一目標。

本書首先討論國際體系的崩潰，試圖說明一旦建基於國際勢力均衡體系的全球經濟崩潰，國際勢力均衡體系不能確保和平。這解釋了這體系的突然中斷以及不可思議的迅速分解。

但如世界經濟崩潰是依隨著文明衰敗，肯定前者不是由後者引發。世界經濟崩潰的源頭可追溯百年前社會和科技的巨變，因而自發調節的市場在西歐崛起。這段冒險旅程來到我們這年代走到終點，結束了工業文明歷史的獨特階段。

本書最後部份討論支配我們這年代的社會和國家變化的機制。從廣義上來說，我們認為人類目前的狀況應以這危機的機制源頭來定義。

十九世紀的現象是西方文明史上前所未聞：從 1815 至 1914 年間的百年和平。除了或多或少殖民性質的克里米亞戰爭；在這期間英國，法國，普魯士（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俄羅斯總共只有十八個月曾彼此開戰。在這之前的兩個世紀，相比數字是每百年平均有六十至七十多年是戰火瀰漫。十九世紀最激烈的戰爭是 1870-71 年的普法戰爭，不到一年就結束，戰敗國有能力支付賠款而沒有影響本國的貨幣金融。

這種務實的和平主義佔上風，肯定不是因為沒有導致嚴重衝突的成因。強國和偉大帝國之間的內外狀況幾乎時刻有變，伴隨著這和平的盛會。在這世紀上半葉，內戰、革命和反革命的干預措施無日無之。在西班牙，Duc d'Angouleme 揮軍進攻 Cadiz；在匈牙利，革命軍幾乎打敗了國皇親臨指揮的軍隊，最終被俄羅斯援軍擊敗。德系國家，比利時，波蘭，瑞士，丹麥和威尼斯都有武裝干預，標誌著神聖同盟[40]無處不在。世紀下半葉釋放了進步的動力；奧斯曼帝國，埃及帝國和中東酋長帝國相繼解體，中國被外國軍隊入侵，被迫對外開放，非洲大陸被列強瓜分。同時，美國和俄羅斯乘時崛起，成為世上兩個大國。德國和意大利實現了民族團結；比利時，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匈牙利成為歐洲地圖的主權國家。工業文明邁進，公然入侵陳腐文化或原始民族的領域。俄羅斯軍事征服中亞，英國贏得印度和非洲戰爭，法國侵佔埃及，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敘利亞，馬達加斯加，印度支那和暹羅，引起列強之間的衝突，一般只能以武力解決。然而，這些衝突都是局部性，而無數劇烈變化的情況都被聯合軍事行動或列強平靖而妥協。不管是什麼方法，結果都是相同。在這世紀上半葉，神聖同盟以自由之名壓制自由，禁止憲政主義；到了下半世紀，有商業頭腦的銀行家又是以和平之名把憲制強加於動盪的獨裁政制。因此，在不同形式和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之下（有時以進步和自由為名，有時由於皇位和祭壇的權威，有時受惠於股市和支票簿，有時因為腐敗和賄賂，有時因為道德和開明的呼籲，有時被刺刀所迫），但殊途同歸：和平得以維持。

這幾乎是奇蹟的事態是勢力均衡無意中產生的不尋常結果。就本質而言，均衡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即是各勢力單位的存活；事實上，這只是假設三個或更多有勢力的單位總會與較弱勢單位聯手抗衡最強者增強勢力。在世界歷史的範疇，勢力均衡關注的是國家得以保持獨立。但是，為了達到這目的，各國持續開戰，不斷改變合作夥伴。古希臘或意大利北部城邦是這情況的實例；戰鬥團體不斷轉換成員，藉著戰爭在很長一段時間維持了這些城邦的獨立。同樣原則的行動維護了

[40] Holy Alliance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41](1648)劃分的歐洲國家主權長達兩百年。七十五年後，烏得勒支和約[42]的簽約國正式宣告遵從這原則，從而以體制落實並建立相互保證，以戰爭保障強國弱國同時存在。事實上，在十九世紀，是同樣的機制導致和平，不是戰爭；對史學家來說，這是富挑戰性的問題。

本書提出這是因為出現了全新的因素，即是因而衍生的和平權益。傳統上，這種權益被視為在國家體系範圍之外。和平以及附屬的工藝和藝術只是日常生活的裝飾。教會可能為和平祈禱，一如為豐收祈禱，但國家行動領域是主張動武；政府把和平置於安全和主權之下，即是為求實現意圖，不惜採取最終手段。若是社會有和平權益的組織存在，這是極為不妥當。十八世紀後期，盧梭[43]指責商人不愛國，懷疑他們喜歡和平不愛自由。

1815 年以後，這種變化是突然和整體。法國大革命增強了工業革命的浪潮，和平成為普遍關注的權益。德國政治家 Metternich 聲稱歐洲人想要的是和平，不是自由。德國人 Gentz 也指責愛國者是新蠻人。教會和皇室開始提出歐洲非國家化的論點，其論據得到支持，因為兇猛的戰爭新形式和新興經濟體系大大增強了和平的價值。

像往常一樣，鼓吹新「和平權益」的人主要是權益的受惠者，即是世襲職位被席捲歐洲大陸革命浪潮的愛國主義威脅的君主和封建主義者。因此，在這數十年間，神聖同盟是積極和平政策的威懾力量和思想動力，同盟軍隊在歐洲四處鎮壓少數民族和抑制多數民族。1846 年至 1871 年是「歐洲歷史上最混亂和擁擠的四份一世紀」[44]：和平的基礎不穩，應對力量消減而工業主義的實力不斷增長。在普法戰爭之後的四份之一世紀，和平權益復甦，其載體是新成立的強大歐洲協同體[45]機制。

但權益一如意圖，除非通過一些社會媒介轉化為政治手段，否則只會是理想的空談。從表面上看，沒有這種實現的載體；說到底，神聖同盟和歐洲協同體只是獨立主權國家的組合，因而受到勢力均衡及其戰爭機制的影響。那麼如何維持和平？

誠然，任何勢力均衡體系往往會防止因為某國未能預見其試圖改變現狀所引起勢力調整帶來的戰爭。著名的情況是德國首相卑斯麥在 1875 年因為俄羅斯和英國的干預（奧地利對法國的援助當作是必然的）而取消對法國的新聞宣傳；這一次，

[41] Treaty of Munster and Westphalia
[42] Treaty of Utrecht
[43] J. J. Rousseau
[44] 原註 1：Sontag, R. J., *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 1871-1932,* 1933.
[45] Concert of Europe，中譯有：歐洲協調

歐洲協同體針對德國，德國被孤立。在 1877-78 年，德國無法阻止俄羅斯與土耳其的戰爭，但藉著英國嫉妒俄羅斯可能進佔土耳其內海的達達尼爾海峽[46]，成功把戰事局限為地方戰事；德國和英國支持土耳其對抗俄羅斯，從而挽救了和平。1878 年的柏林會議推出瓜分奧斯曼帝國在歐資產的長期計劃，儘管這隨後改變了現狀，但避免了大國之間的戰爭，因為各路人馬實際上預先知道如開戰會面對什麼軍力。在這情況下，和平是勢力均衡體系受大眾歡迎的副產品。

此外，如只涉及小國的命運，有時刻意消除戰爭成因是可以避免開戰。小國受到勸阻，以避免以任何方式改變現狀和可能引發戰爭。荷蘭在 1831 年入侵比利時，最終導致該國宣告中立。挪威在 1855 年宣告中立。在 1867 年，荷蘭向法國出售盧森堡，德國提出抗議，盧森堡宣告中立。在 1856 年，歐洲協同體宣稱維持奧斯曼帝國完整對歐洲的均衡至關重要，並致力維持該帝國；1878 年之後反過來認為奧斯曼帝國解體是勢力均衡之必需，該帝國的解體得以有序進行，雖然在這兩種情況下的決定關乎幾個小民族的生死存亡。丹麥在 1852 至 1863 年間，以及德國在 1851 至 1856 年間都威脅擾亂均衡體系，每次都是列強迫使小國屈從。在這種情況下，列強利用體系提供的自由行動的權力以實現共同權益；這共同權益正好是和平。

偶爾及時澄清勢力情況或脅迫小國可以避免戰爭，但遠遠不足以維持百年和平。國際情況失去均衡，可能有無數理由：從皇室戀情到河口淤積，從神學爭議到科技發明。僅僅是財富和人口的增減勢必導致政治勢力失衡，外部情況勢必影響內部。即使有組織的勢力均衡體系能夠確保和平，永無戰爭威脅，但先要能夠直接處理內部因素，在萌芽階段防止可能出現的失衡。一旦失衡有了勢頭，只有動武才可以解決。老生常談的是：要確保和平，必先要消除戰禍成因，但一般沒有認識這先要在源頭控制生活的流程。

為此，神聖同盟有特有工具。歐洲的皇室貴族組成了國際化的親屬關係，而羅馬教會在南歐和中歐為他們提供自願的民間體制，包含從最高到最低的的社會階梯。血統和恩賜交織成有效的當地管治工具，只須輔之以武力，就可確保歐洲大陸的和平。

但繼承的歐洲協同體沒有神聖同盟的封建和神職觸鬚，至多只是一個鬆散的聯邦，與 Metternich 的緊湊傑作毫不連貫。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會召開列強會議；列強之間的嫉妒滋生了陰謀，反對意見和外交破壞；聯合軍事行動變得罕見。神聖同盟有完整統一的思想和目的，但依然依靠頻繁的武裝干預才可以維持歐洲和平；歐洲協同體較少使用武力，但可以維持世界範圍的和平。要解釋這驚人壯舉，我們必須尋求一些在新環境中運作，又未被公開的強大社會媒介，這媒介發

[46] the Dardanel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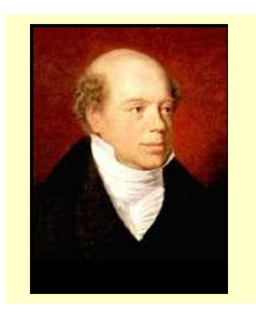
揮著昔日皇朝和主教的作用，讓和平權益有效發揮。這個不為人知的因素是**國際金融集團**[47]。

迄今沒有人全面研究十九世紀國際銀行的性質；這個神秘體制萌生於政治-經濟神話的明暗對比。[48] 有些人爭辯它僅僅是政府的工具，有人反駁政府是這貪得無厭體系的工具，有人指責它是國際紛爭的根源，有人認為它是柔弱世界主義的載體，削弱了剛強國家的實力。誰都不是大錯特錯。國際金融集團是自成一格的體系，特見於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和二十世紀初三十年，其功能是聯繫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組織，為國際和平體系提供工具；和平體系得助於列強，但列強沒有能力建立和維持和平體系。歐洲協同體偶爾有所行動，而國際金融集團是極具彈性的常設機構。國際金融集團獨立於任何政府，即使是最強大的政府，但與各方有聯繫。國際金融集團獨立於中央銀行，即使是英倫銀行（英國央行），但彼此緊密相連。金融和外交之間有親密接觸；任何一方考慮任何長遠計劃，無論是和平或好戰，必要確定對方的好處。然而，成功維護總體和平的秘密無疑是因為國際金融的位置，組織和技術。



國際金融集團人才和動機贏得的地位是牢牢植根於嚴格商業利益的私營領域。羅富財家族(Rothschilds，插圖為羅富財家族紋章[49])不是任何國家的子民；這家族體現了抽象的國際主義原則，只是對企業效忠；在快速增長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企業信貸已成為政治政府和工業界的唯一超國家聯繫。在最後的情況，企業的獨立性是源於時代需求要有主權的代理人，以取得國家政治家和國際投資者的信心；正正是這重要需求，近乎完美的解決方案就是落足歐洲各國首都的猶太銀行家王朝的抽象而不受管轄的特質。企業不是和平主義者；企業財富來自戰爭融資，不受道德考慮影響，不反對任何小規模，短期或局部戰爭。但如列強全面開戰，影響到體系的貨幣基礎，就可能損害業務。事實的邏輯是企業身處革命性變革中必要維持總體和平；世上人人都受這些革命變革影響。

[47] *haute finance*
[48] 原註 2：Feis, H.,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1930, 本書經常引用參考。
[49]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b/b8/Rotschilds_arms.jpg/220px-Rotschilds_arms.jpg



我不在乎誰坐在英格蘭的王位管治日不落帝國。

控制英國的貨幣供應，即是控制大英帝國。我控制著英國的貨幣供應。

Nathan Rothschild[50]

在組織方面，人類歷史上一手造成最複雜制度之一其核心就是國際金融集團，雖然為時短暫，但它的豐富形式和工具是兼收並蓄，只有全人類對工商業的追求可堪媲美。除了國際金融集團中心，還有幾個圍繞著發鈔銀行和證券交易所的銀行中心。此外，國際銀行不僅限於對政府融資和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冒險，其業務也包括外商對工業，公用事業和銀行的投資，以及對外國公共及私營機構的長期貸款。各國的金融體系是縮影。單是英國已有幾十種不同類型的銀行；法國和德國的銀行組織也是各有專注；在這些國家，財政部門的操作及其與私人融資的關係互有不同，令人詫異，其細節也頗為微妙。貨幣市場處理眾多商業票據，海外承兌匯票，純粹的金融票據，以及活期借款和其他證券經紀業務。各國社群和個性千奇百怪，其威望和地位，權力和忠誠，資金資產和人脈，施惠和社交氛圍各有獨特類型，使這模式變得眼花繚亂。

國際金融集團不是設計為和平的工具；歷史學家認為這是意外之得，而社會學家稱之為適逢其會。國際金融集團的動機是收益；要實現這目標，有必要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而政府目標是權力和征服。在這階段可以忽視政府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的區別，也可以忽視政府之間的經濟和政治目的；實際上，在此期間的民族國家其特點使這樣的區分沒有實質意義，無論是什麼目標，政府要通過行使國家權力和增加國家勢力來達致。另一方面，國際金融集團的組織和員工已是國際化，但還沒有完全獨立於國家組織。作為銀行家的活動中心，參與集團、財團、投資集團、國外貸款、財務控制或其他雄心勃勃的交易，國際金融集團必然要尋求國家銀行、國家資本以及國家財政的合作。一般而言，雖然國家財政屈從政府的程度低於國內工業，但仍足以促使國際金融集團急於與政府保持聯繫。國際金融集團憑藉它的位置和人員，以及其私人財富和背景，實際上是獨立於任何政府，可以為新的權益服務，這權益沒有本身的特定機構，也沒有任何其他機構為之服務，但與社會至關重要；這權益就是和平。但不是不惜一切以任何獨立，主權，既得榮譽或涉及列強未來願望為代價的和平，但依然是和平，無須有以上犧牲就可以實現的和平。

不是為了和平而犧牲其他。勢力優先於利潤。然而無論這些領域是如何緊密相互滲透，最終是戰爭奠定了業務的法則。例如，自 1870 年以來，法國和德國勢成

[50] http://www.sott.net/image/image/s5/103815/medium/NathanRothschild.jpg

水火，但這沒有阻礙兩國之間的交易。為了短暫目的，偶爾組成銀行集團；德國銀行私下投資國境以外的企業，不在資產負債表披露：參與短期貸款市場貼現的匯票和以法國銀行商業文件為抵押發放短期貸款；直接投資鐵和焦炭企業以及在法國諾曼第 Thyssen 的工廠；但這樣的投資只限於法國的明確領域，而且受到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猛烈抨擊；直接投資較多見於殖民地，例如德國致力取得阿爾及利亞的高質礦石，或參與投資摩洛哥。然而，1870 年以後，雖然巴黎證券交易所取消了禁止德國證券的官方默許政策，不爭的嚴峻事實是法國依然「選擇不要冒險讓借貸資本的力量針對自己」[51]。奧地利也受到懷疑；在 1905-06 年間的摩洛哥危機，禁令擴大至匈牙利。巴黎金融界呼籲要接納匈牙利證券，但業界支持政府，堅決不支持對可能的軍事對手作出任何讓步。政治外交對抗持續不減。政府否決可能增加假想敵潛力的任何舉措。從表面上看，不止一次解決了衝突，但內幕人士知道這只是轉移到和諧表面之下的更深層次。

德國的東進野心是另一例。政治和金融混在一起，但政治是至高無上。德國和英國危險爭吵了四分之一世紀後，在 1914 年 6 月簽署了巴格達鐵路的全面協議；但很多人認為為時已晚，未能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戰，其他人則認為英德協議證明兩國之間的戰爭不是因為經濟擴張的衝突。兩種觀點都沒有事實的證明。該協議實際上沒有解決主要問題。沒有英國政府同意，德國鐵路線仍然未能越過〔伊拉克南部〕Basra，而條約設定的經濟區勢必導致兩國在未來的衝突。與此同時，列強繼續為大日子做好準備，這日子比他們的預測來得更快。[52]

國際金融不得不面對大大小小的權力衝突野心和陰謀；業界的計劃被外交手段挫敗，長期投資受損，政治破壞和暗中的阻塞阻礙了它盡力建設。國際金融集團無奈與國家銀行合作，否則寸步難行，但國家銀行往往是各自政府的幫兇；如沒有在事前與各參與者敲定分享戰利品，什麼計劃都是徒然。然而，金融權勢也不經常是受害者，而是受惠於融資的笑裡藏刀金錢外交。商業上的成功涉及以武力無情對待弱小國家，大規模賄賂落後的管理部門，以及為求目的不擇手段；這都常見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森林。但出於功能性考慮，國際金融集團不得不盡力避免全面戰爭。如戰火漫天，絕大多數政府債券持有人以及其他投資者和交易商勢必成為第一批輸家，特別是如影響貨幣。國際金融集團對列強施加的影響始終有利於歐洲和平，而且影響是有效的，政府本身在多方面也依賴這樣的合作。因此，歐洲協同體從來就是和平權益的代言人，再加上各國內部的投資習慣已經扎根於不斷增長的和平權益，就可以理解即使在 1871 至 1914 年間，雖然多個國家幾乎動武，但始終沒有爆發熊熊大火的戰爭。

融資是國際金融集團發揮影響力渠道之一，有力影響一些較小的主權國家的議會

[51] 原註 3：Feis, H., *op. cit.,* p. 201.

[52] 原註 4：參見本章〈資料參考〉

和政策。貸款和貸款續期是基於信譽，而信譽是基於良好行為。因此，憲制政府的行為反映在財政預算，貨幣的外部價值不能偏離財政預算，債務國政府要小心留意匯率和避免影響穩健財政狀況的政策；非憲制政府不受國際金融集團歡迎。一旦國家採用了金本位制，這些有用的格言成為有說服力的行為規則；金本位制把允許的波動限制在最低波幅。金本位制和憲政主義是倫敦金融城向許多小國傳授的工具，這些小國採用了國際新秩序這些守規符號。大英帝國耀武揚威，有時展示船堅砲利，但更經常在國際貨幣網絡扯線。

通過暗地裡管理世界各地半殖民地廣大地區的財政，包括近東和北非火藥庫地區的衰敗區域的伊斯蘭教帝國，國際金融集團也得以確保其影響力。正是在這些地區，金融家的日常工作影響著內部秩序的微妙因素，為這些和平最為脆弱的動亂地區提供了實際的管理。這些地區面對幾乎不可逾越的障礙而能夠滿足投資的無數先決條取得長期資本投資，正正是因為國際金融集團。巴爾幹地區，小亞細亞，敘利亞，波斯，埃及，摩洛哥和中國的鐵路建設是史詩式的耐力和驚心動魄，讓人想起北美大陸類似的壯舉。但是，困擾歐洲資本家的主要風險不是技術或財務失敗，而是戰爭 - 不是小國之間的戰爭（這很容易被孤立），也不是大國與小國之戰（經常發生但頗為方便），而是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歐洲不是空洞的大陸，有千百萬新舊民族的人民以此為家，每條新鐵路要穿越不同可靠程度的邊界，有些邊界被新鐵路嚴重削弱，有些因此而變得鞏固。只有鐵腕融資才可以控制落後地區的無能政府，避免災難。土耳其在 1875 年拖欠債務，立即爆發軍事大火，自 1876 年持續至 1878 年簽署柏林條約，之後三十六年和平得以維持。這段驚人的和平時期始於 1881 年土耳其蘇丹的「聖月宣言[53]」，在君士坦丁堡成立由債券外國持有人控制的「公共債務委員會[54]」。國際金融集團的代表被委任管理土耳其的大部份財務。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促成列強之間的妥協，在其他方面防止土耳其自找麻煩，在其他方面，他們只是列強的政治代理人；整體而言，他們服務債權人的利益，如可能的話，也是服務試圖在土耳其謀利的資本家。這任務變得非常複雜，因為債務委員會不是代表私人債權人的機構，而是歐洲公法的工具，但國際金融集團在這機制沒有官方代表。但正是因為這兩棲能力，國際金融集團能夠跨越那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組織之間的鴻溝。

貿易與和平已互有關聯。在過去，貿易組織一直是軍事性質和好戰，是海盜、浪人、武裝行旅、狩獵手、佩劍商人、武裝鎮民、冒險家和探險者、殖民者和征服者、狙擊手和奴隸販子，以及特許公司殖民地軍隊的附屬品。現在這一切都拋諸腦後。貿易現在依賴國際貨幣體系，而這體系在全面戰爭中無法運行，要求和平，而列強致力維持和平。但正如前述，勢力均衡體系本身無法確保和平。國際金融

[53] Decree of Muharrem，土耳其（奧圖曼帝國）的債務由£191,000,000 減至 £106,000,000，但需以鹽稅，煙草稅等等作為還債抵押。

[54] Dette Ottomane。

集團肩負這任務，而國際金融集團正正體現貿易依賴和平的新原則。

人們慣於認為資本主義的擴張是完全不和平的過程，金融資本煽動了無數殖民地罪行和擴張主義入侵，與重工業有密切關聯，使得列寧聲稱金融資本要為帝國主義負責，特別是爭奪勢力範圍、特許權、治外法權和西方列強在落後地區取得控制地位的種種形式，以投資於鐵路、公用事業、港口和重工業藉以獲利的其它永久性設施。實際上，商業和金融是以往許多殖民地戰爭的起因，但也避免了大戰。商業和金融與重工業相互聯繫，雖然實際上只是在德國有密切聯繫，但這種關係是這兩項大事的根由。金融資本是重工業的頂層組織，又以多種形式與各工業部門聯繫，致使金融資本政策不為任何團體支配，以免戰爭促進了任何一項利益而損及其他利益。當然，一旦發生戰爭，國際資本必然是輸家；不過，如戰事局限於事發地方，即使國家資本也偶爾會從中獲利；這足以解釋幾十起殖民地戰爭乎都是由融資者組織；但他們也安排和平。

這務實體系致力防止全面戰爭爆發，又藉著此起彼落的小規模戰爭進行「和平」業務，而且改變了國際法，這正好展示其本質。儘管民族主義和工業顯然會令戰事變得更激烈和徹底，但已建立了有效措施以保障和平貿易得以在戰事期間繼續。據記載，〔普魯士〕腓特烈大帝[55]「出於報復」於 1752 年拒絕償還英國債主的貸款。美國政治科學教授 Amos S. Hershey 指出「之後再沒有過這樣的意圖。…敵對行動爆發後沒收交戰區內敵國子民的私有財產，法國大革命戰爭是最後的重要例子。」[56]。克里米亞戰爭[57]爆發後，敵國商人被允許離港；在其後五十年，普魯士、法國、俄羅斯、土耳其、西班牙、日本和美國都遵守這措施。從這場戰爭開始，交戰國一直頗為容忍民間自由地做生意。因此，在 1898 年西班牙—美國之戰時，裝載著美國貨品（不是戰爭禁運品）的中立國船隻可以自由出入西班牙港口。以為十八世紀的戰爭在所有方面都比十九世紀戰爭較少破壞是偏見觀點。就敵國僑民地位、處置敵國人民的貸款和財產，以至敵國商人離港權利而言，十九世紀的措施顯然有利保障戰時的經濟系統。到了二十世紀這趨勢才逆轉。

因此，經濟活動的新組織形式是百年和平的背景。在第一階段，新生的中產階級主要是一股危及和平的革命力量，可見諸拿破崙一世時期的動蕩；神聖同盟鑑於國家動蕩這新因素，所以組織其反動性和平。在第二階段，新經濟取得勝利。中產階級本身此時變成和平權益的支持者，而且比反動的前人更有勢力，也得到新經濟體系的國內和國際特點的培育。不過，和平權益在這兩方面漸見成效，是因為能夠把勢力均衡體系為己所用，為體系提供社會工具直接處理活躍於和平領域的內部勢力。在神聖同盟時期，這些工具是得到教會的精神和物質力量支持的封

[55] Frederick the Great
[56] 原註 5：Hershey, A. S.,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nd Organization,* 1927, PP. 565-69.
[57] Crimean War

建制度和王權；歐洲協同體時期的工具是與之結盟的國際金融和國家銀行體系。沒有必要誇大兩者的區別。在 1816-46 年的三十年和平時期，英國已迫切要求和平與商業，神聖同盟也沒有鄙視羅富財家族的幫助。也是在歐洲協同體時期，國際金融界往往不得不依靠與王朝和貴族的聯繫。但這些事實只強化本書的觀點：在每一情況下，和平得以維持不是簡單地通過列強的大臣，而是通過為服務整體利益的有組織具體機構。換句話說，只有在新經濟背景之下，勢力均衡體系才能避免全面衝突。不過，歐洲協同體的成就卻遠遠大於神聖同盟；因為後者是在穩定不變的歐洲大陸有限地區維持和平，而前者是在社會和經濟進步的革命浪潮席捲全球時成功遍及全球。這偉大的政治功績是因為國際金融集團這特殊實體出現，是國際生活中政治與經濟組織之間的特定紐帶。

至此，很明顯和平組織是建立在經濟組織之上，但兩種組織有非常不同的一致性。所謂世界性和平組織，只有在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因為歐洲協同體基本上不是和平體系，而僅僅是受戰爭機制保護的獨立主權國家體系。世界經濟組織則與此相反。除非輕率地把「組織」慣性局限為「中央發號施令，所屬職能部門執行」，否則就必須承認這組織建基的普世接受原則是最確實，其實際成份是最具體。財政預算和軍備，外貿和原材料供應，國家獨立和主權，都只是貨幣和信貸的功能。到了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世界商品價格是數百萬歐洲大陸農民生活最核心的現實；天下商人每天都注意倫敦貨幣市場的波動；各國政府按世界資本市場的形勢來討論未來計劃。只有瘋子才懷疑國際經濟體系不是人類的物質存在之軸心。因為這體系的運行需要和平來維持，勢力均衡體系是為其服務。拿走了這經濟體系，和平權益就從政治中消失。除此之外，沒有足夠原因這經濟體系會存在，也沒有可能保護這體系。歐洲協同體之成功源於經濟體系新國際組織的需要，也不可避免地隨著其解體而終結。

1861-90 年是德國鐵血宰相卑斯麥主政的年代，也是歐洲協同體的黃金時期。在崛起成為強國之後的二十年，德國是和平權益的主要受益者，以奧地利和法國為代價，強勢加入強國行列；出於本身利益，德國必須維持現狀和防止戰爭，因為戰爭只可能是報復德國之戰。卑斯麥刻意把和平的觀念培育為列強的共同事業，並避免可能迫使德國放棄其和平強國地位的承諾。他反對在巴爾幹地區和海外的擴張野心；他以自由貿易為武器對付奧地利，甚至法國；他借助勢力均衡策略挫敗了俄羅斯和奧地利的巴爾幹野心，因而與潛在的同盟國共同進退，並避開可能將德國捲入戰爭的情況。這位在 1863-70 年是詭計多端的侵略者，在 1878 年變身為誠實的代理人，反對殖民冒險活動。為了德國的國家利益，他有意識地領導著他認為是那時代的和平趨勢。

然而，到了 1870 年代末期，自由貿易時期(1846-79 年)結束；德國實際採用金本

位制，標誌著貿易保護主義和殖民地擴張時代的開始。[58] 德國與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結成堅強聯盟，以加強本身的地位；不久之後，卑斯麥失去了德國議會政策的控制。自此之後，英國成為歐洲和平權益的領導者；歐洲依然是獨立主權國家的組合，因此受到勢力均衡的制約。在 1890 年代，國際金融集團處於巔峰，和平似乎是前所未有地牢固。英法兩國在非洲有利益分歧；英國和俄羅斯在亞洲相互競爭；歐洲協同體勉力而為，但依然發揮作用；儘管有三國同盟[59]（德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但依然有多個獨立強國猜疑地相互監視。不久之後，在 1904 年，英國和法國就摩洛哥和埃及問題達成全面交易，幾年後又與俄羅斯在波斯問題上妥協，形成一個對抗聯盟。歐洲協同體是獨立國家之間的鬆散聯邦形式，最終被兩個敵對的勢力集團取代；勢力均衡作為體系已經壽終正寢。此時歐洲有兩個敵對的勢力集團，令勢力均衡的機制停止運作，不再有第三個勢力集團會與這兩集團合縱連環，拉一個打一個以挫敗其中一個集團獨大。大約在同一時期，當時的世界經濟漸見敗象：徵兆是殖民地競爭和爭取異國市場漸趨激烈。國際金融集團避免戰爭蔓延的能力迅速減弱。和平苟延殘喘又七年，但十九世紀經濟組織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為百年和平劃上句號。

歷史學家的要務是要認識和平建基的高度人工化經濟組織其真正本質。

第一章資料參考

1. **勢力均衡政策**。勢力均衡政策是英格蘭的國家行為方式，完全是務實和實際，不應混淆「勢力均衡原則」或「勢力均衡體制」。這政策是英國島國位於被各政治體系佔領的歐洲大陸之外的後果。面對強大的大陸國家正在形成，歷代英格蘭政治家奉行勢力均衡政策是保障國家安全的唯一機會。英格蘭的勢力均衡政策早於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體制約兩世紀，而且政策的形成過程是完全獨立於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原則。然而，歐洲大陸勢力均衡體制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幫助了英格蘭的國策，因為這最終使英格蘭更容易與任何在歐洲大陸領頭的強國結成聯盟。因此，英國政治家往往有這種想法：即英格蘭的勢力均衡政策實際上表達了勢力均衡原則，以及英格蘭奉行這政策時只是在以那原則為基礎的體制中發揮本身的作用。然而，英國政治家並非有意遮掩本身的自衛政策是有別於有助推動政策的原則。Edward Grey 爵士在《*Twenty-five Years*》表述：「理論上，當歐洲強大集團的優勢似乎有利穩定與和平，英國並無異議。支持這樣的組合一般總是英國的首選。只有當佔優勢的勢力變得有侵略性以及英國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威脅時，即使不是出於謹慎政策也會是出於自衛本能而趨向可被清楚描述為勢力均衡的任何行動。」

因此，正是出於自身的合法利益考慮，英格蘭才支持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體制發展和支持其原則。英格蘭這麼做是其政策的一部份。以下的引文說明結合「勢力均衡」的兩種根本不同的含

[58] 原註 6：Eulenburg, F., *Aussenhandel and Aussenhandelspolitik.* I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Abt. VIII, 1929, p. 209.

[59] Triple Alliance

義所引發的觀念混亂。1787 年，Charles James Fox 憤憤不平質問政府：「英國是否不再支持歐洲的勢力均衡，是否不再被人尊重為自由的保護者？」他聲言英國應被接受為歐洲勢力均衡體制的擔保人。四年之後，Burke 把體制描述為據言已生效兩世紀的「歐洲公法」。這樣在言辭上把英格蘭國策和歐洲體制視為一致，很自然讓美國人更難區分這兩個同樣令美國人反感的概念。

2. **「勢力均衡」作為歷史規律**。勢力均衡的另一層含義是直接以勢力單位的本質為基礎。在近代思潮中，Hume（休謨）首先提及。在工業革命後，政治思潮幾乎整體暗淡無光，他的成果不再為人所知。Hume 理解到這現象的政治本質，並強調其獨立於心理和道德事實。不管動機，只要參與者的行為體現勢力的作用，這現象就會發生。他寫道：經驗證明「不管〔動機是出於〕嫉妒的競爭或謹慎的政治，效果是一樣。」F. Schuman 說：「如假定多國體制由 A、B、C 三國組成，很明顯任何一國勢力上升會引起另外兩國勢力下降。」他推論勢力均衡「其基本形式旨在維持多國體制是獨立於各國。」他可以把這設想涵蓋所有類型的勢力單位，無論這些單位是否在有組織的政治體制之內。歷史社會學實際上是這樣考慮勢力均衡。Arnold Toynbee（湯因比）在《歷史研究 *Study of History*》提到處於勢力集團邊緣的勢力單位容易擴大，而是不處於中央又壓力最大的單位。在西歐和中歐，實際上已不可能發生即使是細微的領土變化，但美國、俄羅斯、日本和英聯邦卻是擴張活動驚人。Pirenne 提出類似的歷史規律；他留意到最遠離強勢鄰居的相對無組織社區一般形成抵制外部壓力的核心。這樣的例子有：在遙遠北歐建立法蘭克王國的 Pepin of Herstal[60]，東普魯士崛起成為日爾曼民族的組織中心。比利時人 De Greef 的「緩衝國」是這類型的另一個規律，似乎影響了 Frederick Turner 的「邊疆論」，把美國西部視為「漂泊的比利時」。這些勢力均衡與不均衡概念與道德、法律或心理的概念無關，只涉及勢力，這揭示它們的政治本質。

3.**勢力均衡作為原則和體制**。一旦各人的利益得到彼此承認，從中會衍生行為原則。自 1648 年以來，〈Munster and Westphalia 條約〉確定了歐洲各國現狀的利益，建立了各簽署國的團結。歐洲所有強國幾乎都簽署了 1648 年的條約，宣告本身是該條約的擔保人。荷蘭和瑞士以簽約日期作為取得主權國家國際地位的日子。自此以後，各國有權認為現狀有任何重大改變將會涉及所有其它國家的利害關係。這是勢力均衡初創形式的的國際大家庭原則；按照這原則，如有國家打算改變現況，無論是非對錯，不會被視為針對強國的敵意行為。當然，這樣的狀況會極大方便形成反對這些改變的聯盟。然而，在明確承認「維持歐洲平衡原則[61]」的〈Utrecht 條約〉之後七十五年，西班牙領土被 Bourbon 和 Hapsburg 兩大家族瓜分。這原則得到正式承認，歐洲逐漸形成以這原則為基礎的體制。由於較大國家吞併（或統治）小國會打亂勢力均衡，所以這體制間接保護了小國的獨立。歐洲的組織在 1648 年，甚至是 1713 年之後，還是相當模糊，但在二百年間不論大國小國得以維持現況，還是必須歸功勢力均衡體制。無數戰爭是為這個名義開戰；雖然毫無例外可以認為是為爭取勢力而戰，但有許多情況與參戰國是依照集體擔保原則對抗無緣無故的侵略行為並無二樣。沒有其它理由可以解釋清楚在絕對強大軍事鄰國環伺之下的丹麥、荷蘭、比利時和瑞士這些弱小政治實體能夠持續生存這麼長時間。從邏輯而言，原則和

[60] 丕平二世

[61] ad conservandum in Europa equilibrium

建立在原則基礎上的組織（即體制）之間區別似乎是明確的。但即便原則處於半組織狀態，也就是說還沒有達到體制階段，只是對傳統習慣或習俗提出指引時，也不應低估原則的有效性。即使沒有常設中心、定期會議、共用公職人員或強制性行為準則，歐洲通過各國大使館和外交使團之間持續密切接觸已形成一種體制。〔外交〕查詢，外交照會、備忘錄（無論是聯合或分別公告，相同或不同用語）都有嚴格傳統管制，是表達勢力而不致攤牌的多種方法，亦打開妥協的新途徑，或如談判破裂，最終採取聯合行動；實際上，如強國的合法利益受到威脅，共同干預小國事務的權利；以上所述等同歐洲已有半組織形式的指引。

或許，這非正式體制的最大支柱是大量國際私營企業的交易經常依據一些貿易協定或由風俗和傳統形成的其它國際措施。各國政府和有權勢的國民以無數方式捲入由這些國際交易引起的不同類型的金融、經濟和司法困境。局部戰爭只意味著有些交易短時間中斷，而其他交易中的各種利害關係暫時會持久或不受影響，相對於其他被戰爭解體，陷敵人不利的利益關係，形成龐大力量。國際互惠的無形支柱是這種私人利益，其無聲壓力滲透文明社會整體生活和超越國界，即使不是歐洲協同體或國際聯盟這些有組織形式，它是為勢力均衡原則提供了有效的約束力。

（參考書目）（略。請參見原文。）

百年和平

1. **事實**。在 1815 至 1914 年這百年，歐洲列強只在三個短暫時期彼此開戰：1859 年持續六個月，1866 年持續六周，1870-71 年間持續九個月。整整兩年(1853-56)的克里米亞戰爭是邊緣地區的半殖民地性質戰爭；歷史學家如 Clapham, Trevelyan, Toynbee 和 Binkley 都同意。順帶一提，英國人持有的俄羅斯公債在戰爭期間可以兌付。十八世紀和以前幾個世紀之間的基本區別是偶發的全面戰爭和完全沒有全面戰爭。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少將斷言十九世紀年年有戰爭，他的論斷看來似乎無關宏旨。Quincy Wright 比較多個世紀有戰爭的年份（無論全面或局部戰爭），似乎迴避了要點。

2. **問題**。首先要解釋作為全面戰爭豐富源頭的英法兩國之間幾乎持續不斷的貿易戰停止的現象。這和經濟政策領域的兩個事實有聯繫：（1）舊有殖民帝國結束，（2）自由貿易進入國際金本位制時代。隨著貿易新形式到來，戰爭利益迅速消退，與此同時因為與金本位制有關的新國際貨幣和信貸結構的緣故，萌生了積極的和平利益。收入和就業依賴貨幣穩定和世界市場，而兩者的運作涉及整體國家經濟體系。直至 1880 年，強國的一般傳統擴張主義被反帝國主義趨勢取代。（參見第十八章。）

然而，貿易戰期間似乎有幾十年的間歇期（1815-80 年）；在前期階段，外交政策往往被認為促進有利可圖的貿易，在後期階段，外交部長有責任關注外國債券的持有人和直接投資者的利益。正是在這半世紀的間歇期建立了私有企業利益不應影響外交事務的學說；只是在間歇期結束之時財政部長才考慮接受這說法，但在公眾輿論新趨勢下設下嚴格限制條件。本書認為這變化是

由於在十九世紀的情況下，貿易的特點是其範圍和成功已不再取決於直接的勢力政策；商業逐漸影響外交政策的轉向是基於國際貨幣和信貸體制已建立商業利益跨越國界新形式的事實。但如這種商業利益只限於外國債券的持有人，各國政府會極不願意聽取他們的意見；從嚴格意義說，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海外貸款純粹是投機性質；既得收入通常是發債國的政府債券；如國民把資金貸給信譽可疑的外國政府，沒有政府會認為要支持這樣的最高危行為。Canning 斷然拒絕投資者要求英國政府關心他們在國外的投資損失，也明確拒絕〔英國是否〕承認拉丁美洲各國要取決於這些國家承認其外債。Palmerston 的著名 1948 年公告首次暗示這態度有改變，不過從未走得太遠；由於貿易團體的商業利益散佈廣泛，政府不能讓任何不重要的既得利益把世界帝國事務的運行變得複雜。外交政策重新留意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主要是因為自由貿易結束和隨後回歸十八世紀的做法。但海外投資已變得不是投機，而是完全正常的性質，貿易與此有緊密聯繫，所以外交政策回復傳統為社會的貿易利益服務。這後一階段的事實不需要解釋，要解釋的是在幾十年間歇期內這些利益的中斷。



第二章
保守的 1920 年代，革命的 1930 年代

國際金本位制崩潰，是世紀之交世界經濟解體與 1930 年代整體文明巨變之間的無形紐帶。除非理解這因素的重大意義，否則不可能正確看待歐洲陷入厄運的機制或理解文明的形式和內容竟然建立在如此不穩定基礎之上的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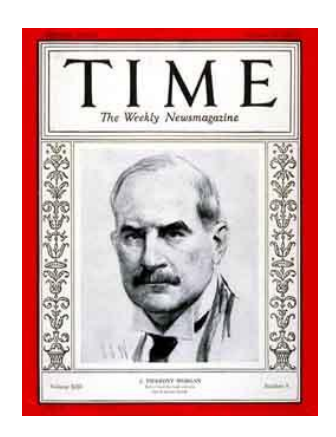
人人生活在國際體系之內，但直到體系崩潰之後才體會其真實本質。很少人理解國際貨幣體系的政治功能；因此，可怕的突然轉型令人人不知所措。金本位制是傳統世界經濟剩下的唯一支柱，崩潰帶來的影響必然是即時。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金本位制是純粹的經濟制度，拒絕視為社會機制的一部份。因此，民主國家是最後才認識這災難的本質，最遲採取應對策略。直至大難臨頭，領袖才明白國際體系崩潰背後是最先進國家的長期發展使體系不合時宜；換句話說，他們沒有覺察市場經濟本身的失靈。

巨變比人們通常認識的更突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後革命是十九世紀的組成部份。1914-18 年的衝突只是促成和無限加重了不是它本身造成的危機，但當時未能察覺困局的根源；生還者認為大戰的恐怖和破壞的源頭是國際組織突然出現障礙。由於經濟和政治體系突然失靈，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物質生活造成可怕危害似乎是一個解釋。事實上，戰後對和平與穩定的障礙與正是催生大戰的禍因同一根源。世界經濟體系自 1900 年開始瓦解，正是 1914 年爆發政治緊張局面的起因；大戰的後果和有關條約消除了德國的競爭，表面上緩和了緊張局面，但同時卻加重了緊張的原因，並因此大大加劇政治與經濟對和平的障礙。

政治方面，那些條約暗藏著致命的矛盾。單方面解除戰敗國的武裝已預先排除了重建勢力均衡體系的任何可能性，因為勢力是這體系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日內瓦會議希望擴大和改進歐洲協同體，建立國際聯盟（國聯）[62]，恢復這國際體系，但只是徒勞無功；〈國際聯盟盟約[63]〉提出的磋商和聯合行動也是徒勞無功，因為欠缺了獨立勢力單位這個基本前提條件。國聯不可能實際建立；第 16 條款（執行條約）和第 19 條款（和平修改）從來沒有實施。和平問題的唯一可行解決辦法是恢復勢力均衡體系，但已是鏡花水月；事既如此，以致 1920 年代最具建設性政治家的真正目的不為公眾理解，公眾依然生活在難以形容的混亂狀態。有些國家被解除武裝，有些國家保留軍備，這令人震驚的局面抹殺了組織和平的任何建設性步驟；流行的情緒化態度是以為國聯以某種神秘的方式預示著和平時代，只需要經常口頭鼓勵就會變得持久。美國人普遍相信只要美國加入國聯，事情會

[62] League of Nations
[63]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變得大不相同。對所謂戰後體系的組織性弱點缺乏瞭解，沒有什麼說法更能夠證明這一點；稱之為「所謂」，因為字有其義，歐洲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政治體系。這樣的蒼白狀況，充其量只能在各方筋疲力盡時方能勉強維持；毫不奇怪，回歸十九世紀體系看起來是唯一出路。同時，要不是那全體同意的致命規則確定由那個任性小國作為世界和平的仲裁者，國聯理事會可能至少起著歐洲協同體在其鼎盛時期發揮的歐洲指南作用。永久解除戰敗國武裝的荒唐策略排除了任何建設性解決辦法。這災難性事態的唯一可選擇辦法是建立國際秩序，授之以超越國家主權的有組織權力。然而，這路線完全超越了那時代的視野。任何歐洲國家都不會臣服這體系，更不用說美國。



經濟方面，日內瓦會議的政策較為貫徹，努力恢復世界經濟作為和平的第二道防線。即使成功重建勢力均衡體系，也要恢復國際貨幣體系才可以為和平效勞。要是沒有穩定的交易和貿易自由，各國政府會一如既往不重視和平，只有當和平不干擾任何重大權益時才會為和平而努力。當時的政治家只有美國總統威爾遜[64]似乎認識到和平與貿易的相互依賴不僅保證貿易，也保證和平。難怪國聯一直努力重建國際貨幣和信貸組織成為維持主權國家和平的唯一可能的預防措施，而世界對國際金融集團的依賴是前所未見。摩根財團[65]已取代羅富財家族成為重新注入活力的十九世紀造物主。

依照十九世紀的標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似乎是革命年代；按照最近的經驗，這恰恰相反。那十年的目標是極其保守，表達了近乎普遍的信念：只有重建 1914 年之前的體系才能恢復和平和繁榮，「這一次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礎」。實際上，正是這次復古行為的失敗才導致 1930 年代的巨變。戰後十年的革命與反革命行動驚心動魄，這只是對軍事失敗的機械式反應，或至多是在中東歐舞臺重演熟悉的西歐自由主義和憲政主義戲劇；到了 1930 年代才有全新元素進入西方歷史的模式。

無論情節如何，中東歐在 1917-20 年的劇變和反劇變只不過是拐彎抹角地重建那些戰事失利的政權而已。反革命的煙霧消散之後，匈牙利、奧地利和德國的政治體系與戰前沒有很大差異。直到 1920 年代中期，芬蘭、波羅的海各國、波蘭、奧地利、匈牙利以及甚至義大利和德國都大致如此。有些國家的民族自由和土地改革取得巨大進步，這種成就自 1789 年以來常見於西歐。俄羅斯在這方面也不例外。當時的趨勢只是建立或重建大體上與英美法革命理想相關的體系。在這廣

64 Woodrow Wilson
65 J. P. Morgan。插圖取自 http://www.mtholyoke.edu/~le20j/images/morgan_jp.jpg

泛意義上，不僅是德國的興登堡[66]和美國的威爾遜，即使俄國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也是遵循西方傳統。

在 1930 年代早期，變化突然而來，其標誌包括英國放棄金本位制；俄羅斯的五年計劃；美國推出「新政」；德國的國家社會黨革命；國聯垮臺讓位給獨裁主義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十九世紀的理想極其重要，影響了其後十年；到了 1940 年，國際體系的痕跡全都消失，除了一些小範圍地區，各國全都生活在全新的國際環境。

本書認為危機的根源在於國際經濟體系岌岌可危，自世紀以還只是蹣跚而行，最後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有關和約摧毀。到了 1920 年代這變得明顯，幾乎所有歐洲的內部危機都是因為外部經濟問題而達到高潮。政治學者根據各國依附的穩定貨幣來劃分國家組別，不是根據所屬大陸。俄羅斯取消盧布〔貨幣〕，令世界震驚；盧布幣值因通貨膨脹已變得一文不值。德國重複這鋌而走險的手法，以欺騙和約；緊接其後又沒收了收租收利息階級的財產，成為納粹革命的基礎。日內瓦會議的聲望源於成功幫助奧地利和匈牙利恢復各自的貨幣，奧地利新貨幣克郎運作極其成功；雖然克郎最後被取締，但維也納成為自由派經濟學家的聖地。在保加利亞、希臘、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波蘭和羅馬尼亞，反革命派以恢復貨幣行動為題作為爭取權力的藉口。比利時、法國和英國以穩定貨幣標準之名將左派趕下臺。貧窮巴爾幹地區的貨幣危機沒完沒了，通過國際信貸體系的彈性捆缚與富裕美國連在一起；這樣的捆缚首先把沒有完全恢復穩定的貨幣的緊張壓力先從東歐傳播到西歐，再從西歐傳播到美國。最後，美國自身則被歐洲貨幣未成熟的穩定化後果吞沒，最終出現崩潰。

第一波衝擊出現在國家範圍之內。俄羅斯、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貨幣在一年之內已垮臺。除了各種貨幣匯率變化是前所未有的快速，這變化是發生在完全貨幣化的經濟體系。人類社會引進了細胞過程，其效應是在人類經驗範圍之外。不斷貶值的貨幣在國內外都帶來混亂。各國發現本國與鄰國之間有鴻溝分隔，同時各階層人民受到完全不同且往往相反的影響。知識型中產階級確實變得赤貧[67]；金融大鱷積累了令人憎惡的財富。一個無法預計的聯合與分裂力量的因素已走上舞臺。

「資本外逃」是新事物。1848 年，1866 年，甚至 1871 年都沒有這樣的記錄，但明顯在以下三件大事有至關重要的作用：1925 年推翻法國的自由派政府，1938 年再次推翻法國的自由派政府，以及 1930 年德國法西斯運動的發展。

[66] Paul von Hindenburg
[67]本書經常用到兩個有關「貧窮」的單字：poor 和 pauper，後者的貧窮程度甚於前者，需要救濟。為了清晰區分，poor 譯為「貧窮、貧困、貧苦」，而 pauper 譯為「赤貧」。

貨幣已成為國家政治的支點。在現代貨幣經濟制度之下，人人都體會到金融準繩的每日變化，都有貨幣意識；民眾預先折算實際收入的通脹效應；各地民眾似乎把穩定貨幣視為人類社會至高無上的需要。不過，有這種意識也要認識到貨幣的基礎可能依賴國界之外的政治因素。因此，社會騷動會動搖對貨幣媒介一貫穩定性的信心，也動搖相互依存經濟體系中金融主權的幼稚觀念。從此以後，與貨幣相關的內部危機會引發嚴重的外部問題。

信任金本位制是那時代行為上接受但精神上拒絕的信念，有人認為是天真，有人認為是必不可少，也有人認為是魔鬼信條，但都有同一信念：鈔票有價值是因為鈔票代表黃金。黃金有價，社會主義者認為這是因為黃金包含著勞動力，正統理論指出這是因為黃金有用和稀缺；兩種說法沒有分別。天地之戰不理會金錢問題，使得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不可思議地團結一起。十九世紀沒人懷疑 Ricardo[68]和馬克思的意見是一致。Bismarck[69]和 Lassalle[70], John Stuart Mill[71]和 Henry George[72], Philip Snowden 和 Calvin Coolidge[73], Mises[74]和 Trotzky[75]都同樣接受這信念。馬克思花盡心思揭露 Proudhon 的理想國勞動券（用來代替貨幣）是自欺欺人；《資本論》暗示了 Ricardo 式金錢商品理論。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黨人 Sokolnikoff 是戰後第一位政治家以黃金為本恢復國家貨幣價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 Hilferding[76]堅決主張穩定貨幣原則而危及本身的政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 Otto Bauer 支持政敵 Sepal 嘗試恢復克郎貨幣的基本貨幣原則；英國社會主義者 Philip Snowden 認為英鎊在工黨手中不安全，轉而反對工黨；義大利元首把里拉和黃金的比值定為 90，刻在石上並發誓拼死捍衛這比值。很難發現胡佛和列寧、邱吉爾和墨索里尼就這一點的意見有任何分歧。誠然，當時國際經濟體系的運作必要有金本位制，這信念是不同國家、階級、宗教信仰和社會觀的人們的唯一共同原則。人們致力恢復其衰敗中的存在，與這看不見的現實生死與共。

這努力終歸徒然，是世上前所未見的徹底失敗。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芬蘭、羅馬尼亞或希臘致力穩定幾乎崩潰的貨幣，不僅是這些小國弱國信心兮兮的行動，在到達黃金彼岸前飽嚐飢餓，也使得他們的強大富裕贊助人（西歐的戰勝國）面臨嚴峻考驗。只要戰勝國貨幣有波動起伏，緊張壓力就不會明顯；這些國家繼續像戰前一樣借錢給外國，因而有助戰敗國維持經濟。但當英國和法國回歸

[68] 李嘉圖
[69] 俾斯麥
[70] 拉薩爾
[71] 穆勒
[72] 亨利喬治
[73] 柯立芝
[74] 米塞斯
[75] 托洛茨基
[76] 希法亭

金本位制，其穩定的匯率的負擔開始顯露。美國是黃金的最大擁有國，最後也要默默關心英鎊的安危。美國擔心大西洋彼岸的事態，意外地把美國帶進危險區。這問題似乎是技術性，但必須清楚理解。美國在 1927 年支持英鎊，暗示紐約要有低利率，避免資本從倫敦大量流向紐約。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因此向英倫銀行承諾維持低利率；但是現在美國自身要有高利率，因為美國的價格體系開始出現危險的通脹（成本大幅降低，物價保持穩定，使通脹顯得模糊）。經歷了七年繁榮之後，鐘擺帶來了 1929 年姍姍來遲的大蕭條，隱藏的通脹使事情惡化。通脹減輕了欠債人的負擔，但拖垮了債權人。這是先兆。美國出於脫身的本能，在 1933 年脫離金本位制，傳統世界經濟的最後痕跡隨之消失。儘管當時沒有人察覺到事件的較深層意義，但歷史趨勢幾乎當即逆轉。

十多年來，恢復金本位制曾是世界團結的象徵。歐洲各地有無數會議，以滿足穩定貨幣的政治先決條件。國聯得到國際勞工局[77]的輔助，拉平各國之間的競爭條件，在不降低生活標準的情況下解放貿易。為了克服轉帳支付的問題，華爾街發起行動以貨幣為核心，先轉為商業票據，然後安排賠款；日內瓦擔當康復過程的擔保人角色，在這過程中倫敦金融城的壓力和維也納的新古典絕對貨幣主義者聯手為金本位制服務；各種國際努力最終都服從這目標，而各國政府調整政策以保護貨幣，特別是與外貿、貸款、銀行業及匯兌有關的政策。儘管人人同意穩定貨幣最終取決於貿易自由，但除了固執己見的自由貿易主義者，大家都知道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但行動不可避免會限制外貿和國際支付。為了應對同樣的情況，大多數國家開發了進口配額、延期償付和凍結協議、清算系統和雙邊貿易條約、實物交易安排、禁止資本輸出、外貿控制以及匯兌平準基金。然而，自給自足的夢魘時常困擾著保護貨幣的措施。儘管目標是貿易自由化，結果卻是壓制貿易。各國政府不但沒有進入世界市場，反而本身的行為阻礙了國家與世界的聯繫，為了維持一點點貿易流動，各國都要做出越來越多的犧牲。為了保護貨幣的外在價值作為外貿媒介，人們不情願地瘋狂努力，卻把自己趕進了自我封閉的經濟。自由貿易保守目標的結果是一套完全背離傳統經濟的貿易限制措施。

這趨勢隨著金本位制的最終崩潰而突然逆轉。為了恢復金本位制所做的犧牲，又不得不再做一次，目的是為了在沒有金本位制的情況下活下去。原先為了維持穩定貨幣體系而設計的制度限制生活和貿易，現在用來調整工業活動以適應永遠沒有金本位制。或許這就是現代工業的機械式和技術性組織能夠抵擋金本位制崩潰衝擊的原因。因為在奮力保留金本位制時，這世界已無意識地準備了某些類型的工作和組織，以適應沒有金本位制的狀況。不過，現在目標是相反的；在長期為無法實現的目標而奮鬥的過程中，有些國家損失最多，各種強大勢力藉著反彈捲土重來。國聯和國際金融集團比金本位制更早垮臺；隨著金本位制消失，國聯的有組織和平權益及其主要實施工具（羅富財集團和摩根財團）都從政治中消失。

[77]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金線突然折斷，是世界革命的訊號。

但金本位制失敗只是設定事件的時間，而事件規模之大，不可能是因此而起的。在世界很大部份地區，伴隨危機的不止是十九世紀社會的國家制度徹底崩潰，各地的制度被改變和重整得幾乎面目全非。許多國家的自由政體被獨裁專制統治取代；這世紀的首要制度是基於自由市場的生產，也被新經濟形式取代。大國重塑思維模式，假借未聽過的宇宙本質概念之名猛然投入以世界為奴役的戰爭，而更強大的國家奮起捍衛自由，換來了同樣是前所未聞的意義。國際體系失敗，儘管引發了轉型，但肯定不可能說明轉型的深度和內容。即便可以知道發生的事情為什麼來得那麼突然，我們卻依然不明白事情為什麼發生。

伴隨著巨變轉型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戰爭；這絕非偶然。歷史追隨社會變革；各國命運與其在制度轉型中的作用相互關聯。這種共生現象在歷史中絕非例外；儘管國家群組和社會制度各有本身的起源，但在掙扎求存時相互借力。共生現象的著名事例把資本主義與大西洋沿海各國家聯繫在一起。與資本主義興起有非常密切關聯的商業革命[78]，成為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和美國走上強國之路的工具；各國從這廣泛而深刻的革命運動中獲益；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利用這些崛起強國在全球傳播。

這規律反過來也適用。國家掙扎求存時可能受阻於正在走下坡的全部或部份制度；二戰時的金本位制就是這種過時制度的例子。在另一方面，出於本身理由而反對現狀的國家，很快發現現有國際秩序的弱點，希望創建更適合本身利益的制度。這些國家推走正在下墮的東西，迎接迎面而來的事物。看起來好像是這些國家發起了社會變革的過程，而事實上僅僅是受益者，並甚至可能扭轉變革的趨勢為本身的目標服務。

因此，戰敗的德國認識了十九世紀秩序隱藏的弱點，利用這見識加速該秩序的崩潰。在 1930 年代，德國有些政治家積累了邪惡的智力優越感，動腦筋要破壞秩序，試圖迫使事態朝著他們的政策傾斜，往往伸延到發展金融、貿易、戰爭和社會組織的新方法。然而，政府沒有造成這些問題，只是在利用這些問題；這些是客觀存在的真實問題，不管個別國家的命運如何，這些問題依然要面對。還有，一戰和二戰之間的區別是明顯的：前者依然是十九世紀的戰爭類型：勢力均衡體系失效導致強國的普通衝突；而後者已經是世界巨變的一部份。

因此是可以把那時期令人心酸的民族史抽離正在演變的社會轉型，然後較容易看到德國和俄羅斯，英國和美國這些勢力單位如何被社會轉型過程或正面或負面影響。不過，社會轉型本身也是如此：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列強崛起為載體，

[78] Commercial Revolution

向各地傳播信條。德國和俄羅斯分別變成全世界的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代表。無論好壞，只有認識這些社會運動的典型特徵，並視之與所服務的國家利益相分離，才能夠評估社會運動的真實範圍。

本書不會關注列強在二戰中的角色，不管是德國或俄羅斯，義大利或日本，英國或美國，儘管這是通史；不過，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卻是制度轉型的活生生力量。德國人和俄羅斯人力求在人類歷史記錄中有更多份額，這股動力可視為事態開展條件的實際資料，而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或「新政」的主旨正是事態的部份。

這把話題導致依然有待證明的**本書命題：巨變源起於於經濟自由主義的理想國行為，以建立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這命題似乎賦予體系有近乎神秘的力量；無異間接指出十九世紀文明的基本元素（勢力均衡、金本位制和自由政體）全是由自發調節的市場這共同方陣塑造。

這聲言似乎頗為極端，其粗疏的唯物主義可能有點駭人。不過，世人目睹文明崩潰，其特點正是該文明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其他社會和文明也受到賴以存活的物質條件制約；這誠然是所有人類生活、實際上是所有生活的共同特徵，不管是宗教還是非宗教的生活，不管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的生活。所有類型的社會都受經濟因素制約。從不同而且獨特的意義來說，只有十九世紀的文明是經濟性質，因為它選擇將自己建立在人類社會歷史上極少被證明是有效，而且肯定從未被提升為日常行動和行為的正當理由的動機：逐利得益。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就是源自這原則。

能與啟動「逐利得益」動機的機制比較效益的，只有歷史上最猛烈爆發的宗教狂熱。在一代人的時間，整個人類世界受到猛烈影響。眾所周知，「逐利得益」動機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工業革命之後成熟於英國；約五十多年後傳到歐洲大陸和美國；最後三地的類似方案形成一種模式，所有西方文明國家都有這模式的主要特徵。要理解大災難的源起，必須轉向市場經濟體系的興衰。

市場社會在英格蘭誕生，但歐洲大陸揭露其孕育最悲慘併發症的弱點。要理解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必須回顧 Ricardo 式的英格蘭。十九世紀是英格蘭的世紀；這不是誇張的說法。工業革命是英格蘭的大事。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和金本位制是英格蘭人的發明。到了 1920 年代，這些制度在四處碰壁；在德國，意大利或奧地利，事態更多是政治性和更戲劇性。但無論情景和最後情節的劇烈程度，要理解破壞文明的長期因素，必要研究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格蘭。

第二章資料參考

金線突然折斷

強制性的穩定貨幣政策加速了金本位制的崩潰。穩定貨幣運動的先鋒城市是日內瓦，在倫敦金融界和華爾街施加的壓力下，這運動傳到財力較弱的國家。

穩定貨幣的第一組國家是其貨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崩潰的戰敗國。第二組國家由歐洲戰勝國組成，這些國家穩定自身貨幣晚於第一批國家。第三組國家有金本位制的主要得益國：美國。

I. 歐洲的戰敗國		II. 歐洲的戰勝國			III. 國際債權國	
	穩定貨幣		穩定貨幣	脫離金本位制		脫離金本位制
俄羅斯	1923	英國	1925	1931	美國	1933
奧地利	1923	法國	1926	1936		
匈牙利	1924	比利時	1926	1936		
德國	1924	義大利	1926	1933		
保加利亞	1925					
芬蘭	1925					
愛沙尼亞	1926					
希臘	1926					
波蘭	1926					

第一組國家的不穩定狀態由第二組國家支撐了一段時間。一旦第二組國家也同樣穩定了貨幣，也就需要由第三組國家支援。最終，由美國組成的第三組國家遭受了歐洲穩定貨幣政策累計的不穩定狀態的最沉重打擊。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鐘擺擺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鐘擺的擺動普遍而快速，但幅度較小。在 1918-23 年期間，因為戰敗的原因，緊隨著結果是失敗的民主（或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後在絕大多數的中歐和東歐國家中都恢復了保守派統治；若干年後差不多又普遍建立了一黨制政府。這次運動再一次是相當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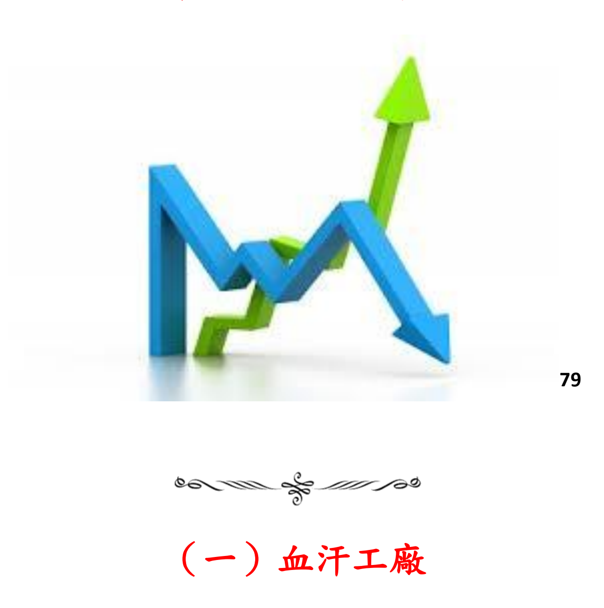
國家	革命		反革命		一黨制政府
奧地利	1918 年 10 月	社會民主共和國	1920	中產階級共和國	1934
保加利亞	1918 年 10 月	急進農地改革	1923	法西斯反革命	1934
愛沙尼亞	1917	社會主義共和國	1918	中產階級共和國	1926

芬蘭	1917 年 2 月	社會主義共和國	1918	中產階級共和國	----
德國	1918 年 11 月	社會民主共和國	1920	中產階級共和國	1933
匈牙利	1918 年 10 月	民主共和國	1919	反革命	----
	1919 年 3 月	蘇維埃			
南斯拉夫	1918	民主聯邦	1926	獨裁軍管國家	1929
拉脫維亞	1917	社會主義共和國	1918	中產階級共和國	1934
立陶宛	1917	社會主義共和國	1918	中產階級共和國	1926
波蘭	1919	社會民主共和國	1926	獨裁國家	----
羅馬尼亞	1918	農地改革	1926	獨裁政權	----



第二部

市場經濟的興衰

[79]

（一）血汗工廠

第三章
生活環境與進步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核心是生產工具有了近乎奇蹟的改進，緊隨其後的卻是老百姓生活悲慘混亂的狀況。

本書致力澄清百年前英國處於極壞狀況時決定各種形式混亂狀況的因素。什麼「血汗工廠」把人折磨？新的物質條件有什麼影響？在新條件下運作的經濟依賴性有什麼影響？舊社會組織被什麼機制破壞，而又未能成功把人和大自然重新結合？

自由主義哲學最失敗的是未能理解變革的問題。出於對自發性的情緒化信念，拋棄了對變革的常識性態度，反而莫名其妙接受改善經濟的任何社會後果。首先貶低，然後忘記政治科學和治國之道的基本真理。無庸細說：如沒有目標的變革過程步伐太快，可能的話應要放慢，以確保社會福祉。傳統治國之道的道理本來是家傳戶曉，往往只是載於古人的社會哲學教誨；到了十九世紀因為粗俗效益主義的荼毒，又毫無懷疑地信賴所謂不自覺增長的自我治癒功效，有識之士的思維已抹去這些道理。

[79] http://t3.gstatic.com/images

因為堅持從經濟觀點評判社會事件，經濟自由主義錯誤解讀工業革命的歷史。以下探討一項看來頗為遙遠的話題作為說明：英國早期都鐸王朝[80]時代把曠野圈圍和可耕種農田轉為牧場；當時田地和公地被領主用籬笆圈圍，鄉郡面臨人口減少的威脅。提起這些為人民帶來不幸的事件，一方面要展示最終有好處的圈地行動造成的破壞是類似工業革命造成的破壞，另一方面是要澄清社會在經濟進步不受監管時所面對的選擇。

如農田沒有轉為牧場，圈地[81]顯然是進步。被圈圍的土地其價值是未被圈圍土地的兩至三倍。在保持耕種的地方，就業率沒有下降，而食物供給顯著增加。土地的產量明顯增加，特別是出租的田地。

即使耕地改變為牧羊場，也不是全都對周圍地區有害，儘管破壞了棲息地和限制了就業。家庭手工業在十五世紀下半葉開始擴大，一百年後已成為農村的特色。牧羊場出產的羊毛為小佃戶和被擠出農耕行業的無地農民提供就業，新的毛紡中心確保許多工匠有收入。

但要點是只有在市場經濟體系中，這樣的補償效應才被視為是理所當然。沒有這樣的經濟體系，養綿羊和賣羊毛這樣的高度有利可圖行業可能破壞農村郊野。綿羊「點石成金」，也可以「點金成石」；十七世紀西班牙的財富最終遭此劫難，因為牧羊業過度擴張，被侵蝕的土地無法恢復。

1607 年，一份呈報領主的官方文件權威地陳述變革的問題：「窮人有了棲息之所，應感到滿足；領主改善土地的期望不受阻礙。」這公式把純粹經濟進步的本質視為必然如此：改進是以社會混亂為代價。但文件也暗示必然的悲慘狀況：富人要求以公帑改善，讓自己得益，窮人只有棲身的茅舍。



圈地行動一直被恰當地稱為富人革窮人的命。領主和貴族推翻社會秩序、打破古代法律和習慣，有時憑藉暴力，但經常是施壓和恐嚇，實情是掠奪窮人的公地份額，推倒一直以來牢不可破習俗默認是屬於窮人和他後代的房舍。社會組織受到破壞；荒涼的村莊和廢墟見證著革命兇殘地危及國防、化城鎮為廢地、人口急劇減少、負荷過重的土地變為塵土、飽受騷擾的體面農夫淪落為乞丐和小偷。儘管這是零星事件，但黑點大有可能成為全面災難[82]。國王和議會、大臣和

[80] Tudor
[81] Enclosure movement
[82] 原註 1：Tawney, R. H., *The Agrarian Problem is the 16th Century,* 1912.

主教都在保衛社會的福祉以及社會的人性和天性免受摧殘。從 1490 年代到 1640 年代，他們夙夜匪懈要阻止人口減少。Kett 叛亂（插圖）[83]被鎮壓後，幾千農民被處死。其後反革命派成功取消圈地法例，護國公 Somerset 公爵[84]被指同情叛亂農民而被處死[85]。

百年過去，兩派敵對勢力又再一較高下。這時的圈地者往往更多是富有鄉紳和商人，不再是領主和貴族。不管是世俗還是教會層次的上層政治都涉及國王行使特權阻止圈地，藉此加強其在憲政鬥爭中與鄉紳互鬥的地位；在這場鬥爭中，Strafford[86]和 Laud[87]被國會判死刑。這些人的政策不僅在工業方面，在政治方面也是反動的；再者，圈地已不是用於耕種，也不是放牧。英國內戰（1642-48 年）的浪潮席捲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88]的公共政策。

十九世紀歷史學家一致譴責這兩個王朝的政策即使不是全然反動，也是譁眾取寵。他們同情國會，而國會一直是站在圈地者一邊。儘管 H. de B. Gibbins 是老百姓的熱心朋友，但他還是說：「然而，這些保護性法規只是一如一般的保護性法規那樣完全徒勞無益。」[89] Innes 說得更明確：「為解決就業問題而採用的慣常手法：懲罰流浪行為，試圖把工業遷至不適當的土地，把資本趕到獲利較少的投資；這一切都失敗，一如既往。」[90]。Gairdner 毫不猶豫呼籲把自由貿易概念作為「經濟法規」，他寫道：「有人就是不理解經濟規律，試圖通過立法阻止地主拆毀農民的房子，地主發現把農田變成牧場增加羊毛產量是有利可圖。經常重複立法反證這些法律在實踐中是如何無效。」[91]。最近，經濟學家 Heckscher 強調自己的觀點：重商主義顯然是因為沒有充分理解經濟現象的複雜性，人類要再花幾世紀的時間才能掌握經濟現象。」[92] 實際上，反圈地立法似乎從來沒有阻止圈地行動的進程，甚至沒有構成嚴重阻礙。John Hales 最熱衷共同體百姓原則，也不得不承認很難收集證據對付圈地者；圈地者經常讓他們的家僕在陪審團前宣誓，而且「馬屁精和食客眾多，沒有這些人是沒法組織陪審團。」。有時只是權宜在農田劃出犁溝，犯規的領主已可避免懲罰。

---

[83] 1549 年 7 月，英格蘭東部諾福克郡的農民受不了圈地的折磨，揭竿而起，原本打算拆毀富農 Robert Kett 的籬笆，反而後來說服了他參加農民起義，成為領袖。經多番波折，農民被軍隊打敗，約有三千農民被處死；史稱 Kett's Rebellion，是英格蘭兩次最重大農民起義（叛亂）事件之一。

[84] Edward Seymour, 1st Duke of Somerset，Lord Protector

[85] 這不是完全正確。Somerset 公爵是皇叔，身為護國公，少不免捲入宮廷政治。當時最激烈反對圈地行動的是教會和一些政治人物，當然還有身受其害的農民。Somerset 是在失寵後在 1549 年 3 月被處死。

[86] Thomas Wentworth, 1st Earl of Strafford

[87] William Laud

[88] Stuart

[89] 原註 2：Gibbins, H. de B.,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95.

[90] 原註 3：Innes, A. D.,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1932.

[91] 原註 4：Gairdner, J., "Henry VIII,"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I, 1918.

[92] 原註 5：Heckscher, E. F., *Mercantilism,* 1935, p. 104.

私人利益輕易凌駕公義的現象，往往被視作為立法無效的某種象徵；趨勢未被制止而且勝出，這後來被作為結論性證據證明「反動性干預主義」的所謂徒勞無益。但這些觀點完全點錯主題。為何趨勢的最終勝利被視為未能拖慢趨勢進程的證據？為何不以這些措施的目的來衡量：即是拖慢變革的速度？雖然這未能阻止發展的方向，但不是徹底無效。變革速度與變革方向同樣重要；不過，儘管變革方向往往並不取決於人們的意志，但可以決定變革速度。

人們相信進步是自發的，必然看不到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這作用包括經常調整變革速度，根據情況加速或減速；如認為速度是無法改變或甚至更糟的認為干預速度是不正當行為，那麼就根本沒有干預的空間。圈地行動是一例。回過頭看，很明顯西歐經濟進步的趨勢是要消除人為保持一致的農業技術、土地條塊式交替種植和原始的公地制度。就英格蘭而言，毛紡業的發展肯定是國家資產，終而建立棉紡業這工業革命的載體，也很明顯國內紡織業增長依賴國內羊毛供應量增加，這足以證明農田轉為牧場和併發的圈地行動是經濟進步的趨勢。不過，若不是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早期政治家的政策得以維持，經濟進程的速度可能具毀滅性，進步本身變得退步而不是有益。因為這速度影響很多事態：被剝奪土地財產的人能否在不嚴重損害本身（人性和經濟、物質和道德）的情況下，適應已經改變的環境；他們能否在與變革間接有關的機會領域中找到新工作；出口增長帶來的進口增長其效應能否幫助在變革中失去工作的人找到新的生計。

每種情況的答案都取決於變革和調整的相對速度。經濟理論的一般「長期」考慮不切實情；假定事件發生在市場經濟體系而預判問題。這樣的假設看來很自然，但沒有道理：人們很容易忘記市場經濟是制度性組織，只在近世出現，而且只是部份出現。但除了這項假設，「長期」考慮是毫無意義。如變革的即時效果是有害，那麼除非有相反證據，否則最終結果也是有害。如果農田轉為牧場涉及拆毀一定數量的房子、一定數目的人失去工作、當地食物供應減少，那麼這些結果可視為最終結果，除非有相反的證據。這並不排除要考慮其他可能效應：出口增加影響地主的收入；當地羊毛供應量最終增產會增加就業機會；地主收入增加，可能用於投資或奢侈支出。變革與調整兩者的時間一比率相比，可得出變革的淨效益。但除非證明自發調節的市場確實存在，無論如何都不能假定市場規律在發揮作用。只有在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中，市場規律才適用；這不是都鐸王朝的政治家偏離事實，而是現代經濟學家暗示市場體系從前已存在。

英格蘭抵住了圈地行動的災難而沒有受到嚴重損害，只是因為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運用國王的權力減慢了經濟改善的進程，直至社會能夠承受變革：運用中央政府的權力幫助變革的受害者，疏導變革過程以減少破壞。大臣和特權宮廷的觀點絕不保守；他們代表著新治國之道的科學精神，贊成外國工匠移居入

境，熱心移植新技術，採用統計和精確報告方法，輕視習慣和傳統，反對規定性權利，減少教會特權，輕視不成文法[93]。如創新造就革命，他們是那時代的革命者。他們致力於老百姓福祉，美化君王的權力和威嚴；但是，未來是屬於憲政主義和國會。皇室政府讓位階級政府，這階級帶領工商業的進步。憲政主義的偉大原則與政治革命結合，攆走了皇室；當時的皇室已經失去了幾乎所有創造性能力，而其保護性職能對經歷轉型風暴的國家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國王的財政政策過份制約國家的力量，開始抑制貿易；為了維持特權，國王一再濫用特權，並因而損害了國家資源。國王的最後功績是出色管理勞工和工業以及審慎控制圈地行動。但人們更易於忘記資本家和中興中產階級的僱主才是保護性措施的受害者。兩個世紀之後，英格蘭才再享有被共和體毀掉的有效有序的社會管理。誠然，人們不再那麼需要這種家長式管理，但中斷了這種管理方式在一方面造成了極大危害：使國家忘記圈地行動時期的恐怖和政府成功克服人口減少的功績。或許這有助解釋一百五十年之後，當工業革命這場類似災難對國家生活和福祉構成威脅時，為何沒有清楚認識危機的真實本質。

這一回事件〔工業革命〕是英格蘭獨有；這一回的海上貿易是波及整個國家的行動之源；這一回規模最大的變革為老百姓的生活環境帶來前所未有大浩劫。在這沒有走得太遠之前，勞工已經擁擠在新的荒涼之地，即所謂英格蘭的工業城；鄉下人變成貧民窟的居民；家族走向解體；大塊的鄉村地區被「血汗工廠」吐出的煤渣和廢料迅速堆填。不同觀點和門派的作家、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總是把工業革命的社會環境稱為人類衰敗的真正深淵。

迄今沒有人能滿意解釋這事件。當代人猜想已經在支配財富和貧困的鐵律中發現詛咒之鑰，稱之為工資鐵律[94]和人口鐵律[95]；但這都被證明是錯的。有提出「剝削」作為富和貧的另一解釋；但這不能解釋以下事實：工業貧民窟的工資高於其它任何地方，而且持續增加了一百年。更常見的是引述一連串成因，但都難以令人滿意。

本書的答案決不簡單；實際上佔了大部份篇幅。本書認為英國面臨雪崩式社會混亂，規模遠超圈地時期的社會變革；這災難是經濟進步巨大運動的伴物；一個全新的制度性機制開始在西方社會作用，其危險在初改動時有切膚之痛，而且從未被克服；十九世紀文明史大體上是人們致力保護社會免遭這機制蹂躪。工業革命僅僅是革命的開端，極端而反動地點燃了宗派主義者的思維，但新信條是徹底唯物主義，並相信人類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無限數量的物質商品來解決。

---

[93] Common Law，亦稱「習慣法」。
[94] iron law of wages
[95] iron law of population

這故事已傳遍無數次：工業革命崛起是由於市場拓展、有煤有鐵以及溫和氣候有利棉花業、諸式人等的土地財產被十八世紀新圈地行動剝奪、自由制度存在、機器發明以及其它因素以某種方式互動。已經有結論表明沒有任何一個因素可以脫離其它而單獨成為那場突然而至又出乎意料事件的成因。

如何定義這場革命？有什麼基本特徵？是否工廠城鎮興起，貧民窟出現，童工的超長工時，某些類別的勞工低工資，人口增長率上升，還是各種產業集中？本書認為所有這些都只是附屬於建立市場經濟制度這基本變革；要理解這制度的本質，先要理解機器對商業社會的影響。本書無意聲稱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由機器引起，但堅持一旦精確的機器和工廠被用於商業社會的生產，必然形成自發調節市場的概念。

在農業和商業社會使用專門化機器肯定會產生典型效果。這樣的社會包括農業工人和從事農產品買賣的商人。使用專門化、精確和昂貴的工具和工廠，要依附買賣才能適用於這樣的社會。商人是唯一可以辦妥諸事的人，只要不虧本他也很樂意這樣做。他出售貨品是一視同仁，但買入的形式各有不同：不是買入現成商品，而是買入必需的勞動力和原材料，然後指示兩者如何製成新產品，再加上一些等待和生產時間。這不只是描述家庭工業或「家庭加工外判[96]」，也是描述工業資本主義，包括當代的工業資本主義。隨之而來是社會體制面對的重要影響。

精確機器價錢昂貴，除非生產大量商品才值得投資。[97] 機器生產要不虧損，生產不能因為機器等待初級產品而停工。對商人而言，這意味著有錢就可以買入這些生產要素的任何數量。除非能夠滿足這條件，否則專門化機器生產方式是過於冒險；商人真金白銀投資，社會的收入、就業和商品供應依賴持續的生產。

農業社會沒有這樣的條件，要創造出來。這些條件是逐步創造出來，但沒有改變令人吃驚的本質。轉型意味著社會成員行為動機的改變：從只求糊口改變為追求利潤。所有交易變為金錢交易，這倒過要求工業活動每一環節要引入交易媒介。所有收入必然來自出售一些東西；不管實際收入來源為何，都必然是銷售的結果。「市場體系」這簡單術語隱喻以上描述的制度模式。體系最令人吃驚的特性在於一旦建立起來，其運行必須沒有外界干預。利潤沒有任何保證，商人必須在市場賺取利潤。必須讓價格本身自發調節。這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就是市場經濟。先前的經濟模式轉型為市場經濟體系是如此徹底，毛毛蟲的蛻變比持續增長和發展更能表達這種演變。例如，比對商人生產者的銷售活動與購買活動；銷售只關心人造產品；不管他是否找到買主，社會組織不必然受到影響。但他購買的是原材料和勞動力，即是大自然和勞工。商業社會的機器生產實際涉及轉型，把

[96] putting out
[97] 原註 6。Clapham, J. H.,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III.

社會的自然和人類物質轉型為貨品。結論儘管怪異，卻是無法避免；不是這樣不能達到目的：顯然，這些因素引起的混亂肯定分裂了人的多重關係，威脅要完全摧毀人類棲息的自然環境。

實際上，危險迫在眉睫。如仔細研究支配自發調節市場機制的法則，可以察覺它的真實特性。



第四章
社會與經濟體系

在討論支配市場經濟體系法則之前，例如十九世紀試圖建立的那種法則，必須首先牢牢掌握這體系建基的一些非同尋常的假設。

市場經濟意指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稍微更技術性的說法是市場價格支配的經濟模式；沒有其他，只有市場價格。這體系組織整個經濟生活，沒有外來幫忙或干預，肯定可稱為自發調節。這些粗略解釋應該足以顯示這是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

把意思表達得更準確。除非有某種經濟組織，否則社會不能自然地存在，無論時間長短；從原則上說，在近代之前從來沒有受市場控制的經濟組織。儘管十九世紀學術界一直異口同聲，但在人類經濟中交易的利潤從來未曾發揮重要作用。雖然石器時代之後常見有市場制度，但其作用只不過是附屬於經濟生活。

有好理由強調以上堅持的論點。正是亞當·斯密[98]這樣的思想家提出社會的勞動分工依賴市場的存在，或正如他指出，人類「傾向以物易物、以實物代工資、以物換物[99]」。這句話後來導出經濟人的概念。回頭看看，可以說這樣的誤解過去竟然更能預言未來。因為即使到了亞當·斯密的時代，任何被觀察的社會幾乎都沒有大規模顯示那種傾向，至多只是經濟生活的附屬特徵而已；但百年之後，工業體系在世上重要地區蓬勃發展，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都意味著有特殊傾向左右人類的所有經濟活動，雖然這沒有波及政治、知識和精神方面的追求。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對經濟學研究不精的 Herbert Spencer 把勞動分工原則等同以物易物和交易；又五十年後，Ludwig von Mises 和 Walter Lippmann 重複同一謬論。是時，論點已無庸爭論。政治經濟學、社會史學、政治哲學和普通社會學的許多作者都踏著亞當·斯密的腳步，把他的原始人以物易物範式確立為各自學科領域的公理。實際上，亞當·斯密關於早期人類經濟心理的見解，與盧梭關於原始人政治心理的觀點同樣都是錯誤的。勞動分工現象，與人類社會同樣古老，源自性別、地理和個人稟賦這些事實的固有差異；所謂人類天生傾向以物易物和交易的說法幾乎全是虛假之言。歷史和人種史記錄有各種經濟模式，大多數有市場制度，但在近代之前從未記錄過任何哪怕是近乎由市場支配和調節的經濟模式。本書稍後

[98] Adam Smith

[99] Adam Smith《國富論》第二章的名句：propensity to barter, truck and exchange one thing for another。一般中譯為「以物易物」或「物物交易」。Barter, truck 和 exchange 都不涉及金錢作為交易媒介，但三者是否同義詞？若然三者同義，為何 Smith 要分別列出？中文網上沒有相關資料；根據多個英語網頁，可歸納為 Barter 原意是「以實物交換實物」；Truck 是僱主以物資（實物、代用卷等等）代替現金發薪；Exchange 是「以實物交換服務」（你做飯，我洗碗）或「以服務交換實物」（性交易）。現代用語的 Barter 已涵蓋以上的細微分別，泛指不涉及金錢作為媒介的交易。為免重複，以下的譯文籠統譯為「以物易物」。

提出對經濟制度史和市場史的整體觀，這將變得一清二楚。直至近代，市場在各國內部經濟的作用並不重要，後期轉向由市場模式支配的經濟體系，下文會交待清楚。

先要拋棄十九世紀的一些偏見，這曾經是亞當·斯密所謂原始人偏好獲利假設的基礎。因為他的道理更適用於眼前的未來而不是模糊的過去，所以這驅使他的追隨者對人類早期歷史採取奇怪的態度。表面上來看，證據似乎表明原始人非但沒有資本主義心理，實際上卻有共產主義心理（後來這也證明是弄錯了）。因此，經濟史學家傾向只關注以物易物和交易已具相當規模的近代歷史，原始經濟被歸入史前史。無意中這導致偏向市場心理的發展，因為在過去幾百年短短時期內，可以看作萬事俱備，最終是為了建立市場體系，而不管其它暫時被壓下去的趨勢。要糾正這「短短時期」觀點，顯然經濟史要結合社會人類學，而這一直是經常避免的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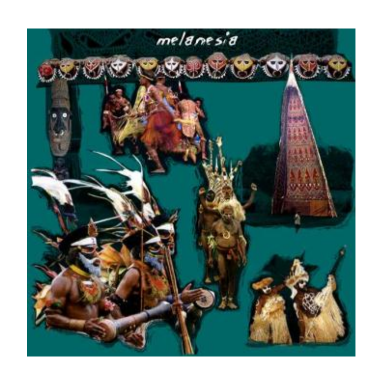
時至今日不能再追隨這些路線。人們習慣把過去一萬年以及早期的多種社會形式作為大約始於 1776 年《國富論》出版的人類文化真實歷史的前奏；可以說至少這是過時的觀念。這章節在目前已經結束，而為了估計未來的各種選擇，應先克服輕易追隨先輩成見的自然傾向。但是，導致亞當·斯密那一代人認為原始人偏好以物易物的偏見，同樣致使後來者放棄對早期人類的所有興趣，因為這以為先民不曾沉湎於這些值得稱道的熱情。古典經濟學家曾試圖把市場法則建基於自然狀態中人類的所謂傾向，取代這傳統觀念的是放棄對「未開化」人類的一切興趣，認為這與理解近世問題無關。

對早期文明採取主觀主義的態度，應是有悖科學精神。文明人和「未開化」先民之間的差異一直被過分誇大，特別是在經濟領域。據歷史學家說，直到最近，農業歐洲的產業活動形式與幾千年前相比並無太大差別。自從引進主要是用牲畜牽拉的耕犁，西歐和中歐的農耕方法基本上沒有改變，一直到現代。實際上，這些地區的文明進步主要是政治、知識和精神方面；至於物質條件，西元 1100 年的西歐幾乎還不及一千年前的羅馬世界。即使到了後來，改變多見諸治國之道、文學和藝術，特別是宗教和學習，而不是工業。中世紀歐洲的經濟大體上與古波斯、印度或中國同一水平，肯定不及兩千年前新埃及王國的財富和文化。歐洲現代經濟歷史學家中，Max Weber 最先反對因為與文明社會的動機和機制問題無關而漠視原始人經濟。社會人類學後來的研究有力證明他是對的。對早期社會的研究，最特別突出的結論就是人類作為社會動物是萬世不變的。在任何時空的社會，人的稟賦非常穩定的重現；人類社會生存的必要前提條件看來是一成不變。

近來，歷史和人類學研究的重要發現是人的經濟關係通常包含在他的社會關係。他的行為不是為了保護擁有物質財富的個人利益，而是為了保障其社會地位、社

會權益和社會資產。物質財富服務這目標時才會被重視。生產和分配過程與擁有物質相關的具體經濟利益是不相關的，但這過程每一步驟都與許多社會權益密切相關，最終確保必要步驟得以實施。小小狩獵或捕魚社會的社會權益與龐大專制社會非常不同，但經濟體系都是在非經濟動機的基礎上運行。

以生存角度來解釋較為容易。以部落社會為例，個人的經濟利益極少是至高無上，因為社會養活所有成員，除非社會陷入災難，則集體經濟利益受到威脅，不是個人。另一方面，維持社會關係至關重要。首先，如個人忽視大眾接受的道德或慷慨守則，將自絕於社會；其次，因為長遠來看，所有社會責任都是互惠性質，履行責任最能符合個人的有來有往利益。這種情況肯定對個人形成持續壓力，把經濟私利從意識中抹掉，以致在許多情況下（但決不是所有情況）甚至無法以利益角度理解本身行為的含意。這態度因經常性部落社會行動而強化，例如分享共同捕捉的食物或參加危險的部落遠征。以社會威望來衡量，慷慨行為的代價非常之高，因此任何不是徹底忘我的行為都是得不償失。個人性格與此幾乎沒有關係。不同價值觀對人有不同定義：好人或壞人，合群或不合群，忌妒或慷慨。分配〔食物，成果〕儀式的大眾接受原則是不容許任何人有忌妒的動機，正如以勤勞、靈巧或別的方式取得成功的園丁會得到公開讚揚（除非他太成功以致被誤為巫術所害而應該慢慢消失）。人的激情，不管好壞，只是指向非經濟目標。炫耀儀式目的在盡力鼓勵彼此盡力效法，而集體勞動的習俗每每未能達致最高數量和品質。免費送贈禮物的交換行為預期會有回報，雖然不必然是相關個人的回報；這程序通過精心宣傳，魔法儀式以及建立把組群以相互責任聯結的「二元關係」得以細緻傳揚和完美被保護；這現象可以解釋為何沒有得益或甚至財富的概念，只有傳統上提高社會聲譽的物品。



下文簡述太平洋西美拉尼西亞群島[100]社會的一般特徵，沒有考慮受風俗、法律、巫術和宗教影響的性別和地域組織，因為本書只打算說明所謂經濟動機是如何萌生於社會生活的背景。近代人種學者都同意一項負面觀點：沒有得利的動機，沒有為報酬而勞動的原則，沒有最省力原則；特別是沒有任何以經濟動機為基礎的獨立和獨特制度。既然如此，如何確保生產和分配的秩序？

答案是是兩個基本上與經濟學無關的行為原則[101]：**互惠**[102]和**再分配**[103]。以西美拉

[100] Western Melanesian，包括新幾內亞(New Guinea)，瓦努阿圖(Vanuatu)，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和所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插圖）
[101] 原註 1：這一章大量參考 Malinowski 和 Thurnwald 的論述。
[102] reciprocity
[103] redistribution

尼西亞群島的 Trobriand 島民[104]為例說明這經濟類型：互惠主要是通過社會的性系組織，即是家庭和親屬關係；再分配之有效，是因為人人都是同一首領的子民，因此有地域特性。以下分別考慮這些原則。

婦女和兒童是島民的家庭單位，生計是母系親戚的責任。男人拿出最好的收成養活姊妹和她的家人，他的良好行為贏得榮譽但沒有什麼物質利益回報；如果他懶散懈怠，首先是聲譽受損。互惠原則為他的妻子子女帶來利益，因而他的公民道德行為得到經濟補償。在自己的農圃和受惠家庭前典禮式展示食品，確保他的超卓農藝為人所知。顯然農藝和家庭形成社會關係的一部份，與優秀農藝和傑出公民行為有關聯。廣泛的互惠原則有助保證生產和家庭生計。

再分配原則同樣有效。島上大部份產品由村長送交部族首領儲存。島民的活動主要是節慶、舞會和其它互相款待的場合，也款待島外鄰居來訪（在這些場合，按照禮儀規則分發長途貿易的貨品和互贈禮品；首領向眾人分發習俗禮品），儲存制度的絕對重要性清楚顯現。從經濟角度看，這是現有勞動分工、外貿、公共稅收和國防儲備的必要部份。但經濟體系這些功能完全被極其生動的體驗吸納，為整體社會體系框架內每一行動提供了極豐富的非經濟性動機。

然而，除非行為原則適用於現有制度模式，否則不會變得有效。在沒有文字記錄和精密管理的條件下，互惠和再分配能確保經濟體系運行，只是因為這類社會組織符合這解決辦法的要求，這解決辦法用上了諸如**對等**和**中心**[105]這些模式。

對等制度模式極大促進了互惠，是沒有文字民族社會組織的常見特徵。部落分支的「**二元關係**[106]」引人注目，有助個人關係配對，因此有助人們在沒有永久記錄的情況下交換物品和服務。在原始社會中，同一族裔分為兩半[107]，這兩個親屬組群有互惠行為[108]。關於「二元關係」的起源，知之甚少；Trobriand 群島沿海村莊似乎都和內地村莊結成姐妹村莊，方便安排表面上是互贈麵包果和魚獲禮品的不定期交易。巴布亞新幾內亞的 Milne Bay 省有一種交換回報制度，稱為 Kula 交易：每人和另一個島的島民結成對等交易夥伴，把互惠關係個人化。廣泛的互惠行為不能只依賴各自交易行為的長期運行，這是不切實際，還要依賴部落分支對等模式的頻率，居住地區和部落之間的關係。

某程度上，所有人類群組都有「**中心**」這制度模式，是收集、儲存和再分配物品

[104] Trobriand 島民不相信懷孕是因為男女交歡，也不承認父親和子女之間有生理關係。.

[105] symmetry and centricity

[106] dua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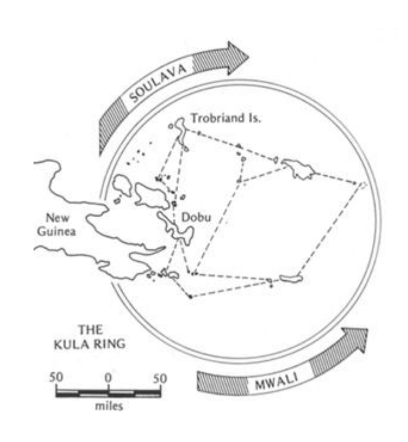
[107] moieties，可能互相通婚。

[108] 原文的原意是沒有顧及同一族裔的兩個分支有親屬關係，因此提出「原始社會為同一族裔的兩個分支創建“姊妹”關係，而這關係是建基於互惠行為」。譯文的修正版似乎更符合一般人情。

和服務的途徑。狩獵部落的成員通常把獵物交給族長再分配。狩獵活動的特點是獵物數量不固定以及獵物是集體行動的成果。在這樣的條件下，沒有其它切實可行的分配方法可以在每次捕獵行動之後維繫部落不致分裂。所有類型的經濟體系都有類似的需求，不管有多少組群。領土越大，產品種類越多，再分配更能導致有效的分工，因為這有助聯繫不同地域的生產者。

對等和中心模式頗能滿足互惠和再分配的需求；制度模式和行為原則相互調整。只要社會組織按慣例運行，就無需個人經濟動機，不用擔心個人逃避責任，自動確保分工，經濟責任得到履行；最重要的是所有公共節慶場合有足夠物資。這樣的社會禁止利潤的想法，譴責討價還價的行為，稱讚慷慨饋贈是美德；不會出現所謂以物易物的傾向。經濟制度實際上只是社會組織的功能。

不應由此推斷這種社會經濟原則是局限於原始傳統或小型社區；沒有利潤、沒有市場的經濟體系不必然是簡單的。上文提到的 Kula 交易建基於互惠原則，是已知最複雜的貿易方式；金字塔文明是規模龐大的再分配形式。



Trobriand 位處環狀群島，大多數島民上在 Kula 貿易活動花上相當多時間。稱之為貿易，但毫不涉及貨幣或實物的利潤；沒有儲藏物品，甚至沒有長久擁有；收到的物品高高興興送贈別人；沒有討價還價，沒有以物易物；整個活動完全由禮儀和魔法儀式調控。這依然是貿易：環狀群島的島民定期組織大規模遠航，把一種貴重物品送給居住在順時針方向島嶼居民，另一些人的遠航把另一種貴重物品送到逆時針方向島嶼居民[109]。



最後，兩組物品（傳統手工製作的白貝殼臂章[110]和紅貝殼項鍊[111]）沿著群島繞了一圈，足足要十年時間。再者，Kula 貿易一般要求個別島民與對等夥伴互贈同樣貴重的臂章和項鍊，最好是名人曾經擁有的物品。這種有系統有組織經長途運輸的貴重物品對等交換，無疑可稱為貿易。但整個複雜過程全是依照互惠原則行事。



這錯綜複雜、覆蓋數百里地域、跨越數十年時光、聯繫數以百計島民和數以千計物品的「時－空－人」系統沒有任何記錄或管理、也沒有任何獲利動機。這不是以物易物的傾向，而是互惠的社會行為

109 http://cla.calpoly.edu/~lcall/213/kula1.gif
110 http://www.tribalartfinder.com/images/products/Cone%20Shell%20b.jpg
111 http://www.mossgreen.com.au/imagesart/265_15.jpg

主導。儘管如此，這結果卻是經濟領域的巨大組織性成就。可以考慮一下基於嚴格會計的最先進現代市場體制能否接手這任務。倒霉的經銷商面對無數買賣個別物品的壟斷者，每項交易又涉及許多限制條件，可能沒法賺取標準利潤，他寧可不做生意。

再分配也有其漫長而多樣化的歷史，幾乎持續到現代。〔Namibia 中部山區〕遊牧民族 Bergdama 狩獵歸來，婦女出外尋找根莖、果實和葉子歸家，都預期要把大部份收獲獻給集體。實際上，這是和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共同分享活動的成果。至此為止，互惠的概念壓到一切：今天送贈他人，他日接受饋贈，只不過有些部落，部落首領或其他有名望的人擔當中間人，負責接收和分配供應物品，尤其是需要儲存的話。這是正常的再分配。顯然，這種分配方式的社會影響可能意義深遠，因為並不是所有社會都像原始狩獵人那樣民主。不管是有勢力家族、名人、佔統治地位的貴族階級或是官僚負責物品分配，都會試圖通過再分配的方式來增加本身的政治權力。



加拿大原住民 Kwakiutl 的冬季贈禮節日[112]，首領炫耀和分配獸皮財富，這樣做也是為了使受贈者欠他人情、成為他的債務人並最終成為僕從。

所有大規模實物經濟體系的運作都借助再分配原則。公元前巴比倫城邦的 Hammurabi 王朝以及尤其是古埃及新王朝是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央集權官僚專制政權，把家長制家庭無限倍數擴大，其「共產主義式」分配分級分等，各有差別很大的不同配給內容。要有大量倉庫接收農民的勞動產品，不管是養牛人、獵人、麵包師、釀酒師、陶工、編織工或其它職業。每件產品要詳細登記；如不是在當地消費，就從小倉庫轉送大倉庫，一直送到法老王的中央政府。布料、藝術品、裝飾品、化妝品、銀器、宮廷服飾各有獨立的貴重物品倉庫；還有要大型糧倉、軍械庫和酒窖。

但金字塔建造者實施的大規模再分配方式並不局限於那些不知金錢為何物的經濟體系。實際上，所有古老王國都使用金屬貨幣支付稅收和工資，但其他交易利

[112] *potlatch；http://ih1.redbubble.net/image.8765000.7666/flat,550x550,075,f.jpg*

用糧倉和倉庫的各種實物支付，倉庫的形形式式物品分配給不從事生產的人員使用和消費，包括官員、軍人和有閒階級。印加帝國、巴比倫王朝、古代中國和印度都實施分配制。這些國家和許多其他有巨大經濟成就的文明有由再分配機制促成的細緻周密勞動分工。

這原則也適用於封建制度。非洲的種族分級社會有時會出現定居在農民之間的牧人組成上層階層，而農民依然使用掘地木棍和鋤頭。牧民收到的禮物主要是穀物和啤酒這些農產品，分發出去的禮品可能是牲畜，特別是綿羊或山羊。這些情況有勞動分工，但一般情況通常是不同階層之間不平等分工：分配經常遮掩剝削現象，但與此同時這種共生現象對兩個階層都有改善勞動分工的好處。從政治角度來說，在這些封建制度社會，牛和土地有特權價值。東非有固定的養牛封地。研究再分配問題的 Thurnwald 教授以此指出封建制度意味著到處都有再分配體系。只有在極先進的條件和特殊環境，這體系才變得極具政治性，例如西歐之改變是因為諸侯要得到保護，禮品改為封建貢品。

這些例子表明再分配也易於使經濟制度融入社會關係，一般是再分配過程通常形成現政權的部份，不管是部落、城邦、專制還是養牛和土地的封建制度。物品生產和分配大體上分為收集、存儲和再分配；這模式以首領、廟宇、專制君主或領主為中心。政治權力的基礎各有不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亦有不同，所以再分配原則涉及不同的個人動機，例如有獵人自願與他人分享獵物，而古阿拉伯農民是因害怕懲罰而以實物繳稅。

在此故意忽略**同質社會**[113]和**等級制社會**的重大區分；前者的社會結構大體上統一而後者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雖然某些狩獵部落的自由平等成員與奴隸和奴隸主的相對地位可能相差十萬八千里，因此兩種社會有非常不同的動機，經濟體系可能依然建立在同樣的原則基礎，但各有非常不同的文化特徵，後者是由於非常不同的人際關係與經濟體系相互糾纏。

第三頂原則註定在歷史上發揮重大作用，可稱為「**自產**[114]」原則，希臘人稱之為 ***oeconomia***，是「**經濟** *economy*」的詞根。從人種學記錄來看，不應假設為個人和組群生產是比互惠和再分配更古老；相反的是有證據推翻正統觀念和某些較新近的理論。蠻夷先民從來沒有只為自己或家人獨自採集食物和狩獵。實際上，只有在較先進農業水平才出現自產行為；但即使如此，這與謀利動機或市場制度毫無共同之處。這是封閉組群模式。無論自給自足的單位是小戶家庭或莊園大宅，

[113] homogeneous societies。作者解釋 homogeneous societies 是 societies which are on the whole socially unified，與辭典和學術文章慣常的意思略有不同。homogeneous societies 同質社會泛指其成員分享相同價值觀、語言、宗教框架和種族的社會，慣常提出的例子有日本，中國和印度。即使接受這定義，也不能否定日本，中國和印度同樣有等級制社會。

[114] householding

原則是永遠相同：即是生產和儲存是為了滿足組群成員的需求。這原則與互惠和再分配同樣廣泛，其組織核心的性質無關緊要：可能是父權制家族的性別、村落的地點或貴族大農莊的政治權力。組群的內部組織也無關重要：可能是專制的羅馬家族或斯拉夫地區的民主鄉村共同體[115]；可能與法國卡洛林家族[116]的龐大領地或西歐一般農民的小耕地。對貿易和市場的需求是一如互惠或再分配制度。

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試圖把這樣的狀況建立為常態。從全球市場經濟正在迅速衰落的角度回顧既往，必須承認他在《政治學》序言區別家庭自產和賺錢的著名論述或許是社會科學領域最具預言性的見解，也依然是對這主題的最佳分析。亞里士多德堅持家庭自產的本質是為了使用，不是為了獲利，又強調為市場的附帶生產不必然要破壞家庭自產，只要例如牛羊和穀物這些經濟作物也可以自行生產留作己用，出售剩餘產品不一定破壞家庭自產的基礎。只有他這樣有常識的天才會如此斷言謀利動機只是限於為市場而生產，而金錢因素為這情況引入了新元素；不過儘管如此，只要金錢和市場只是附加於本來是自給自足的家庭自產，「生產為了使用」的原則是可以運作。毫無疑問，亞里士多德說法是對的，儘管他未能察覺忽視市場的存在是多麼不切實際，當時希臘經濟已依賴批發貿易和借貸資本。在那年代，Delos 和 Rhodes 諸島正在發展成為貨物保險、海貿貸款和轉帳銀行的商業中心；對比之下，一千多年後的西歐只是一幅原始圖景。但牛津大學 Balliol 學院院長 Jowett 犯了嚴重錯誤，以為他的維多利亞時代英格蘭比亞里士多德更清楚掌握家庭自產與謀利之間有差異的本質。他為亞里士多德開脫：「與人相關的知識相互交錯，在亞里士多德時代不易區分。」亞里士多德確實沒有清楚認識勞動分工的含意及其與市場和金錢的聯繫，也不認識金錢的借貸和資本效用。至此 Jewett 院長的批評有道理，但他不明白謀利的人性含意，不是亞里士多德。他沒有看清楚使用與謀利原則上的區別是完全不同文明的關鍵；兩千多年前，在當時粗疏市場經濟還沒有顯示這些原則之前，亞里士多德已準確預測其大略，而 Jowett 面對完全發展成熟範例，卻忽略這些原則的存在。亞里士多德指責毫無節制，為謀利而生產「不是人的本性」，實際上他是瞄準關鍵點，即是獨立的經濟動機剝離了原本含有這些局限的社會關係。

從廣義上來說，這命題認為直至西歐封建制度結束時，所知的所有經濟制度要麼是建基於互惠或再分配或家庭自產，要麼是這三項原則的某種混合體。社會組織把這些原則制度化，利用對稱、中心和獨裁這些模式。在這框架內，一般行為準則約束了多種多樣的個人動機，以確保物品有序生產和分配。謀利在這些動機中並不顯眼。風俗和法規，魔法和宗教一起促使個人遵守行為準則，而這最終確保個人在經濟制度中發揮作用。

---

[115] *zadruga*
[116] Carolingian

在希臘－羅馬時代，儘管貿易高度發達，這方面沒有中斷；特徵是羅馬政府在本來是家庭自產的經濟中施行大規模糧食再分配，直到中世紀結束時依然沒有超越這規格：市場在經濟體系中沒有重要作用；其它制度模式發揮作用。

自十六世紀以還，市場既數量多而且重要。在重商主義制度下，市場實際上成為政府的主要關注，但還沒有跡象顯示市場即將控制人類社會。相反，規則和管轄比前更嚴格，沒有自發調節市場的概念。若要理解經濟制度在十九世紀突然轉變為全新類型，必要考察市場史；在回顧以往各種經濟制度時往往可以實際上忽略市場。

第四章資料參考

金融與和平

關於上半個世紀國際金融的政治作用，幾乎找不到任何資料。Corti[117]的羅富財集團著作只涵蓋歐洲協同體之前的時期，沒有提到集團參與蘇伊士運河的股份交易，沒有記載〔與羅富財集團有密切關係的〕Bleichroeder 投資銀行通過發行國際貸款為 1871 年法國戰爭賠款融資，以及〔土耳其〕東方鐵路公司[118]期間的大量交易。Langer 和 Sontag 的歷史著作鮮有提及國際金融問題(Sontag 列舉和平因素時沒有提到金融）；Leathes 在《劍橋現代史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評論幾乎是例外。正如法國的 Lysis 和英國的 J. A. Hobson 這些作家的任意兼論直接揭露金融家沒有愛國主義精神或是他們傾向支持損害自由貿易的保護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趨勢。Rudolf Hilferding[119]或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強調來自國家銀行業界的帝國主義力量以及與重工業的有機聯繫。這些論點主要限於德國，肯定未能處理國際銀行業界的利害關係。

華爾街對 1920 年代發展的影響近在眼前，不方便客觀研究。總的來說，沒有人會懷疑爾街的影響波及國際緩和與國際仲裁方面，從和平條約時代到 Dawes 計劃、Young 計劃和〔瑞士〕洛桑會議前後的清償賠款。最近的一些文獻往往分開私人投資的問題，例如 Staley 的著作特意不包括給政府的貸款，不管貸款是其他政府還是私人投資者提供；這種限制實際上排除了他的有趣研究對國際金融的一般性評價。本書多處引用 Feis 的優秀研究，他幾乎涵蓋了整個主題，但不能避免沒有真實資料的缺失，因為國際金融集團的檔案資料還沒有公開。Earle、Remer 和 Viner 的有價值著作也無可避免有相同的局限。



[117] Luigi Conte Corti：1823-88 年，義大利外交家

[118] Oriental Railway Company

[119] 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 年，維也納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主要代表

第五章
市場模式的演變

若要破除對十九世紀的經濟迷信，先要詳細研究市場的本質和起源，然後理解市場在資本主義經濟發揮的主導作用，以及在這經濟體系中以物易物或交換原則的基本意義。[120]

以物易物，以實物代工資和以物換物是經濟行為原則，其有效性取決於市場模式。市場是以物易物或買賣雙方會面的場所。除非有這種市場模式存在，至少是部份存在，否則以物易物的傾向沒有足夠空間，無法產生價格。[121] 一如互惠得助於對等的組織模式、再分配因權力集中而變得較容易、家庭自產必須建基於獨裁專制，交換原則的有效性必然取決於市場模式。社會可能有互惠、再分配或家庭自產，但不普遍；如其它原則佔據上風，以物易物原則也可能在社會中處於次要地位。

然而，在某些其它方面，以物易物原則不是與另外三項原則處在同樣地位。與以物易物原則相關的市場模式，比「對等、中心或專制」更具體；與市場模式相比，這三項僅僅是「特徵」而已，沒有建立只為一項功能設計的制度。對等只是社會安排，沒有產生獨立制度，而是把現有制度模式化（部落或村莊是否具有對等模式，不涉及任何不同制度）。雖然中心模式往往產生獨特的制度，意味沒有動機會令制度只服務單一功能（例如村長或中央官員可能擔任不同的政治、軍事、宗教或經濟職務）。最後，經濟專制制度只是現有封閉組群的附屬特徵。

在另一方面，市場模式有特有以實物代工資或以物易物動機，能夠建立具體的制度，即是市場。最終，這也是市場控制經濟體系對整個社會組織有極其重要後果的原因：這意味著社會運作是附屬於市場。社會關係**鑲嵌**[122]在經濟體系之內，不是經濟鑲嵌在社會關係。經濟因素對社會存在至關重要，排除了任何其它結果。因為一旦經濟體系基於具體動機和特別地位而組成不同制度，社會必然被塑造以容許該體系按照本身規律運行。這就是大家熟知的聲言：市場經濟只能在市場社會運作。

把多個孤立的市場組織成市場經濟體系、把受調節的市場改變為自發調節的市場，這步驟確實至關重要。無論十九世紀歡呼這是文明巔峰或悲嘆這是毒瘤增

[120] 原註 1：見本章資料參考。
[121] 原註 2：Hawtrey, G. R., *The Economic Problem,* 1925, p. 13. 「個人主義原則的實際應用全然取決於交易的實務。」但 Hawtrey 錯誤假設市場的存在是簡單地源自交易實務。
[122] embedded

長，當時的想法很幼稚，以為這樣的發展是市場擴張的自然結果，沒有認識到市場逐漸轉變為有巨大力量的自發調節體系，不是市場內在傾向要長出多餘的東西，而是社會受到高度人為刺激的效應，以滿足機械這人為現象產生的情況。當然沒有認識到市場模式的有限性和非擴張性，近代研究令人信服地澄清了這事實。

「市場並非處處都有；如市場不存在，儘管顯示孤立狀態和孤立的傾向，但卻是與任何特殊發展狀況無關；同樣，市場存在也不能說明什麼。」這乏味的句子引自 Thurnwald 的《原始社會經濟學[123]》，概括了對這問題的近代研究重要成果。另一位作者從貨幣角度複述 Thurnwald 關於市場的說法：「從經濟學角度看，部落使用金錢這事實與其它處於相同文化水平但沒有使用金錢的部落沒有分別。」無需更多論述，只要指出這些話語的更加驚人含意。

市場或金錢是否存在，不必然影響原始社會的經濟體系；這反駁了十九世紀的神話：金錢是一項發明，加快勞動分工的步伐和釋放人類以物易物的傾向，因而不可避免地建立市場。實際上，正統經濟史是基於對市場重要性有無限誇大的觀點。唯一可以從沒有市場狀態正確導出的經濟特徵是「某種孤立狀態」或「孤立傾向」；對經濟的內部組織來說，市場是否存在沒有什麼差別。

理由很簡單。市場不是主要在經濟之內運行的制度，而是在其外。市場是長途貿易聚會之地。普通的地方市場並不重要。此外，長途貿易和地方市場本質上都不是競爭性，因此這兩種市場都沒有什麼壓力要建立地域貿易，即所謂內部市場或國家市場。以上每一句話都打擊傳統經濟學家的一些公理式假設，但這些言論嚴格追隨近代研究所呈現的事實。

誠然，這些說法的邏輯幾乎與傳統學說的基礎邏輯相反。正統學說從個人傾向於以物易物開始，從而導出要有當地市場，然後是勞動分工，最後是貿易，然後是外貿甚至包括長途貿易的必要性。依據現有的知識，這次序應該幾乎顛倒：真正的起點是長途貿易，這是商品地理位置的結果，地理位置也決定勞動分工。長途貿易往往產生市場，而市場涉及以物易物行為和買賣行為（如有使用金錢）；因此，市場最終為某些人提供機會讓他們陶醉於所謂討價還價的傾向，當然這不是必要的。

這學說的重要特點是貿易源於與經濟內部組織無關的外部環境：「從觀察狩獵到**區域以外**取得物品得出的原則付諸應用，導致一些我們後來認為是貿易的交易形式。」[124] 尋找貿易之源，起始點應是從遠方取得物品，一如狩獵。「澳大利亞中

[123] *Economics in Primitive Communities*
[124] 原註 3。Thurnwald, R. C., *Economics in Primitive Communities,* 1932, p. 147.

部 Dieri 族每年七、八月間長途跋涉到南方以取得用於彩繪身體的紅赭石…他們的鄰居 Yantruwunta 族同樣到八百公里外的 Flinders 山區取得赭石和沙岩板，用作碾壓草籽。在這兩個例子，如當地人反對他們採石，可能要動武。」相對於我們慣見的貿易，這種強行採石或尋寶行動明顯非常類似搶奪和海盜行徑，基本上是單方面的事情，後來變為雙方「某種形式的交易」，往往只是因為當地有勢力人士勒索，或是類似 Kula 貿易圈、西非 Pengwe 遠訪團的互惠安排，又例如 Kpelle 族族長堅持招待全部賓客從而壟斷外貿。誠然，這種訪問不是偶然行為，而是真正的貿易行旅；這是我們現在的觀點，不是他們當時的觀念；物品交易以互贈禮品為名、並經常回訪。

我們由此得出結論：儘管人類社會似乎從未完全忘掉外部貿易，這種貿易不是必然涉及市場。最初，外貿更多是冒險、探險、狩獵、海盜和戰爭，而不是以物易物。這也極少有和平是雙方事務的意思，即使有這樣的意思，通常也是按照互惠原則組織，不是以物易物。

這種交易形式轉變為和平的以物易物，可追溯兩個方向：何謂以物易物，何謂和平。如上所述，部落行旅可能不得不遵守當地有勢力人士設定的條件，可能向陌生人強行索取一些對等之物；這種關係儘管不完全是和平性質，但可能導致以物易物：單方面來訪變為兩方面交往。另一種發展情況常見於非洲叢林的「無聲貿易」：通過有組織的休戰以避免戰鬥，而貿易在雙方小心謹慎的情況引進了和平，信任和信心這些元素。

眾所周知，市場後來成為重要的外貿組織。但從經濟觀點來看，外貿市場完全不同於地方市場或內部市場，不僅規模有區別，而且制度有不同功能和起源。外貿是運輸；重點是某地區缺少某些類型的物資；例子是英格蘭以羊毛交換葡萄牙的葡萄酒。地方貿易不用運輸，局限於當地物資，因為物品太重、太大或容易損耗。因此，外貿和地方貿易與地理距離有關；地方貿易局限於那些無法克服地理距離的貨品，外貿限於能克服地理距離的貨品。這種貿易正確地描述為補充性貿易。地方貿易是城鄉之間的補充性貿易，外貿是不同氣候區域之間的補充性貿易；都是建立在這原則。這種貿易無需意味著競爭，如競爭可能會擾亂貿易，消除競爭不會有矛盾。相對於外部和地方貿易，內部貿易的本質有競爭性；除了補充性交易，還包括來自不同源頭但相似貨品的龐大數量交易彼此競爭。因此，內部貿易或國內貿易出現之後，競爭才逐漸被接受為貿易的通常原則。

這三種貿易類型的經濟功能和起源都非常不同。上文已討論外貿的起源：因應運輸需要歇腳的淺灘、海港、河源或陸路交通交匯，市場應運而生。「港口」成為水路交通交匯點。[125] 歐洲著名集市的短暫昌盛是長途貿易產生某種類型市場的

[125] 原註 4。Pirenne, H., *Medieval Cities,* 1925, p. 148 (footnote 12).

例子；英格蘭的專賣城鎮是另一個例子。儘管集市和專賣城鎮再次突然消失令教條主義進化論者驚惶失措，但港口和城鎮在西歐人民定居過程中有巨大作用。即使城鎮建立在外貿市場所在之處，地方市場往往在功能和組織兩方面都是獨立於前者。港口、集市和專賣城鎮都不是內部或國內市場的發源地。究竟源出何處？

既然有了個別的以物易物行為，理所當然以為這會導致地方市場的發展，而這樣的市場一經存在，也會同樣自然地導致內部或國內市場的建立。然而這些假設全都不成立。一般而言，個別的以物易物行為不會導致在社會中建立市場，社會有其它經濟行為的原則。幾乎所有原始社會都常見以物易物的行為，但被認為並不重要，因為這沒有供給生活必需品。古代的再分配制度龐大，常見有以物易物行為和地方市場，但至多只是附屬性特徵。互惠原則也是如此：以物易物行為一般鑲嵌在長期關係之中，意味著信任和信心，這情況會消除交易的雙邊特徵。限制因素來自於社會各方面：風俗和法律、宗教和魔法都同樣限制了交易行為的人和物、時間和場合。一般而言，以物易物只是參與大家心中有數的物品交易。西南太平洋小島 Tikopia 語言的 *Uta* 就是互惠交易中的傳統對等安排。[126] 十八世紀觀念認為交易的基本特徵包括討價還價的自願元素和以實物代替工資，在實際交易中沒有什麼空間；在這交易程序背後這動機很少有機會浮現。

習慣性的表現方式反而是反其道而行。送禮者可能只是把禮品丟在地上，而收禮者假裝偶然撿起，或甚至讓隨從拾起。仔細檢視收到的禮品，不是大家接受的行為。有理由相信這高雅態度不是因為對交易的物質方面沒有興趣，而是可以把以物易物的禮節描述為限制這項特徵的抵消性發展。

誠然，從已有證據來看，斷言地方市場是從個人交易行為發展而來可能是輕率之言。地方市場的源由模糊不清，只可以說：從一開始，這制度有許多安全措施以保護社會的現有經濟組織不受市場作為的干擾。人們的禮節儀式是確保市場安寧的代價，限制了市場範圍又確保市場在既定的狹窄局限內運行。市場體系最重要的結果是城鎮和都市文明的誕生，實際上是這種矛盾發展狀況的成果。城鎮作為市場的產物，不僅保護了市場，也防止市場向鄉村擴張而侵擾社會的現有經濟組織。「包圍[127]」這單詞的兩個意思正好涵蓋城鎮的雙重功能：「包含」和「限制」發展。

如以物易物的行為被各種禁忌包圍，以避免這種人際關係濫用正常經濟組織的功能，那麼市場的紀律是更加嚴厲。非洲坦桑尼亞人數最多的 Chaga 族有這樣的例子：「市場必須在墟期定期開放。若是因任何事情未能開放一兩天，市場在淨化之前就不能做生意…有任何流血事件，市場都必須立即補贖。從那一刻起，婦女

[126] 原註 5：Firth, R., *Primitive Polynesian Economics,* 1939, p. 347.
[127] contain

不得離開市場，人們不得觸摸貨品；貨品必須先淨化才可以帶走或用作食物。最低限度要即時用山羊獻祭。如婦女在市場生孩子或流產，必須採用更昂貴嚴肅的補贖方式，以生乳畜牲獻祭。首領的家宅還須用乳牛血液淨化，並逐區噴灑區內的婦女。」[128] 這樣的規則使市場擴張更不容易。

家庭主婦在典型地方市場購買日常必需品，農民和工匠出售各自的產品；世上各地的市場自古以來就是這樣。這種市集在原始社會是相當普遍，而且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在大多數西歐國家幾乎保持不變。不管是中非部落，還是法國中古時代的城市，或是亞當·斯密時代的蘇格蘭村莊，大同小異的市集都是當地生活的附屬品。鄉村如是，城市也如是。城市的地方市場基本上是街坊市場；儘管這對社會生活極為重要，但沒有任何跡象依照本身模式改變現有的經濟體系。街坊市場不是內部或國內貿易的起源。

西歐的內部貿易實際上是因國家干預促成。一直至〔十六世紀〕商業革命時代，我們現在當作是國內貿易並不是全國性質，而只是城市之間的貿易。漢薩同盟[129]不是由德國商人組成，而是由來自北海和波羅的海城鎮的貿易寡頭組成的公會。漢薩同盟沒有把德國經濟生活「國家化」，而是故意切斷了內陸與貿易的聯繫。安特衛普、漢堡、威尼斯或里昂的貿易決不是荷蘭、德國、義大利或法國的國內貿易。倫敦也不例外，沒有什麼「英格蘭」色彩。這時期的歐洲貿易地圖只有城鎮，留白的都是鄉村地區：從有組織貿易的角度來看，實際上是沒有鄉村。所謂國家只是非常鬆散的政治單位，經濟是由無數大大小小，自給自足的家庭和不起眼的地方市場組成。貿易局限在有組織城鎮的地方性街坊貿易或是長途貿易；兩者被嚴格分開，而且不允許隨意滲透鄉村。

城鎮組織內部的地方貿易與長途貿易長久分離，對演化論者來說肯定是另一打擊；演化論認為事情似乎總是一事生一事。但就是這特殊事實形成西歐都市生活的社會史關鍵。這頗為支持本書根據原始經濟體系的條件所推斷市場的起源。地方貿易與長途貿易之間的顯著分別可能看起來過於刻板，尤其是這導致本書頗為令人驚訝的結論，即是長途貿易和地方貿易都不是現代內部貿易的起源，因而別無選擇，只能以政府干預作為解釋。最近的研究也證實這結論。不過，先要簡略介紹都市文明史，因為這是由中世紀城鎮範圍內的地方貿易與長途貿易的特別分離狀態塑造。

這分離狀態實際上是中世紀城市中心制度的核心。[130] 城鎮是**自由民**[131]的組織。

---

[128] 原註 6。Thurnwald, R. C., *op. cit.,* p. 162-164.

[129] Hanseatic League/ Hanse。十二至十三世紀神聖羅馬帝國時代中歐諸城組成的商業、政治聯盟，以德國北部城市為主。

[130] 原註 7：本文表述追隨 H. Pirenne 的知名著作。

[131] burgesses

只有自由民才有公民身份，而這制度是建基於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之間的區別。鄉下的農民和來自其它城鎮的商人很自然都不是自由民。但是，儘管城鎮有軍事和政治影響力對付周邊的農民，但不能加諸外國商人。因此，自由民在地方貿易和長途貿易的地位是完全不同。

關於食品供應，規章要求強制公開交易和禁止中間人，以管制貿易和防止提高物價。但這些規章只適用於城鎮之間及周邊地區的貿易，長途貿易有完全不同的管制。香料、鹹魚或酒類要經長途運輸，因此是屬於外商及其資本性批發貿易的範圍。地方規章不能管制這種貿易，只可以盡可能排除在地方市場之外，並為此而完全禁止外商從事零售。在進口方面，資本性批發貿易量增長越多，強行將其排除在地方市場之外的措施就越嚴格。

在工業產品方面，地方貿易與長途貿易之間的分離更為深切，影響出口生產的整體組織。原因在於組織工業生產的行業公會的性質。地方市場的生產是根據生產者的需要而管制，因而把生產限制在有利可圖的水平。這原則很自然不適於出口，因為生產者的權益不會為生產設限。因此，雖然地方貿易受到嚴格管制，出口生產只受到行業公會的常規控制。那時代的主導出口產業是布匹貿易，實際上建基於資本性的受薪勞工制。

地方貿易與出口貿易之間越來越嚴厲的分離，是都市生活對靈活資本威脅要瓦解城鎮制度的反應。典型的中世紀城鎮要避免威脅，不是試圖化解可控制的地方市場與變化多端又不可控制的長途貿易之間的矛盾，而是通過最嚴厲執行排斥和保護政策來面對危險；這些政策是其生存之道。

實際上，這意味著城鎮致力建立任何可能的障礙以阻止資本性批發商迫切要求的國內市場或內部市場。通過維持非競爭的地方貿易和城鎮之間同樣非競爭長途貿易的原則，自由民利用一切可用手段阻止貿易範疇納入鄉村，也阻止開放城鎮之間的一視同仁貿易。正是這發展迫使領土國家走到最前線，成為市場「國家化」的工具和創立內部貿易。

十五和十六世紀時，國家採取深思熟慮的行動，把營商體系強加諸極度保護主義的城鎮和諸侯國。重商主義摧毀了地方貿易和城市間貿易的過時**特殊主義**[132]，清除了這兩種非競爭商貿活動之間的屏障，為國內市場掃除障礙，而國內市場則越來越忽視城鄉之間以及各城鎮及省份之間的區別。

營商體系實際上是人們面對許多問題時的反應。從政治上來說，中央集權國家是商業革命召喚的創新；商業革命把西方世界的重心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沿岸地

[132] particularism

帶，促使較大規模農業國家的落後人民為了商業和貿易而組織起來。就外部政治而言，建立主權是時代的需求；因此，重商主義的治國之道包括為外交事務的力量而調集整個國土的資源。就內部政治而言，統一被封建主義和城市特殊主義分裂的鄉間是這種努力的必要副產品。

就經濟而言，統一的工具是資本，即是私人囤積的財富，因此尤其適用於商業發展。最後，把傳統的地方自治體系擴大到整個國家領土，為中央政府經濟政策提供了管理技能。法國的行業公會每每是國家機構，擴大到整個國家；在英格蘭，圍城城鎮衰落，致命削弱行業公會制度，鄉村在沒有行業公會監督管理的情況下就進行了工業化；與此同時，在英法兩國，貿易和商業擴大到全國各地，成為經濟活動的主導形式；這情況就是重商主義的內部貿易政策的起源。

國家干預行動從特權城鎮的約束下解放了貿易，現在需要解決城鎮曾經成功對付的兩個密切相關的威脅：壟斷和競爭。當時眾人皆知競爭最終肯定導致壟斷，對壟斷的畏懼比後來更甚，因為這往往影響生活必需品，容易置社會於險境。解決辦法是全面管制經濟生活，但這一次是在全國範圍而不再只是在自治區。以現代眼光來看，可能容易認為排除競爭是目光短淺，但實際上這是在特定條件下保護市場運作的手段。因為買方或賣方的任何暫時侵擾市場的行為肯定會打破市場平衡，挫傷一般買家或賣家，導致市場停止運作。從前的經銷商無法肯定貨物賣得好價錢而停止供貨，而供給不足的市場成為壟斷商家的獵物。需求方面有程度較少的同樣危險，因為需求快速減少之後可能是需求壟斷。政府為了使市場擺脫特殊主義的限制和各種收費及禁令，所採取的每步驟都危及生產和分配的有組織制度；這制度受到無節制競爭和無執照商人侵入的威脅，只從市場「撈好處」但不保證市場長期存在。因此，雖然新的國內市場無可避免具有某程度的競爭，但佔據主導地位的還是傳統的管制特徵，不是新的競爭元素。[133] 經濟體系的廣泛基礎依然是為生計而勞動的自給自足農戶，逐漸通過內部市場的形成而被集成龐大的國家單位。這國內市場現與地方市場和外國市場並存和部份重疊。內部商貿補充農業，而內部商貿是相對孤立的眾多市場，與在農村依然佔據主導地位的家庭經濟原則完全並行不悖。

以上總結本書對工業革命時代為止的市場史概述。眾所周知，人類史的下一階段試圖建立龐大的自發調節市場。西方民族國家的重商主義特有政策沒有預示這獨特的發展結果。重商主義「解放」貿易，僅僅是把貿易從特殊主義中解放，但同時卻擴大管制範圍。經濟體系被淹沒在一般的社會關係；市場僅僅是社會權威為了控制和管制而訂立制度的附屬特徵而已。

[133] 原註 8：Montesquieu, *L'Esprit des lois,* 1748. "The English constrain the merchant, but it is in favor of commerce."

第五章資料參考

「社會與經濟體系」的參考文獻

十九世紀曾試圖建立基於個人謀利動機的自發調節經濟體系。本文認為如此的冒險行為本質上是極不可能的事情。本文只關注這方法意味著對生活和社會的扭曲觀念。例如，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假定人們的行為一如市場的商賈是「自然」的行為，而任何其它行為模式都是非自然的經濟行為，是干預人類本能的結果；只要人類聽其自然，就會自發形成市場；不管這樣的社會有什麼道德基礎，其可行性起碼是建基於人類不可改變的特性，等等。與這些主張幾乎完全相反的觀點出現在社會科學不同領域的現代研究證言，涉及諸如社會人類學、原始經濟、早期文明社會史以及一般經濟史。確實，不管明示或暗喻，經濟自由主義哲學包含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假設，幾乎全都被駁倒。以下是一些引文。

（1）「謀利」的動機不是人類的「天性」。

「原始經濟的典型特點是生產或交易沒有謀利的意欲。」(Thurnwald, *Economics in Primitive Communities,* 1932, p. xiii) 「另一個必須徹底被推翻的概念是目前一些經濟學教科書中提到的**原始經濟人**概念。」(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30, p. 60) 「曼徹斯特自由主義派的理想型在理論和歷史觀點都是誤導，必須反對。」(Brinkmann,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Abt. IV, p. 11).

（2）期望勞動有償不是人類的「天性」。

「在較文明的社會中，謀利經常是勞動的刺激因素，但在原始的天然狀態中從來沒有激勵勞動的作用。」(Malinowski, *op. cit.,* p. 156) 「未受影響的原始社會根本找不到勞動與有償報酬的想法有任何聯繫。」(Lowie, "Social Organizatio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XIV, p. t4).「沒有地方出租或出售勞力。」(Thurnwal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Bk. III, 1932, p. 169) 「把勞動視作責任，無需補償…」很普遍。(Firth, *Primitive Economics of the New Zealand Maori,* 1929) 「即使在中世紀，因為賺工資而為陌生人工作是聞所未聞。」「陌生人與責任沒有個人聯繫，因此應為榮譽和認同而勞動。」游吟樂師是陌生人，「接受報酬，因而被人鄙視。」(Lowie, *op. cit.*)

（3）把勞動限制在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度不是人的「天性」。

「我們留意到到工作從來不局限於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度，而是超出絕對必要的數量，這歸因於自然或已成習慣要有所為的功能性欲望。」(Thurnwald, *Economics,* p. 209) 「勞動量總是超過嚴格需要。」(Thurnwal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p. 163)

（4）勞動的常見激勵因素不是謀利，而是互惠、競爭、工作的樂趣和社會認可。

互惠：「即便不是全部，大部份經濟行為屬於某種互惠送贈和回贈的鏈條，長期而言兩方平衡，

雙方同等受益…。如某人的經濟行為經常固執地不服從法規，很快會被社會和經濟秩序排斥—這人也非常清楚。」(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1926, pp. 40-41)

競爭：“競爭是盡力表現，儘管目標一致，但競爭的表現卻極不一致…為力爭優秀而重複各種模式。」 (Goldenweiser, "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1936, p. 99) 「把大木柱搬到庭園或搬走已收割的山藥，人們在速度、幹勁和能夠舉起的重量方面相互競爭。」(Malinowski, *Argonauts,* p. 61)

工作的樂趣：「為工作而工作，是〔新西蘭〕毛利族人不變的特點。」(Firth, "Some Features of Primitive Industry," *E.J.,* Vol. I, p. 17) 「大部份時間和勞動花在美觀美化的事情，庭園打掃整潔，清除所有垃圾；築起精致又牢固的柵欄，特別是支撐結實和粗大的山藥杆子。在某種程度上，所有這些都是種植莊稼要做的事；但毫無疑問土人盡心盡意已遠遠超出純粹必需的限度。」(Malinowski, *op. cit.,* p. 59)

社會認可：「庭園收拾得盡善盡美，是某人社會價值的一般指數。」(Malinowski,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 II, 1935, p. 124)「預期社區人人一樣的勤奮。」(Firth, *Primitive Polynesian Economy,* 1939, p. 161) 「印度洋的安達曼島人認為懶惰是反社會行為。」(Ratc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 「受命於他人而勞動，是社會服務，不僅僅是經濟性質的服務。」(Firth, *op. cit.,* p. 303)

（5）從古至今人性皆是如此。

Linton 在《人類研究 *Study of Man*》提醒要注意心理學理論的性格決定論，主張「全面觀察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性格〕類型的整個範圍普見於所有社會…。換句話說，觀察者一旦看透了文化差異的屏障，會發現各式人等基本上和我們相同。」（p. 484）。Thurnwald 強調人類在所有發展階段極為相似：「上文研究的原始經濟與其它形式的經濟沒有區別，都是關乎人際關係，並建基於相同的社會生活普遍原則。」(*Economics,* p. 288)「人類的自然元素有一些基本相同的集體情緒，足以解釋人類社會存在重複出現相似結構。」("Sozialpsychische Ablaufe im Volkerleben."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 383) Ruth Benedict 的《文化模式 *Patterns of Culture*》最終是基於相似的假設：『愚見以為普世人類的性格相當穩定，似乎每一社會都潛在大致相似的分配，似乎文化根據傳統模式從中選擇，把大多數人鑄為一體。例如，按照這種解釋，「靈魂出竅」的出體經驗是局限於任何人口的少數人。如這種體驗得到尊重和獎賞，有相當比例的人會演示或效仿…』」（第 233 頁）。Malinowksi 的著作始終堅持相同的立場。

（6）經濟體系一般是嵌鑲於社會關係；非經濟動機確保物品的分配。

原始經濟是「是社會事件，把各人作為有相互聯繫的整體來看待。」(Thurnwald, *Economics,* p. xii) 這同樣見諸財富、勞動和實物交易。「原始財富不具有經濟特性而是社會特性。」（同上）。勞動能夠「有效工作」，因為這「被社會力量整合為有組織的努力。」(Malinowski, *Argonauts,* p. 157) 「商品和服務的實物交易大多數在固定的夥伴關係中進行，或與一定的社會關連有關，或是涉及非經濟事務的相互依存關係。」(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p. 39)

支配經濟行為的兩項主要原則似乎是「互惠」和「貯存與再分配」:**「整個部落生活滲透著頻繁的交換。」**(Malinowski, *Argonauts,* p. 167) 「今天之給，有日後之得作為補償。這是遍及原始生活的每一層關係的互惠原則結果，…」(Thurnwald, *Economics,* p. 106)互惠之變得可能，「每一原始社會都有一定的制度〔兩重性〕或是結構的均衡，作為互惠責任不可缺少的基礎。」(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p. 25)「〔巴布亞新基內亞〕Banaro 族人先人靈位的對稱分隔是以同樣對稱的社會結構為基礎。」(Thurnwald, *Die Gemeinde der Banaro,* 1921, p. 378) Thurnwald 發現，「貯存和再分配」的做法最為普遍，從原始狩獵部落一直至最大的帝國都適用；與互惠行為有時互不相干，有時相互結合。物品由中央以各種各樣方式收集，然後再分配社會各人。例如，在太平洋群島，「國王作為第一部族的代表人物，接受部落的收入，隨後以賞賜形式再分配各人。」(Thurnwald, *Economics,* p. xii) 這種分配功能是中央機構政治權力的主要源頭（同上，第 107 頁）。

（7）為自己和家人儲存食物不是初民生活的部份。

經典著作假定「前經濟人」不得不照料自己和家庭。Carl Buecher 本世紀之交的開拓性著作重提這項假設並廣泛傳播。最近的研究一致糾正了他的觀點。(Firth, Primitive Economics of the New Zealand Moari, pp. 12, 206, 350 ; Thurnwald, Economics, pp. 170, 268, an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Vol. III, p. 146; Herskovits,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1940, p. 34; Malinowski, Argonauts, p. 167, footnote).

（8）互贈與再分配是經濟行為原則，不僅適用於小原始社會，也適用於龐大而富有的帝國。

「分配有本身的獨特歷史，起始於狩獵部落的最原始生活。」「…較為現代和有較明確階層的社會其情況不同…」「牧人與農民的接觸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子。」「…這些社會的各自情況有頗有差異。隨著一些家族的政治權力提升和專制君主崛起，分配的功能增大。族長收受農民的禮物，現已變成〔稅收〕，分發百官，特別是附屬宮廷的官員。」

「這發展涉及更複雜的分配制度…。」 所有古國（古中國、印加帝國、印度各王國、埃及、巴比倫）的稅款和工資利用金屬貨幣，但更多利用儲存在穀倉和倉庫的實物支付…分配給官員、士兵、有閑階級這些不參與生產的人口。在這個例子，分配實現了基本的經濟功能。」 (Thurnwald, *Economics,* pp. 106-8).

「談到封建主義，我們通常想到中世紀歐洲…。然而，這是一種體制，很快呈現在有階層的社會。大多數交易是實物形式，上層階級聲稱獨霸所有土地或家畜；這些事實是封建主義的經濟起因…。」（同上，第 195 頁）。



第六章
自發調節市場與虛擬商品：勞動力、土地和金錢





[134]

上一章簡略概述經濟體系和市場，可見在我們這時代之前市場從來都只是附屬經濟活動。一般而言，經濟體系被歸入社會體系，

而市場模式總能配合在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行為原則。這模式背後的以物易物和交換的原則沒有因為擴大而犧牲其它原則的傾向。在重商主義中最高度發展的市場制度，是在中央政權控制下繁榮興旺，政權在家庭經濟和國民生活兩方面都培育了專制制度。規章制度和市場實際上是一起成長。沒有人知道有自發調節的市場；實際上，自發調節這概念的出現是完全背離發展趨勢。有了這些事實才可以完全理解市場經濟背後的一些不尋常假設。

市場經濟是指由市場獨自控制、調節和指導的經濟體系，負責商品生產和分配的秩序。這種經濟體系源於預期人類行為是為了賺取最大金錢收益。這假設市場價格固定的商品供給（包括服務）是相等於在這價格的需求；又假設貨幣的存在，發揮擁有者購買力的功能。因此生產是由價格控制，因為指導生產者的利潤是視乎價格，商品分配也視乎價格，因為價格形成收入，有了收入商品才可以在社會成員中分配。這些假設認為商品生產和分配的秩序只是由價格獨自確定。

自發調節意味著所有產品都是為了在市場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這種銷售。因此，所有生產要素都有市場，不僅只是商品（必然包括服務），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也有市場，其價格分別稱為商品價格、工資、租金和利息。這些術語表明價格形成收入：利息是使用資本的價格，是出資人的收入；租金是使用土地的價格，是地主的收入；工資是使用勞動的價格，是勞工的收入；最後，商品價格是企業管理服務出售者的收入，利潤實際上是兩組價格之差，即是商品價格減去生產成本之差。如果這些條件全都得到滿足，來自市場銷售的全部收入正好足夠購買所

[134] http://en.docsity.com/news/wp-content/uploads/2012/03/Economic-resources.gif, http://www.fltia.org/wp-content/uploads/2012/01/money-bags.jpg

有產品。

國家及其政策有另一組假設：不應抑制市場的形成，收入必須源自銷售；不得干預價格隨市場條件而變化，無論價格是商品價格、勞動力價格、土地價格或是資本價格。因此，所有生產業要素都要有市場[135]，而且任何措施或政策不得影響這些市場的運作。無論價格、供給和需求都不應固定或管制；正確的政策或措施必需創造條件，讓市場成為經濟領域的唯一組織力量，從而有助確保市場自發調節。

為了全面理解，先暫時回顧重商主義制度及其致力發展的國內市場。在封建制度和行業公會制度，土地和勞力是社會組織本身（資本還沒有發展成為生產的主要要素）的部份。作為封建秩序的關鍵要素，土地是軍事、司法、行政和政治制度的基礎，其地位和功能由法律和習俗確定。土地所有權是否可以轉讓？如果可以，可以轉讓何人？有什麼限制？產權包括什麼？一些土地有什麼用途？所有這些問題被剔除在買賣組織之外，被另一組完全不同的制度規管。

勞動力的組織也是如此。一如以往歷史的其它經濟制度，行業公會制度下的生產活動其動機和條件被鑲嵌在社會的一般組織。師傅、滿師學徒和學徒之間的關係，行會的規矩，學徒的數目以及工資都受到行業公會和城鎮的習慣和規章管制。重商主義制度只是統一這些條件；或是英格蘭以法例出之，或是法國把行業公會「國有化」。土地的封建地位被廢除，但只限於切斷省內特權；其他土地仍然是**在商業範疇之外**[136]，英法兩國就是如此。直至 1789 年〔法國〕大革命，作為農莊地主依然是法國社會特權之源；甚至在此之後，英格蘭關於土地的不成文法基本上還是中世紀的。儘管重商主義偏向商業化，但始終沒有攻擊保護兩個基本生產要素（即勞動力和土地）的保障，使其成為商品。英格蘭在通過〈1563 年工匠法[137]》和〈1601 年濟貧法[138]》把勞動力「國有化」，不再受危險威脅；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的反圈地政策一貫反對農莊地主從中得利的原則。

無論重商主義如何堅持商業化作為國家政策，但對市場的概念卻違反市場經濟，最好佐證是極度擴大國家對產業的干預。重商主義者與封建主義者，宮廷謀劃者與既得利益集團，中央集權的官僚與保守的特殊主義者，他們通通對這一點沒有

---

[135] 原註 1：Henderson, H. D., *Supply and Demand,* 1922. 市場的實務有兩方面：為不同用途分配要素，以及組織各項力量以影響各項要素的總體供給。

[136] *extra commercium*

[137] Statute of Artificers。〈工匠法〉限制價格，設定工資上限，限制勞工的人身自由和監管培訓。當地官員有責任控制農業工資；行業工會控制城鎮的工資。這實際上把以前封建時代工藝行業公會的功能交給新成立的英格蘭國家。

[138] Poor Law。1601 年伊麗莎白一世女王頒佈第一部〈濟貧法〉，規定地方政府負責濟貧工作，授權當地官員以教區為管理濟貧事宜單位，徵收濟貧稅及核發濟貧公帑。救濟細節因人而異：年老及喪失勞動力者在家接受救濟；貧窮兒童在指定人家寄養，到一定年齡時送去當學徒；流浪者被關進監獄或送入教養院。

分歧；他們意見不同的只是針對管制方法：行業公會、城鎮和省份訴諸風俗習慣和傳統，新的國家權力機構偏重政令和法規；但他們都一致反對勞動力和土地商業化的概念，而這正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法國在 1790 年才廢除工藝行業公會和封建特權；英格蘭在 1813-14 年間才廢止〈工匠法〉，1834 年才廢止〈濟貧法〉。直至十八世紀最後十年，這兩個國家才討論建立自由的勞工市場，而經濟生活自發調節是完全超出那時代的概念。重商主義者關心通過貿易和商業開放鄉間資源，包括充分就業，但理所當然地接受土地和勞動力的傳統組織。在這方面，重商主義者的觀念一如他對政治領域的現代觀念大相逕庭；重商主義者相信開明獨裁君主的絕對權力不受民主調和。正如民主制度和代議政治的過渡涉及徹底逆轉那時代的趨勢，十八世紀末期市場從被管制轉變為自發調節也代表著社會結構的徹底變革。

自發調節的市場從制度上把社會分為經濟和政治兩個領域。就整體社會的角度而言，這兩分法實際上只是重申自發調節市場的存在。可以推論任何時代任何類型的社會都有這兩個分離的領域，不過這樣的推論是建基於謬誤。誠然，任何社會存在都必然有某種制度以確保物品生產和分配的秩序，但這不意味有獨立的經濟制度存在；一般來說，經濟秩序僅僅是身處的社會的功能而已。上文已指出，無論是部落、封建或重商的社會都不存在獨立的經濟制度。十九世紀實際上是獨一無二，偏離常規的時代：經濟活動獨立，並歸因於獨特的經濟動機。

除非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服從它的要求，否則這樣的制度模式無法運作。市場經濟只能存在於市場社會。本書分析市場模式的整體情況得出這結論，以下較為詳盡說明理由。市場經濟必然由全部產業要素組成：勞動力、土地和資金。（在市場經濟，最後一項是產業活動的必需要素；市場機制納入資金具有深遠的制度性影響。）勞動力和土地就是組成每一社會的兩部份：人類本身及其身處的大自然環境。市場機制納入這兩要素，意味著社會的本質要服從市場規律。

現在可以更具體探討市場經濟其制度性本質和所涉及的社會風險。首先，下文描述市場機制何以能夠控制和指導產業活動的實際要素；這機制影響社會，本書稍後評估這些影響的本質。

得助於商品概念，市場機制逐步適應產業活動的各種要素。商品在此按實證定義為供給市場銷售的產品；而市場也是按實證定義為買賣雙方的實際接觸。因此，產業每一要素都被認為是為銷售而生產，這樣才只會受到供求機制與價格互動的支配。實際上，這意味著產業每一要素都必須有市場；在市場上，每一要素都被組成供應方和需求方；每一要素都有價格，與供求一起互動。所有這些不計其數的市場相互關聯，形成一個大市場。[139]

[139] 原註 2：Hawtrey, G. R., *op. cit.* Hawtrey 認為功能在於「把所有商品的相對市場價值變得彼此

關鍵是在於勞動力、土地和資金是產業的基本要素，也必須組織成為市場；實際上，這些市場形成市場經濟體系絕對至關重要的部份。但勞動力、土地和資金顯然**不是**商品；假設任何供買賣的東西必然是為銷售而生產，這說法不適用於這些要素。換句話說，根據商品的實證性定義，這些不是商品。勞動力只是人類活動的另一名稱，與生活本身同在，不是為銷售而生產，而是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人類活動也不能脫離生活的其餘部份、不能儲存或移動；土地是大自然的另一名稱，不是人生產的；最後，實際資金（金錢）只是購買力的象徵，通常不是生產出來的，而是借助銀行業或國家財政的機制產生。這三項沒有一項是為銷售而生產的。對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的商品描述完全是虛擬。

無論如何，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的市場得以組織起來，是得助於這虛擬說法[140]；這些要素實際上在市場買賣，其供求規模龐大；任何可能抑制這種市場形成的措施或政策都會實際上危及市場經濟體系的自發調節。因此，對整體社會而言，**虛擬商品**[141]的說法是至關重要的組織原則，以最變化多端的方式影響幾乎所有社會制度；即是，原則上任何措施或行為不得阻礙依照虛擬商品這說法建立的市場實際運作。

就勞動力、土地和資金而言，這樣的假設現在是無法站住腳。若是讓市場機制成為人類命運和大自然環境的唯一指導，甚至只是購買力總量和用途的唯一指導，社會會因此而毀滅。因為所謂「勞動力」商品是不能推來攘去、不能隨便使用或甚至不能被丟在邊上而不影響恰好是這特殊商品的載體：個人。在安排個人勞動力時，體系會無意中棄置了附上這標簽的肉體、心理和道德實體：「人」。若然喪失了文化制度的保護性外殼，人類會因為暴露於社會的效應而消亡，可能死於惡行、顛倒黑白、犯罪和饑餓等劇烈社會混亂。大自然滿目瘡痍，破壞周圍環境，污染河流，軍事安全岌岌可危，失去生產食物和原材料的能力。最後，由市場管理購買力會一再殺死商業企業，因為資金短缺和氾濫的破壞力一如原始社會的洪水和旱災。毫無疑問，勞動力、土地和資金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但除非社會的人類和自然資源以及商業組織得到保護，免受血汗工廠蹂躪，沒有任何社會能夠承受這樣粗疏虛擬假設的體系影響，哪怕只是極短時期。

市場經濟的極端人為本質其根源在於生產過程本身是以購買和銷售的形式組織起來。[142] 商業社會沒有其他組織生產的方法。在中世紀後期，出口工業生產是由富裕自由民組織，在家鄉城鎮直接監督生產。後來，在重商社會中，生產由商

相若。」

[140] 原註 3。馬克思論及商品價值的崇物特徵，是指真實商品的交易價值，與本文提到的虛擬商品無關。

[141] commodity fiction

[142] 原註 4：Cunningham, W.,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

人組織，而且不再局限於城鎮；這是「走出去」時代，純粹做生意的資本商人向家庭手工業提供原材料，控制生產過程。從此商人明確掌控工業生產，而且規模龐大。商人瞭解市場，需求的規模和品質，也能保證原料供應；原料供應只包括羊毛和靛青染料，有時還包括家庭手工業使用的織布機或編織架。如供應出了問題，手工業工人受害最深，暫時失去工作；但這不涉及昂貴工廠，商人不用負擔生產責任的嚴重風險。幾百年來，這體系的力量日增、範圍擴大；例如英格蘭的主導產業是毛紡業，覆蓋大片地域，由服裝商組織生產。做買賣的人偶然也涉及生產，但無需其他動機。創造商品不涉及互助形式的互惠態度，不用照顧戶主的需要，不用關心工匠一展身手的自豪感，無需公眾誇獎——只有商人最熟悉的利潤動機。直至十八世紀末，西歐的工業生產只是附屬於商業。

若然機器便宜、不是專用工具，這情況無需改變。家庭手工業要利用同樣時間生產更多商品，可能促使戶主使用機器以增加收入，但這事實本身不必然會影響生產的組織。便宜的機器是工人或商人所有，這對雙方的社會地位會造成一些差異，也幾乎肯定會影響工人的收入；工人擁有自己的工具，經濟狀況要好一些；但這不會迫使商人變成工業資本家，也不會限制商人和從前一樣只借錢給擁有工具的工人。商品出路極少出問題；較大的困難依然是原材料供應，因為供應有時不可避免被打斷。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擁有機器的商人所受的損失也不是嚴重。徹底改變了商人與生產的關係不是上文述說的機器，而是發明了配置精良的專用機器和工廠。商人引進了新的生產組織，這決定了整個轉變歷程；但使用配置精良的機器和工廠涉及工廠體系的發展，因而改變了商業和工業的相對重要性，後者越來越吃重。工業生產不再附屬於商人的買賣組織，而是涉及帶有風險的長期投資。除非持續生產得到合理保證，否則難以承受這樣的風險。

工業生產變得愈複雜，就更多生產要素的品種需要保證供應。當然，這些要素中的老三項尤其重要：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商業社會只有一種方法組織這些要素的的供應：買入；因此要組織這些要素在市場買賣，即是成為商品。市場機制擴大到產業的三大要素，是商業社會引進工廠體系不可避免的結果。生產要素必須可以買賣。

這與對市場體系的需求同義。這樣的制度要借助相互依存的眾多市場以確保自發調節，利潤才得到保證。鑒於工廠體系已組織成為買賣過程的一部份，因此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必須轉變為商品，才可以維持生產。當然，這實際上不可能轉變為商品，因為這老三項不是為了銷售而生產出來，但假設這是為了銷售而生產出來的虛擬說法已成為社會的組織原則。老三項的勞動力最為突出：勞動力是「人」的代名術語，不是僱員就是僱主；因此勞動力的組織會與市場體系組織一同改變。但由於勞動力的組織只是老百姓生活形式的另一種叫法，這意味著市場體系的發展會伴隨社會自身組織的改變。沿著這路線，人類社會已成為經濟體系的附

屬物。

上文提到英國歷史上圈地行動的災禍與工業革命之後的社會慘劇是相類似，又指出社會進步通常是以社會紊亂為代價。如紊亂來得太快，社會肯定在過程中崩潰。都鐸王朝和早期的斯圖亞特王朝調節社會變革的進程，讓社會更能承受改變，放緩改變的破壞力，從而解救了英格蘭免遭西班牙的厄運。但這不能解救英格蘭平民免受工業革命的衝擊。人們盲目相信自發性進步，最開明人士帶著宗派狂熱極力推動無節制和無監管的社會變革。變革為人民生活帶來的痛苦難以言表。誠然，若不是有保護性反制行動消減了這自我毀滅機制的行動，人類社會可能遭受滅頂之災。

因此，十九世紀社會史是**雙向動力**[143]的結果：一方面是與真實商品相關的市場體制在擴張，另一方面是對虛擬商品的制約。儘管市場一方面在全球擴張，所涉及商品之數量增長至不可思議的規模，但在另一方面措施和政策整合為各種強有力的制度，以阻撓與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相關的市場行動。在金本位制之下，商品、資本和貨幣的世界市場為市場機制注入前所未見的動力，但同時出現了深層次運動旨在對抗由市場掌控經濟體系的有害作用。社會保護自身以避免自發調節市場體系的內在危險；這是當代歷史的最全面特徵。



[143] double movement

英格蘭勞工及濟貧法律大事記

1215 年：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建立（天賦）人權的概念，對自由人權的影響頗大，像英格蘭 1628 年的「權利請願書」以及 1679 年的「人身保護令」都出自憲章第 39 條，美國的聯邦憲法及各州的憲法多少受其影響。

1349 年：〈工匠法〉要求人們留在家中，並且要為地主工作，不管地主給予多少報酬。除了老人及無法工作的人，法律禁止乞討及施捨。首度將貧民分類為值得幫助的窮人如老人、殘障者、寡婦幼兒等；不值得幫助的窮人如身體條件可工作卻未就業的成人。

1531 年：窮人救濟法案授權地方官員許可某些特定的人（如老人及無生活能力的人）在鄰近地區乞討，若無許可而乞討者則予以處罰。為了執行此法案，官員必須提出判斷是否給予執照的標準與程序，並且給予申請者許可的類別。

1601 〈伊莉莎白濟貧法〉主張以地方（教區）標準來管理貧窮救濟，每一教區納稅人僅對該教區之貧民負責。濟貧法也為貧窮兒童制定學徒計畫，為依賴人口規劃工寮濟貧院，而對健壯而不工作的貧民予以嚴厲懲罰。

1662 年：〈定居與遷移法〉是世上第一條以居住地為資格決定幫助與否的法律。市政當局被授權只能幫助當地的貧窮居民，更排除可能成為受助的依賴人口的司法權利。此法賦予主政者有權評估該地貧困的潛在人口，此法雖嚴苛而且充滿了對貧民的懲罰性，但對貧窮原因的探討有頗多著墨。

1697 年：Bristol 市設立工寮濟貧院，很快傳遍整個英國以及部份歐洲。此法的規劃本來是為了避免增加濟貧稅，所以要求窮人必須在工寮工作，否則不予救濟以示懲罰。工寮經常與私人企業訂定契約由私人企業家管理，讓窮人在工寮工作來換取照顧。住在工寮的人經常是非常年幼的兒童，無謀生能力或年老的依賴人口，工寮只給最低度的照顧，卻要他們像奴隸一樣長時間工作。

1782 年：〈Gilbert 法〉為工寮住民被剝削權利而呼籲要求給他們更人道的待遇，此法案使許多工寮被關閉，建立了窮人可在家中接受救濟的制度（院外救濟），而且要求六歲以下兒童必須與家人一同安置。其他未關閉的工寮則由市政職員代替企業家管理。

1795 年：史賓漢蘭制度訂立貧窮線。有工作的人若其收入低於貧窮線可從政府領到

救助，數額根據當時麵包價格與該人家中依賴人口數目而定，當物價上漲而工資下降，由公帑補足差額。

1834 年：〈新濟貧法〉強調自立原則，再也不認為公共救助是人民的權利，政府也不必為百姓的失業負責，而且建立了「次於合格標準」的原則，意即受助者所得的救濟金額絕對不能超過有工作者的最低工資。

1847 年：〈工廠法〉規定婦人及兒童的最高工作時間由原來的 13-18 小時降為 10 小時。

1908 年：〈老年退休金法[144]〉向年滿七十歲以上老人發放退休金，唯需經資產調查，而國民無需為此供款。

1911 年〈國民保險法[145]〉確定由在職者、僱主與社會分擔國民的醫療和失業救濟金開支。

1925 年：〈寡婦、孤兒及老年繳費式退休金法[146]〉

1942 年：Beveridge 的《社會保險與相關服務報告書[147]〉催生了其後工黨在 1945 年上台執政後擴大國民保險範圍和建立國立醫療體制。

錄自：簡春安〈從典範變遷看社會福利的發展〉，略有改寫和補充。

[144] Old Age Pension Act
[145] National Insurance Act
[146] Widow, Orphans and Old Contributory Pension Act
[147]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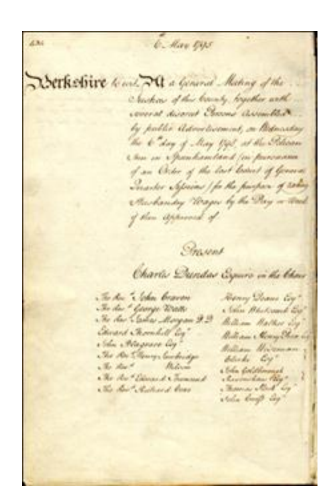
第七章
1795 年史賓漢蘭制度

十八世紀社會無意識地抵制把社會變成市場的附屬物。無法想像有任何市場經濟體系是不包括勞工市場；但若要建立這樣的市場，特別是在英格蘭農業文明條件下，無異是要徹底打破傳統的社會組織。在 1795-1834 年間工業革命最活躍時期，英格蘭制定「史賓漢蘭制度[148]」，〔無意中〕阻止建立勞工市場。

勞工市場實際上是新產業制度下最後組織的市場，在市場經濟即將啟動才採取這最後步驟；其時老百姓感受到沒有勞工市場的缺點是多於引進勞工市場帶來的災難。雖然創立勞工市場的做法頗為不人道，最後人人得益於自由勞工市場。

但就在此時出現了關鍵問題。自由勞工市場的經濟優點無法彌補對社會造成的破壞，不得不引進新的監管制度再度保護勞工，但這一次是利用市場機制本身的作用。引進諸如工會和工廠法規這些新的保護制度是盡可能適應經濟機制的要求，但依然干擾體系的自發調節和最終摧毀了制度。

從這發展結果的廣義邏輯角度看，史賓漢蘭制度佔據了戰略位置。



在英格蘭，土地和資金的調動是先於勞工。法律嚴格限制了勞工流動，阻礙國內勞工市場的形成，因為勞工事實上被限制在本身教區之內。1662 年的〈定居與遷移法〉制定了所謂教區佃農制度的規章，直至 1795 年才放寬。若然不是同年施行史賓漢蘭制度或補貼制度，這步驟可能方便建立國內勞工市場。史賓漢蘭制度的意圖正好相反，要強力執行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的家長式勞工組織制度。1795 年是極為艱苦的年代，當年 5 月 6 日 Berkshire（郡）的地方官員在 Newbury（鎮）附近的史賓漢蘭（村）的鵜鶘酒館開會，決定以麵包價格為標準，按比例補貼窮人的工資；無論窮人有多少工資，補貼確保他們有最低收入。

官員的著名建議是這樣的：如符合品質的一加侖裝麵包[149]價格為 1 先令，每名貧窮但勤勞的人民每週可得 3 先令補貼，由本人或家中勞工領取，或從平民救濟稅

---

[148]原文多處稱之為 Speenhamland Law，有點混淆觀點。Berkshire 郡地方官員在 Speenhamland 召開會議，為農業工人定出最低收入和救濟標準。插圖是會議記錄首頁。因此史賓漢蘭制度只是地方措施，不是純粹定義的 law。譯文全以「史賓漢蘭制度」出之。

[149] gallon。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英格蘭，出售麵包慣常以加侖（容量單位）計，其重量約為 8.6875 磅。

領取補貼（妻子和每名家人可得 1 先令 6 便士）；如麵包價格上升至 1 先令 6 便士，每週補貼 4 先令外另加 1 先令 10 便士；麵包價格在 1 先令價位上每上漲 1 便士，他本人可得 3 便士，其他家人每人 1 便士。各郡的金額各有不同，但大多數採用了史賓漢蘭標準。這在當時是作為緊急措施，而且不是很正規施行。儘管一般稱之為法律，但這標準從未作為法律頒佈，但很快就成為英格蘭大多數鄉村地區的當地規則，實際上這引進了不亞於「生存權利」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創新；直至 1834 年被廢除，這「法」有效阻止了建立競爭性勞工市場。兩年之前，中產階級在 1832 年成功闖入權力中心[150]，部份原因是為了消除新資本主義經濟面對的這一障礙。最明顯的是工資制度權威地要求撤銷史賓漢蘭制度聲言的「生存權利」：在經濟人的新制度下，如無需做工就可以過日子，沒人會為工資而工作。

十九世紀的作家大多數沒有看清楚撤銷史賓漢蘭制度的另一特點，即是為了領薪族自身的利益，工資制度必須普及，即使這意味會剝奪勞工求生存的合法要求。「生存權利」已證明是死亡陷阱。

這矛盾只是表面。據聞史賓漢蘭制度意味可以寬鬆執行〈濟貧法〉，但實際上卻與原意相反。按照〈濟貧法〉，不管能夠拿到多少工資，窮人都得工作，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有資格得到救濟；以救濟代替工資不是原來的意圖，也不是必然。按照史賓漢蘭制度，即使有工作的勞工也可得到救濟，只要他的工資是低於標準規定的家庭收入。因此，勞工沒有物質利益要滿足僱主的要求；無論工資是多少，他的收入（工資+補貼）都是一樣；只有當標準工資（即實際支付的工資）超出標準，情況才有所不同，但工資超出標準的情況並不常見，因為僱主幾乎以任何工資都可以招聘勞工；不管僱主支付的工資是多麼少，濟貧稅的補貼都使工人的工資達到標準。不出幾年，勞工的生產力開始跌至赤貧勞工的水平，因此僱主更有理由不把工資提升到規定標準之上。因為一旦勞工盡心和效率的強度跌至一定水平之下，這等於門面功夫，只做瑣碎而無價值的瑣事。儘管原則上依然強制人要工作，但實際上院外救濟[151]已變得普遍；即使被強制住在濟貧院的窮人從事的職業幾乎算不上是工作。這等同廢除都鐸王朝的法律，不是因為較少而是更多家長式管治。擴大院外救濟，引入工資補貼，另加家庭主婦和子女補貼，而每項補貼隨麵包價格加減；這一切等同整體工業活動正迅速消除的監管原則在勞工範疇內卻戲劇性復活。

沒有什麼措施是如此廣受歡迎。[152] 父母不用費心照顧子女，子女不再依賴父母；僱主可以隨意降低工資，工人不管忙碌還是懶散都不會挨餓；人道主義者歡呼這措施是憐憫之舉，儘管不是那麼公正，而自私自利者高興地安慰自己：雖然是憐

[150] 英格蘭在 1832 年通過〈改革法 Reform Act〉，擴大下議院選民基礎，加入了中產階級。
[151] outdoor relief。申請救濟的人無需強制居住在濟貧院。
[152] 原註 1：Meredith, H. O., *Outline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908.

憫，但至少不是施捨；甚至納稅人也沒有很快認清楚這對稅收有什麼影響。這制度宣揚「生存權利」，不管這人是否掙錢養家。

最後的結果是可怕的。雖然要過了一段時間老百姓的自尊才降至最低點，情願領取救濟而不掙工資；由公帑補貼工資必然是無底黑洞，並迫使老百姓依賴稅收。農民逐漸變得赤貧化；順口溜說得好：「一日靠補貼，日日靠補貼」，此話確實不假。若不是補貼制度的長期效果，不可能解釋早期資本主義的人性和社會墮落。

史賓漢蘭事件向那個世紀領先國家的人民揭示了他們正在參與的社會冒險行動的真正本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傻瓜樂園的教訓；如 1832 年〈改革法〉和 1843 年〈濟貧法修正案〉通常被認為是現代資本主義的起點，那是因為這結束了仁慈地主階級及其補貼制度的統治。試圖建立沒有勞工市場的資本主義秩序，已經一敗塗地。支配這秩序的法則曾大展身手，又與家長式原則絕對對立。這些法則的嚴厲苛刻已是顯而易見，而違背法則的人受到無情報復。

在史賓漢蘭制度下，社會被兩股對立勢力撕裂；一股勢力來自家長式管理，保護勞工免遭市場制度威脅；另一股勢力在市場制度下組織包括土地在內的生產要素，並因此剝奪了老百姓從前的地位，迫使他們靠出賣勞動為生，而且同時剝奪了勞動的市場價值。新的僱主階層正在形成，但僱員沒有形成相應的階層。一場新的龐大圈地浪潮正在調動土地並生成了鄉村無產階級，而濟貧法錯誤施行卻妨礙了他們憑藉自己的勞動賺取生計。毫不奇怪當代人對看似矛盾的現象感到驚駭：伴隨著近乎奇蹟的生產增長是群眾近乎忍饑挨餓。到了 1834 年，大家已經有了共識，對許多長於思考的人來說，這是充滿情感的共識：隨便什麼措施都比繼續施行史賓漢蘭制度更可取。要麼就消滅機器（就像 Luddite 成員[153]的所為），要麼就必須建立正常的勞工市場。由此，人類被迫走上理想國實驗的道路。

這一章的篇幅不足以詳細論述史賓漢蘭制度的經濟方面，稍後再談。從表面看，「生存權利」措施應該完全消滅賺取工資的勞工。標準工資應該逐漸下降至零，由此把實際的工資單完全交由教區處理，這樣的話，補貼制度的荒謬就會一覽無遺。但當時基本上只是資本主義的預備時代，老百姓依然保持傳統思想，行為還不是只受金錢動機的支配。絕大多數鄉下人都是自住業主或終生租戶，為了不陷入赤貧，願意選擇任何糊口方式，即使要承受隨後發生的令人厭惡或可恥的傷殘。如勞工能自由團結爭取權益，補貼制度當然可能對標準工資有相反作用：因為寬鬆執行〈濟貧法〉，對失業者的救濟可能極大幫助工會行動。那可能就是 1799-1800 年不公義的〈反結社法[154]〉出臺的原因，否則是難以解釋，因為 Berkshire

[153] 十九世紀英國工業革命運用機器大量取代人力勞作，使勞工不能改善生活，甚至失去工作。工人起而反抗，毀壞紡織機。事件以虛構人物 Ludd 命名。

[154] Anti-Combination Laws

地方官員和國會議員整體上是關心窮人的經濟情況，況且在 1797 年之後政治動亂已經平息。可以說史賓漢蘭制度的家長式干預引起了〈反結社法〉進一步干預。若不是〈反結社法〉，史賓漢蘭制度可能有提高工資的作用，而不是實際上壓低了工資。史賓漢蘭制度與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紀才廢除的〈反結社法〉一起導致極具諷刺的結果：即是以財政施行的「生存權利」措施最終卻糟蹋了表面上要救助的人民。

對後代人來說，工資制度和「生存權利」措施之間的互不相容是顯而易見；換句話說，只要用公帑補貼工資，資本主義秩序的運作就絕無可能。但當代人未曾理解他們為之鋪路的秩序。群眾生產力被嚴重削弱，是阻礙機器文明進步的民族災禍；只有在這情況下，社會才醒覺有必要取消窮人無條件可獲得救濟的權利。當時最具專業水準的觀察家也不理解史賓漢蘭制度的複雜經濟內容;但結論似乎是更令人信服:即是工資補貼肯定有內在的邪惡,因為這不可思議地損害了接受補貼的人。

市場體系的缺陷不是顯而易見。要清楚認識，必須區別自機器問世以來，英格蘭勞工經歷的滄桑巨變：首先是 1795-1834 年史賓漢蘭制度時期；其次是其後十年〈新濟貧法[155]〉造成的困苦;最後是 1834 年之後對競爭性勞工市場的有害影響；直至 1870 年代工會得到承認後才提供充分保護。按時間次序，史賓漢蘭制度是在市場經濟之前;〈新濟貧法〉的十年是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與前一時期交疊的最後階段是市場經濟時期。

這三個時期差異懸殊。史賓漢蘭制度旨在防止老百姓變成無產階級，或至少是放慢改變的速度。結果卻是老百姓赤貧化，在這過程中幾乎不似人形。

1834 年的〈新濟貧法〉廢除「生存權利」措施，取消了勞工市場的這一障礙。新法的科學性殘忍在 1830 和 1840 年代對公眾情緒造成極大震撼,以致當時的激烈抗議模糊了後世眼中的圖像。確實，隨著取消院外救濟，許多最貧苦的人被迫聽天由命，最悽慘的是所謂「值得帮助的窮人[156]」，他們自尊心極強，不願進入已經變成恥辱居所的救濟院。或許現代歷史從來沒有比這更加冷酷無情的社會改革，壓垮眾多生命時只是由救濟院假裝提出真正貧困的標準。溫和的慈善家冷靜地提出和實施心理虐待，作為潤滑勞動力工廠輪子的手段。不過，大多數的埋怨是歸咎突然連根拔起舊制度被和激進變革突然生效。〔英格蘭保守黨政治家〕Disraeli 公開指責人民生活中這「不可思議的革命」。然而，如果只考慮金錢收入，人民的生活條件會很快就被認為已得到改善。

[155] Poor Law Reform Act
[156] deserving poor

第三階段的問題更為深層。與所有現代制度中最有能量的勞工市場的整體效應相比，1834 年之後十年因為中央集權的〈新濟貧法〉官僚對窮人犯下的暴行只是零星事件。〔勞工市場的整體效應〕的規模與史賓漢蘭制度構成的威脅相似，兩者之間的重要差異是競爭性勞工市場已成為危險之源，不是沒有勞工市場。如史賓漢蘭制度曾阻止勞工階層崛起，那麼現在的貧窮勞工是被冷酷無情的機制壓力形成這樣的階層。如在史賓漢蘭制度之下，窮人曾被當作普通動物看待，現在要面對所有不利條件而自求多福。如史賓漢蘭制度意謂可憐兮兮的墮落，勞工現在是社會的無家可歸可憐人。如史賓漢蘭制度過度利用鄰里、家庭和鄉村周邊的價值觀，現在的老百姓離開家人親人，連根拔起，遠離有意義的環境。簡而言之，如史賓漢蘭制度意謂守株待兔而奄奄一息，現在的危險是死於暴曬。

直至 1834 年英格蘭才建立競爭性勞工市場；因此，在此之前不能說工業資本主義已經是已存在的社會體系。不過，社會的自我保護行動幾乎緊隨其後開動：工廠法和社會法，以及政治和產業工人階級運動乘時而起。保護性行動試圖阻止市場機制的全新危險，與體系的自發調節發生致命衝突。毫不誇張地說，1834 年〈新濟貧法〉為市場體系打通經脈，市場體系的邏輯決定了十九世紀的社會史。事態的起點就是史賓漢蘭制度。

若然本文提出研究史賓漢蘭制度即是研究十九世紀文明的誕生，研究重點不是其經濟和社會後果，甚至不是這些後果對現代政治史的決定性影響，而是現代人大多不知道的事實：〔史賓漢蘭制度〕的模子鑄造了我們的社會意識。此後幾乎已被遺忘的赤貧人口，曾經是人們的主要話題，其影響力可以媲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法國大革命歸功於 Voltaire、Diderot、Quesnay 和盧梭(Rousseau)的思想，〈濟貧法〉的討論影響了 Bentham、Burke、Godwin、馬爾薩斯、Ricardo、馬克思、Robert Owen、John Stuart Mill、達爾文和 Spencer 的思想；彼等和法國大革命都受到十九世紀文明精神源頭的滋養。就是在史賓漢蘭制度和〈新濟貧法〉之後的數十年間，人們的思想帶著新的憂慮之情轉向本身的社會：Berkshire 地方官員未能阻止後來被〈新濟貧法〉釋放的革命，把人們的視野轉到自身的集體存在，恍如從前未有留意。人們揭開了其存在從未被懷疑的世界：掌控複雜社會的多項原則。雖然這嶄新而獨特的社會出現在經濟範疇，其涵義是普世適用。

進入人們意識的新生現實其形式是政治經濟，其令人驚異的規則性和同樣令人驚歎的矛盾性必須套入哲學和神學的體系才可以溶入人類的意義。頑固的事實和冷酷的法律似乎剝奪了人們的自由，但已在多方面與「和平」和解。這是秘密支撐實證論者和功利論者那些形而上勢力的主要動力。面對這些可怕的局限，人類思想的矛盾反應是對從未探索的人類各種可能性領域既有無限希望也有無邊失望。希望是完美的期望，從人口和工資法的夢魘中被排出，轉而體現在鼓舞人心的進步理念，以致「希望」似乎證明即將來臨的大規模又令人痛苦的社會轉型是

有理有據。「失望」其後被證明才是社會轉型的更強大推手。

人被迫無奈接受現世的滅亡：註定或是不再生育兒女，或是因為戰爭和瘟疫、饑餓和邪惡而灰飛湮滅。社會的殘存常態是貧困；食糧有限，人口無限，成為當前問題；正當此時突然有望財富無限增加；這諷刺變得更為苦澀。

對社會的發現與人類精神世界就是如此結合；但是，這新現實，新社會如何轉化為生活？作為行為指南，和諧與衝突的道德原則已極度受壓，被逼走入幾乎是完全矛盾的模式。據說，和諧是經濟的固有特徵，個人與社會的利益最終是一致，但這種和諧性的自發調節要求個人尊重即使摧毀個人的經濟法規。衝突似乎也是經濟的固有特徵，不管是個人之間衝突或是階級鬥爭，但這些衝突可能只是當前或未來社會更深層次內在和諧的載體。

赤貧化、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現是緊密交織一起。貧困把人們的目光固定在無法理解的事實，即是貧困與富裕似乎結伴而行。但這只是現代人面對工業社會諸多令人困惑的悖論的第一個。通過經濟學之門，人類已進入新居，而這後天環境為那個時代套上唯物主義的光環。對 Ricardo 和 Malthus 來說，沒什麼比物資貨品更真實。對他們而言，市場規律就是人類可能性的界限。Godwin 相信無限的可能性，因此不得不否定市場規律。Owen 一士諤諤，認為人類的可能性有限，不是因為市場規律而是社會自身的規律，他察覺到市場經濟面紗背後浮現的現實：社會。然而，他的見解塵封百年。

同時，就著貧困問題，人們開始探索複雜社會中的生命意義。政治經濟學以兩個對立的視角進入普世範疇，一個視角是進步和完美性，另一視角是決定論和詛咒；政治經濟學付諸實踐也是以兩個對立的方式進行，一是和諧與自發調節的原則，另一是競爭與衝突的原則。這些矛盾形成了經濟自由主義和階級概念。一套全新觀念以重大事件終局的形式進入人們的意識。

第七章資料參考

「市場模式演變」的參考文獻

經濟自由主義受錯覺支配：以為本身的實作和方法是進步法則的自然產物。為了使支持自發調節市場的原則符合這模式，這些原則被回溯到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因此全面扭曲了貿易、市場和貨幣、城鎮生活和民族國家的真正本質和起源。

(1) 原始社會少見「以物易物[157]」的個別行動。

「幾乎無人知道以物易物。原始社會的先民非但沒有以物易物的渴望，反而討厭。」(Buecher, *Die*

[157]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904, p. 109) 「例如不可能以食物的數量表達魚鉤的價值，因為從來沒有這樣的交換；太平洋島民會認為〔魚鉤〕是神奇事物…每種物件是適合特定的社會情況。」(Firth, 同上，p. 340)

(2) 貿易不是在社區內出現；這是涉及不同社區的外部事務。

「在初期階段，商業是種族群體之間的交易，不會發生在同一種族或部落的人群，而是最古老社會社區的外部現象，只是直接面向外族。」(M.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 195) 「雖然看上去很奇怪，中世紀的商業一開始不是受本地貿易、而是受出口貿易的影響而發展。」(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p. 142) 「中世紀的經濟因為遠程貿易得以復蘇。」(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125).

(3) 貿易不依靠市場；其源起是單方面的運送，無論是和平還是其它手段。

Thurnwald 確定了最早的貿易模式只是遠距離運送採購和物品，本質是狩獵的遠征。遠征是否類似找尋奴隸或海盜行為的開戰情況，主要取決於遇到的抵抗（同上，第 145、146 頁）。「荷馬時代希臘人之間的海上貿易起初是由海盜行為促成，正如挪威海盜一樣；在頗長時間兩種行業並行發展。」(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109)

(4) 市場是否存在，不是基本特徵；本地市場沒有增長的傾向。

「沒有市場的經濟體系無需為此共同擁有其它特徵。」(Thurnwal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Vol. III, p. 137) 在早期的市場，「只有明確數量的確定物品可以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同前，第 137 頁）。「特別值得一提 Thurnwald 注意到原始貨幣和貿易本質上具有社會意義，不是經濟意義。」(Loeb,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 Early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 153) 當地市場之產生，不是因「武裝貿易」或「悄悄以物易物」或其它外貿形式，而是萌生於維護與鄰區進行交易這有限目的的某個聚會地點的「和平」。「本地市場的目的是為居住當地的人口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這說明了本地市場每星期一次的墟期、吸引的圈子非常有限以及活動範圍局限於小規模零售業務。」(Pirenne, *op. cit.,* Ch. 4, "Commerce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97) 即使到了後來，與市集比較，本地市場沒有增長的傾向：「市場滿足了本地居民的需求，只有鄰近的居民到來；商品都是鄉村產品和日常生活用品。」(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935, Vol. I, p. 221) 本地貿易「通常發展自農民和從事家庭工業的副業，一般來說是季節性工作…」(Weber, 同上，p. 195) 「乍看起來，很自然會想到商人階層是慢慢從農業人口中成長起來。然而，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理論。」(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111)

(5) 勞動分工不是源於貿易和交易，而是源自地理、生物性和其它非經濟因素。

「勞動分工決不是複雜經濟情況的結果，儘管理性主義理論認為如此；原則上這要歸因於生理的性別和年齡差異。」(Thurnwald, *Economics,* p. 212) 「幾乎所有勞動分工只是在男女之間。」(Herskovits, *op. cit.,* p. 13)勞動分工可能源於生物性因素的另一情況：不同種族群體的共生關係。「不同種族群體〔通過形成社會的上層階級戲〕轉變為專業一社會群體。從而創造了的組織一方面是基於附屬階級的供養和服務，一方面是基於領導階層家長的分配權力。」(Thurnwald,

Economics, p. 86) 這是國家源起的一個因素。(Thurnwald, *Sozialpsyschische Ablaufe,* p. 387)

(6) 貨幣不是決定性的發明；其是否存在對經濟類型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從經濟學角度看,部落使用金錢這純粹事實與不使用金錢的部落沒有很大區別。」(Loeb, *op. cit.,* p. 154) 「如有使用貨幣，其作用大異於在我們文明社會的作用。貨幣一直是具體物件，從來不是抽象地代表價值。」 (Thurnwald, *Economics,* p. 107)。以物易物的種種難處沒有導致「發明」貨幣。「傳統經濟學家這種陳舊的觀點與人種學研究背道而馳。」(Loeb, *op. cit.,* p. 167, footnote 6) 商品既有金錢的功能又有權力屬性的象徵意義，由於這些特殊效能，不可能「只從單方面的理性角度來看待〔商品〕的經濟擁有。」(Thurnwald, *Economics*) 例如，金錢可能只用於支付工資和稅款（同前，第 108 頁）或買下妻子，支付賠償或罰款。「因此，從這些有國家之前的例子可見，有價物品的評估是源自習俗性價值的數量，領導人物的地位和他們與幾個群體平民的具體關係。」(Thurnwald, *Economics,* p. 263)

總的來說，貨幣像市場一樣外部現象，對社群的重要性主要是由貿易關係決定。「金錢的觀念通常是從外部引進。」(Loeb, 同上，p. 156) 「金錢作為交易的一般媒介其作用源於對外貿易。」(Weber, *op. cit.,* p. 238).

(7) 對外貿易不是源於個體而是集團之間的貿易。

貿易是「集體作業」，涉及「集體取得的各種物品。」，源自「集體的貿易旅程。」「為這些通常具有外貿性質的遠征隊伍做出安排的，體現了集體性原則。」(Thurnwald, *Economics,* p. 145) "「總之，最古老的商業是不同部落之間的交換關係。」(Weber, 同上，p. 195)。中世紀貿易明顯不是個體之間的貿易，而是「一些城鎮，社區或城市之間的貿易活動。」(Ashley,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Part I, "The Middle Ages," p. 102)

(8) 鄉村在中世紀被排斥在貿易之外。

「一直到十五世紀及在這世紀，城鎮已成為商業和工業的唯一中心，情況是沒有什麼生意跑到開放的鄉郊。」(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169) 「與農村貿易和農村手工業的鬥爭持續了至少七、八百年。」(Heckscher, Mercantilism, 1935, Vol. 1, p. 129) 「隨著民主政府的發展，這些措施變得更嚴厲…」「在整個十四世紀，經常派出正規的武裝遠征軍對付附近的所有鄉村，把織布機和染缸破壞或運走。」(Pirenne, *op. cit.,* p. 211).

(9) 中世紀沒有城鎮之間的隨意貿易。

城鎮之間的貿易意味著特定城鎮或城鎮群之間有優惠關係，例如倫敦和德國之間的 Hanse 結盟。這些城鎮之間的關係借助互惠和報復的原則。例如，如欠債不還，債權人所在城鎮的地方官員可以求助債務人所在地的官員，要求一如處理當地案件執法，「並威脅如欠債不還，會對城鎮全部人等報復。」(Ashley, *op. cit.,* Part I, p. 109).

(10) 沒有國家保護主義。

「從經濟角度看，在十三世紀幾乎無需區分不同的國家，因為在耶教範圍內社會交流面對的障礙比我們今天遇到的阻礙要少得多。」(Cunningham,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 Vol. I, p. 3) 直至十五世紀政治邊界才出現關稅。「在此之前，沒有證據顯示出〔國家〕有一丁點興趣要保護本國貿易免受外國競爭。」(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92) 所有貿易的「國際」貿易都是自由開放的。(Power and Postan,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1) 重商主義強迫國內城鎮和省市有更自由的貿易。

Heckscher 的 1935 年著作第一卷的書目是：《重商主義是統一團結的制度 *Mercantilism as a Unifying System*》。因此重商主義「反對把經濟生活限制在特定地方，阻礙國內貿易的任何措施。」(Heckscher, *op. cit.,* Vol. II, p. 273) 「城市政策有兩方面與國家的經濟目標有衝突：對鄉村的壓制和對抗國外城市的競爭。」（同上，第 1 卷第 131 頁）。「重商主義把各國國有化，是通過商業行為把本地做法推廣至全國。」(Pantlen, "Handel." In *Handwo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Vol. VI, p. 281) 「競爭通常是由重商主義人為培養，目的是為了通過供求的自動調節來組織市場。」(Heckscher)。Schmoller (1884)是第一位近代作家認識到商業制度的自由化傾向。

(12) 中世紀的監管主義極為成功。

「在舊世界衰落以後，中世紀的城鎮政策很可能是西歐首次試圖根據一致的原則在經濟方面監管社會，而且頗不尋常地成功。獨霸天下的經濟自由主義或自由放任主義的鼎盛時期也許是這情形；但從整個時段來看，與城鎮政策的持續韌性相比，自由主義是短暫和逐漸消失的插曲。」(Heckscher, *op. cit.,* p. 139) 「它們通過監管制度達到這目的，巧妙地令監管措施適應它的目標，可以視為傑出…。城市經濟比得上同時期的歌德式建築。」(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217).

(13) 重商主義把城市的實踐擴展至全國。

「結果是城市政策擴展到更廣泛地區，這是建立在國家基礎上的地方性政策。」(Heckscher, *op. cit.,* Vol. I, p. 131)

(14) 重商主義是最成功的政策。

「重商主義創造了複雜精美，讓人滿意的優秀制度。」(Buecher, 同上， p. 159) 〔法國〕為私營製造業的產品品質定下無數的「規章」，成就驚人。(Heckscher, 同上，Vol. I, p. 166) 「國家規模的經濟生活主要是政治中央集權的結果。」(Buecher, 同上，p. 157) 要歸功重商主義的監管制度「建立了勞工法規和勞工紀律，比受限於道德和科技的中世紀城鎮政府的狹隘特殊主義能夠提出的法規要嚴格得多。」(Brinkmann,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Abt. IV)



第八章
前因後果

史賓漢蘭制度起初只是權宜之計，但後來決定性塑造了整體文化，而又在新時代能夠啟動之前被拋棄。這是社會轉型時代的典型產物，值得當今研究人類事務的學者關注。

在重商主義制度下，英格蘭的勞動力組織是建基於〈濟貧法〉和〈工匠法〉。把 1536-1601 年間的諸多法律稱為〈濟貧法〉，無可否認是誤稱；實際上，這些法律與後來的修訂部份形成了英格蘭勞工法規半數之多；另一半是由 1563 年〈工匠法〉組成。後者針對僱員；〈濟貧法〉針對可稱之為失業者和不可能被僱用的人（老人和孩子除外）。這些措施後來又加上 1662 年關於人民合法居所的〈定居法〉，嚴格限制人民遷居的自由。（當然，僱員、失業者和不可能被僱用者之間的嚴格區分是時代錯誤的說法，因為這意味著二百五十年後才問世的現代工資制度；概論使用這些術語只是為了簡單表述。）

根據〈工匠法〉，勞動力組織有三個支柱：強制勞動，七年學徒期，政府官員每年評審工資。應要強調法律同樣適用於農業勞工和工匠，並在城鄉一並執行。法律嚴格執行了八十年；學徒期條款後來部份廢止，嚴格限制在傳統手藝，但不適用於新產業，例如棉紡業；根據生活費用評審工資部份在 1660 年王政復辟之後在全國很多地方不再執行，但直至 1813 年才正式廢止評審，1814 年才廢止工資條款。然而，在許多方面，學徒規則在該法被廢止後依然存在，時至今日依然是英格蘭手藝行當的通例。強制勞動在鄉村逐漸停止。但依然可以力陳在這二百五十年間，〈工匠法〉基於監管和家長式管理原則，為全國的勞動力組織奠定基礎。

〈工匠法〉因此得到〈濟貧法〉補充。現代人對「貧窮」和「赤貧」[158] 兩個類似詞語頗為困惑。英國紳士認為受薪一族不夠錢過著閒暇日子即屬於窮人，所以 poor 實際上是「普通人」的同義詞，而普通人是沒有土地的階級（幾乎任何成功商人都不會沒有土地財產）。因此，「窮人」指「有所求」的人。當然，這包括赤貧民，但不只是赤貧民。社會既自稱在本身範圍之內每個耶教徒都有容身之地，老弱孤兒必須得到照顧。但除此之外；有勞動能力的失業者都假設他們如果找到工作，都可以自力謀生。行乞會嚴重受罰；流浪是殺頭之罪。1601 年〈濟貧法〉規定有勞動能力者必須工作養活自己，由教區負責提供工作；救濟的負擔完全由教區承擔，教區被授權通過地方稅或不動產稅籌措必要資金。無論貧富，所有家庭和租戶都必須按地租或屋租繳付稅金。

---

[158] Poor and pauper

〈工匠法〉和〈濟貧法〉共同構成可稱之為「勞工守規」的制度。然而，〈濟貧法〉是由地方管理，每個教區都是細小的管理單位，對如何安置有勞動能力的人工作，維持濟貧院，安排孤兒和貧窮孩子當學徒，照顧老弱病殘者，埋葬赤貧民等等，各有不同安排。各教區的稅收標準也各有不同。所有這一切其實言過其實；許多教區沒有濟貧院，更多教區沒有幫助有勞動能力的人就業；此外當地納稅人拖拖拉拉，窮人監管者漠不關心，利益集團對赤貧問題鐵石心腸；以上一切都危害法律的運行。即使如此，全國約有一萬六千個濟貧機構基本上維持了農村生活的社會組織完整和安然無恙。

在國家的勞動力制度下，失業者和救濟窮人的地方組織明顯是異常事物。管理得宜的教區越是有更多濟貧措施，越會吸引「職業赤貧民」。在王政復辟之後，推出〈定居法〉以保護「較好」教區免遭赤貧民大量湧入之苦。百多年後，亞當·斯密猛烈抨擊〈定居法〉，指責這迫使人民寸步難行，因此阻礙人民找到有用的工作，也阻礙資本家找到僱員。〈定居法〉規定要有當地方官員和教區機構許可，人民才能在教區居住；若是遷居他地，即使有很好地位和工作，都很可能被逐。人民的自由和平等受到嚴苛限制；他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人身自由，但沒有為自己或子女選擇職業的自由，沒有按自己意願選擇居住地的自由，以及被迫勞動。伊利莎白一世的偉大〈濟貧法〉、〈工匠法〉和〈定居法〉一起構成了平民的自由憲章，同時也是束縛他們的封條。

是時工業革命正在醞釀；在產業需求壓力之下，1662 年的法令在 1795 年被部份廢除、教區佃農制被廢止，勞工重獲定居自由權利。國家規模的勞工市場從而可以建立。但是，就在同一年引進了濟貧法的管理方法，這顛倒了伊莉莎白立法的強制勞動原則。史賓漢蘭制度保證了「生存權利」；普遍實行工資補貼；外加家庭補貼；所有這都是以院外救濟形式發放，接受救濟的人不一定要住在濟貧院。儘管救濟的標準極低，但足以維持基本生計。似乎正當蒸氣機在呼喚自由、機器迫切需要人手之際，卻回到了管制主義和家長式管治。但史賓漢蘭制度出臺與〈定居法〉撤銷同時發生，這矛盾很明顯：廢除〈定居法〉是因為工業革命要求國家提供為工資而工作的勞工，而史賓漢蘭制度的原則是任何人不需擔心餓死；無論他掙錢多少，教區都會養活他和他的家人。這兩項產業政策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這兩項政策同時繼續推行，除了社會暴行之外，還能指望有什麼其他結果？

但史賓漢蘭制度時期的一代人沒有意識到事情的發展。在史上最偉大工業革命的前夕依然沒有資本主義悄然而至的任何徵兆。沒人預言機器生產的發展，它的到來完全是意外。當圍壩破裂、舊世界被朝向全球經濟的一往無前洪流席捲之際，英格蘭有一段時間實際上預期外貿會永久衰退。

然而，直至 1850 年代，沒有人肯定有這樣的見識。要理解史賓漢蘭官員的建議，

關鍵在於他們不知道當時面對的發展其廣泛意義。回頭看看，他們似乎是嘗試不可能之事，而且是利用當時應該已頗為明顯的內部矛盾。實際上，他們成功保護了鄉村免遭混亂之苦，但措施在其它未曾預見的方面卻帶來更大災難。史賓漢蘭措施是勞工市場發展過程一個特定階段的後果，應該從當時制定政策者的角度來理解。從這角度看，補貼制度是鄉紳階級面對再也無法限制勞工流動而設計的手段；鄉紳希望避免因為接受自由的國內勞工市場而改變當地條件，包括較高工資。

因此，史賓漢蘭措施的動力是植根於其淵源的環境。農村赤貧化狀況出現是劇變即將來臨的徵兆，不過當時似乎沒人想到。農村貧困與世界貿易的衝擊之間的聯繫不是顯而易見。那個時代的人完全沒有理由把農村窮人的數目與七大洋的商業發展聯繫。窮人數目的增加無法解釋，通常幾乎都歸咎〈濟貧法〉的執行，而這不是沒有一些好理由。實際上，在表面之下，農村赤貧的惡性增長是與經濟通史的趨勢直接相關，但這聯繫依然幾乎難以覺察。很多作者曾探究窮人零星流入鄉村的途徑，提出令人驚訝的途徑數目和不同理由。不過，只有少數當代作者提到現代人通常與工業革命聯繫在一起的社會混亂徵兆。直至 1785 年，英格蘭人沒有意識到經濟生活中的任何重大變化，除了隅爾的貿易增長和赤貧人口增加。

窮人來自何處？這是隨著時日越來越多小冊子提出的問題。在文獻中，赤貧化的成因與對抗措施很難兩者分開，因為啟發文獻的信念是只要能夠紓解赤貧化的最顯著邪惡，貧困不再存在。曾幾何時，人們對貧民增多的不同成因有普遍的一致意見，包括：穀物短缺、農民工資太高、引致食品價格高昂；農民工資太低、城鎮工資太高；城鎮就業波動；自耕農消失；城鎮工人不會幹農活；農場主不願支付較高工資；地主擔心如支付較高工資，就會減少地租收入；濟貧院不敵工廠的競爭；國內經濟不發達；居住環境狹小；飲食習慣一成不變；毒癮。有些作者責怪新品種大綿羊，也有人責怪應以牛代馬；甚至有人敦促少養狗。有些作者認為窮人應該少吃或不吃麵包，有些人甚至想到「窮人免費享用最好的麵包。」有人認為茶飲損害許多窮人的健康，而「家釀啤酒」恢復健康；最堅信這說法的人強調茶飲好不了最便宜的酒。四十年之後，〔英格蘭第一位女性社會學家〕Harriet Martineau 依然相信為了紓解貧困應要宣傳戒除飲茶習慣。[159] 誠然，有許多作者埋怨圈地行動的混亂後果；另有許多人堅持製造業的起伏損害了農村的就業。不過，普遍的總體印象認為赤貧是自成一格的現象，由多種成因引起的社會疾病，只是由於〈濟貧法〉沒有運用正確的補救方法才被激活。

正確的答案幾乎肯定是：由於今天稱為「隱性失業」增加，才導致當時赤貧狀況加劇和增多。在當時即使就業也是隱性，當然不容易看清事實；這是家庭手工業某程度上的必然結果。但以下的問題依然懸而未解：為何失業和就業不足的人數增加？為何當代最敏銳的觀察家沒有注意到產業領域迫在眼前的變化跡象？

[159] 原註 1：Martineau, H., *The Hamlet,* 1833.

這些問題的答案：因為早期貿易過度波動，遮掩了貿易量的絕對增加。儘管就業率上升可歸因貿易增加，但貿易波動卻造成失業率以較大幅度上升。總體就業水準上升緩慢，但失業和就業不足的人數增加較快。因此，恩格斯稱之為「產業後備軍」的累積超過了產業創建的正規軍。

這帶來重要後果：容易忽視失業率與貿易總量上升的關係。雖然有人常說失業上升歸咎貿易量巨大波動，但人們沒有注意到這些波動形成潛在進程變化幅度更大的一部份，即是商業的總體增長越來越依賴製造業。對當代人而言，以城鎮為主的製造工廠與鄉村貧困人口大量增加似乎沒有聯繫。

貿易總量增加必然導致就業人口增加，而勞工的地域分割與貿易的劇烈波動結合，導致城鄉職場的嚴重混亂，引致失業人口快速增加。窮人聽聞謠傳遠處有高工資，對農業能夠負擔的工資感到不滿，造成窮人厭惡報酬很低的農業勞動。那時代的工業區就像新國家新美國，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移民。移居之後又是大量的再移居。人們回流農村必然曾經發生，似乎支持農村人口沒有絕對減少的事實。因此，由於不同人群在不同時期被吸引進入商業和製造業，過後又返回農村原居地，所以人口狀況一直不穩定。

英格蘭鄉村遭受的大部份破壞，起先是因為貿易破壞了農村。農業革命肯定是在工業革命之前。農耕方法有了巨大進步，但同時公地被圈圍和合併，導致極度混亂。農舍屢遭迫害、菜園和土地被收購、公地權益被剝奪，這些行動剝奪了家庭手工業的兩大支柱：家庭收入和農業背景。若然手工業生產者有菜園子、小塊土地或放牧權的補充，勞工無需全部依賴金錢收入；一塊土豆田、幾台除草機、利用公地放養的一頭母牛或甚至一頭毛驢，都會令境況完全不同；家庭收入擔當失業保險的角色。農業合理化措施無可避免把勞動者趕出家園，並危及他們的社會安全。

城鎮生活又如何？波動性就業新災禍的影響當然清晰可見。工業通常被視為沒有前途的職業。〔英格蘭國教會教士〕David Davis 在 1795 年寫道[160]：「今天有工作的工人，明天可能在街上討飯…」，他還寫道：「這些新發展的最險惡後果是勞工沒有保障。」「在工廠工作的鎮民一旦沒有工作，一下子陷入癱瘓，立即成為教區的負擔；而這厄運不會隨著那一代人逝去…」。因為勞動分工同時在發洩仇恨：失業的工匠徒然回到他的村莊，因為「織布工雙手沒有別的用處。」城鎮化的致命不可逆轉是建基於這簡單事實；亞當·斯密已有預見，當時他描述工人的智力比不上最窮的農民，因為農民通常可以適應任何工作。儘管如此，直至亞當·斯

[160] David Davies, *The Condition of The Agriculture Worker*, 1795

密出版《國富論[161]》，赤貧現象沒有急劇增加。

在隨後二十年，形勢突變。Burke 在 1795 年向 Pitt 遞交的備忘錄〈思考匱乏及詳論[162]〉，承認儘管總體上有進步，但「過去二十年是惡性循環。」實際上，在七年戰爭（1763 年）之後十年，院外救濟增加顯示失業人口明顯增加。第一次看到貿易繁榮伴隨著窮人的災難增長。對西方的下一代來說，這明顯的矛盾註定成為社會生活中最難理解的周而復始現象。人口過多的幽靈開始困擾人們的思想。Joseph Townsend 在《濟貧法論述[163]》警告：「撇開投機，事實上英格蘭的人口多於我們能夠供養，而且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是多於我們可以有利可圖的僱用。」亞當·斯密在 1776 年曾反映悄然進步的氣氛。Townsend 在其後十年的著作已意識到風潮的來臨。

風雨欲來之際，還要有許多事情發生，（只是五年後）逼使蘇格蘭造橋專家 Thomas Telford 這樣遠離政治的成功人士苦苦抱怨說不能指望政府的常規方針有什麼改變，革命是唯一希望。Telford 把 Paine 的《人權論[164]》寄給家鄉父老，引發了暴動。巴黎正在催化歐洲的發酵。

〔英國政治家〕George Canning 深信〈濟貧法〉解救了英格蘭不受革命之苦。他主要是考慮到 1790 年代和法國戰爭。新的圈地行動爆發進一步壓低了農村窮人的生活標準。J. H. Clapham 是這些圈地行動的辯護者，他承認：「最有系統利用稅收補貼工資的地區，正好是近來圈地最多的地區，這巧合最為顯著。」換句話說，若不是有工資補貼，英格蘭廣大農村地區的窮人可能已跌至饑餓水平之下。到處都在縱火焚燒乾草堆[165]。越來越多人相信要拿起武器[166]。經常出現暴動，更多的是暴動的謠傳。英格蘭東南部 Hampshire（不止這地方郡），法院威脅對「在市場或路上強行壓低商品價格」處以極刑，不過又同時緊急要求普遍發放工資補貼。顯然，採取預防性行動的時機已到。

但是，在所有行動路線中為何選擇那個事後看起是最不切實際的路線？下文考慮當時的情況和所涉及的利害關係。鄉紳和教士管治農村。Townsend 總結情況：鄉紳地主與製造業保持「進退有餘的距離」，因為「〔鄉紳地主〕認為製造業不穩

---

[161] *Wealth of Nations*

[162] *Thoughts & Details on Scarcity* by Edmund Burke, 1795

[163] *A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 By a Well-Wisher to Mankind* by Joseph Townsend, 1786。原文為 William Townsend，遍查沒有資料，應為誤植。

[164] *The Rights of Man* by Thomas Paine, 1791-1792. 網上簡體譯本《人權論》。

[165] 1830 年，英格蘭南部和東部的農工起義，要求提高工資和取締影響他們冬季就業的打穀脫粒機。他們抗議之餘，縱火焚燒乾草堆以壯聲勢。

[166] 原文是 The Popgun Plot found wide credence。1794 年，名醫 James Parkinson 被指控與同黨密謀以氣槍發射毒箭行刺英皇喬治三世，但事無佐證，不了了之；史稱「氣槍陰謀」。此處比喻武裝行事。

定；他從製造業獲得的利益抵不上這對他的財產帶來的沉重負擔…」負擔主要是製造業的兩個看似矛盾的效果，即是赤貧人口增加和工資上漲。不過，只要假定有競爭性勞工市場存在，這兩個效果才是互相矛盾，因為這樣的市場傾向減少僱員工資以減少失業。缺乏這樣的市場——〈定居法〉依然有效——，貧困人口和工資可能同時上升。在這條件下，城鎮失業的「社會成本」主要由失業人士往往回流的家鄉村莊承擔。城鎮的高工資是農村經濟更大的負擔。農業工資超出農場主的承受能力，但又不夠勞工維持生計。似乎很明顯農業無法與城鎮工資競爭。另一方面，人們普遍認為應廢除〈定居法〉或至少應該放寬，以幫助勞工找到工作和僱主找到勞工。大家覺得這會全面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順帶減少工資的實際負擔。如容許城鄉工資「找到自身水平」，城鄉工資差異這即時問題給農村帶來更大壓力。隨著工業勞工在就業和失業陣痛交替之間在城鄉之間來回流動，對農村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混亂，不得不建設防護大壩保護農村免遭不斷上漲的工資洪水侵害。要想辦法保護農村不陷入社會混亂，鞏固傳統權威，防止農村勞工流失，在不過分增加農場主負擔的情況下提高農業工資。史賓漢蘭制度就是這辦法，一旦投入工業革命的洶湧洪流，必會產生經濟旋渦，但掌控農村利益的鄉紳階層認為史賓漢蘭制度的含意正好符合當時形勢。

從執行〈濟貧法〉的角度看，史賓漢蘭制度是可悲的倒退措施。二百五十年的經驗顯示教區是太小的管理單位，完全沒能力管理〈濟貧法〉，因為要適當處理這問題，必要區分有勞動能力的失業者和老弱病殘及兒童。這猶如今天的城鎮單槍匹馬地試圖處理失業保險，又或是失業保險混雜了照顧老人。因此，只有在〈濟貧法〉管理既具有國家性質又能夠區別對待的很短時期內，才稍為讓人滿意。政治家 William Cecil 和 William Laud 大主教在 1590-1640 年主政期間就是這樣的時期；當時王朝當政時是通過太平紳士[167]管理〈濟貧法〉，並發起建立濟貧院的鴻圖大計以及執行強制勞動。1642-60 年的動蕩政局[168]再次摧毀了被斥為國王個人統治的政權，但 1660 年王政復辟[169]，反為極其諷刺的完成了曇花一現的聯邦共和政制未竟之功[170]。1662 年的〈定居法〉把〈濟貧法〉限制在教區，而直至 1830 年代，立法機構對貧困問題毫不關心。最後在 1722 年才開始區分濟貧的工作；教區聯盟建立「貧民習藝所[171]」，有別於本地的濟貧院[172]；偶爾也允許院外救濟

[167] Justice of the Peace, JP 是源於英國的委任制度，由政府委任民間知名人士擔任太平紳士（中譯源出香港殖民政府）維持社區安寧（例如定期巡視監獄，初步鑑定精神病人然後送院）和處理較簡單的法律程序（例如小販和垃圾違規）。

[168] 1642-60 年英格蘭的動蕩政局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次內戰(1642-45)，第二次內戰(1645-1648)和強勢首相 Oliver Cromwell 以聯邦共和政制(Commonwealth, 1649-53 以及 1659-60)管治英國。

[169] Restoration 1660。英王查理士二世復辟，

[170] 1689 年，英國宮廷政變，英王詹姆士二世被迫流亡海外，國會和新任英王威廉三世共同通過〈權利法〉，永遠改變了英王的政治地位和承繼制度。

[171] workhouse

[172] poorhouse

活動，因為貧民習藝所接管了評審貧困的工作。1792 年〈新濟貧法[173]〉的長遠策略鼓勵設立教區聯盟以擴大管理單位；當時政府敦促教區在當地為有勞動能力的勞工尋找工作，其他輔助政策有院外救濟和甚至工資補貼措施，以減少對有勞動能力失業者的救濟成本。儘管建立教區聯盟不是強制性，但這意味著向擴大管理單位和區分不同類型的受救濟窮人邁進一步。儘管救濟制度有諸多缺陷，雖然〈新濟貧法〉仍有不足，但已朝向正確方向；只要院外救濟和工資補貼措施僅僅是輔助積極的社會立法，就不會危及合理的解決方案。史賓漢蘭制度使改革陷於終止。由於普遍推行院外救濟和工資補貼措施，這制度沒有遵循〈新濟貧法〉路線，而是徹底逆轉了新法的趨勢和實際摧毀了〈濟貧法〉整個體系。費精勞神區分貧民習藝所與濟貧院的措施變得毫無意義；各類型的貧民和體格健全失業者，現在不分青紅皂白融合為具依賴性的赤貧群體。另一個與區分相反的程序開始了：貧民習藝所併入濟貧院，而濟貧院本身逐漸消失；教區再一次成為制度退化真正傑作的唯一和最後的單位。

史賓漢蘭制度的後效果提升了鄉紳和教區牧師的崇高地位，如果這是可能的話。窮人督導者抱怨「不分青紅皂白的權力善行」，在「保守派社會主義[174]」中發揮最好的作用：太平紳士行使仁愛權力，而稅收的重擔由農村中產階級承受。大多數自耕農已在農業革命的變遷中消失；在農村權勢階層看來，餘下的中農階層（擁有部份田地和房產）和佃農和傭農階層合併形成一個社會階層，但未能仔細區分窮人和偶爾窮困的人；權勢階層居高臨下，看到農民艱苦掙扎，卻似乎看不到窮人與赤貧的嚴格分界線；即使知道在歉收年份小農場主由於收成太差而要「吃救濟」，也不會大驚失色。這種事例肯定不是常見但有可能發生，這突顯許多納稅人也是窮人的事實。總體而言，當時納稅人和赤貧民之間的關係就如現代各種保險計劃中就業者與失業者之間的關係：就業者承擔供養暫時失業者的責任。但典型的納稅人通常沒有資格享受貧困救濟，而典型農業勞工卻無需納稅。從政治上來說，史賓漢蘭制度加強了鄉紳階層對農村窮人的影響力，但卻削弱了對農村中產階級的影響力。

制度最怪誕之處是在經濟方面。「誰為史賓漢蘭制度埋單？」是實際上無法回答的問題。當然是由納稅人直接承擔。但農場主因為支付低工資而得到部份補償，這是史賓漢蘭制度的直接後果。另外，如農場主願意僱用要依靠救濟的失業村民，可以減免部份稅款。由此導致農場主的廚房和院子多出人手（有些幹活不買力）就必須記在借方欄。吃救濟的勞工，其勞動力更加便宜。他們必須經常換地方打雜工，所得的報酬只是一頓飯，或者在村中「勞動力市場」出售廉價勞力。這種退縮的勞動到底價值幾何，這是另一個問題。最後，窮人偶爾會得到一些租金補貼，但村舍房主卻通過高價出租那些髒兮兮住房而賺錢；鄉村管理機關很可

[173] Relief of the Poor Act，亦稱 Gilbert's Act。
[174] Tory socialism

能睜一眼閉一眼，只要那些簡陋房舍繼續繳納稅金。顯而易見，這種糾纏不清的利害關係會損害任何財務責任，並鼓勵各種各樣卑劣的腐敗行為。

雖然如此，從更廣泛的意義來看，史賓漢蘭制度是值得的。制度從工資補貼開始，表面惠及僱員，但實際上以公帑補貼僱主。補貼制度的主要後效是把工資壓至糊口水平之下。在那些全面赤貧化的地區，農場主根本不想僱用那些依然擁有小塊土地的勞工，「因為擁有土地的人沒資格獲得教區救濟，而標準工資是如此之低，以致如沒有某種救濟，已婚男子根本沒法養家。」因此，在某些地區，只有吃救濟的人才有機會找到工作；試圖不要救濟而自食其力，幾乎無法找到工作。但是在大部份農村地區，後者佔絕大多數，僱主階層因為得益於低工資而獲取額外利潤，同時卻無需以稅金做出補償。長期而言，這樣沒有效率的制度必然影響勞動生產力和壓低標準工資水平，最終甚至壓低地方官員為窮人利益而設定的「標準比例」。到了 1820 年代，許多郡縣都不斷降低麵包標準，而窮人的可憐收入降低更加厲害。在 1815-30 年間，曾在全國各地相當均等的史賓漢蘭標準下降了幾乎三分之一（實際上降低份額不是普遍如此）。Clapham 懷疑究竟地稅的總負擔是否一如突然爆發的抱怨使人們相信的那樣嚴重。他的懷疑有道理。因為雖然地稅上升令人側目，而且在一些地方肯定被認為是災難，但麻煩的根源似乎最有可能的不是稅金負擔，而是工資補貼對勞動生產的經濟效應。受衝擊最嚴重的英格蘭南部地區，濟貧支出還不到稅收 3.3%，Clapham 認為這是非常可以承受的份額，因為這筆稅款的大部份「應該是以工資形式支付窮人」。實際上，地稅總額在 1830 年代一直穩定下降，而比對不斷增長的國民財富，其相對負擔肯定下降得更快。1818 年，實際用於濟貧的支出總額約為八百萬英鎊，至 1826 年已持續下降至少於六百萬，而國民收入卻快速增加。儘管如此，對史賓漢蘭制度的批評卻越來越激烈，原因似乎在於群眾的非人性化傾向開始癱瘓國家生活，特別是限制了工業本身的能量。

史賓漢蘭制度觸發了社會大災難。我們已習慣把早期資本主義的可怕表現輕視為「傷感的材料」。這種說法沒有任何正當理由。上文提到的 Harriet Martineau 是〈新濟貧法〉的熱心信徒，她描繪的情況吻合極力反對〈新濟貧法〉的憲章派宣傳。著名的 1834 年濟貧法委員會[175]報告主張立即廢除史賓漢蘭制度，報告羅列的事實可以作為大文豪狄更斯反對委員會政策的參考資料。Kingsley[176]、Engels[177]、Blake[178]和 Carlyle[179]相信人類形象曾經被某種可怕災禍敗壞，他們的想法沒有錯。比詩人和慈善家咆哮的痛苦和憤怒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Malthus[180]和

[175] Commission on the Poor Law
[176] 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國文學家，大學教授和神學家。
[177] Friedrich Engels 恩格斯(1820=1895)，德國哲學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
[178] 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國诗人、畫家，浪漫主義文學代表人物之一。
[179] Thomas Carlyle(1795-1881)。蘇格蘭評論、諷刺作家、歷史學家。
[180]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

Ricardo[181]無情漠視他們的世俗沉淪哲學所建基的那些場面。

毋庸置疑，機器造成的社會秩序混亂以及和人類現在必定要為機器服務的環境帶來許多無法避免的後果。稍後歐洲大陸工業城鎮成長的城鎮環境缺少了英格蘭的鄉村文明。[182] 新城鎮沒有城市中產階級在此定居，也沒有工匠和手藝工人的核心，沒有受尊敬的小資產階級和城裡人組成粗魯工人的同化媒介；這些工人被高工資吸引或被詭計多端的圈地者趕出農村，來到早期的工廠幹苦活。英格蘭中部和西北部的工業城鎮是文化荒地；當地的貧民窟反映了缺乏傳統和市民自尊。移居而來的農民以及以前的自耕農或農地租戶跌入這荒涼悲慘境地，很快墮落成為泥沼中的四不像動物。這不僅僅是工資太低或工時太長（雖然往往如此），而是勞工被生活環境折磨至不似人形。來自非洲森林的黑人被關在籠子，在奴隸販子的船艙裡透不過氣，可能與這些勞工有同樣感受。但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無法彌補。只要權勢中人堅守他家族或同胞確立的榜樣，他可以為之而戰，救贖自己的靈魂。但是，勞工只有一條陽關道：把自己打造為新階級成員。除非他能夠以本身的勞動謀生，他就不是工人，而是乞丐。史賓漢蘭制度最令人痛恨的就是把人逼上絕路。這含糊不清的人道主義行動阻礙了勞工把本身打造成為經濟階層，因此剝奪他們逃離本來註定要在經濟工廠做苦力的命運的唯一途徑。

史賓漢蘭制度是使大眾道德敗壞的萬無一失措施。如人類社會是自動機器，維持著自身賴以建立的標準，那麼史賓漢蘭制度是自動摧毀任何類型社會賴以建立的標準，不僅獎賞逃避和假裝不能工作的行為，而且恰好在某人盡力逃避赤貧命運的關鍵時刻提高了赤貧主義的吸引力。一旦進了濟貧院（如果貧民和家人已經吃救濟一段時間，通常會被送到這裡），一頭陷進去就極少有可能離開。在濟貧院的雜亂環境中，幾百年來安定生活形成的體面和自尊很快消耗殆盡；在那個地方，人人小心不讓人以為活得比他人好，以免被趕出院外找工作，而是在熟悉的環境中拖拖拉拉混日子。「濟貧寵壞了群眾…為了取得救濟份額，粗暴的人威脅管理人員，放蕩鬼展示他們的野種，懶人抱著雙臂一直等待拿到救濟；無知的少男少女在濟貧院成婚；竊賊、小偷和妓女以恐嚇手段強搶；鄉紳為討民眾歡心而胡亂發放，委員會為了方便而發放。公帑就是這樣花掉…」「農場主不是僱用正常數目的勞工耕種田地，而是被迫僱用兩倍正常數目的勞工，工資部份由地稅支付；勞工不情不願工作，農場主控制不了他們：勞工可以選擇幹活或不幹活，因而農產質量下降，農場主又不能僱用願意自食其力的較好人手。好人壞人一起沉淪；納稅的農戶經過一陣徒勞的掙扎，也跑去尋求救濟…」Harriet Martineau 如是說。[183] 羞愧的自由主義者忘恩負義地忽視了這位坦率信徒對他們的信條的回憶。他們害怕即使她的說法誇張，也是說到點子。她本人就是掙扎的中產階級，

---

[181] 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國政治經濟學家。

[182] 原註 2：Usher 教授認為城市化始於 1795。

[183] 原註 3：Martineau, H.,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 Thirty Tears' Peace (1816-1846),* 1849

這窮得優雅階層對〈濟貧法〉的道德複雜性更為敏感。她理解並清楚說明社會需要「獨立勞工」的新階層。他們是她夢中的英雄，她也創作了一位主角：一位長期失業但拒絕救濟的勞工驕傲地對另一位決定去吃救濟的勞工說：「我頂天立地，向任何鄙視我的人挑戰。我帶孩子走教堂的中央過道，看誰有地位敢嘲弄他們。有人比我聰明，有人比我富有；但沒人比我更有尊嚴。」統治階層的大人物依然沒有理解這新階層的需求。Martineau 指責「貴族的庸俗過失，以為富裕階層之下只存在一個他們出於無奈要打交道的社會階層。」她抱怨大法官 Eldon 勳爵和其他知情人士「把最富有的銀行家之外的其他人全歸一個檔次（社會下層階級）：生產商，貿易商，工匠，勞工和赤貧民…」[184] 她堅持認為社會的未來取決於區分最後兩種人。她寫道：「除了君王和子民之間的區分，沒有比獨立勞工和赤貧民之間的社會差別有更大的鴻溝；把兩者混為一談是無知、不道德和失策。」當然，這肯定不是事實的陳述；在史賓漢蘭制度下，這兩個階層之間已經不存在差異。更準確地說，這是基於預言性期望的政策陳述。這政策就是新濟貧改革委員的政策；預言想像有自由競爭的勞工市場以及由此產生的工人階級。廢除史賓漢蘭制度之日正是現代工人階級真正誕生之時，他們的即時自身利益註定他們成為社會保衛者，對抗機器文明的內在危險。無論將來如何，工人階級和市場經濟歷史同時出現。英國工人階級一代又一代的特徵是痛恨公共救濟、不信任政府行為以及堅持尊嚴和自食其力。

廢除史賓漢蘭制度是英國中產階層這個新階層登上歷史舞臺的任務。地主階級無法完成的任務，註定由中產階層完成：社會轉變為市場經濟。在轉變開始之前，廢止十多項法律和訂立新法。1832 年的國會〈改革法〉廢除腐敗自治市鎮的特權，並轉交下議院永遠授予平民。他們的第一項偉大改革就是廢除史賓漢蘭制度。現在我們認識到它的家長主義方法與農村生活融合的程度，可以理解為何即使最激進的改革支持者會有保留，建議不少於十年或十五年的過渡期。實際上，事情發生頗為突然；後來人們尋找反對激進改革的論據時，所謂英國式漸進主義傳奇變成笑柄。那事件的殘酷衝擊困擾著幾代英國工人階級的白日夢。但這令人心痛行動的成功是因為廣大人民的一些根深蒂固觀念，包括勞工本身；這些觀念認為表面上支援人民的制度實際上卻是在掠奪人民，而「生存權利」措施是把病人送往死亡。

新法規定不再有院外救濟，由國家管理和有所區分。在這方面，這是徹底改革。工資補貼當然終止。再次採用貧民習藝所測試，但有了新意思。現在是由申請者自行決定是否一無所有，是否自願進入被故意弄成恐怖之地的收容所。貧民習藝所被賦予污名；住在習藝所成為心理和道德折磨，還要遵守衛生和禮節的要求，這實際上是巧妙利用這些要求作為進一步剝削的藉口。太平紳士和當地督導員不再管理習藝所，而是交由有更廣泛權力的管理人員在獨裁的中央政府監督之下管

[184] 原註 4：Martineau, H., *The Parish,* 1833.

理。赤貧民舉殯之時變成同是天涯淪落人與他斷絕關係之日。

1834 年，工業資本主義已準備啟動，〈新濟貧法〉也開始執行。史賓漢蘭制度曾保護英格蘭農村和一般勞動人口免受市場機制全面吸吮社會的骨髓。至該法被廢止之時，大批勞工已變得更像惡夢中的鬼怪而不是人。如果說工人肉體方面被非人化，富裕階層則在道德方面走下坡路。耶教社會的傳統團結正被富人拒絕為同胞承擔責任的態度取代。「兩個民族」正在形成。有思想的人感到困惑的是前所未聞的財富竟然與前所未聞的貧困貼在一起。學者一致宣稱已經發現了新科學，清楚展示支配人類世界的規律。規律要求拋棄同情心，以最多人最大幸福之名而堅決放棄人類團結；這規律取得了世俗宗教的尊嚴。

市場機制逐步進逼，爭取完成使命：人類勞工必須成為商品。追求復古的家長主義試圖抵制這必然發展，但徒勞無功。人們離開了史賓漢蘭制度的恐怖，盲目衝向理想國式市場經濟作為避難所。

第八章資料參考

史賓漢蘭制度的文獻

只有在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和結束時，我們才意識到史賓漢蘭制的決定性重要。當然，那是在 1834 年前後。然而，通常提到「補貼制」和「濟貧法弊政」不是始於由 1795 年的史賓漢蘭制，而是從 1782 年的〈Gilbert 法〉算起；當時公眾人士還沒有清楚理解史賓漢蘭制的真正特點。

即使時至今日人們仍然普遍認為史賓漢蘭制只是隨意對窮人發放救濟。實際上完全不是這回事；這是系統性的補助性工資。當代人只是有限地認識到這樣做法與都鐸時期的法律原則有正面衝突，人們也沒有完全認識到這與正在形成的工資制度完全不相容。至於實際效果，直到結合 1799-1800 年制定的〈反合併法[185]〉，人們才認識到這會壓低工資和變成對僱主的補助。

正如古典經濟學家對租金和貨幣的研究一樣，他們從來沒有停下來，仔細研究「補貼制」的細節。他們把補貼和院外救濟的所有形式和〈濟貧法〉混為一談，迫切要求要徹底清除。Townsend、Malthus 和 Ricardo 都沒有提出要改革〈濟貧法〉，而是要求廢止。只有 Bentham 曾研究這題目，在這問題上比起別人少了些教條。他和 Burke 理解工資補貼是真正的壞原則；這 Pitt 所忽略的。

恩格斯和馬克思沒有研究〈濟貧法〉。可以想像最符合他們心意的莫過於披露一種制度的偽人道主義：這制度據稱迎合窮人的想法，但實際上把他們的工資壓制在僅堪糊口水平以下（有賴特別的反工會法大力幫助），把公帑交給富人，幫助他們從窮人身上賺更多錢。但到了他們的時代，〈新濟貧法〉已是眾人之敵，Cobbett 和憲章運動份子往往把舊版〈濟貧法〉理想化。而且，恩

[185] Anti-Combination Laws

格斯和馬克思正確地堅信，如資本主義要到來，改革〈濟貧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們不僅漏掉了一些一流論點，也漏掉史賓漢蘭制的論點會強化他們的理論體系：沒有自由的勞動力市場，資本主義不能運行。



Harriet Martineau（插圖）對史賓漢蘭制效果的駭人描述，大量引用 1834 年《濟貧法報告[186]》的經典段落。她深信只要窮人能理解這些政治經濟的法規，必然更能承受他們的命運，因此她執筆寫成幾十本小冊子，解釋窮人的悲慘境遇是必然的；贊助她出版小冊子的宗教人士不可能再找到更真誠以及總的來說更博學的人來宣導他們的信條。她的著作《卅年和平：1816-46 年[187]》語調克制，比諸她對恩師 Bentham 的回憶，她更為同情憲章運動份子。(Vol. III, p. 489, and Vol. IV, p. 453) 她的編年史結語：「最有智慧的人現在專注勞工權利這個大問題，帶來國外的深刻教訓：絕不能忽視這個大問題，否則人人遭殃。是否無從解決？這解決方案可能是下一時期英國歷史的核心現實；解決方案可能比現在更好，似乎過往三十年的和平已為此準備。」這是延後行為的預言。英國歷史下一個時期沒有勞工問題，但在 1870 年代捲土重來，再數十年後，「人人遭殃」。顯而易見，在 1840 年代比 1940 年代較容易看清楚問題的根源是管理〈濟貧法改革法案〉的各種原則。

維多利亞時期及之後的哲學家和史學家都沒有仔細研究過史賓漢蘭制的瑣碎經濟。效益主義的三位歷學名家之中，Leslie Stephen 爵士沒有探究細節；Elie Halevy 首先認識到〈濟貧法〉在哲學激進主義歷史的關鍵作用，但對這個主題只有朦朧的概念；Dicey 的錯漏更是驚人，他對法律和輿論關係的出色分析把「自由放任」和「集體主義」作為事物的經緯，認為這模式本身源於當代的工業和商業趨勢，即是源於塑造經濟生活的制度。Dicey 最強調赤貧論對輿論的主導作用以及〈濟貧法〉改革對整套效益主義法例的重要性，然而他不理解效益主義者在立法計劃中極為重視〈濟貧法〉改革，而他實際上認為地方稅對業界的負擔才是關鍵問題。Schumpeter[188]或 Mitchell 這些經濟學思想史大師在分析古典經濟學家的概念時沒有提到史賓漢蘭制的情況。

Toynbee 的 1881 年講座把工業革命納入經濟史，認為史賓漢蘭制及其「富人保護窮人的原則」是因為「保守派托利社會主義」。William Cunningham 在同一時期研究同一主題，奇蹟地有所成就，但他只是沒有知音的一家之言。Mantoux 的 1907 年著作得益於 Cunningham 1881 年的傑作，但他只是把史賓漢蘭制度稱之為「另一改革」，奇怪地把「將窮人趕入勞動力市場」的後果歸因於史賓漢蘭制。(*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438)。Beer 專注研究早期的英國社會主義，但他幾乎沒有提及〈濟貧法〉。

直至 Hammonds(1911)想到由工業革命帶來新文明的景象，史賓漢蘭制才被重新發現，成為社會史的部份而不只是經濟史的事件。Webbs (1927)繼續研究，提出史賓漢蘭制的政治和經濟先決條

---

[186] Poor Law Report

[187] *Thirty Years' Peace, 1816-1846*

[188] 熊彼特

件這些問題，認識到這是我們這時代社會問題的起因。

J. H. Clapham 嘗試建立論點反對恩格斯、馬克思、Cunningham, Mantoux 和近代 Hammonds 提出被稱為經濟史的制度論。Clapham 不承認史賓漢蘭是一種制度，只是國家「農業組織」的特徵（第 1 卷，第 4 章）。這是不恰當的，因為正是把史賓漢蘭制擴展到城鎮而導致制度的崩潰。此外，他分開考慮史賓漢蘭制對地方稅和工資的影響，把前者置於「國家經濟活動」來討論。這相當武斷，忽略了從僱主階層的角度來看制度：僱主從低工資得到的好處等同甚或超過地方稅方面的損失。但 Clapham 有意識地考慮各種事實，彌補了他對制度的不當處理。他首次揭示了推行史賓漢蘭制地區的「暴力圈地」和制度導致實際工資下降的真實程度。

傳統經濟自由主義者一直認為史賓漢蘭制和工資制度互不相融，認為廣義上來說任何保護勞工的形式都涉及一些史賓漢蘭制度的干預原則。Herbert Spencer 憤怒指控「有補貼的工資」是「集體主義」的做法，他也輕易把這論點擴大到公共教育、公共房屋和遊樂場地等等。Dicey 在 1913 年概括了他對〈1908 年老年人養老金法案[189]〉的批評：「本質上只是院外濟貧的新形式。」他同時質疑經濟自由主義者是否曾有公平的機會成功落實他們的政策。「他們的一些提議從沒有落實；例如，院外濟貧從來沒有廢除。」既然 Dicey 有這樣的觀點，那麼很自然 Mises 會斷言「只要一直支付失業救濟金，失業就肯定會存在。」(*Liberalisms,* 1927, p. 74)；而「幫助失業者證明是最具破壞力的武器。」(*Socialism,* 1927, p. 484; *Nationalokonomie,* 1940, p. 720)。Walter Lippmann 在《美好社會 *Good Society*》（1937 年）試圖與 Spencer 的理論分開，但引用了 Mises。 Mises 和 Lippmann 反映了自由主義者對 1920 和 30 年代新保護主義的反應。無疑當時的形勢有許多特點令人想起史賓漢蘭制。在奧地利，破產的財政部要撥款救濟失業者；英國的長期失業福利和失業救濟金沒什麼區分；美國推行了公共事業和公共工程；化工企業總裁 Alfred Mond 爵士在 1926 年曾要求英國僱主應收到失業基金的補貼，以「補貼」工資，有助增加就業，但不得要領。自由資本主義由始至終都沒有解決失業問題和貨幣問題。

赤貧問題和舊濟貧法的當代文獻（從略，可參見原文）

史賓漢蘭和維也納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地利的發展，其發人深思的社會和經濟形勢吸引了本文作者研究史賓漢蘭制度及其對傳統經濟學家的影響。

奧地利是是完全資本主義的環境，維也納的社會主義市政府建立了被經濟自由主義者猛烈攻擊的政權。市政府施行的一些干預政策無疑與市場經濟機制不能和諧共存。但純經濟論點不能夠詳細闡述一個主要是社會性而不是經濟的問題。

有關維也納的主要史實如下。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8 年）後十五年的大部份時間，奧地利的失業保險金由公帑大量補貼，因而無限期延長了院外救濟；住屋受到管制，固定在以前水平的

[189] Old Age Pensions Act (1908)

極低百份比，而維也納市政府徵稅籌集資金建造非牟利的出租房。儘管沒有工資補貼，然而全面提供的社會服務雖然不算過份，但實際上還是方便了工資過多地下降，但發達的工會運動得到強力的支持而擴大失業救濟。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樣的制度當然是不正常。租金被限制在完全無利可圖的水平，不能配合現有的私企制度，特別是建造業。另外，貧窮國家在初期實施社會保護干預了貨幣的穩定：通貨膨脹政策和干預政策兩者互相影響。

最終，維也納不得不屈服於純經濟論點強力支持的政治勢力；這是和史賓漢蘭制度一樣的命運。1832 年在英格蘭以及 1934 年在奧地利的政治波動都旨在解放勞動力市場，免受保護主義干預。無論是鄉紳的農村或是工人階級的維也納，都不可能長時間與周圍的環境隔離。

然而，顯而易見，這兩個干預時期有頗大差別。在 1795 年，英格蘭農村要被保護，免受城市工業大步向前的經濟發展造成混亂；而在 1918 年，維也納的工業工人階級受到保護，免受因為戰爭、戰敗和工業混亂引起的經濟衰敗影響。最後，史賓漢蘭制度導致勞工組織的危機，開拓了通向繁榮新紀元之路；但是奧地利保安團[190]的勝利卻是國家和社會體制整體災難的部份。

本文想強調這兩類型的干預在文化和道德影響有巨大差別：史賓漢蘭制試圖阻止市場經濟到來，而維也納實驗則嘗試完全超越這樣的市場經濟。史賓漢蘭制為老百姓帶來真正的災難，而維也納卻實現了西方歷史上最蔚為奇觀的文化勝利。1795 年導致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空前下降，阻止他們取得新的社會地位；在 1918 年，工業工人階級受到維也納制度保護，抵禦了嚴重經濟混亂的負面影響，把自身提升到任何工業化社會廣大民眾從未達到的水平，從而啟動了前所未見的道德和知識興起。

很明顯，這要歸因於事態的社會方面原因，這有別於經濟方面。但正統經濟學家是否正確掌握干預主義的經濟理據？實際上，經濟自由主義者認為維也納制度是另一種「濟貧不得其法」，另一種「補貼制度」，傳統經濟學家必要除之而後快。但這些思想家是否被史賓漢蘭制建立的相對持久情況誤導？他們的深邃洞察力有助正確預測未來，但他們對他自身所處時代的思考卻是完全錯誤。現代的研究已經證明他們的可靠判斷聲譽是名不副實。Malthus 完全誤解他那個時代的要求； T. H. Marshall 說過，如新娘子都相信 Malthus 的人口過剩傾向性警告，「也許經濟進步已當場止步。」Ricardo 錯誤陳述了貨幣的爭論和英倫銀行的作用，沒有抓住貨幣貶值的真正原因；現在我們知道貨幣貶值的原因主要在於政治性支付和轉帳的困難。如英國採納了 Ricardo 對《1810 年黃金委員會報告書[191]》的建議，將會輸掉拿破崙戰爭，而「大英帝國今天也不會存在。」
因此，維也納經驗及其與史賓漢蘭制度相似之處讓一些人重拾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但也讓一些人改持懷疑態度。

為什麼不採用〈Whitbread 草案〉？

如捨棄史賓漢蘭政策，唯一的另外方案似乎應該是 1795 年冬提出的〈Whitbread 草案〉。該草案

[190] *Heimwehr*
[191] Bullion Report

要求擴大 1563 年的〈工匠法[192]〉以包括每年評審最低工資。草案的提案者認為這可維持伊莉莎白時代的工資評審規則，從最高工資擴大至最低工資，從而預防農村出現饑餓。無疑這將滿足緊急狀態的需要，而值得注意的是，例如，薩福克郡的議員支持草案，但地方官員也支持由 Arthur Young 親自出席的一次會議提出的史賓漢蘭制度的原則；在外行人看來，這兩種措施之間的差別極大。這種看法不令人奇怪。一百三十年後，1926 年的〈Mond 計劃〉提議使用失業基金以補貼工業界的工資，公眾仍然很難理解救濟失業者和補貼在職者工資之間的決定性經濟區別。

然而，1795 年的選擇是最低工資或工資補貼。連同〈1834 年濟貧修訂法〉廢除〈1662 年定居法[193]〉一起研讀，就可以看到這兩項政策的差別。〔〈定居法〉類似戶籍制度，規定國民出生地的教會負責他一生的救濟事務。〕該法被廢止，就有可能建立全國性的勞動力市場，主要目的是讓工資「找到自身的水平。」Whitbread 的最低工資草案其意圖正正與廢除〈安居法〉的意圖相反，而史賓漢蘭法卻不是這樣。通過擴大應用 1601 年的〈濟貧法〉而不是 Whitbread 建議擴大 1563 年的〈工匠法〉，鄉紳對農民的照顧其力度和形式只會對市場運作有最低限度的干預，而**實際上使訂定工資的機制無法運作**。從來沒有人公開承認這種所謂〈濟貧法〉運作實際上完全推翻了伊莉莎白時代的強制性勞動原則。

對史賓漢蘭法的發起人來說，實效的考慮才是最重要。尊敬的當代宗教領袖 Edward Wilson 本應是這法例的支持者，但他在小冊子明確贊成自由放任：「一如市場的其他商品，在沒有法律的干預下，勞力從古至今都找到自身的水平。」如英格蘭地方官員持相反論調，認為如沒有法律干預，勞力從古至今都沒有找到自身的水平；這說法可能更適合。不過，根據記錄，這位教士繼續指出工資增長追不上穀物價格，因此他恭敬提請地方行政官員考慮「定量救濟窮人的措施」：一家三口每星期的總救濟金為 5 先令。小冊子中的〈啟事〉是這麼說：「下述內容在去年 5 月 6 日 Newbury 郡議會中提出。」就我們所知，地方官員比教士走得更遠：郡會議一致同意救濟金額為 5 先令 6 便士。

Disraeli[194]的「兩個民族論」和有色種族問題

有幾位作者曾堅持殖民地的問題與早期資本主義的問題相似，但他們未能以其它方法跟進這樣的比喻類推，也就是如實描述百年前英格蘭較貧困階級是那時代被剝離社會成員資格和被貶低的土著，以解釋他們的狀況。

這樣容易忽略這明顯的相似性，原因是因為我們相信自由主義的偏見，不恰當地重視基本上是非經濟過程的經濟方面。當今在一些殖民地區的種族分裂現象，還是百年前工人階級的類似「非人性化」待遇本質上都不是經濟方面。

1. 破壞性的文化接觸主要不是經濟現象。

[192] Statute of Artificers
[193] Settlement and Removal Act
[194]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英國政治家和小說家，兩度出任首相。

L. P. Mair 指出現在大多數土著社會正經歷著快速而強力的變革，只有革命的暴力改變可與其相比。儘管入侵者的動機無疑是經濟性質，但原始社會崩潰必然是由於其經濟體系被破壞所造成；明顯的事實是**原來的文化不能夠同化新經濟制度**，原來的文化沒有被任何其它有條理的價值體制取代，因而分崩離析。

西方體制中具破壞性傾向的趨勢首推「廣泛地區的和平」打破了「部族生活、族長統治的權威以及年輕人的軍事訓練；基本上禁止部族或部落遷徙。」(Thurnwald, *Black and White in East Africa; The Fabric of a New Civilization, 1935,* p. 394). 「戰爭必然令土著生活保持敏銳，遺憾的是在和平年代這種敏銳性喪失…。」廢止戰爭導致人口減少，因為戰鬥的傷亡人數不多，而沒有戰爭意味著喪失了富有生機的風俗和儀式，鄉村生活變得不利健康的沉悶和冷漠。」(F. E. Williams, *Depopulation of the Suan District,* 1933, "Anthropology" Report, No. 13, p. 43) 這情況可比較在傳統文化環境中原居民「充滿活力、生氣勃勃和使人興奮的生活。」(Goldenweiser, *Loose Ends,* p. 99).

用 Goldenweiser 的話說，真正的危險是「介乎中間的文化」。 (Goldenweiser, *Anthropology,* 1937, p. 429) 對這一點實際有一致的意見。「舊有障礙正逐漸減少，又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指導方針。」(Thurnwald, *Black and White,* p. 111). 「如社區認為積累商品是反社會行為，要把這樣的社區與當代的白人文化結合，是試圖協調兩個互不相容的制度體制。」(Wissel in Introduction to M. Mead,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n Indian Tribe,* 1932) 「帶入移民文化的人也許可以成功消滅原有文化，但無法消滅或同化承傳文化的原居民。」(Pitt-Rivers, "The Effect on Native Races of Contact with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Man,* Vol. XXVII, 1927) 或是用 Lesser 的尖刻說話，以為這是工業化文明的另一犧牲者：「Pawnee 族印第安人的成熟文化降格為白人的文化嬰兒。」(*The Pawnee Ghost Dance Hand Game,* p. 44)。

在公認的意義來說，雖生猶死的狀況不是由於一方之得即另一方之失的經濟剝削；但這肯定與影響經濟狀況的土地所有權、戰爭、婚姻等有關，各自影響眾多形形式式的社會習慣、風俗和傳統。強行把貨幣經濟引進人口稀少的西非，造成當地人「買不到食品以填補充沒有種植的食品，因為沒有人會種植多餘的食品賣給他們。」 (Mair, *An Af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34, p. 5)他們的體制蘊含著不同的價值量表；他們既節儉同時又沒有市場頭腦。「無論市場是供過於求或求過於供，他們仍然索取要同樣的價格；為了節省一些小錢，卻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跑遠路去買東西。」(Mary H. Kingsley, *West African Studies,* p. 339).工資上漲常常導致曠工。據說〔墨西哥〕的 Zapotec 族人每日工資 50 分的勤奮程度只是每天工資 25 分的一半。英格蘭工業革命早期的日子也常見這種矛盾的現象。

人口比率的經濟指數不見得比工資更能滿意〔表達情況〕。Goldenweiser 證實了 Rivers 對在太平洋群島(Melanesia)的著名調查：文化匱乏的土著人可能「死於無聊。」F. E. Williams 是當時在那地區工作的傳教士，他記述很容易理解「心理因素對死亡率的影響。…許多觀察家指出土著可能很容易死去。」以前的興趣和活動被限制，似乎對他的情緒是致命打擊。結果是土著的身體抵抗力受到傷害，很容易死於各種疾病。(*op. cit.,* p. 43) 這與經濟欲望的壓力無關。「因此，人口

自然增長率極高，可能是文化活力或文化退化的癥狀。」(Frank Lorimer, *Observations on the Trend of Indi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1).

只有與生活的經濟標準不相應的社會措施才能阻止文化退化，諸如恢復部落土地所有制或隔離部落社會免受資本主義市場手段的影響。John Collier 在 1942 年寫道：「把印第安人與他的土地分離是致命打擊。」1887 年的〈一般土地分配法[195]〉把印第安人的土地「個體化」，其後的文化崩潰導致印第安人丟失了約四分之三的土地，即九千萬畝。1934 年的〈印第安人重組法[196]〉重組部落的土地，通過復興文化得以挽救了印第安人社會。

非洲也有同樣的情況。人人關心各種土地所有制，因為這是社會組織的最直接基礎。看來是經濟衝突的高稅收和租金、低工資等，幾乎全都是隱蔽的壓力，誘使土著放棄傳統文化，從而迫使他們適應市場經濟的方法，即是為了工資而工作和到市場上採購所需貨品。在這過程中，一些土著部落移居到城鎮，喪失了祖先遺傳的美德，成為居無定所的「半馴化動物」：有流浪者、小偷和妓女；這是前所未見，像極了約在 1795～1834 年期間英格蘭的赤貧人口。

(2) 工人階級在早期資本主義下的人性退化是社會災難的結果，不能以經濟學術語衡量。

Robert Owen 早在 1816 年已留意他的工人「不管掙到什麼工資，大多數人註定是不幸的…。」(*To the British Master Manufacturers*, p. 146)。還記得亞當·斯密估計失去土地的工人完全沒有智力方面的興趣。M'Farlane 估計「懂得寫作和計算的老百姓日漸減少。」(*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p. 249-50)一代人之後，Owen 將工人退化歸因於「未成年時被忽視」和「過度工作」，致使他們「即使可以賺得高工資，因出於愚昧而不能很好使用所得。」Owen 只付給工人低工資，但同時人為地為他們創建全新的文化環境以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大多數人養成的惡習大體上與有色人種因文化接觸瓦解而被低貶的特性：浪費、賣淫、盜竊、沒有節儉和節約、邋遢、生產力低下、沒有自尊和毅力。市場經濟擴散正在破壞農村社會、鄉村社區、家庭、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在文化框架內支撐生活的風俗和標準等傳統結構。史賓漢蘭提供的保護使情況變得更糟糕。到了 1830 年代，老百姓身受的社會災難完全與今天的〔南非〕Kaffir 族人一樣。傑出的黑人社會學家 Charles S. Johnson 獨自一人推翻了種族貶低和階層退化之間的類比，把他的觀點應用到階層退化：「順提一下，英格蘭工業革命比歐洲各地超前，急劇經濟重組之後的社會混亂把貧窮的兒童變成與過去非洲奴隸一樣的「單件貨品」…為兒童農奴制開解之辭與開解奴隸貿易幾乎如出一轍。」("Race Rela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E. Thompson, *Race Relations and the Race Problem,* 1939, p. 274).

〈濟貧法〉與勞工組織

迄今為止沒有人研究史賓漢蘭制度的更廣泛含義、其起源、影響以及突然終止的原因。以下是有關這方面的幾個觀點。

---

[195] General Allotment Act

[196]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1. 史賓漢蘭制度在何種程度是戰時措施？

從嚴格的經濟角度看，史賓漢蘭制度不是一些人所謂的戰時措施。當代人很少把工資的狀況與戰時的緊急狀態聯繫。工資有明顯上漲的情況**在戰前已經開始**。Arthur Young 的 1795 年《通函 *Circular Letter*》旨在查明農作物歉收對穀物價格的影響，提出以下的問題：「與前段時期相比，農業勞動者的工資上漲了多少（如果有的話）？」他沒有定義「前段時期」，但引用的參考資料時間範圍從三年到五十年；參考資料的作者都沒有把時段設置為兩年，這是在 1793 年 2 月爆發的法國戰爭的時段。實際上，沒有人提及那次戰爭。

順提一下，應付因歉收和惡劣天氣條件導致赤貧現象增加的措施有：（一）當地捐獻，包括失業救濟金、免費或減價分發食物和燃料；（二）提供就業機會。工資通常不受影響；在 1788-9 年期間的類似緊急狀態，曾以低於正常工資的水平提供額外的就業機會。(Cf. J. Harvey, "Worcestershire," in *Ann. of Agr.,* v, XII, p. 132, 1789. Also E. Holmes, "Cruckton," *l.c.,* p. 196.)

然而，有好的理由認為戰爭至少影響了間接採用了史賓漢蘭緊急措施。實際上，戰爭加劇了快速擴大市場體制的兩個弱點，也導致引發史賓漢蘭制度的形勢：（一）穀物價格波動的趨勢，（二）騷亂對這些波動的影響最為有害。最近才開放的穀物市場不可能承受戰爭的壓力和封鎖的威脅。穀物市場也無法抵抗有外來不祥因素的習慣性騷亂引起的恐慌。在所謂的自發調節的制度下，中央當局認為「有秩序的騷亂」或多或少是本地供應不足的**指標**，應該溫和處理；但現在這被指責是稀缺的**成因**和對整體社會的經濟威脅，不僅局限於窮人。Arthur Young 警告「食品價格昂貴引發騷亂的結果」，Hannah More 的說教式歌詞有類似的觀點：「騷亂或是半條麵包，總比沒有麵包好。」她對家庭主婦的回答只是抑揚頓挫表達 Young 的虛擬對話：「我們是否直至挨餓都一聲不發？肯定你不想這樣，你應該抱怨；但抱怨或行動的態度不要讓所感受的不幸更為惡化。」他強調「**只要沒有騷亂**」，根本不會有饑荒的危險。這樣的擔心是有很好的理由：穀物供應極易受恐慌的影響。另外，因為法國大革命，即使有秩序的騷亂有了威脅性的含義。儘管害怕工資上漲無疑是史賓漢蘭制度的經濟成因，但可以認為就戰爭而言，這種情況的含意較多是社會性和政治性，而不是經濟方面。

2. William Young 爵士和放寬〈定居法〉

1795 年有兩項關鍵性〈濟貧法〉措施：史賓漢蘭制度和放寬「教區農奴制[197]」。很難相信只是巧合，而各自對勞工流動的影響剛好相反。因為後者，工人對四處尋找就業機會較有吸引力，而前者則減少他這樣做的意欲。研究移民時有使用「推」和「拉」這些術語；當目的地有強大的「拉」，家鄉的「推」會減弱。修訂〈1662 年法案〉可能導致農村勞工大規模不安本份，史賓漢蘭制度肯定減輕了這方面的危險。從管理〈濟貧法〉的角度看，這兩項措施明顯是是互補。因為放寬〈1662 年法案〉涉及設計該法案要迴避的風險，即是窮人大量湧入「較好的」教區。要是沒有史賓漢蘭制度，這種風險也許真的發生。當代人很少提及這種關係，回想〈1662 年法案〉幾乎沒有公開討論就付諸實施，這樣的反應是不足為奇。然而，William Young 爵士必然有這信

[197] parish serfdom

念，因為他曾兩次共同提出這兩項措施。在 1795 年，他倡議修改〈定居法〉，又動議〈1796 年法案〉，把史賓漢蘭制度的原則納入法律。在此之前，他在 1788 年曾倡議同樣的兩項措施，但未獲成功。他幾乎以 1795 年相同的措辭動議廢止〈定居法〉，同時又和議救濟窮人的措施，建議設立生活工資，三分之二由僱主支付，三分之一由地方稅支付。(Nicholson, *History of the Poor Laws,* Vol. II)然而，這一直要等到另一次嚴重歉收再加上法國戰爭，這些原則才付諸實行。

3. 城市高工資對農村社會的影響

城鎮的「拉」導致農村工資上漲，同時也往往導致農村勞動力儲備流失。這兩個災難密切相關，以後者的影響更為重要。農業生產要有足夠的勞動力儲備，因為冬季的農閒，春秋兩季的農活需要很多人手。在傳統社會的自然結構中，這樣的勞動力儲備不是簡單的工資水平問題，而是決定人口中較貧困的勞工其**地位**的制度性環境問題。幾乎所有已知的社會都有法定或習俗安排，方便地主在農忙時節傭用農村勞工。

城市工資上漲導致農村社會的問題，情況的核心是**地位**讓位於**合約**。在工業革命之前，農村有重要的勞動力儲備：男人在冬季忙於家庭手工業，而在春秋兩季男工和妻子則忙於田間農活。〈定居法〉實際上使窮人成為教區的農奴，依賴當地的農民。〈濟貧法〉有其他形式把當地勞工變成易受操縱的工人，例如勞工地方稅、必須住在僱主提供的宿舍或由教區以補貼鼓勵農民聘用貧民。擁有特許權的作坊不但可隨意殘酷地懲罰窮人，實際上也秘密施罰；地方政府有權光天化日強行進入民居，如認為窮人「身陷貧困，並且應該得到救濟」，可以逮捕窮人並送往作坊。(31 Geo. III. *c.* 78) 這些作坊的死亡率駭人聽聞。除了這些慘況，北部的僱農或邊境居民的工資以實物支付，且被強迫隨時到田間幹活，窮人的茅房和土地有各種契約把他們牢牢縛在一起，可以想象溫順的後備勞工大軍任由農村僱主魚肉。因此，除了工資的問題，還有維持足夠農業勞動力儲備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的相對重要性在不同時期可能有所不同。引入史賓漢蘭制度與農場主害怕工資上漲有密切關係，同樣原因可能導致在後期農業蕭條期間（1815 年之後）補貼制度快速普及；1830 年代早期，農業界幾乎一致堅持保留補貼制度，不是因為害怕工資上漲，而是擔心是否有充足供應的隨時可用勞動力。特別是在 1792～1813 年的異常繁榮期間，他們一直擔心人手問題；在這期間，穀物的平均價格劇增，並遠超過勞動力價格的上升。史賓漢蘭制度的背後動力不是工資，而是勞動力供應。

從農業社區的角度看，津貼制度的真正功能沒有什麼值得懷疑；那真正功能就是確保隨時都有貧民作為可用的農工儲備。順帶一提，雖然現實中沒有剩餘人口，史賓漢蘭制度就是這樣建立了類似的農村剩餘人口。

工資上漲會吸引更多勞工，因此試圖區分這兩套動機似乎只是刻意而為。但在一些情況下，有證據說明農民較為重視那一套。

首先，有大量證據表明，就貧窮居民而言，農場主反對會減少臨時農業幫工的任何形式的外間就業。1834 年報告書的一份證詞指責貧窮居民「為了每星期一英鎊去捕捉鯡魚和鯖魚，卻把家

人留給教區照顧。他們不在乎一轉頭就被送進監獄，只要他們出獄後有機會賺錢…」(第 33 頁)。同一份證詞抱怨「農場主在春秋農忙季節常常不能找到足夠數量的勞工。」(Henry Stuart's Report, App. A, Pt. I, p. 334A).

其次是小耕地的關鍵問題。農場主一致認為小耕地最能幫助窮人和他的家庭脫離救濟行列，但即使地方稅的負擔也不能誘使他們同意以任何形式向貧窮居民分配小耕地，以幫助窮人更少依賴臨時農活。

這一點值得注意。直到 1833 年，農業社會默然支持保留史賓漢蘭制度。《濟貧法專員報告》提到：補貼制度意味著「廉價勞工，加快收割」(Power)。「沒有補貼制度，農場主不可能繼續耕作土地。」(Cowell)。「農場主希望傭工的工資由濟貧款項支付。」(J. Mann)「我不認特別是大戶農場主希望減少〔地方稅〕。地方稅保持改變，他們總是能夠聘用想要的額外人手；一旦情況變壞，他們可以把這些人手全部趕回教區…」(農場主的證詞)。教區人士「反對任何致使勞工不依靠教區援助的措施，這樣才可以把勞工限制在教區範圍之內，有緊急工作時才有人可用。…高工資和勞工自由會搗垮〔教區〕。(Pringle) 教會默默反對向窮人分配小耕地。小耕地讓窮人自給自足，有體面有自尊，也使他們脫離農業所需的儲備大軍。Majendie 建議小耕地面積為 1/4 英畝，認為高於這個面積的要求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土地) 佔有者擔心使勞工會自給自足。」。另一位支持者 Power 也證實：「農場主一般反對推行小耕地，唯恐土地財產會縮水，找肥料要走更多的路，也反對勞工自給自足。」Okeden 建議小耕地面積為 1/16 英畝，因為這剛好用盡每個手工業家庭的餘暇，一如「紡車和紗杆、梭子和織針消耗了他們的閒暇時間。」

4. 工業化城鎮的補貼制度

史賓漢蘭制度的設計主要是作為農村減貧困的措施，不是要限制鄉村，因為鄉鎮也是農村部份。直到 1830 年代早期，在典型的史賓漢蘭地區大多數城鎮已推行補貼制。例如，Hereford 郡頗為人口過剩，八個城鎮(四個「肯定」，四個「可能」)有執行補貼制，而人口沒有過剩的 Sussex 郡的十二個呈報城鎮有九個執行補貼制。

北部和西北部的工業城鎮情況非常不同。直到 1834 年，工業城鎮的依賴性窮人數目比農村地區少得多；甚至在 1795 年之前靠近工廠的鄉郊地區其赤貧人口往往大幅度增加。1789 年，John Howlett 教士令人信服地反駁：「普遍的錯誤看法是大城市和人口眾多的製造業城鎮的窮人比例高於教區；事實正好相反。」(*Annals of Agriculture,* v, XI, p. 6, 1789)

遺憾的是對新型工業城鎮的情況不是很清楚。濟貧法專員看來擔心史賓漢蘭措施即將擴散到製造業城鎮的所謂危險。人們知道「北部各郡受影響程度最小，」然而仍然聲稱「甚至在城鎮，這種危險的存在已達可怕程度。」這沒有事實證實。誠然，Manchester 或 Oldham 郡的救濟偶爾惠及健康良好和充分就業的人。Henderson 報告在 Preston 鎮的納稅人會議上，一位赤貧者大聲疾呼，投訴「周薪從一英鎊一直降至十八先令」。Salford, Padiham 和 Ulverston 諸鎮歸類為「定期」實施工資補助；Wigan 的織布工和紡紗工也是同樣情況。Nottingham 的長襪低於成本價出

售，但生產商依然「有利可圖」，明顯是因為有地方稅補貼工資。Henderson 撰寫 Preston 的報告時，腦海中已想到這可惡的制度「逐漸成形和引用私人利益來保護自己。」根據濟貧法專員報告書，這制度較少在城鎮中流行，只是「因為製造業資本家只是地方稅納稅人的少數，因此對教區的影響少於農民。」

從短期看可能是這樣，但從長期看似乎可能有幾個理由令工業界僱主不普遍接受補貼制度。

一個理由是窮人工人效率低下。棉紡業主要以計工計算工資。但現在即使在農業方面「領取教區救濟的人士效率低下，四、五個人的效率才等同一個計件工人。」(Select Committee on Laborers' Wages, H. of C. 4, VI, 1824, p. 4.) 濟貧法專員報告書提到計件工作可使用史賓漢蘭方法，而不必破壞「製造業工人的生產效率」；這樣生產商也許會「真正得到廉價勞工。」這暗示著農業工人的低工資不一定意味著廉價勞動力，因為這些工人的低效率可能壓低了低工資的價值。

企業家反對史賓漢蘭制度的另一可能原因是競爭者可能利用補貼工資以較低的工資成本生產。這種威脅不會影響在不受限制市場出售產品的農民，但城市的廠家會感到極大不安。濟貧法專員報告認為「因為甲郡濫用〈濟貧法〉，乙郡的製造商可能被對手廉價傾銷並導致破產。」William Cunningham 指出 1834 年法案之重要在於對〈濟貧法〉管理的「國有化」影響，從而消除了發展全國市場的嚴重障礙。

反對史賓漢蘭制度的第三個理由，可能也是對資本家集團影響最大的理由，是這制度往往扣住「大量懶惰的剩餘勞動力」，未能流入城市勞工市場。(Redford)。到了 1820 年代後期，城市生產商對勞工的需求很大；Doherty 的工會引起大規模動盪；這是 Owen 主義運動的開始，導致英格蘭經歷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和停工。

因此，從僱主的角度看，有三個強力而長期論據反對史賓漢蘭制度：對勞動生產力的負面影響；造成國家不同地區成本差異的趨勢；促成農村「勞動力市場不能流動」(Webb)，從而維持城市工人壟斷勞動力市場。個別僱主或甚至當地的僱主小圈子可能不大理會這些情況，可能輕易相信低勞工成本的優勢，不僅確保利潤，而且有助與其它城鎮生產商競爭。然而，企業家階層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隨著時日，看來原本對個別僱主或僱主小圈了有利的事情卻對整個階層構成威脅。實際上，補貼制度在 1830 年代早期向北部工業城鎮擴展（即使補貼制度形式上有所精簡），鞏固了反對史賓漢蘭制度的輿論，並在全國推行改革。

這證據表明城市政策或多或少有意識地在城鎮逐步建立工業的勞工儲備，主要是為了應付經濟活動的劇烈波動。在這方面，城鎮和農村沒有多大區別。鄉村當局寧可選擇高地方稅而不是高工資，城市當局也不願意趕走在城市落腳的非常住窮人。農村和城市僱主之間為爭取勞工儲備而彼此競爭。1840 年代中期有嚴重和長時間經濟蕭條，以地方稅為代價支持勞工儲備才變得不可行。即使如此，農村和城市的僱主還是以相同方式行事：工業城鎮開始大規模清除窮人，與之相呼應的是農村地主「清洗農村」：兩者都是為了減少常住窮人的數目。(cf. Redford, p. 111)

5. 城鎮優先農村

本文假設史賓漢蘭制度是面對城市工資水平上漲威脅時的措施，以保護農村社會。這涉及貿易周期中城鎮優先農村。1837-45 年蕭條時期是例子，說明這種情況。1847 年的細緻統計調查顯示蕭條從英格蘭西北部的工業城鎮開始，然後蔓延到農業郡縣，其後的經濟復蘇也是明顯遲於工業城鎮。數據顯示「壓力首先影響製造業地區，最後才在農業地區消失。」調查涵蓋的製造業地區 Yorkshire 郡的 Lancashire 和 West Riding 為代表，人口有 201,000，分為 584 個濟貧區；農業地區調查包括 Northumberland, Norfolk, Suffolk, Cambridgeshire, Bucks, Herts, Berks, Wilts 和 Devon，人口有 208,000，也是分為 584 個濟貧區。製造業地區的情況在 1842 年開始改善，赤貧增加率從 29.37%降至 16.72%，1843 年實質減少 29.80%，1844 年 15.26%，1845 年進一步減少 12.24%。與此相比，農業地區 1845 年才開始改善，減少 9.08%。調查計算人均的濟貧法開支，後者是分年分郡計算。(J. T. Danson,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U.K., 1839-1847," *Journ. of Stat. Soc.,* Vol. XI, p. 101, 1848)

6. 農村人口減少和人口過多

歐洲各國只有英格蘭是統一管理城鎮和農村的勞工。例如 1563 年或 1662 年的法令在農村和城市教區一律實施，各地官員在全國公平執法。這種情況歸因於農村較早時期已工業化和城市基地隨後的工業化。因此，城鄉的勞工組織沒有管理上的斷層，這與歐洲大陸迥然不同。這再次解釋了勞工在城鄉之間流動不受約束，從而避免歐洲大陸人口的兩大不幸特徵：即是由於農民向城鎮移民而導致農村人口突然減少，以及不能逆轉這過程，把已在城鎮定居工作的移民再次連根拔起。自十九世紀下半以來，勞動人口大舉外流，是中歐農村社會的恐怖現象[198]，但英格蘭的人口流動是在城鄉就業之間來來回回的鐘擺波動。這情況近乎大部份人口一直處於懸而不決的狀態，使國內移民雖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非常困難。另外，這國家到處都有港口，沒有長距離移民的必要，因而在理解全國勞工組織後，〈濟貧法〉的管理可以輕易調節。農村教區經常向在不太遙遠的鄉鎮就業的非常住窮人發放院外救濟，救濟金送到他們的住所；另一方面，製造業城鎮經常救濟沒有在城鎮定居的常住窮人。只有在 1841-43 年非常時期，城市當局才例外實施大規模遷移。按照 Redford 的說法，有 12,628 名窮人被遷出北部的十九個製造業城鎮，其中只有 1%的定居地是在九個農業區內。他也指出幾乎很少遠距離移民，僱主利用城鄉的寬鬆救濟措施維持大部份的後備勞工以供後用。難怪城鄉會同時出現「人口過多」現象，而實際上 Lancashire 郡的製造商在高峰期還要從愛爾蘭引進大量工人，而農場主強調如村裡的窮人都被誘惑移民，莊稼收割期間將不夠人手應付。



〈參考閱讀〉

簡春安〈從典範變遷看社會福利的發展〉

[198] 德文 *Landflucht*

郭家宏〈工业革命与英国贫困观念的变化〉《史学月刊》2009 年第 7 期

第九章

赤貧主義與理想國

貧窮問題以兩個緊密關聯的問題為核心：赤貧和政治經濟學。雖然本書分別探討兩者各自對現代意識的影響，但兩者曾形成不可分割的整體：社會的發現。

直至史賓漢蘭制度時期，對於「窮人來自何處」這問題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但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大體上同意赤貧化和進步是不可分離。John M'Farlane 在 1782 年報告：最多窮人的地方不是貧瘠國家或野蠻民族，而是最富饒和最文明的國度。義大利經濟學家 Giammaria Ortes 在 1774 年提出公理：國家財富與其人口相對應，其不幸與其財富相對應。甚至亞當·斯密也慎重宣稱最富裕國家的勞工工資不是最高的。所以，M'Farlane 認為英國已接近其全盛時期，「窮人數目將繼續增加」[199]，他的意見不是危言聳聽。

況且英格蘭人預言商業停滯只不過是附和廣泛的意見。如 1782 年之前半個世紀的出口增長是顯著的話，那麼貿易的波動更是如此。貿易正開始從把出口數字降低至半世紀前水平的衰退中恢復。對當代人而言，英法七年戰爭（1756-63 年）後貿易巨大擴張和國家繁榮，意味著緊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法國之後的英國也有本身的機會。英國急速崛起已經是過去的事，而且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可以持續進步，因為這僅僅是一場幸運戰爭的結果。現在回看，當時人們幾乎一致認為貿易會衰退。

事實上，繁榮就在不遠處，排山倒海的繁榮註定要成為新生活形式，不僅一國如此，整個世界也如此。但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都沒有絲毫暗示繁榮即將到來。對政治家來說，這可能是無關緊要，因為在兩代人時間，貿易數字急劇上升只是略為減輕大眾的不幸。對經濟學家來說，極其不幸的是他們的整個理論體系是在這「畸形」洪水中建立，其間貿易和生產的龐大增長碰巧與人類苦難龐大增加相伴隨：實際上，Malthus, Ricardo 和 James Mill 的原則所依據的明顯事實，只是反映這明確過渡時期的矛盾性趨勢。

這情況確實令人莫名其妙。英格蘭的窮人首次出現在十六世紀上半葉；隨著個人脫離莊園或「任何封建主子」，窮人變得引人注目；窮人逐漸成為自由勞工階層，是以下兩種情況結合的結果：對流浪行為的殘暴迫害以及培養家庭手工業，後者得助於對外貿易持續擴大。在十七世紀，人們較少提到赤貧化，甚至〈定居法〉的苛刻措施在沒有公共討論的情況下被通過。到了世紀末重提議題時，Thomas

[199] 原註 1：M'Farlane, J.,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Cf. also Postlethwayt's editorial remark in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1757 on the Dutch Poor Law of 7th October, 1531.

More 的《理想國》(1516 年)和早期的〈濟貧法〉已經是一百五十年前的往事;很久以來,人們已忘記解散修道院和鎮壓 Kett 造反的事。有些圈地和「霸佔〔公地〕」行為一直在進行,例如在查理一世統治期間;各新階層的整體已經成形。十六世紀中期窮人突然出現對社會是危險,到了十七世紀末,窮人只是依賴救濟的社會負擔。另一方面,半封建社會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半商業社會,其有代表性的人民是因為喜歡工作而工作,不接受認為貧窮不成問題的中世紀觀點,也不接受成功圈地者的看法,認為失業者是有勞動能力的懶漢。從此以後,對赤貧化的各種觀點開始反映哲學態度,非常類似以前的神學問題。對窮人的看法越來越多反映對總體存在的見解;因此,這些觀點各有不同和看似混亂不清,在文明歷史也是極為重要。

貴格會教徒是探索現代生活可能性的先驅者,最先認識到非自願性失業肯定是勞動力組織某種缺陷的結果。他們堅決相信以做生意的手法辦事,以集體自助的原則幫助本身社群中的窮人;他們偶爾以有良心反對者的身份支付關押窮人的費用而避免支持政府。Thomas Lawson 是熱心的貴格會教徒,在 1660 年發表了〈呼籲國會關注窮人,英格蘭不應有乞丐[200]〉文章作為「平台」,建議設立「勞工交易所」這種現代意義的公共職業輔導中心。作家 Henry Robinson 十年前已發表〈職業諮詢事務處[201]〉的建議。但王政復辟政府喜愛比較呆板的方法;1662 年〈定居法〉的傾向與任何合理的勞工交易制度大相徑庭;勞工交易制度可能建立更廣大的勞工市場;該法案中第一次使用「居住權」這詞語,把勞工限制在教區之內。

1688 年的「光榮革命[202]」之後,信奉貴格會哲理的 John Bellers 成為遙遠未來的社會思想趨勢的名副其實預言者。「受難者會議[203]」當時經常利用統計資料為宗教濟貧政策提供科學準確性;Bellers 在 1696 年提出建立「行業協會[204]」,更好利用窮人的非自願性閒置時間。這不是基於勞工交易所原則,而是非常不同的勞工交易原則。前者與為失業者尋找僱主的傳統概念相關;後者意味著勞工不需要僱主,只要他們的產品能夠直接交易。Bellers 說:「窮人的勞動是富人的寶庫」,質疑窮人為何不能利用這些財富為自己謀幸福,甚至還有富餘?只要勞工組織成為「協會」或企業,就可以集合資源。這就是後來關於貧困問題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不管是 Owen 的「鄉村聯盟[205]」,Charles Fourier 的自給自足的合作社區[206],

[200] *Appeal to the Parliament concerning the Poor that there be no beggar in England* by Thomas Lawson, 1660

[201] *Office of Addresses and Encounters* by Henry Robinson, 1650.

[202] Glorious Revolution(1688-89)是英國和耶教有關的非暴力宮廷政變;信奉新教的政黨聯手推翻信奉舊教的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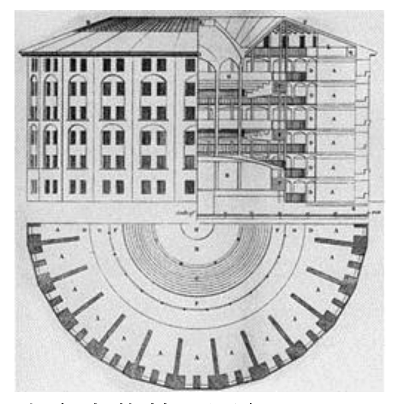
[203] Meeting of Suffering;貴格會在 1675 年成立的關注社會貧困問題的議政團體,至今依然存在。

[204] Colleges of Industry

[205] Villages of Union

[206] 德語 *Phalansteres*

Proudhon 的交易銀行[207]，Louis Blanc 的國立工廠[208]，Lassalle 的國立工作坊[209]，甚至史達林的五年計劃。簡言之，Bellers 的著作包含了自機器在現代社會出現所產生巨大混亂以來與這問題相關的大多數建議。「這協會夥伴關係使勞動而不是金錢成為評價所有必需品的標準…」。設想的方案是「由所有有用行業組成協會，相互幫助，無需救濟…」。把勞動券、自助和合作聯繫在一起是至為重要。以三百人為一組的自給自足勞工，為糊口之計而一起工作，「多勞者另有報酬。」。因此，糊口口糧和勞動所得混合計算。一些小型自助實驗把財政盈餘交給「受難者會議」，用於宗教團體其他成員的福利。這些盈餘注定有偉大的前途；利潤是新概念，是那時代的萬應靈藥。Bellers 的國家失業救濟計劃實際上是由資本家為營利而執行！同年，即 1696 年，商人 John Cary 推動在 Bristol 成立濟貧企業[210]，初期取得少許成功之後未能繼續盈利，其它同類的企業也是同樣命運。Bellers 的建議建基於 John Locke 在 1696 年提出的勞工分配制；Locke 建議按照地稅比例把當地農村窮人分配為納稅人工作。這是 1782 年〈新濟貧法〉實施輪工制[211]的起源。赤貧民要為得到救濟付出代價的概念已深入民心。[212]



正好在百年之後，最多產的社會預言家 Jeremy Bentham 構思計劃大規模利用赤貧民操作由他更具創造天才的兄弟 Samuel 設計的機器為木材和金屬加工。Leslie Stephen 爵士說：「Bentham 和他的兄弟期待蒸氣機的出現。現在他們有機會利用囚犯而不是蒸汽。」這是在 1794 年；Bentham 已多年籌劃圓形監獄（見圖）[213]，設計既便宜而又可以有效管理，他現在決定把這應用於囚犯作業的工廠，只不過是由窮人代替了囚犯。Bentham 兄弟的生意經併入了解決整體社會問題的計劃。1795 年史賓漢蘭地方官員的決定，同年 Samuel Whitbread 向國會提出最低工資草案，尤其首相 William Pitt 在 1796 年私下傳閱的濟貧法改革草案，使赤貧成為政治人物的議題。Bentham 的批評可能促使 Pitt 撤回草案，而 Bentham 於 1797 年在 Arthur Young 出版的《農業年鑑[214]》中提出他本人的精心建議。他的工業大樓[215]是按照圓形監獄的藍圖，有五層高分為十二個分區，是為了利用接受救濟的

[207] Banks of Exchange
[208] 法語 *Ateliers Nationaux*
[209] 德語 *Nationale Werkstatten*
[210] Bristol Corporation for the Poor
[211] Roundsman System：有工作能力的失業者被輪派為農民工作，工資由農民和教區共同承擔。
[212] 原註 1：M'Farlane, J.,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Cf. also Postlethwayt's editorial remark in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1757 on the Dutch Poor Law of 7th October, 1531.
[213] Panopticon；監獄設計如圖所示：環形建築分隔成囚室，一端面向外界採光，另一端面向中間的高塔，高塔的監視人員可以時刻監視到任何囚室，而囚犯因為逆光無法看到監視人員。經多年波折，Bentham 的計劃最終從來沒有落實。
[214] *Annals of Agriculture*
[215] Industry-House

窮人的勞動力；大樓交由設在首都的中央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參照英倫銀行董事會的組織，投資五或十英鎊的股東都有投票權。幾年後發表的文本這樣說：「英國南部的濟貧事務交由一個機構管理，相應開支從一個基金支付。」[216]這管理機構是股份公司，名稱大概是「國家慈善公司」；公司「將建設不少於二百五十幢工業大樓，有大約五十萬住宿者」。連同這計劃是對各類型失業者的詳細分析，Bentham 此舉走在這方面的其他研究之前足足一百年。他擅長分類，把腦袋的現實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最近剛剛丟掉工作的「新失業者」有別於可能因為「暫時停滯」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受「週期性停滯」影響的季節工有別於「被替代的失業者」，例如「因為引進機械而失去工作的失業者」，現代術語稱之為技術性失業；最後一個組群是「被遣散人員」，這是 Bentham 時代由法國戰爭造成的另一類引人注目的失業者。然而，最重要的類別是受「暫時性停滯」影響的失業者，不僅包括生計「依賴時尚」的手藝工匠和藝術家，還包括 「製造業普遍停滯」時更為重要的失業者組群。Bentham 的計劃無異是通過失業人口大規模商業化而平順商業周期。

1819 年，Robert Owen 重新發表 Bellers 一百二十年前提出設立「行業協會」計劃。零星的貧困現象現在已發展成為苦難的急流。他本人的「鄉村聯盟」有別於 Bellers：「鄉村聯盟」規模大得多，由一千二百人和相等的土地畝數組成。包括 Ricardo 這權威人士在內的委員會呼籲人們參加這高度試驗性計劃以解決失業問題。稍後，法國人 Charles Fourier 因為痴想隱名合夥人最終會參加他的公社組織而受人嘲笑；他的計劃概念非常類似同時代最偉大金融家贊助的計劃。Owen 在蘇格蘭 New Lanark 鎮的公司（Bentham 是隱名合夥人）是否已曾因其慈善計劃的財政成功而變得舉世聞名？世上還沒有關於貧困的標準觀點，也沒有從窮人身上牟利的常規方法。



1832 年，Owen 把 Bellers 的勞動券概念應用於他的「國立公平勞動交易所[217]」，以失敗告終。勞動階層與經濟自給自足密切相關的原則（也是 Bellers 的想法），是隨後兩年著名的英國總工會[218]運動的背後動力。當時的總工會是所有行業、工藝和手藝的聯合工會，也不排除小戶師傅，其模糊目標是把以和平的表現方式把他們組成社會主體。誰會想到這是百年之後的暴力「大聯盟[219]」（見圖）的肧胎？工團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各自為窮人制定的計劃

---

[216] 原註 2：Bentham, J., *Pauper Management.* First published 1797.

[217] National Equitable Labor Exchange

[218] Trades-Union，留意不是個別工會 trade union。

[219] One Big Union 是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概念，工會人士希望團結工人以解決勞工問題，尤以「世界勞工組織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最熱衷推動。（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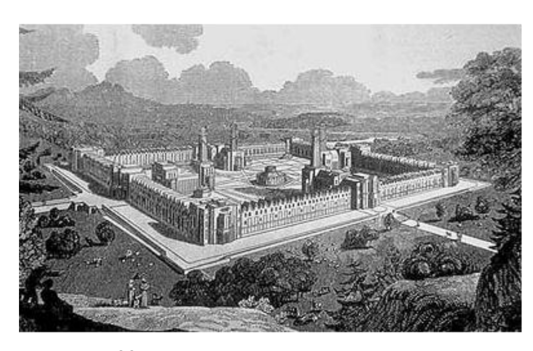
上實際上幾乎沒有分別。1848 年 Proudhon 的「交易銀行」是哲學無政府主義[220]第一項實際業績，基本上衍生自 Owen 的實驗。馬克思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嚴厲抨擊 Proudhon 的想法；此後是由國家為這類型的集體主義計劃提供資本，Louis Blanc 和 Lassalle 的集體主義計劃已塵歸歷史。

從赤貧民身上賺不到錢，其經濟原因應該是顯而易見。一百五十年前，笛福[221]在 1704 年出版的小冊子終止 Bellers 和洛克發起的討論。笛福堅持如窮人得到救濟，他們就不會為工資而工作；如他們在公共工廠從事製造勞動，只會為私營製造業造成更多失業。笛福〔就社會問題出版了很多小冊子〕的小冊子有一些的題目很嚇人：〈發放救濟不是慈善，僱用窮人是國家的悲哀[222]〉，之後還有荷蘭醫生 Bernard Mandeville 的著名詩集《蜜蜂的寓言[223]》談到聰明蜜蜂的社會繁榮只是因為這鼓勵了虛榮和忌妒以及邪惡和浪費。這位怪醫沉湎於膚淺的道德悖論，笛福這位小冊子作者卻擊中新政治經濟學的要害。笛福的文章很快在「低級政治[224]」圈子之外被遺忘，但 Mandeville 的粗淺悖論吸引到 Berkeley, Hume 和 Smith 這些有識之士。顯然在十八世紀上半葉，流動財富依然是道德問題，而貧窮問題不是。清教徒階層對明顯浪費的封建形式感到震驚，他們的良知斥責這種浪費為奢侈和罪惡；他們不情不願地贊同 Mandeville 關於蜜蜂的說法，只是因為希望那些罪惡的商業和貿易很快會衰退。後來，這些富有商人的商業道德得到保證：新棉紡廠不再迎合無謂擺闊，而是滿足樸素的日常需要，浪費形式在暗地裡形成，不再如前明顯，卻比老一套更為浪費。笛福對救濟窮人的嘲笑還不足以穿透那些全神關注財富的道德危險的良心；工業革命還沒有到來。不過，笛福的悖論預測了將要來臨的種種困惑：「發放救濟不是慈善」，因為消除了饑餓的鋒芒，生產活動受到阻礙，只會造成饑荒；「利用窮人是國家的悲哀」，因為創造公營就業機會只會令市場的物資過剩，加快私營貿易商的破產。大約在十七世紀之初，在 Bellers、貴格會教徒和那位趨炎附勢的記者笛福之間，在聖人和憤世嫉俗者之間，提出了這些問題；要經歷二百多年的工作和思考、希望和折磨，才費盡力氣找到答案。

但是在史賓漢蘭制度時期，人們仍不理解赤貧的真正性質。人們一致同意人越多越好，因為國家的力量在於人。人們也欣然同意廉價勞工的好處，因為勞動力便宜，製造業才能興旺發達。另外，若沒有窮人，誰會開船和打仗？也有人懷疑赤貧是否完全的壞事。無論如何，為什麼赤貧民不能被公營機構利用賺錢，一如他們為私營機構創造利潤？對這些問題，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笛福偶然發現的真理，七十年後的亞當·斯密可能理解，也可能不理解；市場體系的未開發狀態隱

[220] philosophical anarchism
[221] Daniel Defoe (1660 – 1731)；名著《魯賓遜飄流記》的作者，也是社運份子。
[222] *Giving Alms no Charity and employing the Poor a Grievance to the Nation*
[223]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1705*。《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 公众的利益》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224] inferior politics，十八世紀把社會問題和社會政策稱之為低級政治。

藏著其內在弱點。沒有人完全理解新財富和新貧困。



貴格會教徒 Bellers、無神論者 Owen 和功利論者 Bentham 各有不同思想，但他們的計劃卻令人驚奇的一致，說明以上的問題還在蝶蛹待變時期。Owen 是社會主義者，熱忱相信人人生來平等，天生權利也是平等；而 Bentham 鄙視平均主義，嘲笑人權，非常傾向自由放任。Owen 的「平行四邊形村莊[225]」（見圖）與 Bentham 的「產業大樓」是如此相似，以致人們記起他受到 Bellers 影響之前，可能以為他是完全被「產業大樓」啟發。這三位人士全都相信適當組織失業者的勞動肯定會產生盈利：人道主義者 Bellers 希望是為了救濟其他受難者；功利自由主義者 Bentham 希望交由股東處理；社會主義者 Owen 希望把事業交還失業者。他們之間的差異僅僅顯露了未來裂痕的幾乎難以察覺的徵兆，他們共同的錯覺卻揭示了他們徹底誤解新生市場經濟中赤貧化的性質。比他們之間的差異更為重要的是在此期間窮人數目一直持續增加：1696 年當 Bellers 寫作時，地稅救濟金約為四十萬英鎊；1796 年 Bentham 強烈反對 Pitt 的草案，已超過二百萬英鎊；到 1818 年 Owen 開始行動時，已接近八百萬英鎊。從 Bellers 到 Owen 的一百二十年間，人口可能增加了三倍，而救濟金卻增加二十倍。赤貧化已成為險惡的徵兆，但沒人猜透含意。



[225] parallelogram。Owen 提出「把世界分成村莊，每村有三百至二千人進住，各人獲分配半畝到一畝半土地；村內民居以平行四邊形排列，有共用廚房，食堂，學校和禮拜場所；各人放棄個人主義，要為共同利益工作。」（插圖）

第十章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發現

人們認識貧困的意義時，十九世紀已做好準備。分水嶺大約是 1780 年。亞當·斯密的偉大著作認為濟貧不是問題；但十年後 Townsend 的《濟貧法論述》把濟貧提升為重要議題，在此後一百五十年一直困擾人們的思想。

從亞當·斯密到 Townsend 的氛圍變化確實引人注目。前者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那是由 Thomas More 和馬基雅弗利[226]，馬丁路德[227]和 John Calvin 開創的國家年代；後者屬於 Ricardo 和黑格爾從相反角度發現了社會存在的十九世紀；社會不服從國家的規律，相反，國家服從社會的規律。誠然，亞當·斯密把物質財富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他以極大的現實主義而為之，所以成為一門新科學（即經濟學）的奠基人。對他而言，財富只是社會生活的一方面，其用途是服從社會；財富是歷史上各國爭取生存過程的附屬物，不能與國家分離。依照他的觀點，支配國家財富有一組條件源自整個國家的進步、靜止或衰退狀態；另一組條件源於國家安全穩定以及勢力均衡的需要；還有一組條件取決於政府偏袒城市或鄉村、工業或農業的政策。因此，他認為只有在既定的政治框架內才可以闡述財富的問題，他的意思是「廣大民眾」的物質福祉。他的著作沒有透露資本家的經濟利益為社會制定法則，也沒有透露資本家代表管治自成一體經濟世界的上天在世俗發言。在他而言，經濟範疇還沒有本身法則可以作為善與惡的標準。

亞當·斯密打算把各國的財富視為該國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函數；所以他的海軍政策與 Cromwell 的 1651 年《航海法則[228]》是如此契合，而他的人類社會觀念與 John Locke 的天賦權利論是如此和諧一致。在他看來，沒有什麼指出社會的經濟範疇可能成為道德法則和政治責任的源頭。自利行為只會促使人們做出本質上也會有利他人的事情，就像屠夫的自利行為最終為他人提供菜肴。斯密的思維是廣泛的樂觀，因為支配世界的經濟部份其法則是和人類命運共鳴，支配其餘事物的法則也是如此。沒有無形之手試圖以自利之名把自相殘殺的習俗強加人類。人的尊嚴是有道德的人的尊嚴，因此人是家庭、國家和「偉大人類社會」公民秩序的成員。理性和人性為零星行為設定界限；競爭和獲利必須讓位給理性和人性。依據人類的內在精神原則就是「自然」；依據這些原則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亞當·斯密有意識把物質意義的「自然」排除在財富問題之外。「無論任何國家的土地、氣候或領土範圍如何，其每年的供給是豐富或不足，必然在特定情況下肯定取決於兩個條件，」即是勞工的技能和社會上有用成員和閒散人員的比例。沒有自然

[226] Machiavelli
[227] Martin Luther
[228] Navigation Laws

因素，只有人的因素。他故意在書的開始部份排除了生物和地理因素。重農主義者的謬論對他起了警示作用；他們偏好農業，致使他們混淆了物質的本性和人的本性，並促使他們強辯只有土地才真正具創造力。斯密的思想沒有歌頌自然之理。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人文科學，應該研究什麼是人的本性，不是「自然」的本性。

十年後的 Townsend《濟貧法論述》集中討論山羊和狗的定理。場景是智利海岸之外的太平洋魯賓遜島。Juan Fernandez 登陸島上，放養了一些山羊，以便日後重臨時有肉可吃。山羊以驚人速度繁殖，成為騷擾西班牙貿易的武裝民船（主要是英國人）的便利食品儲備。為了消滅山羊，西班牙當局在那裡放養公狗母狗各一，這兩隻狗日後也大量繁殖，減少了它們以之為食的山羊數量。Townsend 寫道：「然後恢復了新平衡。兩個物種的最弱者最先成為自然債務的犧牲品；最活躍和最健壯的保存了性命。」他又補充：「食物的數量控制了人類物種的數目。」

搜索資料[229]，找不到可以證明上述故事的證據。Juan Fernandez 確實在某時候放養了山羊；但據 William Funnell 的描述，傳說中的犬隻是美麗貓兒，而且據說狗或貓都沒有繁殖；山羊棲息在難以接近的岩石，而沙灘滿是肥胖海豹（所有的報告都是一致），這些胖傢伙更可能成為野狗的獵物。不過，範式並不依賴實證支持。沒有古文物研究的真實證明，絲毫沒有影響 Malthus 和達爾文受到這故事的啟發：Malthus 從 Condorcet 知道這故事，而達爾文是從 Malthus 得知。若不是 Townsend 從山羊和狗的故事得到如下的箴言並希望應用到濟貧法改革，達爾文的天擇論[230]和 Malthus 的人口法則都不可能對現代社會產生任何重大影響。Townsend 說：「饑餓會馴服最兇猛的動物，教導最墮落的人學會體面和禮貌、順從和臣服。通常，只有饑餓能驅使和刺激他們（窮人）勞動；但我們的法律聲言他們決不會挨餓，也必須承認法律提及他們會被迫要工作。不過，法律制約帶來許多麻煩、暴力和吵鬧，令人憎惡，決不能產生為人接受的好服務；而饑餓不僅是平和、無聲、持續的壓力，而且作為生產和勞動的最自然動機，饑餓驅使人盡全力；一旦受惠他人慷慨解囊，這是善意和感恩的持久和可靠的基礎。奴隸肯定要強制工作。但自由人應該自行考慮和判斷，應保護他全面就業，無論多少；當他侵犯鄰居的財物時應受到懲罰。」

這是政治學的新起點。Townsend 從動物方面理解人類社會，繞過了所謂無法避免的政府基礎問題，從而把新的法規概念引入人類事務，即是大自然法規。Thomas Hobbes[231]的幾何學偏見，以及 Hume、Hartley、Quesnay 和 Helvetius 等

---

[229] 原註 1：Cf. Antonio de Ulloa, Wafer, William Funnell, 以及 Isaac James（包括 Captain Wood Rogers 對 Alexander Selkirk 的描述）和 Edward Cooke 的觀察。

[230]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231] 霍布斯 (1588 – 1679)，政治哲學名著《利維坦 *Leviathan*》作者，偏好幾何學，認為是尋找真理的途徑，可惜這方面學藝不精。

人在社會尋求牛頓定律都只是比喻性：他們全都渴望要發現普遍的社會規律，一如大自然世界的萬有引力定律，但他們想到的是人類的定律，例如 Hobbes 的恐懼心理力量，Hartley 的心理學聯想、Quesnay 的自利或 Helvetius 對功利的探索。這沒有什麼神經過敏：Quesnay 像柏拉圖一樣偶爾採用飼養者的觀點看人間事物，亞當·斯密肯定沒有忽視實際工資與勞工長期供應之間的聯繫。然而，亞里士多德曾教導只有諸神或野獸能夠在社會之外生活，而人不是神也不是野獸。耶教思想認為人與野獸之間的區別也是構成的；生理學現實領域的研究不可能混淆人類共和國精神根源的宗教意義。對 Hobbes 而言，如人是狼，那是因為人在社會之外表現像狼，而不是因為人與狼之間存在任何共同的生物性因素。最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還沒有設想到有任何人類社會是沒有法律和政府。但是在 Juan Fernandez 的島上，沒有政府也沒有法律，山羊和狗之間卻依然保持平衡。平衡得以維持，一方面是因為狗沒有辦法吃掉那些逃往島上岩石險峻地帶的山羊，另一方面是山羊克服了種種不便以躲避狗的捕食。那種平衡無需政府維持；是一陣陣的饑餓和食物不足恢復了平衡。Hobbes 曾主張要有暴君，因為人就像野獸；Townsend 堅持人實際上就是野獸，而正因如此所以只需要最小限度的政府。依照這種嶄新的觀點，自由社會可以當作是由兩類人組成：有產者和勞動者。後者的數目受到食物量的限制；只要財產是安全的，饑餓就會驅使他們去工作。無需地方治安官員，因為饑餓比他們更能維持紀律。Townsend 尖銳地指出，懇求治安官員插手即是「強者懇求弱者。」

新基礎與正在浮現的社會密切吻合。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國家市場一直在發展；穀物價格不再是地方性，而是地區性；這預示幾乎是普遍使用貨幣以及貨品有廣泛的市場可能性。市場價格和收入，包括租金和工資相當穩定。重農主義者首先注意到這些規律，但在封建收入依然流行的法國、勞工往往是半奴隸性，以至租金和工資通常都不是由市場決定，所以重農主義者甚至無法把這些規律整理成為理論。但在亞當·斯密時代的英國鄉村已經成為商業社會的部份，地主的租金和農業勞工的工資明顯依賴價格。只有在例外情況才由政府機構限制工資或價格。在這奇怪的新秩序下，舊的社會階層卻繼續多多少少維持先前的階級，儘管他們的合法特權和限制已經消失。雖然沒有法律限制勞工要為農戶幹活，也沒有法律迫使農戶讓地主過好日子，但勞工和農戶還是似乎在這種壓力之下生活。什麼法規命中註定勞工要服從沒有法定責任的主人？什麼力量把社會各階層分開，好像彼此是不同人種？什麼維繫這人類社會的均衡和秩序，無需動用或甚至容忍政治性政府的干預？

山羊和狗的範式似乎提出答案。人類的生物特性似乎是沒有政治秩序的社會的既定基礎。因此，當前的經濟學家放棄了亞當·斯密的人道主義基礎，轉而採納 Townsend 的論點。Malthus 的人口論和 Ricardo 的遞減回報法則使人口繁衍和土地肥力成為新發現領域的的組成要素。經濟社會已形成與政治國家有別。

就十九世紀思想史而言，這人類集體存在的環境（複雜社會）明顯極其重要。因為浮現的社會就是市場體系，人類社會面臨的險境是從迄今以政治實體為部份基礎的道德世界轉至完全陌生的基礎。赤貧化問題顯然難以解決，正迫使 Malthus 和 Ricardo 贊同 Townsend 對自然主義的沉緬。

Burke 從公共安全的角度探討赤貧化問題。西印度群島的環境令他確信如不為白人主子提供任何安全保障措施，培育大量奴隸人口是危險的，尤其是在黑人經常被允許帶有武器。他認為同樣的考慮也適用於國內失業人口增加，因為政府根本沒有警力可用。雖然他是不折不扣的家長制傳統的擁護者，但也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熱情信徒，因為他看到對付迫在眉睫赤貧化管理問題的答案。地方管理機構很樂意看到棉紡廠對貧困兒童的意外需求，而兒童的學徒問題留給教區處理。成百上千與生產商簽訂契約，而工廠往往是在偏遠地區。新城鎮需要大量赤貧民；工廠甚至願意支付窮人。成年人被分配到任何願意養活他們的僱主，一如被輪流分派到教區內農場當雜工。外派窮人比管理「無罪的監獄」節省成本；這是貧民習藝所的別稱。從管理的角度看，這意味著「僱主有更貫徹而細緻的權力[232]」，取代了政府和教區強制〔勞工〕工作的職能。

顯然，這涉及治國之道的問題。如教區向資本主義企業家外派有工作能力的〔失業者〕，而資本家又願意支付工資，為何窮人要成為政府的負擔，要由教區養活？這豈不是清楚表明，除了教區方案，還有更便宜的方法促使窮人掙錢養活自己？答案在於廢除伊莉莎白濟貧法，無需以其它法律代替。無需評審工資，無需救濟有工作能力的失業者，也沒有最低工資或保障生存權利。處理勞工就要正視勞工是在市場尋找自身價格的商品。商務邏輯是自然法則，因此也是上帝的法則。當軟弱的地方官員向較強者求助，太平紳士求助於饑餓，還會是什麼別的？對政治家和管理人員而言，「**自由放任**[233]」只是保證法律和秩序的原則，而且成本和著力最少。就讓市場負責養活窮人，事情將會水到渠成。正是在這一點，理性主義者 Bentham 與傳統主義者 Burke 彼此意見一致。痛苦和快樂的要求不要造成任何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饑餓可以解決問題，就無需任何別的痛苦。「法律能為生計做些什麼？」Bentham 的回答是：「沒法直接做什麼。」[234]。貧困是「大自然」在社會掙紮求存，其具體約束就是饑餓。「具體約束力量夠大，就業的政治約束可能是多餘。」[235] 所需的一切只是「科學而又經濟」地對待窮人。[236]Bentham 強烈反對 Pitt 的〈濟貧法草案〉，草案等同把史賓漢蘭制度變成法律，因為這允許院外救濟和工資補貼。但 Bentham 與他的學生不同，他當時既不是堅定的經

[232]原註 2：Webb, S. and B.,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Vols. VII-IX, "Poor Law History."
[233] *laissez-faire*
[234] 原註 3：Bentham, J.,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Ch. 4. (Bowring, Vol. I, p. 333.)
[235] 原註 4：Bentham, J., *ibid.*
[236] 原註 5：Bentham, J., *Observation on the Poor Bill,* 1797

濟自由主義者也不是民主主義者。他的「行業大樓」是虛假科學管理實行細緻實際管理的惡夢。他堅持計劃總是必要的，因為社會對窮人的命運不可能無動於衷。Bentham 相信貧困是繁榮的部份。他說：「在社會繁榮的最高階段，大多數平民除了日常勞動之外沒有極少的其它財富，因此總是瀕臨貧困…」所以他建議「應定期對貧窮的需求提供援助」，他遺憾地補充：「理論上，需求減少，損害了工業」，因為從效益主義角度看，政府的任務就是增加需求，以加強饑餓的具體約束效力。[237]

讓大多數老百姓瀕臨貧困作為繁榮最高階段的代價，涉及非常不同的人文態度。Townsend 通過沉緬於偏見和情感主義而糾正他的情感平衡。人窮志短是自然規律，否則卑屈、骯髒的和不體面的工作沒人去幹了。如果不依賴窮人，祖國會變成什麼樣子？「因為除了苦難和貧窮，有什麼能能迫使下層人民面對暴風海洋和戰場的一切可怕？」但這樣的粗疏愛國主義展示依然為更細膩的情感留下空間。濟貧措施當然應該徹底取消。〈濟貧法〉「始於近乎荒謬的原則，聲稱要完成本質和世間組織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若是把窮人交付富人的憐憫，誰能夠懷疑「唯一的困難」只是限制後者仁愛之心的衝動？慈善的情感不是遠比嚴格法律責任的情感更加高貴？他高呼「大自然之中能否有比仁慈的溫和滿足感更美？」，並比對鐵石心腸的教區救濟沒有「直接表達對意外恩惠的真誠感激」情景。「當窮人不得不與富人為友，富人決不會希望減輕窮人的苦難…」。讀過《兩個民族[238]》對生活細節的動人描述，沒人會（下意識）懷疑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是從山羊和狗的島上學會情感教育。

Edmund Burke 是不同境界的人。Townsend 這樣的人有少許失誤，他卻犯下大錯。他的天賦把殘忍的事實表彰為悲劇，情感上添上神秘的光環。「當我們假裝可憐那些必須勞動的窮人，否則世界無法存在，我們是在輕視人類的情況。」這無疑好過粗俗的漠不關心、空洞的悲歎或同情心高漲的偽善之言。但這現實態度的雄渾氣度，卻因強調貴族統治地位時的微妙滿足感而打了折扣。結果是要比希律王[239]*還要希律王，但低估了及時改革的機會。公正的猜想是如果 Burke 還活著，1832 年打算結束古代統治的〈國會改革草案[240]〉可能獲得通過，但付出不可避免流血革命的代價。不過，一旦政治經濟的法則註定人民要在不幸中掙扎，Burke 可能反駁：平等的概念不就是殘酷地引誘人類走向自我毀滅？

Bentham 不是 Townsend 那種圓滑的自滿，也不是 Burke 的過份沉溺的歷史主義[241]。他相信理性，改革新發現的社會規律領域似乎是效益主義實驗夢寐以求的無

[237] 原註 6：Bentham, J.,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p. 314.

[238] Benjamin Disraeli 的 1845 年小說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記述英格蘭勞工的苦難。

[239] King Herod：以殘暴著稱的猶太國王。

[240] Parliamentary Reform Bill

[241] historicism，必須研究與解釋人類歷史發展才能認真了解社會與政治。「人類歷史」的意思是

人境地。他一如 Burke 拒絕**動物性決定論**[242]，也拒絕經濟學優於正當政治學。雖然他是《論高利貸[243]》和《政治經濟學手冊[244]》的作者，但他是經濟學的業餘愛好者，甚至沒有提出效益主義[245]對經濟學的重大貢獻，即是價值來自效益。他反而被聯想心理學促使成為有無窮想像力的社會設計師。他認為「自由放任」只是社會機械的另一工具。工業革命的智慧主要動力是社會創新，不是科技創新。過了整整百年，當工業革命早已結束之後，自然科學[246]才對工程學作出決定性貢獻。在機械學和化學這些新的應用科學發展之前，對橋樑或運河的實際建造者以及機器或發動機設計師而言，一般自然規律的知識是完全無用。Telford 是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的創始人和終身主席，拒絕接納物理學學者成為會員；據 David Brewster 爵士所言，他從不學習幾何學原理。自然科學的勝利在真正意義上是屬於理論性，其實際重要性沒法與當時的社會科學[247]相比。科學的聲譽高於常規和傳統，是因為自然科學的地位因為與人文科學[248]的聯繫而大大提升；對此我們這代人認為難以置信。發現經濟學是驚人的意外，大大加速了社會變革和建立市場體系，而具決定性影響的機器卻是那些目不識丁的工匠發明。因此，可以公正又恰當地指出社會科學應當是機械革命的智慧之源，不是自然科學；機械革命把自然力量置於人類控制之下。

Bentham 認為他發現了一門新社會科學，即是道德倫理和立法，這將建基於效益原則，借助聯想心理學以精確計算。十八世紀英格蘭認為「科學」是以經驗知識為基礎的實用技術，正是由於科學在人文事務的範疇內變得有效。對這樣的務實態度的需求頗為勢不可擋。由於沒有統計資料，往往不可能指出人口增加或減少、外貿平衡的趨勢如何、那個人口階層取得優勢。人們往往只能猜想國家財富增加或減少，窮人來自何處，信貸、銀行或利潤的情況如何。「科學」最初是以實證方法解答這些問題，而不是純粹猜測或古文物研究；而由於實際利益很自然是重要，所以科學要提出如何控制和組織新事物的龐大領域。歷史見證了聖徒對貧困的本質感到困惑，又聰明地實驗自助形式；利潤的概念曾被歡呼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貧困是好還是壞的徵兆，眾說紛紜；科學性質的貧民習藝所管理層

「人類發展」，不是「記錄往事」。

[242] zoological determinism，也稱為「生物性決定論」，認為人的本性和行為是演化而來，基調是「人性本惡」，如不受社會制約，受基因支配的行為必然禍及他人。

[243] *Essay on Usury*

[244]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45] utilitarianism

[246] 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學是研究大自然中有機或無機事物和現象的科學，包括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地球科學、生物學等等。

[247] Social sciences 社會科學以科學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如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政治學研究政治、政策和有關的活動，經濟學研究資源分配，還包括法學、犯罪學、哲學、生物學、地理學、醫學、教育學、心理學、語言學、倫理學、藝術、社會工作學及法律學等等，與人文科學有重疊，因此有時統稱為「社會人文科學」。

[248] Human sciences 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哲學、文學、藝術、歷史、語言等）和知識的總稱。

發現無法利用窮人創造財富而感到困惑；Owen 以良知慈善事業運作他的工廠而致富；還有許多其它實驗似乎運用了同樣的啟蒙性自助原則，但都令人惋惜地失敗，善心的發起人陷於悲慘的困惑。如果把視野從赤貧問題擴大到信貸、鑄幣、壟斷、儲蓄、保險、投資、公共財政以及監獄、教育和彩票業等方面，可能每項都容易引出許多相關的新類型探索。

這時期大約在 Bentham 去世時結束[249]；自 1840 年代，在世的計劃者只是特定風險事業的推手，而不再去探討所謂互惠、信任、風險以及人文事業的其它要素這些通用原則的新應用方法。從此以後，商人以為知道業務活動應採取什麼形式，在成立銀行之前極少考慮資金的性質。當時的社會設計師每每是怪人或騙子，也經常被投入監獄。從 Paterson 和 John Law 到 Pereires 的工業和銀行體系曾積極推動各樣宗教、社會和學術宗派項目短暫泛濫股票交易所，現已變成只是細流。負責日常事務的不再如前重視分折意見。至少有人認為社會的探索已經終結，人類的地圖已沒有空白點。百年之內不可能出現 Bentham 那樣的人。一旦工業活動的市場體制成為主導，所有其它體制領域都附屬這模式；社會的人為計劃的天才也失去歸宿。

Bentham 的圓形監獄，不僅只是「把無賴磨練成誠實的人、把懶漢磨練成勤勞的人的工廠」[250]，也像英倫銀行一樣支付股息。他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改善專利制度；有限責任公司；十年一次人口普查；建立衛生部；促進儲蓄普遍化的有息票據；蔬果低溫儲藏室；按新科技原則建立軍工廠、最終由囚犯或者接受救濟的窮人運行；設立文摘日校向社會中上階層教授效益主義；公共會計制度；房地產登記制度；公共教育改革；制服登記；消除高利貸；放棄殖民地；採取避孕措施降低窮人比例；通過股份公司把大西洋和太平洋連接；以及其它建議。這些建議有一些計劃確實可能帶來小小進步，例如「行業大樓」集合多項基於聯想心理學成就的創新，以改善和利用人的勞力。雖然 Townsend 和 Burke 把自由放任扯上**立法無為主義**[251]，但 Bentham 認為這無阻改革浪潮。

Malthus 在 1798 年曾回答 William Godwin 的問題，答案成為古典經濟學的正式起點，但在討論之前先回顧當年的情況。Godwin 的《政治正義[252]》是要反駁 Burke 的 1790 年著作《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253]》。Godwin 的著作面世正好在鎮壓風潮之前，風潮始於 1794 年暫時中止人身保護狀[254]和迫害民主「通訊會社[255]」。當時

[249] 原註 7：1832.
[250] 原註 8：Stephen, Sir L.,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1900.
[251] legislative quietism
[252] *Political Justice*
[253]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254] habeas corpus
[255] Correspondence Societies。通訊會社在 1792 於倫敦成立，主張議會改革，特別是擴大工人階級的代表性。會社反對與法國開戰，因而被政府鎮壓，後來通過擴大〈叛國法〉以法律手段禁

英格蘭正和法國交戰，那恐怖時代令「民主」一詞成為社會革命的同義詞。Richard Price 在 1789 年發表的《愛國論述[256]》禱辭奠定英格蘭民主運動，到 1791 年 Paine 的《人權論[257]》達到文學高點，民主運動一直局限在政治領域，沒有提到貧苦勞工的不滿；只有鼓吹全民選舉和國會任期一年的小冊子略有提及濟貧法問題。但實際上地主階級的決定性對抗手段（即史賓漢蘭制度）是在〈濟貧法〉的範圍內。教區退縮到人為的泥沼，其幌子一直維持到滑鐵盧戰役之後二十年。1790 年代那場政治鎮壓的驚惶失措行動其有害後果（如只是獨立事件）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史賓漢蘭制度引起的退化過程卻留下了抹不去的污點。這制度把地主階級統治延長四十年，代價是犧牲了平民的活力。Mantoux 說道：「當有產階級抱怨濟貧稅越來越重，他們忽略了這實際上是革命保險；勞工接受了少量補貼，沒有認識到部份原因是本身的合法收入減少了。因為補貼無可避免把工資壓低到最低水平，甚至壓低到工薪階層不能更低生活需要的水平之下。農場主或生產商依靠教區補足工資與工薪階層最低生活需要之間的差距。他們為什麼要支出一筆容易轉嫁納稅人的費用？另一方面，收取教區救濟的人願意為較低工資工作，那些沒有教區救助的人失去了競爭力。由此而起的矛盾結果是所謂「濟貧稅」對僱主而言是節省開支，對不指望公共救濟的勤勞勞工而言是損失。因此，利害關係的無情相互作用將仁愛的法律變成鐵鑄枷鎖。」[258]

本書以為新工資法和人口規律就是建基於這枷鎖。Malthus 和 Burke 和 Bentham 都強烈反對史賓漢蘭制度，主張完全廢除〈濟貧法〉。他們沒有料到史賓漢蘭制度會把工資壓到最低生活需要水平和這水平之下；相反，他們預期這會推高工資，或至少人為地維持原況；若不是有〈反結社法〉，情況可能是這樣。這錯誤的期望有助解釋他們未能把農村的低工資水平追溯至史賓漢蘭制度這實際原因，而是視為所謂工資法則作用的不可逆轉證明。下文討論新經濟科學的基礎。

Townsend 的自然主義無疑並不是政治經濟學這門新科學的唯一可能基礎。經濟社會之存在，見諸價格的規律性，而收入的穩定性依賴那些價格；因此，經濟規律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建基於價格。促使正統經濟學在自然主義中尋找基礎，是大量生產者另一令人費解的不幸；就今天所知，這樣的情況不可能源於舊市場的規律。但當代人看到的大概是這樣的事實：過往勞工一直習慣活在貧窮邊緣（如考慮到習慣標準不斷變化的水平，至少是這樣）；自機器出現，勞工肯定未有上升至糊口水平之上；既然經濟社會最終成形，不容置疑的事實就是數十年來勞苦大眾物質水平實際上即使沒有變壞也沒有改善。

止會社，但會社的思想影響了後來的議會改革法案和憲章主義。

[256]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Price 於 1789 年在倫敦老猶太人街會議室發表演講，因此也稱為 Old Jewry 禱辭。

[257] *The Rights of Man*

[258] 原註 9：Mantoux, P. 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28.

如這些事實的充份證據似乎指向一個方向，那麼這就是工資的鐵打法則；這法則聲言是法律導致勞工僅堪糊口的最低水平工資，這法律把工資壓得如此之低，以至不可能有其他標準。這假象當然是誤導，而且從資本主義的任何價格和收入的嚴格理論角度來看，這幾近荒謬。不過，歸根到底，正是由於這虛假外表，工資法則不可能是基於人類行為的任何理性規則，而是必須來自人類繁衍和土地肥力的自然事實；Malthus 的人口論和收益遞減定律已說得清楚。正統經濟學基礎的自然主義要素主要是史賓漢蘭制度造成的環境所導致。

這引伸而來的是 Ricardo 和 Malthus 都不瞭解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直至《國富論》百年後出版才清楚認識在市場制度下，生產要素是產品的組成部份；隨著生產增加，生產要素的絕對份額必會上升。[259] 雖然亞當·斯密在價值的勞動力源頭方面曾錯誤跟隨 Locke 的觀點，但他的現實主義感挽救了他，沒有一直錯下去。因此，他曾經混淆了價格的要素，但同時又正確堅持如社會大多數是窮人，社會不可能繁榮興旺。我們現在認識的公理在他的時代卻是悖論。斯密本人的觀點認為普遍的繁榮必然惠及所有人；如社會越來越富有，人民不可能越來越窮。遺撼的是此後很長時間的事實沒有證明他的觀點；理論家要解釋事實，所以 Ricardo 進而提出：社會越進步，越難取得食物；地主越富有，資本家和工人都受剝削；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利益誓不兩立，但這種對立最終無效，因為工人的工資永遠不會超出糊口水平，而利潤必然枯萎。從鬆散意義來看，所有這些說法都有一些正確元素，但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解釋，這些說法既不真實又艱深難懂。然而，事實本身是建基於矛盾的模式，即使時至今日依然難以澄清。科學體系的作者聲稱是從人的行為導出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不是動植物的行為；但毫不奇怪他們要引用動植物繁殖作為天外救星[260]。

下文簡述經濟理論的基礎是在史賓漢蘭制度時期奠定及其後果：看來是競爭性市場經濟體系其實是沒有勞工市場的資本主義。

首先，古典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基本上是混亂不清。財富與價值的對稱導致 Ricardo 經濟學幾乎每方面都出現最令人困惑的假問題。亞當·斯密留下的**工資基金理論**[261]帶來無限誤解。除了一些有深度洞識的特殊理論，例如租金、稅收和外貿方面，理論只是無望地試圖得出一些定義不嚴格的術語試圖得出分類結果；價格的表現、收入的形成、生產過程、成本對價格的影響、利潤、工資以及利息的

[259] 原註 10：Cannan, E., *A 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 1930.

[260] *deus ex machina* 天外救星是意料之外、突然和牽強的解圍角色、手段或事件。源出希臘戲劇往往以天外救星突然出現來為情節或場面解困。

[261] wage-fund theory，理論指出企業的產出在各個生產要素之間的分配。工資基金代表當年度的產出被僱主（地主與資本家）用來購買來年生產所必須的勞力，其多少（即工資的多少）視乎雇主可使用的產出多少而定，因此工資率即是指可用的工資基金除以就業人口。這理論與 Malthus 人口論結合，認為長此以往，人口不斷增加，以這種方式建立的工資水平必須至少維持在生計水平以上。（參考資料）

水平；有了術語解釋，但大多數依然模糊不清。

其次，由於問題出現的既定情況，不可能有其它結果。沒有一個統一體系能夠解釋這些事實，因為這些事實沒有形成任何體系的部份，而實際上卻是兩個彼此排斥的體系對社會同時作用的結果；一個是初生的市場經濟體系，另一個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即勞動力）範疇內的家長式管制主義。

其三，古典經濟學家偶然發現的答案對理解經濟社會的性質具有最深遠的後果。隨著人們逐漸領會，那些支配市場經濟的規律被視為是在大自然權勢之下。遞減回報定律是植物生理學的規律。Malthus 人口論反映了人口繁殖與土地生產力之間的關係。兩種情況都是大自然的力量發揮作用：動物的性本能和植物在既定土地上的生長。此處涉及的原則類似 Townsend 的山羊和狗例子：人類的繁衍不可能超出食物供給量所確定的自然界限。像 Townsend 一樣，Malthus 得出的結論是多出來的會被殺死；山羊被狗吃掉，狗肯定也因為食物不足而挨餓。Malthus 認為壓迫性控制在於多餘的被殘忍的自然力量消滅。除了饑餓，人類會死於其他：戰爭、瘟疫和罪行這些等同大自然毀滅性力量的因素。嚴格來說，這涉及一個矛盾論點：社會力量要實現大自然要求的平衡；Malthus 對這批評的回答可能是：在沒有戰爭和罪行的美善社會，和平的美德挽救了許多生命，但同樣有等同數目的人挨餓。從本質上來說，經濟社會是建基於大自然的無情現實；如人違背管治社會的規律，倒下的劊子手會扼殺那些短視人類的後代。競爭性社會的法則受到森林法則的制裁。

直至那時才清晰顯示折磨眾生的貧困問題其真正意義：支配經濟社會的法則不是人的法律。亞當·斯密與 Townsend 之間的裂隙已擴大為深谷，出現了標誌著十九世紀意識誕生的**兩分法**[262]。從此自然主義縈繞著人類的科學；社會與人類世界重新結合，成為社會思想演化孜孜以求的目標。依據這樣的論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失敗了，未能達成這目標；失敗的原因在於馬克思過份恪守 Ricardo 和自由經濟學的傳統。

古典經濟學家不是沒有意識到有這樣的需求。Malthus 和 Ricardo 對窮人的命運絕不是漠不關心，但他們的人道關懷只是把錯誤理論逼上更折騰的道路。工資的鐵打法則有著名的保留條款：勞動階層的習慣性要求越高，生計線水平就越高，即使鐵打法則也無法把工資壓低到這水平之下。Malthus 把他的希望建立在這「可憐的標準」[263]，也希望利用一切手段提高這標準，因為他認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從最可憐的境地拯救那些（依照他的規律）註定要跌落可憐境地的可憐人。出於同

[262] dichotomy
[263] 原註 11：Hazlitt, W., *A Reply to the Essay on Population by the Rev. T. A. Malthus in a Series of Letters.* 1808.

樣理由，Ricardo 也希望所有國家的勞動階級都應追求舒適和享樂，「並應該借助一切合法手段激勵他們爭取。」諷刺的是為了規避自然法則，竟然責成平民要提高本身的饑餓線水平。但這正是古典經濟學家致力拯救窮人不會陷入他們的理論幫忙佈置的悲慘命運。

就 Ricardo 而言，理論包含了抗衡僵硬的自然主義的要素。這要素貫穿整個理論體系，並牢固植根於其價值論，即是**勞動力原則**[264]。他完成了 Locke 和亞當·斯密未竟之功：經濟價值人性化；重農主義者歸於自然的，Ricardo 歸於人類。在這錯誤定理的極大範疇，他認為勞動力有唯一的能力創造價值，因此把經濟社會所有可以設想的交易都歸因自由人社會的平等交易原則。

在 Ricardo 的體系中，在經濟社會裡爭奪主導地位的自然和人文因素是相互共存。這情況有勢不可擋的強大動力，結果是競爭性市場的發展取得了自然過程的不可抵擋動力。因為當時相信自發調節的市場源自無情的自然法則，解放市場成為無法逃避的必要。創建勞工市場是在社會軀體上做活體解剖手術，執行手術者以只有科學才可以保證的信心去完成任務，而且肯定要廢除〈濟貧法〉。Ricardo 寫道：「地心引力原理不及這些把財富和活力改變為貧困和虛弱的法則那麼肯定…直到最後所有階級都受到普世貧困的困擾。」[265]。事實上，他可能會是心知肚明的道德懦夫，沒有勇氣廢除濟貧以拯救人類。在這一點，Townsend、Malthus、Ricardo、Bentham 和 Burke 是一致。雖然他們的方法和視野非常不同，但他們是一致反對政治經濟學原則和史賓漢蘭制度。經濟自由主義成為不可抵擋的力量，是因為這些南轅北轍的觀點對此是意見一致；極端改革者 Bentham 和極端傳統主義者 Burke 一致同意的觀點自動展示了不言而喻的特點。

只有一士諤諤察覺到這嚴酷考驗的意義，或許因為那時代的先鋒人物中只有他有實際的工業知識，也善於內省。沒有思想家比 Robert Owen 更了解工業社會。他深刻認識社會與政府的區別。他不如 Godwin 那樣對政府有偏見，但只是在政府有所為的範疇才利用政府：有益的干預旨在避免損害社會，決不是為了組織社會。同樣，他認識機器的中性特點，所以不敵視機器。國家的政治機制和機器的科技功能都沒有擋住眼前的現像：社會。他拒絕社會的獸性論，反駁 Malthus 和 Ricardo 的局限論。他的思想支點是他脫離耶教，指責耶教犯了「個體化[266]」的錯誤，把個性的責任放在個人身上，因此否定了社會的現實及其對性格的強大塑造影響。他抨擊「個體化」，真正意義在於他堅持人類動機的社會根源：「個體化的人以及耶教真正有價值的一切被如此分隔，以至永遠都絕對無法統一。」正是 Owen 發現了社會，使得他超越耶教。他抓住了真理，因為社會是真實的，人最

[264] principle of labor

[265] 原註 12：Ricardo, 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ed. Gonner, 1929, p. 86).

[266] individualization

終必須服從社會。可以說他的社會主義是建基於通過認識社會的現實而改造人的意識。他寫道：「若是眾人即將獲得的新能力不能消除任何罪惡的成因，眾人會知道那些罪惡是必要和不可避免，幼稚而無效的抱怨亦會停止。」

Owen 可能誇大了那些能力，否則他不可能向 Lanark 縣的地方官員建議此後社會應從「社會核心」重新啟動，他在他的農村公社發現這核心。滔滔不絕的想像力是天才的特權；沒有天才，人類不可能存在，因為人類不瞭解自己。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不能移動的自由疆界，那是為了消除社會邪惡而設定的必要界限。Owen 認為只有在人借助其獲得的新能力改革社會之後，那自由的疆界才會顯而易見；然後，人就會以不帶幼稚抱怨的成熟態度接受這疆界。

Owen 在 1817 年描述西方人民已經踏上的道路，他的說話概括了未來百年的問題。他指出「如放任自然」，製造業會產生巨大影響。「製造業普及全國，居民會形成新性格；形成這性格的是非常不利個人或整體福祉的原則，除非立法干預和指令能夠抗衡這趨勢，這將會產生最可悲而持久的罪惡。」以盈利原則組織整個社會肯定產生意義深遠的後果。他從人性角度闡述這些後果。新制度體系的最明顯後果是破壞了定居人口的傳統性格，改變成為某種新人類：遷徙、遊牧、沒有自尊和紀律——勞工和資本家就是野蠻而無情的典型新人類。他進一步概述涉及的法則不利於個人和社會的福祉，導致嚴重的罪惡，除非通過立法使其有效的有意識社會指令可以控制市場制度的固有傾向。誠然，他悲歎的勞工生存環境部份是「補貼制度」的效應。但從本質上說，他的觀察對城鎮和農村勞工而言是真實的，也就是說「他們目前的處境肯定比引進那些製造工廠之前更墮落和悲慘，他們的起碼生計依賴那些製造工廠的成功。」他在此再一次把話講到底了，他強調的不是收入，而是墮落和悲慘。他再一次正確指出墮落的主要原因是把起碼的生計寄託在工廠。他抓住了事實：看起來主要是經濟問題，本質上卻是社會問題。從經濟角度看，工人肯定是被剝削：工人在交易中得不到他應得的。不過，這一點雖然重要，但不是全部。雖然工人受到剝削，但手頭可能比前寬裕。但不利於個人和整體福祉的法則正在破壞他的社會環境、鄰里、社會地位、手藝；簡而言之，即是他以前的經濟存在所植根的大自然和人文關係。工業革命正引發範圍龐大的社會秩序變動，而貧困問題只是這事件的經濟方面。Owen 的斷言是正確的：除非立法干預和指令抗衡這些破壞力量，巨大而持久的罪行就會接踵而至。

當其時他沒有預見他呼籲的社會自我保護是不配合經濟體系本身的運作。

第二部（二）

社會的自我保護

第十一章
人、大自然和生產組織

百年以來，現代社會的動力受到雙向趨勢的支配：市場不斷擴大，然而這趨勢受到有明確方向的相反趨勢抑制。雖然這相反趨勢對保護社會至關重要，但最後分析是與市場的自發調節是不相容，因此與市場體制本身也是不相容。

那體制以跳躍式方式發展，吞噬了空間和時間，通過創造銀行貨幣而帶來了前所未見的動力。大概在 1914 年，這體制已達極致，一網打盡全球各地、這一代和下一代人、自然人和虛擬實體的企業。自耶教開始傳播以來，一種生活新方式以空前絕後的方式廣泛傳遍世上，而這一次是在純粹物質層面。

但同時有相反的趨勢在發展。這不僅僅是社會面對變革時的慣常防禦行為，而是對抗混亂的反應；混亂已經攻擊社會結構，可能破壞由市場創造的生產組織。

Owen 的洞識是正確的：如任由市場經濟按照它的規律發展，就會產生龐大而永久的災難。

生產是人和大自然的互動。如這過程的組織是通過以物易物和交易的自發調節，人和大自然必然要進入軌道，受制於供求關係；換句話說，人和大自然都是商品，是待售的生產貨品。

這正是市場體系的安排。人以勞工之名、大自然以土地之名出售；勞動力以工資價格四處買賣，土地以協商的租金價格出讓使用權。勞動力有市場，土地也有市場，兩種市場的供求關係受到各自的工資和租金高度調節；勞動力和土地待售的假設一直受到支持。因此，勞動力和土地不同組合的投入資本在生產部門之間流轉，自動平衡各部門的收入水平。

但是，雖然理論上可以這樣組織生產，但商品化的假設忽略了如把土地和人的命運交給市場，效果等同摧毀土地和人。因此，相反的趨勢存在於生產要素（即勞動力和土地）方面抑制市場的行動。這是干預主義的主要作用。

生產組織也受到同一方面的威脅，價格水平改變危及工業、農業或商業的單一企業。因為在市場體制下，如價格下跌，業務受損；除非所有要素的成本同比下降，否則「做生意的公司」被迫倒閉；價格下跌很可能並不是由於成本全面下跌，而只不過是由於貨幣體制的組織方式。這就是自發調節市場發生的情況。下文詳述。

理論上，購買力是由市場行為自身提供和調節；「貨幣是商品」就是這意思，商品的數量取決於商品（剛好發揮貨幣的作用）的供求關係——這是眾所周知的貨幣傳統理論。根據這學說，貨幣只是比其它商品更常用於交易的一種商品的另一名字，擁有貨幣的主要目的是方便交易。為求達到這目的，使用獸皮、牛隻、貝殼還是黃金作為貨幣並不重要；任何發揮貨幣作用的物件其價值取決於物件只是作為食糧、衣著、裝飾或其它目的用途。如剛好以黃金作為貨幣，其價值、數量和流向是受到適用於其它商品的相同法則支配。所有其它交易手段都涉及在市場之外創立貨幣；無論由銀行或是政府發行貨幣，都會干預市場的自發調節。關鍵在於作為貨幣的商品與其它商品沒有什麼不同；其供求如同其它商品的供求一樣被市場調節；貨幣只是間接交易的手段，因此賦予貨幣其它特徵的觀念本質上是錯誤。因此如以黃金作為貨幣，假如有紙幣的話，紙幣必定代表黃金。Ricardo學派根據這學說期望英倫銀行組織貨幣的供應。確實沒有其它方法能夠阻止政府「干預」貨幣體制，從而保證市場的自發調節。

商業的情況非常類似社會的自然和人力物質的情況。出於基本上相似的理由，市場的自發調節是全體的威脅。如在勞動力方面需要規管工廠的法律和社會法律來保護工人不受虛構商品的影響，如土地和農業方面需要土地法律和農業關稅來保護自然資源和農村文化免受虛構商品的影響，那麼同樣也需要中央銀行和貨幣體制的管理來保護製造業和其它生產型企業免受虛構商品對貨幣的危害。矛盾的是不單只是人類和大自然資源、資本性生產本身的組織也有必要尋求保護，免受自發調節的市場的毀滅性影響。

回到上文提到的雙向趨勢。這可以體現為社會的兩種組織原則的行動，各自為本身定出具體的制度性目標，借助一定的社會力量和利用本身的獨特方法。趨勢之一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則，旨在建立自發調節的市場，依賴貿易階層的支持和主要利用自由放任與自由貿易作為手段；另一趨勢是社會保護的原則，旨在保護人和大自然以及生產性組織，依賴最直接受到市場行為有害影響階級的不同支持（主要但並不限於勞動階級和地主階級），以及利用保護性立法、限制性協會和其它干預措施作為手段。

對階級的強調是重要的。地主階級、中產階級以及工人階級對社會的貢獻塑造了十九世紀的整體社會史，彼此各有角色，因為各自承擔源自社會總體狀況不同功

能的功能。中產階級是新生市場經濟的承載者，其商業利益整體而言與生產和就業的一般利益並行；如生意興榮，可能人人就業，地主收到租金；如市場擴大，可以自由和容易投資；如貿易成功與外國競爭，貨幣安如磐石。另一方面，貿易階層沒有能夠察覺危險的器官；這些危險涉及榨取工人體力、破壞家庭生活、破壞鄰里關係、濫伐林木、污染河流、工藝標準退化、社會習俗瓦解以及生存水平總體下降，生存包括房舍和藝術以及無數不影響利潤的私人和公共生活方式。中產階級對利潤是普世恩澤有幾乎是神聖的信念，藉此發揮他們的功能，但這信念使他們沒有資格保護幸福生活中一如促進生產同樣重要的其它利益。那些沒有在生產中應用昂貴、複雜和特殊機器的階級就可以乘機而起。粗略地說，地主貴族和農民有責任確保國家的軍事能力，軍事能力依然主要依靠人和土地；而勞動人民在不同程度上成為已是無家可歸人類共同利益的代表。但在不同時間，各社會階層代表的利益是大於本身的利益，即使他們沒有這樣的意識。

十九世紀來臨之際，普選已是相當普遍，工人階級是國家的有影響力因素；另一方面，把持立法機關的貿易階層受到挑戰，更注意他們在行業中領導地位涉及的政治權力。只要市場體系繼續在沒有大壓力和張力的情況運作，影響力和權力奇特的本地化不會造成麻煩；但如出於內在原因情況不再是這樣、當社會階級之間形成緊張關係，各方角力把政府和企業、以及國家和行業分別形成各自大本營，就會危及社會本身。為爭取本身利益，各方使用和濫用政治和經濟這兩項重要的社會功能作為武器。正是由於這危險僵局導致二十世紀出現了法西斯主義危機。

從這兩個角度可以概述塑造十九世紀社會史的趨勢。一種趨勢源自經濟自由主義的組織原則和社會保護之間的衝突導致根深蒂固的體制張力；另一趨勢源自各階層之間的衝突；兩者相互影響，於是危機劇化為災難。



第十二章
自由主義信條的誕生

經濟自由主義是社會創建市場體制的組織原則，初時只是傾向非官僚主義的方法，然後通過自發調節的市場演化成為人類世俗救贖的真正信念。這樣的狂熱是因為社會發現承擔的任務突然變得嚴重：無辜人民遭受巨大痛苦以及建立新秩序時涉及大範圍的連鎖改變。自由主義信念只是回應全面配置的市場經濟體系的需求，才有這份傳道式熱情。

往往把「**自由放任**[267]」政策追溯至法國首先使用這流行語的十八世紀中葉，這是完全沒有歷史依據；較實在的說法是直至兩代人之後，經濟自由主義才不再是「似有還無」的趨勢。直至 1820 年代，「自由放任」政策才概括三條古典原則：勞動力應在市場找尋價格，發行貨幣應有自動調節機制的約束，貨物應在各國之間自由流通，不受阻礙或優惠；簡而言之即是勞動力市場、金本位制和自由貿易。

把這種情況的設想歸因於 François Quesnay 是言之過重。重商主義世界的重農主義者只是要求穀物自由出口，以保障農民、佃農和地主有更好收入。其它的所謂「自然法則[268]」只不過是指導性原則，認為應由據稱是全能和無所不知的政府監管工業和農業。Quesnay 的著作《格言[269]》打算為這樣的政府提供把《經濟表[270]》的原則轉化為實用政策的各種觀點；《經濟表》是他定期更新的統計資料。他從未想到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概念。

英格蘭也狹義解釋「自由放任」：生產不受規章制約，並不包括貿易。棉織品製造業是那時代的奇蹟，從無足輕重已發展成為國家的重要出口產業，但依然明令禁止進口印花棉布。雖然國內市場是傳統壟斷，但白洋布或細棉布獲發出口補貼。保護主義根深蒂固，以至曼徹斯特市的棉織生產商在 1800 年要求禁止紡線出口，雖然知道生意有損失。1791 年立法把禁止棉織製造工具出口的懲罰擴大到模型或技術規範出口。所謂自由貿易始於棉織業是神話而矣。業界要求的是生產範疇不受管制；交易範疇不受管制依然被認為是危險。

可能有人認為生產自由會從純粹科技領域自然地伸延到勞工就業。然而，曼徹斯特市是在相對較晚時期才增加對自由勞工的要求。棉織業從來不受〈工匠法〉管制，因此每年一度的工資評審或學徒規則沒有妨礙這行業。另一方面，後來的自由主義者猛烈反對的舊〈濟貧法〉有利生產商：這不僅為生產商提供依賴教區救

[267] *laissez-faire*
[268] *ordre naturel*
[269] *Maximes*
[270] *Tableau Ecollomique*

濟的學徒，而且容許他們免除對被解顧員工的責任，從而把失業僱員的負擔大部份扔給公帑。棉織生產商初時不歡迎史賓漢蘭制度：只要補貼的道義效果沒有減少勞工的生產能力，該行業就有充分理由把家庭已有資產[271]視為幫助措施，以維持儲備勞動力應付急劇貿易波動的迫切需要。當時的農業就業仍然以年計算，有這樣的流動勞工儲備對擴展中的產業是非常重要。因此，生產商抨擊〈定居法〉妨礙勞工的實際流動，但法律在 1795 年才廢止，取而代之的是是較多，不是較少家長式作風的〈濟貧法〉。貧困依然是鄉紳和農村居民的關注。即使史賓漢蘭制度的激烈批評者，例如 Burke, Bentham 和 Malthus，是把自己看作是農業管理合理原則的宣導者，而不是工業進步的代表。

直至 1830 年代，經濟自由主義才迸發改革的激情，而「自由放任」成為戰鬥的信條。生產商階層迫切要修改〈濟貧法〉，因為阻礙了收入是多勞多得的產業工人階級崛起。創建自由勞動力市場涉及的風險規模和改革犧牲者遭受的痛苦程度已顯而易見。因此，至 1830 年代初期，情緒已明顯急劇變化。1817 年，Townsend 的《論述》再版，〈緒言〉讚美作者的遠見對〈濟貧法〉造成壓力，並要求徹底廢止；但編輯警告作者提議在短短十年廢除對窮人的院外救濟是「鹵莽和輕率」。Ricardo 的《原理[272]》在同年發表，堅持廢除補貼制度的必要性，但是強烈主張應逐步廢除。Pitt 是亞當·斯密的信徒，反對廢除補貼，因為會造成無辜者的苦難。到了 1829 年，Peel 還在「懷疑除了漸進之外還有其它方法能夠安全廢除補貼制度。」[273] 然而，中產階級在 1832 年取得政治勝利後，〈濟貧法修正案〉以最極端形式出臺，沒有任何寬限期就倉促實施。「自由放任」被催化為不妥協的暴行動力。

經濟自由主義在工業組織其他兩方面從學術興趣提升為無限制的活動主義：貨幣和貿易。明顯見到除極端方案之外，別無他法可以解決問題的情況之下，這兩方面的「自由放任」政策融合為受熱烈擁護的單一信條。

英格蘭社會第一次認識貨幣問題，是生活費用普遍上升。在 1790 年至 1815 年，物價翻了一番，實際工資下跌，商業受到匯率暴跌的打擊。可是，直至 1825 年的經濟恐慌，健全的貨幣才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則，也就是說只有當 Ricardo 原則已深深烙印在政治家和商人的腦海，致力維持「金本位制」，不管會造成多大的金融傷亡。這是人們堅定不移相信金本位制自動導航機制的開始；沒有金本位制，市場體系無法啟動。

國際自由貿易只不過是一種信任的行為，含義極為豐富。這意味著英格蘭的食品

---

[271] family endowment
[272] *Principles*
[273] 原註 1：Webb, S. and B., *op. cit.*

將依靠海外供應，有必要時會犧牲本國農業，並進入新的生活形式：英格蘭會成為模糊設想的未來世界整體的部份，這樣的全球社會將肯定是和平的社會，不然的話，大英帝國強大的海軍力量會保證這世界的安全；英國深信能以優越的創造性和生產能力面對持續的產業混亂的可能性。然而，人們認為只要全世界的穀物能自由流入英國，英國工廠就能以較低價格向全球出售。再一次，完全接受方案涉及的提議力度和風險規模限定了所需決心的措施，做不到完全接受即是肯定會滅亡。

如分別看待「自由放任」教條的理想國根源，根本不能完全理解。它有三條原則形成一個整體：競爭性勞動力市場、自動調節的金本位制、國際自由貿易。為了只滿足任何一項的努力是不夠的，必定要確保其它兩個原則能同時成功，否則要麼全勝，要麼徹底失敗。

例如，任何人都看得出金本位制意味著通貨緊縮的極危，在驚慌時致命的銀根短絀。因此，生產商要能堅持就要有保證：以有利可圖的價格擴大生產規模（換句話說，工資至少按價格總體下降的比例下降，生產商可以充份利用不斷擴大的世界市場）。因此，1846 年的〈反穀物草案[274]〉是 1844 年 Peel 的〈銀行法[275]〉的必然結果；兩者都假定自 1834〈濟貧法修訂法[276]〉以來，勞動階級在饑餓威脅下被迫最大限度付出，因此工資是依據穀物價格調整。三種重要手段形成連貫的整體。

經濟自由主義席捲全球，已是一清二楚。只有全球規模的自發調節市場能夠保證這巨大機制的運行。除非勞工價格取決於最便宜的穀物，否則不能保證沒有保護的產業不會屈服於人們自願接受的監工（即黃金）。市場機制在十九世紀擴大的同時也意味著國際自由貿易、競爭性勞工市場和金本位制度三位一體同時擴大。難怪一旦這風險開始呈現巨大危險之時，經濟自由主義成為世俗世界的信仰。

「自由放任」不是自然事物；如事物順其自然發展，不會有自由市場。例子是建立棉織生產這最主要的自由貿易行業是通過保護性關稅、出口補貼以及間接工資補貼的幫助；「自由放任」是由國家推行的。1830 和 40 年代有很多新法撤銷了限制性規章，而且國家的行政管理功能也大大增加，中央官僚制度可以完成自由主義信徒定下的任務。對典型的效益主義者來說，經濟自由主義是社會項目，應該為最多人謀取最大福祉；「自由放任」不是實現目標的方法，而是需要實現的目標。誠然，除了撤銷有害的限制，立法不能直接做任何事。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不能做任何事，尤其是間接做事。恰恰相反，效益論的自由主義者把政府視為

[274] Anti-Corn Law Bill of 1846
[275] Bank Act of 1844
[276]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

實現福祉的最大機構。Bentham 認為就物質福祉而言，比對「警務部部長」的無意識貢獻，立法機構的影響力「幾乎為零」。經濟成功要有三個條件：取向、知識和權力，而人民只有取向。Bentham 指出：由政府管理知識和權力比由人民管理便宜得多。行政機關的任務是收集統計資料和資訊、促進科學和實驗以及在政府範疇提供最終實現的無數措施。Bentham 式自由主義意味著由行政機關的行動取代國會的行動。

這方面有很大空間。英格蘭不是如法國那樣以行政手段處理〔社會〕反應，而是由國會立法實施政治壓制。「1785 年和 1815-20 年的革命運動不是以行政部門行動應對，而是由國會立法。暫時廢除〈人身保護令〉、通過〈誹謗法[277]〉和 1819 年的「六法規[278]」都是極其嚴重的強制手段，但沒有企圖賦予行政機關任何歐洲大陸式的特點，國會立法破壞了個人自由。」[279] 經濟自由主義者在 1832 年剛贏得對政府的影響，形勢已改變為贊同行政手段。「以不同力度為 1832 年定性的立法活動的最終結果是建立零星但非常複雜的行政機器，一如現代生產工廠時常要修理、重建和適應新要求。」[280] 行政機構這樣增長，反映了效益主義的精神。Bentham 的寓言性「圓形監獄」是他的最個人化理想國：一所星狀的建築物，獄警在監獄中心以最少公共成本有效監視最大數目的囚犯。同樣，在效益主義的國家，他喜愛的「可檢查[281]」原則保證高高在上的部長應有效控制所有地方行政。

通向自由市場的路已經打開，由大量增加的持續、中央組織和控制的干預主義維持道路暢通。亞當·斯密的「簡單又自然的自由」要配合人類社會的需求是最複雜的事務。這見諸無數圈地法的複雜條款；涉及管理〈新濟貧法〉的官僚控制數量，這是自伊莉莎白女王登基後中央機構的第一次有效監管；或是頗見成效的市政改革增加了政府行政管理。然而建立所有這些政府干預的據點，目的是要組織一些簡單的自由，例如土地、勞工或市政。與預期相反，正如發明節省勞動力的機器沒有減少，反而實際上增加使用人類勞動力，引入自由市場遠遠沒有擺脫對控制、管理以及干預的需求，反而大大擴大了範圍。行政官員必須時刻保持警覺以確保該體制的自由運作。因此，即使是最熱衷希望免除國家所有不必要責任以及哲理上要求限制國家行動的人都不得不把建立自由放任政策所需的新權力、機構和措施交給同一國家。

---

[277] Libel Act

[278] 'Six Acts' of 1819。英國在 1819 年 8 月 16 民眾暴動後，在當年十二月通過六條新法以防止未來暴動：〈培訓防治法 *Training Prevention Act*〉禁止任何人接受任何武器培訓或演習；〈充公武器法 *Seizure of Arms Act* 〉;〈輕罪法 *Misdemeanors Act*〉減少保釋的機會和方便法院更快處理案件；〈煽動性會議防治法 *Seditious Meetings Prevention Act*〉規定五十人以上討論國事的會議要法官批準；〈褻瀆和煽動性誹謗法 *Blasphemous and Seditious Libels Act*〉提高已有法律的刑罰；〈報章和印花稅法 *Newspaper and Stamp Duties Act*〉規定論政出版物要納稅。

[279] 原註 2：Redlich and Hirst, J., *Local Government in England, Vol.* II, p. 240, quoted Dicey, A. V., *Law and Opinion in England,* p. 305.

[280] 原註 3：Ilbert, *Legislative Methods,* pp. 212-3, quoted Dicey, A. V., *op. cit.*

[281] inspectability

另一種矛盾超越了這種矛盾。自由放任經濟體系是國家有意作為的產物，但隨後對自由放任的限制是以自發方式開始。「自由放任」是有規劃的政策，但規劃本身沒有規劃。這說法的前半部份正確。若是曾為執行故意由政府控制的政策而有意識利用行政機關，這就是自由放任全盛時期的 Bentham 主義。後半部份最初由傑出的自由主義者 Dicey 提出，他致力探究自 1860 年代以來漸趨明顯的「反自由放任」趨勢的起源，他稱之為英格蘭輿論的「集體主義」趨勢。他驚訝的發現除了有關法案，找不到有這樣趨勢存在的證據。更確切地說，在那些似乎代表這種趨勢的法律之前，沒有發現輿論中有「集體主義趨勢」的證據。至於後期的「集體主義」觀點，Dicey 推斷「集體主義」法律本身可能就是主要來源。Dicey 明察秋毫的研究結果表明在 1870-80 年代直接負責制定限制性法律的人完全沒有打算擴大國家的職能或約束個人自由。在 1860 年下半葉對抗自發調節市場的立法矛頭證明是自發的，沒有受到輿論引導，而是被純粹務實精神驅使。

經濟自由主義者必定強烈反對這觀點。他們全套社會哲學的關鍵是確信自由放任是自然發展的概念，而隨後的反自由放任立法是自由主義原則的反對者有意而為的結果。對雙向趨勢的兩種完全相反解釋，涉及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到底是真言或謊話。

Spencer, Sumner, Mises 和 Lippmann 這些自由主義作家對雙向趨勢的記述很大程度上與本書相同，但他們提出的解釋卻完全不同。本書的觀點認為自發調節市場的概念是理想國，其進程被社會的現實自我保護阻止。他們的觀點認為所有保護主義是由急躁、貪慾和眼光短淺做成的過失；沒有這些缺失，市場可以解決困難。近代社會史最重要的問題也許是要找出那一種觀點是正確，涉及要決定經濟自由主義是否所聲稱的是社會的基本組織原則。在轉向以事實說話之前，有必要更詳細表述這議題。

日後回顧會認為我們這時代見證了自發調節市場的終結。在 1920 年代，經濟自由主義的聲望達到頂點。通貨膨脹的災禍折磨著數億人民，剝奪了整體社會階級和整體國家〔的財產〕。穩定貨幣成為各國人民和政府政治思想的焦點；恢復金本位制成為經濟領域群起而攻之的最高目標。人們認為償還外債以及回復穩定貨幣是政治理性的試金石；為了重建健全貨幣，不惜人民受苦和侵犯主權。為滿足經濟自由主義先驗推論的健全預算和健全貨幣的要求，即使失業者因通貨緊縮失去工作而陷入窮困、公僕被解職得不到微薄補償、甚至放棄國家權利和損失憲法自由，這些都是合理的代價。

1930 年代開始質疑 1920 年代的極端觀點。英美兩個最大強國在重新穩定貨幣和預算平衡的若干年後陷入困境，拋棄了金本位制和著手管理本國的貨幣。最富有

和最受尊敬的借貸人大規模拒絕償還國際債務，又漠視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則。在1930 年代中期，法國和其它一些國家依然堅持金本位制，但被以前堅決維護自由主義信條的英美兩國財政部逼迫而放棄。

經濟自由主義在 1940 年代遭受更不幸的失敗。雖然英美兩國背棄了正統貨幣學說，但在工業和商業以及經濟生活的一般組織卻保留自由主義的原則和措施。因為經濟自由主義創造和培養獨裁政治必定帶來經濟大災難的錯覺，這就成為促使戰爭突然爆發和阻礙應戰的因素。由於這樣的信條，民主政府最後才理解管理貨幣和指導貿易的含義，即使是為勢所迫要實行這些政策；經濟自由主義的傳統同時以平衡預算和自由企業的名義阻止了及時重振軍備，而重振軍備是處於戰爭狀態時經濟力量的唯一可靠基礎。英國的正統預算和貨幣學說導致國家事實上面對全面戰爭時依然堅持有限度參戰的傳統戰略原則；美國的既得利益集團，例如石油和鋁礦行業，躲在自由企業的戒律後面，成功抗拒為工業的緊急情況作好準備。若然經濟自由主義者不是固執和堅持他們的謬論，民族領袖和大多數自由人可能為這時代的考驗有更充份準備，甚至也許能夠完全避免衝突。

十年間發生的事件沒有改變擁抱著整個文明世界社會組織的世俗原則。在英美兩國，自由放任原則衍生了數以百萬計的獨立企業單位，在某一領域頹然失敗沒有摧毀它在所有領域的權威。誠然，自由放任原則的部份衰落可能加強了它的影響力，因為擁護者藉此強調未有完全執行原則是造成任何困難的原因。

實際上，這是經濟自由主義迄今的最後論點。辯士以無盡的不同說法重複辯解：若是沒有批評者鼓吹的政策，自由主義會完成任務；導致種種弊病的不是競爭性體系和自動調節的市場，而是對那體制和那市場的干預。這論點不僅有最近侵犯經濟自由的無數事例支持，而且還有另一明確事實的支持：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自動調節市場體系的擴展遇上持久的逆向趨勢，阻礙了這樣的經濟體制自由運轉。

因此，經濟自由主義者能夠臆猜把現和過去連接成為連貫的整體。試問誰能否認政府干預企業會破壞信心？如法律沒有提供失業救濟，失業有時反而會少一些？公共工程的競爭損害私人企業？財政赤字會影響私人投資？家長式作風會抑制企業的主動性？當今如此，當然過去也是如此。在 1870 年代，一股全面的社會和國家保護主義運動在歐洲興起，誰可懷疑這會妨礙和限制貿易？誰可以懷疑工廠法，社會保險，市政企業[282]，醫療服務，公用事業，關稅，賞金和補貼，壟斷集團與信託，禁止移民、資本轉移和進口，更不用說較少公開的對人、物、支付

[282] municipal trading。政府的公眾服務對象一般是整體市民（警政、街燈等）或有資格限制的使用者（濟貧、兒童教育等），政費開支來自稅收。如政府決定一些經濟服務（水、電、墳場等）要收費，收回部份或全部成本，這已類似企業運作。

流動的限制，必定對競爭性體制功能造成重重阻礙，延長了經濟蕭條，失業惡化，金融低潮深化，貿易量減少，嚴重破壞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自由主義者堅持所有不幸的根源就是自 1875 年以來不同派別的社會、民族和壟斷保護主義對就業、貿易和貨幣自由的干預；若是工會和工人組織沒有和壟斷性生產商和農業集團組成非神聖同盟[283]，因為目光短淺的貪婪聯手阻撓經濟自由，今天的世界已在享受這近乎自動創造財富機制的成果。自由主義的領袖從不厭倦重複嘮叨十九世紀的悲劇源於人類沒有能力信奉早期自由主義者的啟示；先輩的許多方案受到以下種種因素阻撓：民族主義、階級衝突、既得利益團體、壟斷者以及勞動人民漠視全人類（包括工人）最終受惠於不受限制的經濟自由。人民群眾的智慧和精神弱點阻撓了偉大的智慧和精神前進；自私自利的力量力使〔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精神的成就化為烏有。簡言之，這是經濟自由主義的辯詞。如不駁倒這些辯詞，經濟自由主義將繼續在辯論中把持發言權。

下文集中這問題。一致公認旨在推廣市場體制的自由主義運動遭遇趨向約束市場體制的保護性逆向動力；這樣的假設是本書有關雙向趨勢的基本論點。本書斷言市場體系自動調節的概念其內在謬論最終會摧毀社會，但自由主義者指責最不同的因素破壞了這偉大的方案。自由主義者未能舉出證據證明有任何協調的力量阻撓自由主義運動，只好提出幾乎不能反駁的陰謀論。這是自由主義者解讀 1870-80 年代事件時以不同形式提出反自由主義陰謀論的神話，通常認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崛起是改變情景的主要因素；生產商協會和壟斷者、農業集團和工會被認為這情景的反派角色。因此，自由主義學說的最高精神形式假設現代社會的一些辯證規律證明啟蒙理性顯得矛盾，而其粗糙形式淪為攻擊政治民主主義是干涉主義的主要動機。

事實的證言明確地駁斥自由主義的論點。反自由主義陰謀純粹是想象。「集體主義」逆向趨勢的不同形式不是因為一致的利益集團偏愛社會主義或民族主義，而是市場機制膨脹影響更大範圍的重要社會利益。這解釋了那機制膨脹引起普遍反應的重要務實特點。知識潮流對這過程沒有任何作用；因此，自由主義者偏見認為反自由主義發展背後的意識形態力量也沒有任何作用。雖然正統自由主義在 1870-80 年代終結的說法是正確，現今的所有關鍵問題可追溯那年代也是正確，但如認為社會保護主義和民族保護主義的變化是由於其他任何原因而不是自動調節市場體系的內在弱點和危險引起，這說法是不正確。可以有多種方法表達這情況。

首先是行動針對的問題有驚人的差異。單單這種情況會排除一致行動的可能性。以下引用 Herbert Spencer 在 1884 年編纂的干預清單，當時他指責自由主義者為

[283] unholy alliance

了「限制性立法」而放棄他們的原則。[284] 清單可見題目是如此多式多樣。1860 年授權政府「從地方稅支付分析員的食物和飲料」；接著的法案規定「檢查煤氣工程」；補充〈開礦法〉，規定「聘用十二歲以下綴學文盲男孩即屬違法」；1861 年授權「濟貧督察強制執行接種疫苗」；授權地方管理委員會「訂定租用交通工具的費率」；授權一些地方團體「在當地徵稅以支付農村排污和灌溉工程以及飼養牲畜供水」。1862 年通過法案，宣佈「只有單一通風管道的煤礦」違法；另一法案賦予醫學教育委員會獨有權力「提出藥典，價格由財政部制定」。驚恐的 Spencer 寫了數頁紙列舉這些或類似的法案。1863 年，「蘇格蘭和愛爾蘭強制接種疫苗」。還有法案委任檢查官員負責檢查「食物是否可口」；〈煙囪清潔工法〉防止指派兒童清掃太窄的煙囪而導致折磨和最終死亡；〈傳染病法〉；〈公共圖書館法〉授權地方政府「為購買圖書，多數人可向少數人徵稅」。Spencer 指出這些都是反自由主義陰謀論的不容反駁的證據。但這些法案任何一項都是為了處理某些現代工業環境引起的問題，旨在維護某些公共利益免受環境或處理工業問題的市場手段危害。不帶偏見的看法認為這正好證明「集體主義」逆向趨勢本質純粹是實際和務實。大多數執行這些法案的負責人都是深信自由放任的支持者，肯定不希望他們同意在倫敦成立消防隊是暗示對經濟自由主義原則表示不滿。正好相反，這些法案的支持者一般是毫不妥協地反對社會主義或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

其二，解決辦法從自由主義轉變為「集體主義」有時是一瞬間的事情，參與立法醞釀過程的人根本沒有這樣的意識。Dicey 舉出的典型例子是〈勞工賠償法[285]〉處理工人在受僱期內因工受傷時僱主的責任。自 1880 年以來，有多項法案都依據個人原則：必須有序規管僱主對僱員的責任，一如規管他對其他人的責任，例如陌生人。輿論幾乎沒有任何改變，但在 1897 年僱主突然成為僱員的承保人，承擔僱員因工受傷的責任；正如 Dicey 公正地評論，這是「徹底的集體主義立法」。這是最好佐證說明自由主義原則被反自由主義原則取代，不是涉及的利益集團類型和對事情的輿論已經改變，而是純粹因為環境演變，產生問題，要找出解決辦法。

其三，比較不同政治和意識形態結構國家的發展，得出間接但最引人注目的證據。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格蘭和卑斯麥時代的普魯士（德國）相差甚遠，與法國第三共和國或是哈布斯堡王朝[286]有很大差異。可是各國都經歷了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時期，接著在公共衛生、工廠條件、市政企業、社會保險、海運津貼、公用事業、貿易協會等方面經歷了反自由主義立法時期。很容易製作各國大事紀的清單。勞工賠償法：英格蘭在 1880 和 1897 年立法，德國 1879 年，奧地利 1887 年，法國 1899 年；執行工廠檢查：英格蘭 1833 年，普魯士 1853 年，奧地利 1883

[284] 原註 4：Spencer, H., *The Man vs. the State.,* 1884.
[285]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286] Empire of the Hapsburgs

年，法國 1874 和 1883 年；市政企業：英格蘭伯明翰市異見人士和資本家 Joseph Chamberlain 在 1870 年代引進包括公用事業的市政企業；Karl Lueger 在 1870 年代為維也納帝國引入市政企業，他是信奉耶教舊教的「社會主義者」和極度痛恨猶太人；德國和法國許多城市的當地聯盟引入市政企業。在一些案例，支持一方是極端反動和反社會主義（維也納），或是「極端帝國主義」（伯明翰），或是像法國里昂市長 Edouard Herriot 的純粹自由主義色彩。英格蘭信奉耶教新教，保守黨和自由黨輪替的內閣斷斷續續努力爭取完成工廠法。在德國，耶教舊教徒和社會民主黨黨員一同參與；奧地利教會和最好戰的支持者、法國教會的敵人和激烈反對教權的人負責制定幾乎相同的法律。不同國家的形形式式政黨和社會階層有不同口號，有非常不同的動機，面對一大堆複雜問題時都實施了幾完全一樣的措施。從表面來看，如果像反自由主義陰謀論那樣以為各路人馬秘密地被相同的意識形態成見或狹隘集團利益驅使，這是荒謬絕倫的想法。與此相反，所有事情都支持這個假設：嚴竣大自然的客觀理性強迫立法者表態。

其四，重要的事實是經濟自由主義者本身在不同時間提出在理論和實踐非常重要的明確案例，倡議限制**契約自由**[287]和自由放任政策。當然，他們的動機不是反自由主義的偏見。例如一方面是勞工結社的原則，而另一方面是工商企業法。前者指工人結社以爭取改善工資；後者指信託權益、壟斷集團或其他資本主義式結社以提高價格。指責在這兩情況下利用契約自由或自由放任政策以抑制貿易，這說法是公正的。無論勞工結社是為了爭取提高工資，或是企業結盟是為了提高價格，既得利益集團明顯利用自由放任原則來縮小勞動力市場或其它商品市場。極為重要的是在這兩種情況，從 Lloyd George 和羅斯福，到 Thurman Arnold 和 Walter Lippmann 這些長期自由主義者把「自由放任」屈服於自由競爭市場的需求；他們迫切要求規章和限制，迫切要求刑事法律和強制，並一如任何「集體主義者」一樣指責工會或企業正「濫用」契約自由。理論上，自由放任或契約自由意味工人可以決定個別或聯合一起拒絕工作；也意味商家不用理會消費者的願望，相互協商售價。但實際上這樣的自由與自動調節市場的機制相互抵觸，並且，**在這樣的抵觸情況，自動調節市場必然優先**。換句話說，如自動調節市場的需求與自由放任的需求彼此矛盾，經濟自由主義者會背棄自由放任，寧願採用集體主義的規章和限制措施，一如反自由主義。這種態度催生了工會法和反壟斷法。事實就是即使經濟自由主義者時常在工業組織的絕對重要領域中使用「集體主義」措施，沒有其他確鑿證據說明現代工業社會無可避免要使用反自由主義或「集體主義」措施。

順便一提，以上有助闡明術語「干預主義」的真正意義；經濟自由主義者喜歡以這術語表示與己相反的政策，但只是顯得思想混亂。干預主義的對立面就是自由放任，而上文解釋經濟自由主義不等同自由放任（雖然一般用法是可以把兩個術

---

[287] freedom of contract

語交替使用）。嚴格來說，經濟自由主義是社會的組織原則，社會的工業建基於自動調節市場機制。誠然，一旦這樣的體系差不多完成，就較少需要某一類干預。但這遠遠不是說市場體系和干預是相互排斥。因為只要這體系還沒有建立，經濟自由主義者必定以及毫不猶豫要求國家干預以建立這體系；一旦體系建立，也要求國家維護。所以，經濟自由主義者沒有任何猶豫要求國家運用法律的力量，甚至可能利用內戰的強暴力量建立自動調節市場的先決條件。在美國，南部邦聯訴諸自由放任論點來證明奴隸制度有道理；北部邦聯求助於武力干預建立自由勞工市場。因此，自由主義作者對干預主義的譴責是空洞口號，意味著只是憑一己是否恰好贊同一套行動而是否譴責。經濟自由主義者能夠始終堅持的唯一原則是自動調節的市場，無論這原則是否涉及干預。

總而言之，針對經濟自由主義和自由放任的逆向趨勢擁有自發性反應的明顯特徵。逆向趨勢在無數斷開的結點落腳，那些直接受影響的利益之間看不到可以追蹤的連結或是任何一致的意識形態。以工人賠償為例，經濟利益、思想影響或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方面沒有任何改變，但同一問題的解決辦法從個人主義轉變為「集體主義」，從自由主義轉變為反自由主義，從自由放任轉變為干預主義；這僅僅是由於更多認識該問題的本質。也可以看到不同國家在工業發展一定階段中都有非常類似的變化，從自由放任轉變為「集體主義」，揭示這過程的根本成因其深度和獨立性，但經濟自由主義者膚淺地把這歸因為情緒的改變或各種各樣的利益。最後，分析揭示即使經濟自由主義的激進擁護者也不能避開令自由放任主義不適用於先進工業環境的規律；因為在工會法和反壟斷監管這些關鍵案例，極端自由主義者不得不要求國家多方面干預，以保護自動調節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不受壟斷性影響。甚至自由貿易和競爭也需要干預才可以運作。1870 和 80 年代的「集體主義」陰謀論的自由主義神話與所有事實恰恰相反。

本書對雙向趨勢的解讀有證據支持。本書強調如市場經濟對社會組織的人文和自然成份構成威脅，人民迫切要求某種形式的保護時還有什麼別的期望？這是本書的發現。同樣，可以預期事情的發生不是他們有任何理論的或理性的先設概念，也無關他們對市場經濟背後的原則有什麼態度。再說一遍，情況就是這樣。此外，本書提出如能證明特定利益是獨立於許多不同國家的特有意識形態，各國政府的歷史比較也許對本書的論點提出半實驗性支持。本書對此可以舉出明顯證據。最後，自由主義者本身的行為證明了維護貿易自由（本書的定義是自動調節的市場）非但不排斥干預，實際上是要求這樣的行動，而自由主義者時常要求國家採取強制性行動，例如工會法和反壟斷法。因此，對雙向趨勢的兩個對立解釋，歷史證據最能決定那一種解釋正確：一方面是經濟自由主義者堅持他的政策從未有過機會，被目光短淺的工會會員，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貪婪的生產商以及保守的地主所扼殺；另一方面是批評者提出十八世紀後半葉的普遍「集體主義」反應以反對市場經濟擴展，作為自動調節市場的理想原則必然危及社會的結論性證據。



第十三章
自由主義信條的誕生（續）：階級利益和社會改變

要全面理解十九世紀政策的真正基礎，先要完全消滅集體主義陰謀論這自由主義神話。這神話表明保護主義只是重農派、生產商和工會份子邪惡利益的結果；彼等自私地破壞市場的自動機制。馬克思主義是另一種形式（當然是沒有相左的政治傾向），其論點用上同一套派系術語。（馬克思的基本哲學集中在整個社會和人類非經濟本質，與本文不相關[288]。）馬克思追隨 Ricardo 以經濟學術語定義各階級，而毫無疑問經濟剝削是資產階級時代的特點。

這導致流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發展的粗糙階級論。爭取市場和勢力範圍的壓力被簡單視為少數資本家的謀利動機。帝國主義被解釋為資本家陰謀，促使政府為大企業利益而發動戰爭。戰爭的成因是這些利益團體結合軍備企業，奇蹟地有能力驅使整個國家陷入與國家重要利益相反的致命政策。實際上，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都同意從派系利益的力量推斷保護主義運動和農業關稅是由於反動地主的政治影響力，工業巨頭渴求利潤是企業壟斷形式發展的原因，戰爭是由於商業猖獗。

因此，經濟自由主義觀點得到狹隘階級理論的有力支持。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支持階級對立的觀點、意味著彼此主張一致。他們建立滴水不漏的例子：十九世紀的保護主義是階級行動的結果，這些行動必然服務有關階級成員的經濟利益。這兩大門派完全防礙了市場社會的整體觀念以及保護主義在這樣的社會發揮作用。

事實上，階級利益對社會的長期趨勢只是有限度的解釋。階級命運更多是由社會需求決定，不是階級需求決定社會命運。如社會結構不變，階級論可以成立，但假如社會結構本身改變，那又如何？失去作用的階級可能瓦解，一夜之間被一個或多個新階級取代。而且各階級在鬥爭中的機會取決於能否贏得階級成員以外的支持，而這又取決於能否履行比本身階級更廣大利益的任務。因此，要理解階級的生與死、階級目的和達到目的的程度、階級合作或對抗。必先要理解整體社會形勢。

整體形勢的建立通常由於外在因素，例如氣候變化，農作物產量，新的敵人，宿

[288] 原註 1：Marx, K., *Nationalokonomie and Philosophie.* In 《歷史唯物主義》"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1932.

敵使用新武器，新的社會目標，或就此而言發現達到傳統目標的新方法。如派系在社會發展的功能派系變得明顯，派系利益最終必然關連整體形勢。

階級利益在社會變化中的主要作用是在事物的本質。任何大範圍的變化必然以不同方式影響社會的不同部份，例如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的經濟和文化工具。因此，派系利益是社會和政治變化的自然載體。無論變化是源自戰爭或貿易，令人吃驚的發明或自然環境的改變，社會的不同派系代表不同的調整方法（包括強制方法）以不同方法調整本身的利益，這些方法有別於他們想勝出其他團體的方法；因此要識別造成變化的組群或多個組群，才可以解釋變化是如何發生。最終成因是由外部力量設定，而社會依賴內部力量只不過是變化的機制。「挑戰」是針對整個社會；「反應」來自組群、派系和階級。

因此，僅僅是階級利益不能夠滿意解釋任何社會長期進程。第一，因為該進程可能決定階級本身的存在；其次，因為既定階級的利益決定的只是那些階級正在為之努力的目標，而不是成功與否。階級利益不是可以從其它階級成員取得對這階級成員支持的魔法。然而，這些支持是日常發生的事情。事實上，保護主義只是例子。此處的問題不是務農者、生產商或工會人士為什麼希望通過保護主義行動來增加收入，而是為什麼他們做得到；不是商家和工人為什麼希望建立商品壟斷，而是為什麼他們達到目的；不是一些歐洲大陸國家的一些組群為什麼希望使用類似方法，而是在很多方面不類似的國家都有這樣的組群，而且都達到他們的目標；不是為什麼種植玉米的人試圖以高價出售，而是他們為什麼經常成功說服購買玉米的顧客，從而有助提高售價。

其二，對階級利益的基本經濟本質有同樣錯誤的學說。雖然人類社會自然而然被經濟因素設定條件，但個別人士的動機卻是唯一異乎尋常地由物質的滿足需求慾望決定。十九世紀的社會組織是基於這假設：這樣的動機可變得普遍，是那時代的特色。因此，分析該社會時要適當容許經濟動機有相對較大的範圍，但必須不要預判問題，而問題正正就是在什麼程度這不尋常的動機如何能起作用。

與社會認知問題相比，諸如需求—滿足影響的純經濟問題與階級行為有較少關連。當然，「需求—滿足」也許是這種認知的結果，特別是它的向外告示或獎賞。但是，最直接代表階級利益的是身份和等級、地位和保障；換句話說，主要不是經濟性而是社會性。

那些斷斷續續參與 1870 年之後保護主義運動的階級和組群主要不是為本身的經濟利益。在關鍵年代制定的「集體主義」法案揭示只有特殊情況才牽涉某一階級的利益；即使這樣，那利益也極少被描述為經濟性。確實有一些法例不是服務「目光短淺的經濟利益」，例如授權城鎮當局接管被忽略的閒置空間、要求至少半年

一次用熱水和肥皂清洗麵包坊、強制檢查纜索和錨。這些措施只是對工業文明需求的反應，而市場方法不能應付。這些干預措施大多數沒有直接影響收入，間接影響也是輕微。所有與衛生和家宅、公眾文娛設施和圖書館、工廠環境和社會保險有關的法律大概都是如此。公用事業、教育、運輸和無數其它事務也是如此。即使牽涉金錢價值，相對於其它利益只是次要。幾乎必然涉及專業地位、安全和保障、個人生活形式、生命的闊度、周邊環境的穩定。不應低估一些典型干預的金錢價值重要性，例如海關關稅和工傷賠償。但即使如此，這些案例的非金錢利益是不能與金錢利益分割。海關關稅隱含資本家的利潤和工人的工資，最終意味著避免失業的保障，穩定地區環境，保障業界不致倒閉，也許最重要的是避免被迫轉職而喪失地位的痛苦，因為舊工作技能和經驗不適用於新工作。

一旦擺脫以為只有局部派系利益，不是整體，會變得有作用的固執看法，也擺脫把人類組群的利益限制在金錢收入的孿生偏見，那麼保護主義運動的廣度和廣泛性不再是神秘。與金錢利益相關者必然會為此發聲，但其它利益涉及更多人，以無窮無盡方式影響無數個人，例如鄰居、專業人士、消費者、行人、乘客、運動員、徒步旅行者、園林工人、病人、母親或愛侶；因而可以通過任何種類的區域性或功能性協會來表達，例如教會、城鎮、兄弟會、俱樂部、工會或最普遍的是基於忠誠原則的政治團體。過於狹窄的利益觀念事實上必定導致對社會和政治歷史的歪曲景象；而且利益的純粹金錢定義沒有對社會保護有重要需求留下空間，保護的任務經常落在主管社會總體利益的負責人——在現代的情況就是在任政府。正正是因為受市場威脅的是不同人口組群的社會利益，不是經濟利益，不同經濟階層的老百姓不知不覺間聯手面對危機。

因此，階級勢力的行動既促進又妨礙市場擴展。既然建立市場體制要有機器生產，只有貿易階級在轉型之初可以處於領導地位。較舊階級的倖存者萌生了新的創業者階級，以接管與社會整體利益一致的發展。但如工業家、創業家和資本家的崛起是由於他們在擴張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那麼傳統的地主階級以及新生的工人階級就必須起來抗衡。如貿易組群中只有資本家代表市場體系的結構性原則，那麼封建制度的貴族階級和崛起中的工業無產階級就要頑固保衛社會組織。地主階級自然要維護過去並從中找尋應付所有惡勢力的辦法，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超越市場社會的界限，從未來的角度借用解決方法。這並不意味著回到封建制度或社會主義宣言是可能的行動方法，但這顯示完全不同的方向：重農派和城市工人階級往往在緊急關頭尋求救濟。如市場經濟崩潰（正如每次重大危機都有這樣的威脅），地主階級會嘗試恢復軍事或封建制度的家長式作風，而工廠工人認為要建立勞工合作社。應付危機的「各方反應」可能指向相互排斥的解決方法。本來可以通過妥協解決的階級利益衝突，如今致命地更顯重要。

所有這一切應當警戒我們在解讀歷史時不要過份倚賴既定階級的經濟利益，這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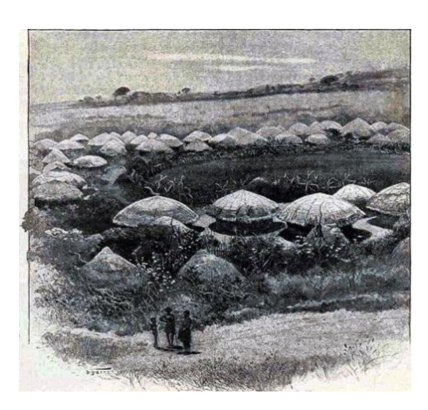
會默認那些階級的既定性，而這只能在不可破壞的社會中發生。這沒有顧及當文明崩潰或經歷變革時，有時在極短暫時間內通常有新階級在舊階級的廢墟中崛起，甚至外國冒險家或流氓無賴也可能乘時而起。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新階級誕生往往是因應當時的需求。因此，最終是階級與整個社會關係決定它在歷史舞臺上的角色；它可以照顧本身的利益，但它的成功取決於自身以外諸多利益的廣度和多樣性。誠然，除了少許例外情況，狹窄階級利益的政策甚至不可能好好保護自身利益。除非社會組織的另行選擇是突然陷入完全毀滅，赤裸裸自私的階級不可能維持本身的領導地位。

為了安全地把過失歸咎集體主義者陰謀論，經濟自由主義者必定最終否認已經出現了社會保護的任何需求。他們最近稱讚一些學者的觀點，這些學者曾經否定工業革命的傳統學說，這學說認為大概在 1790 年代，不幸的英國工人階級遭遇大災難。依據這些作家，人民的生活標準沒有突然惡化。一般而言，在引進工廠制度之後，人民的基本生活水準有了很好的改善，沒有人能夠否認具體數字已快速增長。按照公認的經濟福利標準（實際工資和人口數字），從來沒有早期資本主義地獄；工人階級非但沒有被剝削，反而成為經濟的得益者；這體系惠及全民，明顯不可能要爭辯需要有社會保護。

自由資本主義的批評者受到挫折。差不多七十年以來，學者和皇家調查委員會都譴責工業革命的恐怖；顯赫的詩人、思想家和作家都給工業革命打上殘忍的記號。大家公認的事實是無情的剝削者利用民眾的孤立無助，迫使他們挨饑抵餓幹活；圈地行動剝奪了鄉民的房舍和土地，把他們拋入〈濟貧法修正案〉建立的勞工市場，另外還有孩子不時在礦井和工廠因工作過勞致死的確證悲劇；這些都是民眾窮困的有力證據。誠然，對工業革命的耳熟能詳的解讀是基於十八世紀圈地行動做成剝削的程度、無家可歸的工人的低工資（這解釋了棉製業的高利潤），以及早期生產商迅速累積的資本。對他們的控訴就是剝削，對社會地位低下的人民無限剝削成為如此悲慘和墮落的根源。所有這些內容現在已被明確反駁。經濟史學家宣告籠罩早期幾十年工廠制度的陰影已被驅散。既然經濟確實得到改善，怎麼會有社會大災難？

當然，實際上社會災難主要是文化現象，不是可以依照收入數字或人口統計量度的經濟現象。包含了更多普通民眾階層的文化災難自然不可能經常發生；但也不會像工業革命那樣的洪水般事件：一次經濟地震在半個世紀不到的時間把大量英國農村居民從定居的人口改變為走投無路的流動人口。但是，即使這樣的破壞性的山崩在階級歷史記錄中是罕見的，但在不同種族的人民的文化交往領域內，它們是通常發生的事情。本質上，環境是相同的。主要的差別是這樣：當文化交往通常發生在定居於不同地理區域的社會之間，而居住在同一地理區域的一個社會階級成為一個社會的要素。在這兩個情況中，這種交往也許會對較弱的一方造成

破壞性後果。不是人們經常認為的經濟剝削，而是那些犧牲者的文化環境崩潰才是當時惡化的原因。經濟過程也許自然地提供毀滅的媒介，同時，幾乎總是經濟的次等性將造成比較弱的回報率，但是失敗的直接原因並不是經濟；它存在於對制度的致命傷害，這制度包含其社會存在。這一結果是喪失自尊和標準，無論單位是人或階級，無論這過程源自所謂「文化衝突」或源自在社會範圍內的一個階級的地位改變。



研究早期資本主義，對比是極其重要。今天在非洲一些土著部落的環境非常類似於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工人階級的環境。南非的高貴野人 Kaffir[289]原來居住在牛欄（見圖），最有社會完全感，但已經改變為被半馴養的人種，穿著「即使是最墮落的白人也不穿著的污穢又難看的破舊衣服」[290]，無可名狀的生命，沒有自尊或標準、真正的人類廢物。描述令人想起 Owen 描述他本國的工人；他當時在 New Lanark 向工人演講，以社會研究員記錄事實一樣冷靜和客觀直斥工人他們變成墮落賤民的原因；最適當的說法是他們墮落的真正原因是因為生存在「文化真空」；一位人類學家[291]引用這術語來描述與白人文化接觸受到影響的一些非洲勇敢黑人部族其文化退化的成因。他們的工藝衰退，生活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受到破壞，正如 Rivers 出名的描述，他們因厭倦而消亡，或是浪費生命和揮霍物質。當他們本身的目標不再值得他們努力或犧牲，種族的勢利和偏見阻擋他們充份參與白人入侵者的文化。[292] 以社會障礙取代膚色障礙，1840 年代的「兩個國家[293]」出現了，Kaffir 人適當地取代了小說描述的呆滯貧民區居民。

然而，若是輕易贊同文化真空的生活根本不是生活，似乎期望無論在怎樣的環境，經濟需求會自動填補這真空和使人生是可以活下去。人類學研究推翻了這項假設。Mead 博士說：「個人會爭取的目標由文化決定，不是生物對外部文化沒有定義的情況的反應，例如簡簡單單的食物不足…原始人改變成為採金礦工或船員或只是被剝奪對工作的激勵，被遺棄在滿滿魚獲的河邊默然死去；這過程可能看來是稀奇古怪，背離社會的本性和正常運作，以至近乎病態。…但一般而言在外部引入暴力或至少是外部引起改變時，這過程確實發生在一個民族身上…」。她總結「這樣的粗糙交流，這樣把天真民族從傳統中連根拔起是過於頻繁，根本不值得社會史學家認真關注。」

[289] 泛指南非黑人，現已成為髒話。（插圖）
[290] 原詳 2：Millin, Mrs. S. G., *The South Africans,* 1926.
[291] 原註 3：Goldenweiser, A., *Anthropology,* 1937.
[292] 原註 4：Goldenweiser, A., *ibid.*
[293] Disraeli 的小說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 主題是急速擴展的工業城鎮的貧窮問題。小說副題 The Two Nations 暗喻英格蘭已分裂為兩個民族：奢華的貴族階級和極度貧困的工人階級。

然而，社會史學家沒有理解提示，依然拒絕理解把殖民世界弄得翻天覆地的文化交流自然力量其實類似百年前造成資本主義初期可怕場景的力量。一位人類學家[294]有以下的推論：「雖然有許多分歧之處，但是當今外族的困境與我們數十年或數百年前的困境基本一樣。新科技設備，新知識，財富和權力的新形式提高了社會流動性，也就是個人流動，家庭興衰，組群區分，新形式領導，新模式生活，不同價值觀。」 Thurnwald 明察秋毫的看法理解當今黑人社會的文化大災難近乎類似在資本主義初期的大部份白人社會。只有社會史學家仍然沒有覺察到這類比。

經濟性偏見比任何事情更有效遮擋我們的社會視野。「剝削」一直被放在殖民地問題的最前線，這問題值得特別關注。而且從明顯的人文意義來說，白人是如此經常、持久、無情剝削世上落後的人，對殖民地問題的任何討論如不突出這特別事實，辯論沒有意義。然而，正正是這樣強調「剝削」，蒙蔽了文化衰退這更大問題。如以經濟角度定義「剝削」為交易比例從來不足不全，這會令人質疑是否有「剝削」這回事。土著社會大災難是受害者的基本制度被迅速和激烈破壞的直接結果（這過程中是否使用武力似乎完全不相關）。這些制度之所以被破壞，正是因為把市場經濟強加於完全不同組織的社會；工人和土地變成商品。重提一次，這只是肅清有機體社會每一和任何文化制度的簡短公式。收入和人口數目的變化明顯與這過程不匹配。例如，雖然相比在本國叢林的生活，奴隸被販賣後的生活水平在某些人為意義來說已有改善，但沒有人會否定自由人被賣為奴是剝削。但如假設被征服的土著如前享受自由，甚至沒有強迫他們為不值錢的棉產品付出高昂價錢，他們挨餓「僅僅」是由於他們的社會制度被破壞，那麼什麼都沒有改變。

以著名的印度事件為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印度平民因饑餓大量死亡，不是因為英格蘭棉織工業城鎮剝削，而是印度農村社會被破壞，破壞成因是經濟競爭的力量：機器製造的成衣長期以低於手工編織布匹的價格出售；這是事實；不過這只證明是經濟剝削的相反，因為傾銷意味高價格降至低價格。過去五十年饑荒的真正成因是穀物自由買賣，加上當地人收入減少。當然，農作物歉收是饑荒的部份原因，但鐵路可以運輸穀物，可以運輸救濟物品到受威脅地區；問題是人民沒有能力購買價格急劇上升的穀物。在自由但組織不完善的市場，供應不足必然導致價格上升的反應。從前，本地小店鋪是糧食歉收的緩衝，但小店鋪已不復見或被大市場吸納。因為這個原因，經常採取公共工程形式讓人民有能力承擔高價格以防止饑荒。1857 年印度反英革命之後，英國統治下的三、四次大饑荒不是自然因素所致，也不是剝削所致，而只是由於勞動力和土地的新市場瓦解了舊鄉村但沒有解決它的問題。在封建和農村社會的制度下，位高責重、親族團結以及玉

[294] 原註 5：Thurnwald, R. C., *Black and White in East Africa; The Fabric of a New Civilization,* 1935.

米市場監管防止了饑荒；在市場規則中，沒有遊戲規則保護人民避免挨餓。東印度公司的無情壟斷被廢除和印度引入自由貿易後，情況變得嚴重，稱得上「剝削」。在壟斷者得勢時，又有鄉下地方的陳舊組織幫忙，包括穀物自由分發，情況還控制得住；在自由和平等交易過程中，數以百萬計印度平民死去。從經濟角度看，印度也許已經受益，從長期來說肯定受益；但從社會角度看，印度已瓦解，印度人民深受窮困和衰敗所害。

至少有一些案例可以說明文化交流開始瓦解的過程，這是剝削的相反。1887 年，強制把土地分配給北美洲印第安人，依照我們的財政計算尺度，他們人人受益。這措施幾乎消滅種族的肉體存在，是有記錄以來文化衰敗的突出案例。John Collier 這位道德天才在差不多五十年後重新取回立場，堅持重回土著的土地：今天北美洲印第安人至少在一些地方已經是有生命的社區——不是經濟改善，而是**重建社會**恢復奇蹟。大概 1890 年代，美國土著 Pawnee 族的手號遊戲[295]衍生為著名的〔宗教儀式〕「鬼舞[296]」，記錄了破壞性文化交流的衝突；當時印第安人正在改善經濟環境，印第安人文化變得不合時宜。此外，另一經濟指標是人口增長不必然排除文化災難，人類學研究同樣證明這事實。人口自然增長率也許是文化活力或衰敗的指標。「無產階級[297]」一詞把人口出生率和乞討生活聯繫一起，最能明顯表達這矛盾心理。

經濟性偏見是資本主義初期剝削粗糙理論的源頭，也是隨後否認有社會大災難這雖然稍有學術氣質但同樣粗糙誤解的源頭。後者的重要意義和最近對歷史的詮釋在於自由放任經濟體系的復興。因為如果自由經濟沒有造成災難，那麼剝奪這世界自由市場利益的保護主義便就是荒唐的罪行。「工業革命」這術語令人蹙眉不悅，認為只不過是言過其實的緩慢進程。這些學者堅持這只不過是科技進步的力量逐漸開展和改變人們的生活；無庸置疑，很多人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受苦，但整體而言是持續改善。雖然受到一些不耐煩的人誇大當時不可避免的困難、這良好後果是經濟力量近乎自動運作完成有益任務的結果。這些干預否認新經濟體系的危險已威脅著社會。如工業革命的修訂歷史正確反映實際情況，那麼保護主義運動就沒有所有客觀的理由，而自由放任會被證明是正確。社會和文化大災難本質的唯物主義謬論助長了傳說：背離經濟自由主義導致當代的所有邪惡。

簡而言之，雖然所涉及階級利益的本質決定性影響後果，沒有單一社群或階級是所謂集體主義運動的起源。最終是社會整體利益導致事情發生，但保衛社會利益主要由一些社群負擔。對保護主義運動的合理分析似乎應以被市場損害的社會實體為對象，而不是階級利益。

[295] Hand Game
[296] Ghost Dance
[297] 無產階級 proletarian 一詞出自拉丁語 proletarius，古羅馬社會最低下層的社會階段，字源是 proles（子嗣），意味該階層的唯一貢獻是延續香火並供應人丁，帶有輕蔑之意。

抨擊的主要方向指出各個危險點。競爭性勞工市場衝擊「人」，這是勞動力的載體。國際自由貿易基本上是威脅最大依賴大自然的行業，即農業。金本位制是否危及生產性組織，要視乎組織在價格上相對運作的功能。市場在每一領域發展，意味對社會存在的某些重要方面有潛在威脅。

容易區分勞工市場、土地市場和貨幣市場，但不是很容易區分文化的那些組成部份其核心是分別由人類、他們的大自然環境和生產組織組成。在文化領域中，人和大自然幾乎是一個整體，而生產企業的貨幣方面只涉及一項重大的社會利益，即是國家統一和凝聚力。因此，雖然容易區別和分隔勞動力、土地和貨幣這些虛擬商品的市場，但彼等涉及的社會威脅不是能夠準確地分隔。

以上對西方社會在那重要八十年（1834-1914 年）期間制度發展的概述可能以相似術語提及每一危險點。因為市場組織已危及人類、大自然或生產組織，所以一定數量的社群或階級迫切要求保護。在每一情況，英格蘭、歐洲大陸和美國的發展有相當長的時間間距是有重要意義，然而在世紀之交，保護主義的逆向趨勢在所有西方國家建立了類比的形勢。

因此，下文分別闡述人、大自然以及生產組織的防衛（自我保護運動），後果是出現了更緊密組織的社會，但面對全面破壞的危險。



第十四章
市場和人

把勞動從其它生活活動中分離，使勞動受制於市場規律，即是扼殺存在的全部有機形式，並以原子化、個體化的不同類型組織取代。

實現這樣的毀滅性計劃，最好是運用**自由契約原則**[298]**，**實際意思是要清除諸如血緣關係、鄰里、同行、宗教這些非契約組織，因為這都要求個人效忠，從而限制了個人自由。經濟自由主義者習慣把這描述為「非干預」原則，只是表達了贊同明確干預的根深蒂固偏見，也就是說，干預會摧毀個體之間的非契約關係，並防止他們自發性重組〔非契約關係〕。

建立勞工市場的效果在今天的殖民地區非常顯著。土著被迫出售勞動來謀生。為了達到這目的，必須摧毀傳統制度，並防止重組，因為原始社會的個人一般不會受饑餓威脅，除非整個社區遭遇類似困境。例如在南非 Kaffirs 族人的圍地制度下，「不可能窮途末路；無論誰需要幫忙，〔鄰人〕毫不猶豫伸出援手。」[299] 北美洲的 Kwakiutl 族「從不會挨餓。」[300]「僅堪糊口的社區沒有挨餓。」[301] 印第安人的農村社會同樣承認需求不匱的原則，可以補充說大約一直到十六世紀初人道主義者 Vives 在索邦神學院[302]提出對窮人的現代觀念之前，幾乎所有類型的社會組織都是同一情況。個人不受饑餓威脅，使得原始社會在某種意義上比市場經濟更有人性，但同時經濟力較差。諷刺的是白人對黑人世界的最初貢獻主要是引進如何利用饑餓的災難。因此，殖民者可能決定砍掉麵包果樹，人為造成食物短缺，或者向土著徵稅，迫使他們賤賣勞動力。這兩種情況的效果都類似英格蘭都鐸時代的圈地行動，導致遊民漂泊。國際聯盟[303]的報告恐怖地說到最近在非洲叢林出現了十六世紀歐洲場景中的不祥人物——無主孤魂。[304] 在中世紀後期，無主孤魂只活在社會「裂縫」[305]，然而卻成為十九世紀漂泊勞工的前人。[306]

時至今日，白人可能依然在偏遠地區偶爾這麼做，為了從社會結構榨取勞動力這要素而瓦解社會結構，一如在十八世紀白人曾經為了同樣目的同樣對待白人。

---

[298]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contract

[299] 原註 1：Mair, L. P., *An Af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34.

[300] 原註 2：Loeb, E. M.,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 Early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1936.

[301] 原註 3：Herskovits, M. J.,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1940.

[302] the Sorbonne，巴黎大學的前身。

[303] League of Nations

[304] masterless man。原註 4：Thurnwald, R. C., *op. cit.*

[305] 原註 5：Brinkmann, C.,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1924.

[306] 原註 6：Toynbee, A.,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87, p. 98.

Ricardo 構建的的勞動力市場是川流不息的人類生命受制於食物數量的供應，使 Hobbes 對國家的古怪構想相形見絀；國家巨靈的軀體是由無數人類軀體組成。雖然人們承認有慣常標準，勞動工資不能低於這標準，但這想法要有效果，就要迫使勞工只能選擇沒有食物或是在市場以任何價格出售勞力。這順帶解釋了古典經濟學無法說明的疏忽，即是只有饑餓的懲罰，不是高工資的魅力，才有能力建立一個運作的勞動力市場。殖民地的經驗也證實了這想法。因為工資越高，對土著的誘因越低；土著不同白人，不會受到本身文化標準驅使盡力賺最多的錢。早期勞工也痛恨工廠，感到屈辱和受折磨；除非受到體罰（不是身體致殘），土著不樂意以我們的方式工作。十八世紀法國里昂生產商主張低工資，主要是出於社會理由，[307] 認為勞工過度工作和被壓制才放棄與夥伴交往和放棄逃出聽任主子命令的環境。「心甘情願的勞工」要有一些先設條件：例如英格蘭的法律強制和教區農奴制，歐洲大陸的嚴苛勞工警察，美洲早期的契約勞工。但最後階段是運用「大自然的懲罰」，即饑餓，而且必須摧毀不讓個人挨餓的有機社會。

保護社會的責任首先落在能夠直接執行他們意向的統治者。然而，經濟自由主義者過於容易假設經濟性統治者才會受益，而政治性統治者往往不能受益。亞當·斯密似乎不是這麼認為，他極力主張英國直接統治應取代通過在印度的特許公司，認為政治性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彼此的利益平衡，後者的財富增加前者的稅收，而商人的利益很自然與顧客的利益對立。

出於本身利益和傾向，英格蘭地主有責任保護平民生活免受工業革命洪流的衝擊。史賓漢蘭制度是保衛傳統農村組織的護城河，抵抗當時席捲鄉村的動亂導致農業成為不穩定的行業。鄉紳很自然不情願向工業城鎮各種要求屈服，首先起來全力對抗一場註定失敗的百年之戰。他們的反抗不是徒勞，而是拖延了幾代人的衰落和爭取到幾乎是全面調整的時間，阻礙了關鍵四十年的經濟發展，並在 1834 年「改革議會[308]」廢除史賓漢蘭制度時，地主把對抗轉移反對工廠法。教會和鄉紳鼓動人民對抗紡織廠廠主；如廠家取得優勢會使得人們大力要求廉價食物，間接威脅要削減地租和稅金。其中一位是 Oastler：「牧師、托利黨黨員，保護主義者」[309]和人文主義者；工廠運動的主要人物還有混雜了保守黨社會主義[310]的 Sadler、Southey 和 Shaftesbury 勳爵。但推動大量信徒的是各人對金錢損失的預感確實有充份的佐證：英格蘭曼徹斯特市出口商很快要求較低工資和較便宜的穀糧；廢除史賓漢蘭制度和工廠的發展事實上為 1846 年〈反穀物法[311]〉的騷動鋪平道路。然而，由於偶然的原因，英格蘭農業的崩潰整整推遲了一代。其間，Disraeli 以抗議〈濟貧法修正法〉為保守黨社會主義打下基礎，英格蘭的保守地

[307] 原註 7：Heckscher, E. F., *op. cit.,* Vol. 11, p. 168.
[308] Reform Parliament
[309] 原註 8：Dicey, A. V., *op. cit.,* p. 226.
[310] Tory socialism
[311] Anti-Corn Law

主以激進的新生活方法加諸工業社會。馬克思讚揚 1847 年的〈10 小時法案[312]〉為社會主義第一次勝利，是受啟蒙的反動份子的成果。

勞動人民本身在這偉大運動中根本不是要素；形象地說，這運動的效果是讓勞動人民捱過了中央航道[313]。一如 Hawkins 船長裝運的黑奴一樣，勞動人民在決定本身命運時幾乎沒有發言權。然而，正是因為英國工人階級沒有主動參與決定本身的命運而決定了英格蘭社會史的進程；無論是好是壞，英格蘭的進程與歐洲大陸大不相同。

漫無目的的刺激，新興階級的摸索和失誤；很久以前歷史已經揭示其獨特色彩。政治方面，1832 年〈議會改革法[314]〉拒絕英國工人階級有投票權；經濟方面，1834 年〈濟貧法修正案〉區分工人和赤貧民，工人得不到救濟；英國工人階級就是這樣被定義。在未來一段時間，「未成形」工業工人不能確定救贖是否回歸農村生活和手工藝。在史賓漢蘭制度後二十年，勞工致力遏止自由使用機器：或是執行〈工匠法〉的學徒條款，或是一如 Luddite 派的直接行動〔搗毀機器〕。這向後看的保守態度是 Owen 主義運動的潛流，直至 1840 年代末期〈十小時法案〉，憲章運動[315]的衰落和資本主義黃金時代開始，人們才忘記過去。直至那時，新生的英國工人階級不瞭解自己；只有密切注意並理解其半意識行動，才可以評估英國工人階級未能平等分享國家生活引致的龐大損失。Owen 主義和憲章運動已精疲力盡，英格蘭國變得更貧窮；在這些事情的背景，其實盎格魯—撒克遜人[316]可以建立未來數百年自由社會的理想。

即使 Owen 主義運動只引發了規模不大的地方性活動，但在人類創造性想像方面是豐碑；即使憲章運動沒有走出構思「國定假日[317]」以爭取人民權利這核心的界限，憲章運動顯示了有些人仍然在夢想他們的夢，對已忘記人類的社會有意見。然而 Owen 主義運動和憲章運動都不是這種情況。Owen 主義不是小圈子的啟示，憲章運動也不是只限於政治精英；兩個運動的參與者包括成千上萬的工匠、勞工和工人，組成現代史上最大型的社會運動。雖然兩項運動不盡相似，但失敗的程度類似，但前者已足以證明保護人民免受市場威脅的必要性是無可避免。

[312] 1847 年〈工廠法〉Factory Act 亦稱 Ten Hours Act，限制紡織廠女工和十三至十八歲青年工人每最期五天每天工時十小時，星期六八小時。

[313] Middle Passage。奴隸貿易時代，非洲、歐洲和南北美洲之間形成三角形航運路線。「中間航道」是歐洲前往南北美洲的中手航程，泛指旅途的中段。。

[314] Parliamentary Reform Act

[315] Chartism，1838-48 年英國勞工要求社會和政治改革的群眾運動。

[316] Anglo-Saxon，泛指五世紀至十一世紀在英格蘭東部和南部生活，其語言和種族近似的多個民族。

[317] national holiday。所謂「國定假日」其實是 1830 年代工運份子計劃全國大罷工，以爭取政治改革。

Owen 主義運動本來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工人階級的運動，只是普通民眾的欲求被工廠到來所打擊，要尋找人控制機器的生存方式。我們看來這運動本質上的目的是要繞過資本主義。當然，這樣的構思必然是相當誤導，因為人們依然沒有理解資本的組織角色和自發調節市場的本質。可是，這也許最能表達 Owen 的精神，要強調他從來不是機器的敵人。Owen 認為儘管有了機器，人民依然應該是自己的僱主；合作或「結合」的原則可以解決機器的問題，不用犧牲個人自由或社會團結，不用犧牲人的尊嚴或他對同胞的同情心。

Owen 主義的力量在於它的啟示非常實用，而方法是建立在對人的整體理解。儘管各種問題本質上是日常生活的問題，諸如食物品質、住房、教育、工資水準、防止失業、生病時的支援等等，但涉及的各種問題是一如所呼籲的道德力量一樣廣泛。如能找到正確方法，認為人可以找回存在〔意義和方法〕的信念就可以讓運動的根源穿透人格形成的更深層次。極少有另一規模相近但稍欠智慧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的信念把即使看似非常瑣細的活動都賦予意義，因而無需設定任何信條。誠然，他們的信念是預言性，因為他們堅持的重建方法超越了市場經濟。

Owen 主義是工業宗教，工人階級是承載者[318]，其形式和方案之豐富無與倫比。實際上，這是現代工會運動的始祖。成立合作社，以會員為主要零售對象；這當然不是常規的消費者合作社，而是由熱心者支持的商店，利潤用於促進 Owen 主義的計劃，尤其是建立合作社鄉村[319]。「他們的活動有教育性和宣傳性以及商業性，目的在聯手創造新社會」[320]。工會成員成立的「工會商店」本質近乎「生產者合作社」，方便失業工匠找到工作，或是如發生罷工時可以賺點錢。Owen 式「勞工交易所」把合作社商店的精神發展成為獨特的制度。「交易所」或「集市」的核心是各種工藝的互補性質；工匠滿足彼此的需求，從而解放自己，以為免受市場波動的影響；隨後採用流通量很大的勞動券。這樣的手段在今天看來似乎很好；但 Owen 時代還沒有探討勞動工資以及甚至鈔票的特點。社會主義與 Bentham 式運動豐富想像的大量計劃，本質上和發明沒有差異。不僅是反叛的反對派，受尊重的中產階級也是在探索。Bentham 本人有投資 Owen 在 New Lanark 的未來教育計劃，還得到分紅。Owen 式會社是協會或同人組織，以支持上文提到的與濟貧有關的鄉村合作社；這是農業生產者合作社的起源，是長期又卓越有成的概念。第一個全國性生產者合作社是「作業建築商協會[321]」，有工團主義者的目標，試圖通過建造「範圍最廣泛的協會」直接監管建造業，引人本身的貨幣，展示實現「旨在解放生產階級的偉大協會」的手段。十九世紀的工業生產者合作社源自這事業。其後的建築工人工會[322]及其「議會」萌生了更雄心勃勃和牢固的工會，

[318] 原註 9：Cole, G. D. H., *Robert Owen,* 1925.
[319] Villages of Co-operation
[320] New Society
[321] Operative Builders’ Union
[322] Builders' Union or Guild

短時間已有近百萬工人工匠附屬於其鬆散組織的工會聯盟和合作社。工會的思想是工業和平革命；記得他們的運動初始時是以救世主形式出現，只是勞動人民意識到他們的使命已足以使勞動人民的心願難以壓制，因此工業和平革命的想法看來沒有矛盾。Tolpuddle 蒙難者[323]屬於這工會一個農業分會。「重建會社」[324]繼續宣傳工廠立法，並在稍後成立道德會社，是世俗主義運動的先驅。這些組織全面開展非暴力抵抗。一如法國的**聖西蒙主義**[325]，英格蘭的 Owen 主義表現出精神啟蒙的所有特點；但聖西蒙致力耶教復興，而 Owen 是現代工人階級領袖中第一位反對耶教。世界各地都有模仿英國的消費者合作社，這當然是 Owen 主義最突出和實用的衍生成就。英國工業史最大的一次精神力量挫折莫過於消費者合作社失去動力，或更精確地說只是在消費者運動邊緣存在。但在史賓漢蘭制度時期道德衰敗之後，這民族仍然有彈力發揮和維持如此有想像力的新猶，這民族有無限智力和情感活力。

Owen 主義的整體看法仍然殘存著某些中世紀遺傳的社團生活方式，見諸「建築工匠協會」和他的社會理想「合作鄉村」的農村情景。雖然這是現代社會主義的源頭，但建議不是基於財產問題，財產只是資本主義的法律方面。一如聖西蒙主義，Owen 主義遇上工業新現象，認識到機器的挑戰。但 Owen 主義的特點是堅持**社會**方法，拒絕接受把社會分割為經濟和政治領域，亦因而拒絕政治行動。接受有分隔的經濟領域，意味著承認社會的組織力量是得益和利潤的原則。Owen 拒絕這說法。他的天賦認識到只有新社會才能夠包容機器。對他來說，事情的工業方面決不局限於經濟方面（這意味著他拒絕了社會的市場觀點）。New Lanark 工廠的經驗讓他明白工資只是工人生命的一個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大自然與住宅環境，商品的品質與價格以及就業穩定。（一如其他工廠，New Lanark 工廠即使沒有工作也發工資。）但調整過程包含更多因素。整體工業人口要有建立新社會地位的環境，就要顧及兒童和成人的教育，娛樂、舞蹈和音樂，以及人人有高尚道德和個人標準。來自整個歐洲（甚至美國）的訪客川流不息參觀 New Lanark，以為這是未來的保留地，完成了不可能的壯舉，即是整體員工操作成功的工廠。但 Owen 支付的工資其實低於附近一些城鎮的公司。New Lanark 工廠的利潤主要是因為工時較短而工人有較高生產率，這是因為卓越組織和工人有充分休息，這些優勢勝過增加實際工資來慷慨提供體面生活。但後者已足以解釋工人以阿諛奉承的態度緊貼 Owen。他從這些經歷汲取以社會方法解決工業問題，即是比經濟方法更廣泛。

---

[323] Martyrs of Tolpuddle；1832 年，英格蘭南部 Tolpuddle 村六名農業工人成立友誼會，抗議工資過低。當時法律禁止宣誓加入會社，六人被定罪流放澳大利亞殖民地。此案引起民憤，掀起英格蘭首次大型示威抗議，六人先後獲釋回國。

[324] Regeneration Societies

[325] Saint-Simonianism；十九世紀上半葉在法國由 Saint-Simon 發起的政治和社會運動。他的著作關心工業化和科學發現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他認為社會要重整，先要放棄傳統的時空觀念，才可以演變成為人人各盡其力的有生產力社會，這是「真正平等」的基礎。他的思想影響了馬克斯，John Stuart Mill 和其他思想家及社會理論家。



儘管這有全面觀點，但他有見識抓住了支配工人生活的具體事實的尖銳特性。他的宗教意識厭惡 Hannah More 的實用性**先驗論**[326]，以及她的《廉價宗教小冊子[327]》。有一本小冊子讚揚一位在蘭開夏煤礦工作的女孩。她九歲就要下礦井，為她少兩年的弟弟當拉車工[328]。「她高高興興跟隨父親進入煤坑，埋首地下深處，少少年紀已不以性別為藉口，和礦工做同樣工作；這幫男人很粗魯，但對社會有極大貢獻。」（見圖）在一次事故中她目睹父親死於礦難。她後來申請做傭人，但由於當過礦工被歧視，女傭也當不成。幸運的是她的舉止和耐性引起人關注，到煤礦查詢，她有了很好的推薦，終於找到工作。小冊子總結「這故事讓窮人明白只要選擇努力工作，必定可以脫離如此糟糕的生存條件，提升至某種程度的獨立，悲慘的境遇也不能禁絕許多高尚美德的行為。」More 姐妹團樂意和挨餓的勞工一起工作，但對他們肉體受苦沒有興趣，只是利用工人的寬宏大量賦予他們社會地位和功能以解決工業主義的實質問題。More 堅持女主角的父親是社會上有用的人，僱主的好評是女兒地位的佐證。More 認為正常運作的社會只需要這些。[329] Owen 捨棄耶教，因為這宗教拒絕人可以掌握世界，偏重歌頌 More 筆下可憐女主角的假想地位和功能，而不是面對超越耶教新約經文揭示人在複雜社會中的苦況。沒有人懷疑 More 的信念：她認為窮人越容易默默接受許其墮落的景況，就越容易轉向尋求上天的慰藉；她堅信市場社會，認為這是窮人得到救贖和市場有序運作的依歸。最有愛心的上層階級深信這些耶教空話，與努力挽回社會的英格蘭人民對工業宗教的創造性信念是南轅北轍。然而，資本主義仍然還是有前途的。

在 Owen 主義實踐和不成熟倡議失敗之後，幾乎可以預見訴諸於許多不同衝動的憲章運動會乘時而起。這純粹是試圖通過憲法途徑試圖影響政府，追隨以往中產階級取得選舉權的「改革運動」的傳統路線。「憲章六條[330]」要求有效的普選權。六、七十年來，改革後的國會毫不妥協，面對群眾對憲章派的廣泛支持時不惜使用武力，自由主義者在 1840 年代對人民政府概念的憎惡，在在證明英格蘭中產階級不接受民主政治的概念。只有在工人階級接受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原則，工會

---

[326] transcendentalism

[327] Cheap Repository Tracts；1795 至 1797 年間，Hannah More 策劃和出版約一百二十份宗教小冊子，廉價出售，讀者是略懂文墨的窮人。小冊子批判酗酒、放蕩、懶散、賭博、暴力集會；贊揚誠實、勤儉、忍耐和安於本份等美德。小冊子頗為成功，每年銷量有二百萬份。

[328] 原註 10：More, H., *The Lancashire Colliery Girl,* May, 1795; Cf. Hammond, J. L. and B., *The Town Labourer,* 1917, p. 230.

[329] 原註 11：Cf. Drucker, P. F.,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1939, p. 93, on the English Evangelicals; and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1942, pp. 21 and 194 on status and function.

[330] Six Points of the Charter。倫敦工人協會的人民憲章運動提出的六項政治改革：一人一票、保護投票選民、選民資格不以財產甄別、議員受薪、公平選區規模、議員任期一年。（資料）

以工業順利運作為己任之後，中產階級才把選舉權向較高地位的工人開放；這時憲章運動已煙消雲散，肯定工人不會利用選舉權來實現他們的想法。從擴展市場存在形式的角度來看，這可能言之成理，因為這有助克服勞動人民依然保留殘存的根本和傳統生活方式的各種障礙；但人民的生活方式已被工業革命連根拔起，如何重整老百姓的種種不同工作，這方面隻字不提。人民的生活受到不可挽回的損害，影響了他們分享領導權的能力，授予他們有投票權也不能改善這情況。統治階級犯了錯誤，把僵硬的階級統治原則擴大至另一類型的文化：為了避免衰退性影響，這文化要求聯邦國家的文化和教育統一。

憲章運動是政治性，比 Owen 主義更容易領會，但如對那時代沒有一些豐富想像力，則不能夠理解運動的情感強度或廣泛範圍。1789 年和 1830 年把歐洲革命變成常規；1848 年巴黎起義實際上是柏林和倫敦的預報，預告社會動亂爆發的精確程度比預告集市開張更為準確，「後續」革命迅速在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和義大利的一些城鎮爆發。倫敦極度緊張，因為包括憲章運動者在內人人期望以暴力行動迫使國會同意人民有選舉權。（有普選權的成年男人少於 15%。）1848 年 4 月 12 日這一天是英格蘭史上集結最多武力的一天，以保衛法律和秩序；幾十萬市民在那一天以輔警身份武裝起來對付憲章運動者。巴黎革命來得太遲，未能把英格蘭的平民運動帶向勝利。由〈濟貧法修正案〉和饑餓的 1840 年代苦難激起的反革命精神已逐漸減弱；貿易興旺的浪潮增加就業，資本主義漸見成果。憲章運動者和平散去。國會稍後考慮他們的訴求，下議院以五比一多數票不通過議案。數百萬人簽名沒有作用。憲章運動者的奉公守法行為沒有作用。勝利者的嘲弄使運動煙消雲散，結束了英格蘭人民建立平民民主的最大政治努力。一兩年後，人們幾乎忘記了憲章主義。

半世紀後，工業革命傳至歐洲大陸。當地沒有圈地行動迫使工人階級放棄土地；更確切地說，高工資和城市生活引誘半奴隸農工放棄莊園移居到城鎮，與傳統的下層中產階級交往，有機會學習城市語調。在新的環境中，他非但沒有感到社會地位降低，反而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得到提升。即使在二十世紀之初，低下階層的城鎮工人的居住條件依然惡劣，酗酒賣淫猖獗，但這與英格蘭農工或世代相傳佃農的道德和文化災難無法相比，因為後者是無助地在工廠附近的貧民窟沉淪於社會和物質困境；在這方面，斯洛伐克或波蘭的農工幾乎在一夜之間從擁有穩定住所的傭農變成現代大都市的工業工人。愛爾蘭或威爾斯的日薪工人或蘇格蘭高地人懶洋洋走過早期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小巷時，也許有相似經歷；但英格蘭自耕農的兒輩或被逐離家的佃農肯定沒有覺得社會地位提高。然而，在歐洲大陸，不只最近得到解放的糊塗農民極可能提升至中產階級的下層（古代文化傳統的工匠和商人），社會地位稍高的中產階級在政治上都有相同處境，幾乎一樣被排除在實際統治階層之外。崛起中的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緊密結盟，以反對封建貴族和羅馬主教勢力。知識份子，尤其是大學生，結合了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共同

攻擊專制主義和特權階級。無論是十七世紀的鄉紳和商人還是十九世紀的農場主和商販，英格蘭的中產階級有足夠力量維護本身的權利，即使在 1832 年的近乎革命中也沒有尋求勞工階層的支持。此外英格蘭貴族一直吸收最富裕的新移民，擴大最高社會階層的範圍，而歐洲大陸的半封建貴族依然沒有與中產階級的子女通婚；因為沒有長子繼承的制度，從而使貴族自閉於其它階級。因此，邁向同等權力與自由的每一步，使歐洲大陸的中產和工人階級同樣受益。始於 1830 年（如果不是 1789 年），工人階級參與中產階級對抗封建制度是歐洲大陸傳統的部份，但正如常言道中產階級盜取了勝利的果實。但不管是勝是敗，工人階級取得經驗，把目標提升到政治層面。這就是「具有階級意識」的含義。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明確了城市工人的視野，環境教導了城市工人使用其工業和政治力量作為高層政治的武器。英國工人在工會主義的個人和社會問題方面取得無與倫比的經驗，包括工業行動的策略，把國家政治留給較有能力的人，而中歐工人成為政治社會主義者，慣於處理治國之道的各種問題，說真的是主要關心本身的利益，諸如工廠法和社會法案。

如果說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工業化有半個世紀左右的間距，那麼建立統一的國家有更大的時間間距。英國在數百年前已實現統一，義大利和德國要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才統一，東歐一些小國更晚一些。在這建國過程中，工人階級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進一步增強了他們的政治經驗。在工業時代，這過程一定包含了社會政策。卑斯麥通過採用社會立法這種新紀元形式試圖統一第二帝國。義大利的鐵路國有化加快了統一。奧匈帝國融合了多個種族和民族，國王一再呼籲勞工階級支持中央集權和帝國統一。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在這個較大領域內通過他們對立法的影響，有更多機會服務工業工人的利益。

唯物主義的先設概念模糊了工人階級的輪廓。英國作家很難理解歐洲大陸觀察員對〔英格蘭〕蘭開夏郡早期資本主義環境的極壞印象。他們指出中歐紡織業許多工人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與英格蘭同行一樣差勁。然而，這種比較掩蓋了顯著要點，即是歐洲大陸工人的社會和政治地位上升，而英格蘭工人的地位下降。歐洲大陸工人沒有經歷史賓漢蘭制度那樣可恥的赤貧化，也沒有類似〈新濟貧法〉的灼熱經歷，他的社會地位從佃農改變，或更精確地說是升級成為工廠工人，並且很快成為有選舉權和有工會組織的工人，因此避開了緊隨英格蘭工業革命之後的文化大災難。而且由於效法英格蘭的社會保護措施，歐洲大陸工業化時已可以調整適應新的生產技術。[331]

從社會意義來說，歐洲大陸根本沒有工業革命，所以大陸工人需要的保護不是針對工業革命，而只是針對工廠和勞動力市場環境的正常行動。大陸工人主要借助

[331] 原註 12：Knowles, L.,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1926.

立法來實現保護，而英國工人更多依賴自願性協會（工會）以及協會壟斷勞動力的勢力。相對來說，歐洲大陸的社會保險計劃早於英格蘭，這種差異在於歐洲大陸的政治傾向以及工人群眾較早享有投票權。儘管容易高估強制性和自願性保護方法（即立法與工會主義）的經濟差異，但政治方面是有很大差別。在歐洲大陸，工會由工人階級政黨創立，而英格蘭是由工會創立政黨。歐洲大陸的工會主義或多或少改變為社會主義，而在英格蘭甚至政治性社會主義本質上仍然是工團主義。因此，普選權在英格蘭提升國家團結，但有時在歐洲大陸有相反效果。評論家擔心人民政府對經濟體系構成危險，這體現在歐洲大陸，不是英格蘭。

從經濟角度看，英格蘭和歐洲大陸的社會保護方法導致幾乎一樣的結果：都實現了原來的打算，即是破壞稱為勞動力這生產要素的市場。只有當工資和物價一並下降，這樣的市場才能實現其目的。從人的角度看，這樣的假設意味著工人收入極不穩定，絕對沒有專業標準，可憐無依地任由市場突如其來隨意擺佈。Mises 公正地指出，如工人「沒有成為工團主義者，而是按照勞動力市場的需求降低要求和轉換地點和職業，最終會找到工作。」這總結了建基於勞動力商品化假設的制度的情況。商品不能決定在什麼地方出售，用於什麼目的，以怎樣的價格轉手，以及以什麼形式被消耗或消滅。這位始終如一的自由主義者寫道：『沒有人曾想到「沒有工資」是比「沒有工作」更好的用語，因為失業者錯過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的報酬。』他說得對，但這不是他的創見；一百五十年前，Whately 主教說過：「有人乞求工作時，他要求的不是工作，而是工資。」但以下的說法技術上是正確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問題是由於政府和工會的政策都是旨在維持與現有勞動生產率不相符的工資水平。」Mises 質疑：若然不是工人「因為工資不符理想，拒絕勞工市場某些他們有能力和願意做的工作」，不可能有失業問題。這清楚解釋了僱主要求勞工流動和彈性工資的真正意思正正是上文把市場限定為勞動力商品化的市場。

所有社會保護措施的正常目的是破壞這樣的制度，使其難以存在。事實上，只有在工資和工作環境，標準和規章制度能夠保障所謂商品（即勞工）的人文特性的情況下，才允許勞動力市場保留其主要功能。有時有人指出社會立法、工廠法、失業保險，特別是工會沒有干預工人流動性和彈性工資，就意味著那些制度完全沒有達到目的，這目的正正是要干預人類勞動力的供求定律，使其離開市場軌道。

（參考閱讀）王文霞：英國工會與工會主義的發展(1800-1880)



第十五章

市場和大自然

所謂「土地」是大自然的基本要素，與人類制度緊密交織。把土地獨立出來並形成土地市場，或許是先民最不可思議的事業。

土地和勞動傳統上是不可分離；勞動是生活的一部份，土地是大自然的一部份，生活和大自然形成了明確的整體。因此，土地跟家族、鄰里、行業和宗教這些組織、與鄉村、協會和教會有密切聯繫。另一方面，「大市場[332]」是經濟生活的安排，包括生產要素的多個市場。因為這些要素正好不能與人類制度、人以及大自然這些要素區分，所以很容易看到市場經濟包括了社會，而社會制度是服從市場機制的需要。

有關土地的命題，就像勞動力的命題一樣是理想國形態。經濟功能只是土地許多重要功能之一。土地賦予人類生活的穩定性，是居住的地方，人身安全的條件，是風景和四季。可以想像出生時沒有手腳，猶如生活沒有土地。然而，市場經濟體系的理想國概念就是把人和土地分離，並以這方式組織社會以滿足房地產市場的需要。

再者，現代殖民化領域特顯這情況的真正意義。無論殖民者取得土地是為了埋藏其下的財富，或是土著生產的食物和原材料盈餘，這都無關宏旨；土著是否在殖民者直接監督或某些間接強迫形式下工作，這也沒有很大分別；因為每種情況都是先要粉碎大自然生活的社會和文化體系。

現在的殖民形勢和西歐一二百年前的形勢極為相似。外國實現動用土地資源可以壓縮為若干年或數十年，西歐可能要用上幾百年。

挑戰來自資本主義的純粹商業形式以外的增長。農業資本主義始於英格蘭都鐸王朝，要對土地特殊處理，包括改造和圈地。自十八世紀起，工業資本主義在法國和英格蘭興起，主要出現在農村地區，要有場地用於建造工廠和工人的住宅。最具影響力的挑戰是十九世紀工業城鎮興起，對食物和原材料供應的無限需求，但這更多是影響土地的使用而不是所有權。

表面上看，對這些挑戰的各種反應似乎沒有什麼相似，然而這些都是地球這行星表面臣服於工業社會需求的不同階段。第一階段是土地商業化，調動封建時代的土地收入。第二階段是強迫增加食物和有機原材料生產以滿足國家規模的快速增長工業人口的需要。第三階段是把盈餘生產的體制延伸到海外和殖民領地。隨著這最後階段，土地及其產品最終適應了自發調節的世界市場系統。

---

[332] One Big Market

土地商業化是清算封建主義的另一名稱，始於十四世紀西方城市中心和英格蘭，約在五百年後結束於歐洲革命消滅了農奴制的殘餘。人和土地分離，意味著經濟體系分解為各個要素，方便各要素在經濟體系中找到最適合發揮本身作用的地方。新體制建立時，與舊體制並存，並通過控制與前資本主義依然緊密關聯的土地，試圖同化和吸收舊體制。封建時代沒收土地的措施被取消，「目的在於消除鄰里和家族組織對土地的所有要求，特別是在商業和抵押之外的男系貴族和教會對土地的要求。」[333] 實現這目的之途徑包括：個人勢力和暴力，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革命，戰爭和征服，立法手段，行政壓力，以及民間自發的小規模長期努力。混亂是否很快結束，或是否對社會體系造成顯著創傷，主要取決於調節個程的各項措施。政府引入各種有力的變革和調節因素。例如，直至義大利完成統一大業（1815-70 年），教會土地回歸民間是現代國家的基礎，也是土地有序轉讓私人的主要手段。

法國大革命和 1830-40 年代的效益主義改革採取了最大的單一步驟。Bentham 寫道：「沒有指定繼承人、沒有不可轉讓的捐贈、沒有公地、沒有回贖權、沒有十一稅…，這是農業繁榮最有利的條件。」這樣有自由處理財產，特別是土地財產，構成了 Bentham 個人自由主義概念的基本部份。立法的目標和結果是以種種方法擴大這種自由，包括〈1832 年時效歸益法[334]〉、〈1833 年繼承法[335]〉、〈1833 年拟訴棄權法[336]〉、〈1833 年土地財產時效法[337]〉以及 1801 年的一般〈圈地法[338]〉及其後修訂版本[339]，還有從 1841 至 1926 年間多項〈土地登記法[340]〉。在法國和歐洲大陸許多國家，《拿破崙法典[341]》確立了中產階級的財產形式，使土地成為可買賣商品，抵押成為民間契約。

第二步驟與第一步驟有重疊，是使土地服務城市人口快速增的需求。土地實質上當然不可能流動，但如運輸條件和法律允許，土地的產品可以流動。「**因此，商品流通在某程度上彌補了要素不能在地區間流通**；或者說（其實是同一件事）**貿易減輕了生產設施不適當地理分佈的劣勢**。」[342] 傳統思想沒有這種觀念。「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古代和中世紀早期沒有定期買賣日用品的習慣。」[343] 剩餘的穀物

[333] 原註 1：Brinkmann, C.,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1924.
[334] Prescription Act，界定長期使用某物品（包括土地）的時效而取得擁有權。
[335] Inheritance Act
[336] Fines and Recoveries Act 廢除兩項土地業權。
[337] Real Property Limitation Act
[338] Enclosure Act
[339] 原註 2：Dicey, A. V., *op. cit.,* p. 226.
[340] Copyhold Acts
[341] Code Napoleon
[342] 原註 3：Ohlin, B.,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1935, P. 42.
[343] 原註 4：Bucher, K.,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904. Cf. also Penrose, E. F., *Population Theo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1934, 引述 Longfield, 1834 首次提出商品流通可以被視為代替生產

是用來供應附近地區，特別是本地城鎮的糧食需要；一直到十五世紀，穀物市場一直是當地化組織。但城鎮發展吸引了地主為了在市場上銷售而生產；在英格蘭，大城市的發展迫使當局放鬆對穀物貿易的限制並允許穀物在地區之間流通，但這從未發展為全國規模。

十八世紀下半葉工業城鎮人口聚結，最終根本性改變了形勢；首先是全國範圍，然後是世界範圍。

自由貿易的真正意義實際上推動這改變。農產品流通從附近農村地區延伸到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工農業的勞動分工在全球應用。因此，遙遠地區的人民被扯入這變化的漩渦，但不理解這變化的源頭；歐洲各國的日常活動變得依賴還沒有得到確實保證的全人類生活一體化。有了自由貿易，全球相互依賴所帶來的新龐大危險便應運而生。

社會防衛全面混亂的陣線也是一如面對全面攻擊的範圍廣闊。雖然不成文法和立法時不時加快變革節奏，但是在其它情況下則拖慢步伐。但不成文法和成文法在任何時候未必有相同方向的作用。

在促進建立勞動力市場方面，不成文法有積極作用；首先強調提出勞動商品論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律師。在有關勞動組合和合謀法方面，不成文法偏向自由勞動力市場，但這意味著要限制組織工會的自由。

但不成文法對土地問題的作用卻從鼓勵變革改變為反對。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不成文法經常主張地主有權提高土地的盈利性，即使這導致居住環境和就業狀況陷入嚴重混亂。就我們所知，在歐洲大陸這流通過程涉及《羅馬法》的孕育，而英格蘭的不成文法獨樹一幟，成功消除有限制的中世紀產權與現代個人產權的差距，但沒有犧牲與憲法自由至關重要的原則，即是由法官制定法律。另一方面，自十八世紀以來，有關土地的不成文法在面對法律現代化時起了保護過去的作用。但最終是效益主義起了作用；在 1830-60 年代，契約自由擴大到土地，但到了 1870 年代這強大趨勢逆轉，立法急劇改變方向。「集體主義」時代已經開始。

各項成文法有意強化不成文法的慣性，以保護農村各階級的居住環境和地權免受契約自由的影響。為確保窮人的住處符合一定程度的健康和衛生標準，有綜合計劃為窮人提供分配地[344]，讓窮人有機會暫離貧民窟，呼吸大自然（所謂「紳士公園」）的新鮮空氣。立法行動旨在保護窮人居住環境免遭經濟進步浪潮破壞，從

要素流通。

[344] allotment。政府把市區的閒置空地分劃成小塊耕地，低價向附近居民出租，絕大多數作園藝種植。這措施時至今日依然大受歡迎。

市場法則控制中解救了不幸的愛爾蘭租戶和倫敦貧民窟居民。在歐洲大陸，主要是成文法和行政行為挽救了租戶、農民和農業勞工免受城市化最強烈的影響。普魯士（德國）保守主義者，例如 Rodbertus[345]是英格蘭托利—民主黨人的血緣兄弟；普魯士的貴族地主社會主義[346]影響了馬克思。

當其時，就世界各國和各大陸農業人口的保護問題出現了。如果不加限制，國際自由貿易必然消除越來越大規模的農業生產者的緊密團體。[347] 這個不可避免的破壞過程，由於現代運輸發展過程的內在不連續性而變得更嚴重，因為運輸價格昂貴而無法推廣到世上的新地區，除非獲利甚豐。一旦建造蒸汽船和鐵路的巨大投資結出碩果，整個大陸得到開發，大量穀物雪崩似壓向不幸的歐洲。這與經典預言相反。Ricardo 把這發展定為公理：人們首先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地。當鐵路在地球的另一相對極發現更肥沃的土地時，他的說法變成莫大的嘲弄。中歐面臨著農業社會全面遭到破壞，被迫引入穀物法保護農民。

歐洲有組織的國家可以保護自己免遭國際自由貿易逆流影響，政治上沒有組織的殖民地人民就無能為力。反對帝國主義主要是異域人民試圖爭取必需的政治地位，以保護自己避開歐洲貿易政策導致的社會混亂。白人通過本身社會的主權地位輕易取得的保護，是有色人種無法企及，因為他們沒有政治政府這種先決條件。

商貿階級提出了土地流通的要求。Cobden[348]發現農牧業是「生意」，失敗者要淘汰出局；這讓英格蘭的地主大吃一驚。工人階級贊同自由貿易，因為食品明顯變得更便宜。工會變成反對土地改革的堡壘，而革命性社會主義把世界農民打上反動份子的標記。國際勞動分工無疑是進步的信條；其反對者往往是判斷力受到既得利益損壞或是天生愚昧。只有少數人既有獨立思想而又沒有利益關係，發現了不受限制自由貿易的誤區，但人數太少，不成氣候。

不過，雖然不是有意識地承認這些事情，其後果仍然是真實的。實際上，阻礙土地流通那些力量所起的重要保護作用，可輕易解釋十九世紀期間西歐的土地利益集團以及中東歐殘存封建生活形式。經常有提出這問題：歐洲大陸的封建貴族已失去權勢來源的軍事、司法和行政職權，如何在中產階級國家維持影響力？有時會提出「倖存者」理論作為解釋：失去功能的機構或特徵由於慣性作用可能繼續存在。較為真實的說法可能是這樣：沒有機構可以在失去功能後依然存活；如能存活下來，這是因為機構已在發揮其他功能，但**不一定包括原來的功能**。因此，封建制度和土地保護主義能保持力量，是因為致力一個目標：這恰巧是能夠限制

[345] Johann Karl Rodbertus (1805—1875)，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
[346] Junker socialism
[347] 原註 5：Borkenau, F., *The Totalitarian Enemy,* 1939, Chapter "Towards Collectivism.
[348] Richard Cobden (1804 –65)，英國政治家，鼓吹自由貿易。

土地流通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當其時自由貿易者已忘記土地是國家領土的一部份，而國家主權的領土特點不僅是感情聯想的結果，也是包括經濟因素在內的大量事實。「相對於遊牧人民，耕種者投入的改良是**固定在特定地方**。沒有這些改良，人類生活必然保持原始狀態，與動物無異。這些固定的改良在人類歷史有多大的作用！正是這些被開墾和耕種的農田，房屋和其它建築物，交流的方法，生產所需各種各樣的工廠（包括工業和礦業），所有永久和不可移動的改良把人類社會牢縛在當地。這些改良不可能是即興，必然經過多代人耐心努力逐步建立；社會不能犧牲一切在別的地方另起爐灶。因此，主權的**領土**特點滲透政治構想。」[349] 這些顯而易見的真理百年來受到嘲諷。

經濟論點可以輕易擴展至包括國土和資源完整所繫的安全先決條件，諸如人民的精力和毅力，豐富的食物供應，戰略物資的數量和特點，甚至國家的氣候可能受到濫伐森林以及侵蝕土壤和沙塵暴的影響；所有這些最終取決於土地因素，而沒有一項對市場的供求機制有反應。既然體制是完全依賴市場功能來保障其存在的需求，很自然信心會轉投市場體制之外的力量，這些力量有能力保護被該體制損害的共同利益。這觀點吻合本書對階級影響真正源頭的理解：與其以反對階級的影響（沒有解釋）來解釋與一般趨勢相逆的發展，本書以事實解釋這些階級的影響即使是無意之間代表著各種發展，也只是表面上與社會整體利益背道而馳。這些階級的利益往往受惠於這樣的政策，正好說明真相：各階級得到的好處遠遠大於他們對一般平民的服務。

史賓漢蘭制度是另一例子。管理農村的鄉紳想到辦法放慢農村工資上漲和延遲可能破壞農村傳統結構的威脅。長遠來看，他們選擇的方法必然有最邪惡的後果。然而，如鄉紳不是能夠幫助整個國家迎接工業革命的風潮，他們不可能維持他們的慣常做法。

重複以上的說法：歐洲大陸的農業保護主義是必要的。但當代最活躍理性力量參與的冒險事業恰巧改變了他們的視角，以至未能察覺農業苦況的真正重要意義。在這情況下，有組織能夠代表面臨危險的農村利益，其成員的影響力可以越出人數比例。保護主義的對抗運動實際上成功穩住歐洲農村以及減緩向城鎮流動這些當代災害，也恰好發揮了對社會有用的功能，而反動〔階級〕由此得益。當歐洲的反動階級為耕地稅而戰時，以類似功能玩弄傳統感情，也是半世紀之後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和其它進步的社會技術成功的根由。社會的相同需求，在新世界有助民主，但在舊世界卻加強了貴族的影響力。

反對土地流動是十九世紀歐洲大陸政治史中自由主義和反動主義之間鬥爭的社會背景。在鬥爭中，軍方和教會高層與土地階級結盟，後者已幾乎完全失去對社

[349] 原註 6：Hawtrey, R. G., *The Economic Problem,* 1933.

會的較直接功能。當時社會陷入僵局，而市場經濟體系及其必然後果（即憲制政府）有主導大局的傾向，因為市場經濟體系從來不服從傳統以及公眾自由和議會統治的意識形態；土地階級成為任何解決僵局的反動方案的可用籌碼。

簡而言之，經濟自由主義與自由政體聯姻，而土地利益集團形單影隻；這是他們在歐洲大陸享有永久政治影響的源頭，從而產生卑斯麥治下普魯士的政治橫流，刺激法國神職人員和軍國主義者的復仇，確保哈布斯堡王朝[350]封建貴族的宮廷影響力，使教會和軍隊成為崩潰王朝的保衛者。因為這關係經歷了重要的兩代人，土地和土地財產被認為有保守的先天性偏好；凱恩斯確定這關係為「永恆」之外的切實可行方案。人們已忘記英格蘭的托利派自由貿易者和重農先行者，一如忘記了都鐸王朝的壟斷者和他們從土地賺錢的革命方法；現代人對農村永遠落後狀態的偏見抹去了法國和德國的重農地主對自由貿易熱情的記憶。Herbert Spencer 認為一代人已是永恆的樣本，他簡單地把軍國主義等同保守，他不會明白日本、俄羅斯或納粹軍隊近來顯示的社會和科技適應性。

這些思想有短暫時限。市場經濟在工業方面所取得驚人成就，代價是對社會內涵造成巨大損害。封建階級從中發現機會恢復失掉的聲譽：搖身一變成為土地和土地耕種者美德的代言人。在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中，「大自然」與「過去」結盟；在十九世紀的農地分配運動中，封建主義頗為成功重拾過去：以監護人自居，保衛人類的大自然生活環境（土地）。如果危險是不真實，這種計謀不會得逞。

但軍方和教會也是通過「保衛法律和秩序」取得聲譽，不過法律和秩序現在變得非常脆弱，而管治的中產階級不適合確保新經濟體系的要求。與任何已知的其它經濟體系相比，市場體制對暴亂更敏感。都鐸政府因為有暴亂才注意到當地人民不滿；可能處死幾個元兇，之後一切如常。金融市場崛起意味著完全拋棄這種態度；1797 年之後暴亂已不常見於倫敦生活，逐漸被會議取代，會議至少在原則上以舉手表決，不是揮拳相向。[351] 普魯士國王宣佈維持和平是臣民首要職責，他為這悖論而出名；然而不久這已是尋常事物。十九世紀時，如武裝暴民破壞和平，會被認為是初期叛亂，對國家構成嚴重危險；股票崩盤且一瀉而下。大城市街上射擊鬧事可能破壞國家名義首都的頗大部份。然而中產階級不是英勇軍人；大眾歡迎的民主因為鼓動廣大群眾發表意見而沾沾自喜；歐洲大陸的資產階級在防衛路障面對殘暴的貴族時，仍然念念不忘革命青年時代。受自由病毒毒害最少的農民最終被認為是「為了法律和秩序」站出來的唯一階級。保守派的作用之一是維持工人階級的現狀，以免市場陷入恐慌。雖然不是經常要用到農民，但農民

[350] Hapsburg empire 包括了 1804 年到 1867 年的奧地利帝國和 1867 年到 1918 年的奧匈帝國。

[351] 原註 7：Trevelyan, G. M., *History of England,* 1926, p. 533. 「Walpole 治下的英格蘭依然是貴族統治，但不時有動亂。」Hannah More 的詩篇 *The Riot* 是在 1895 年書成，「那是稀缺和警號的一年」，也是史賓漢蘭制度出台的一年。Cf. *The Repository Tracts,* Vol. 1, New York, 1835. Also *The Library,* 1940, fourth series, Vol. XX, p. 295, on "Cheap Repository Tracts (1795-98)."

可以作為產權的保護者已經是重農陣營的資產。

不是這樣不可以理解 1920 年代的歷史。當其時中歐的社會結構在戰爭和戰敗的壓力下瓦解，只有工人階級使社會繼續運轉。各國的工會和社會民主黨接掌權力：奧地利、匈牙利甚至德國宣佈成為共和國，雖然這些國家從來沒有活躍的共和國政黨。但一旦混亂的嚴重危險過去，工會的效用變得多餘，中產階級試圖排除工人階級對公眾生活的全部影響力。這被稱為戰後時期的反革命階段。實際上，自從工人組建為積極反對共產主義的政黨和工會，共產主義政權從來不是任何嚴重的危險。（匈牙利抵禦法國入侵後別無選擇，曾有幾乎是強加於該國的短暫布爾什維克[352]時期。）在非常時期，危險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而是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忽視了市場經濟體系的規則。在市場經濟體系，本來對公共秩序和貿易習慣沒有損害的干擾可能構成致命威脅[353]，因為這會導致社會日常生活所依賴的經濟制度崩潰。這解釋了一些國家從即將由工業工人獨裁統治轉由農民獨裁統治的重大改變。在整個 1920 年代，許多國家的農民決定經濟政策，而一般而言農民以前只是小角色，但當時他們恰巧是唯一階級能夠保衛法律和秩序（現代的高度張力術語）。

戰後歐洲激烈的農地均分主義從側面說明了由於政治原因農民階級享有優惠待遇。從芬蘭的拉普阿運動[354]到奧地利的保安團[355]，農民證明是市場經濟的捍衛者，這股勢力在政治上舉足輕重。戰後初期食物短缺，有時被認為是農民優勢所在的原因，但這其實無關宏旨。例如奧地利為了讓農民在財政上得到好處，雖然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來滿足本國的食品要求，但還是維持穀物稅以降低本國的食品水平。為了保護農民利益而不惜代價，雖然重農保護主義為城鎮居民帶來不幸，出口產業要承擔不合理的生產高成本。以前沒有影響力的農民階級就是這樣取得與其經濟重要性很不成比例的優勢。人們恐懼布爾什維克主義，造就了農民的牢固政治地位。然而這並不是恐懼工人階級獨裁統治（眼前沒有絲毫跡象），而是恐懼市場經濟停頓，除非能夠消除如在受壓情況下可能放棄市場遊戲規則的全部勢力。只要農民是有能力消除這些勢力的唯一階級，就可以維持極高聲譽和控制城市的中產階級。一旦國家權力鞏固（甚至在這之前），法西斯主義者把城市的中產下層階級組織成突擊隊，資產階級才能擺脫對農民的依賴，而農民的聲

[352] 「布爾什維 Bolsheviks」是二十世紀初期俄羅斯政治運動中由列寧領導的成員，在 1917 年 10 月參與俄國革命奪取政權。布爾什維派是當時社會主義民主勞動黨（Socialist Democratic Labor Party）的其中一派系，主張強硬路線和只接受全面革命家入黨。布爾什維主義自此成為蘇聯式共產主義的代名詞。

[353] 原註 8：Hayes, C.,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1870-1890,* 謂「至少在西歐和中歐，大多數國家現在是無比的內部穩定。」

[354] Lapua Movement 是芬蘭激進民族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政治運動，以成立基地 Lapua 鎮命名。激進之餘，運動轉向極右政治，並在 1932 年發動政變，失敗後被取締。

[355] Heimwehr，1920-30 年代奧地利境內民族主義的半軍事組織，反對議會民主；其方法，組織和思想模仿德國的自由軍團(Freikorps)。

響迅速回落。一旦城鎮和工廠的「內部敵人」被肅清和壓制，農民又再回落到以前在工業社會的卑微地位。

大地主的影響力沒有受到類似的削弱，因為有一個恆常的有利因素：農業自給自足的軍事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大眾明白基本的戰略事實，不再是不問情由依賴世界市場，而是恐慌性儲存食品生產能力。由對布爾什維克的恐懼所啟動的中歐「重新均分農地運動」是以絕對手段完成。除了「內部敵人」論點，還多了「外部敵人」論點。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如既往只看到不健全經濟學說導致虛構的過失，而實際上政治大事喚醒了即使頭腦最簡單的人民明白到在面對國際體系即將陷入混亂時，經濟考慮已是無關重要。日內瓦（國聯）繼續軟弱無力提醒各地人民他們只是為了對付想像中的危險而儲備物資，只要大家一致行動，就能恢復自由貿易，大家都有好處。在當時極其容易輕信的氛圍，許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經濟問題（不管這意味什麼）的解決方案不僅減輕戰爭的危險，而且實際上永遠避免戰爭的威脅。百年和平建立了一堵牢不可破幻想之牆掩蓋事實真相。當代作家以脫離現實見長。Toynbee[356]認為民族國家是狹隘的偏見，Mises[357]認為主權國家是荒謬的幻想，Angell[358]指責戰爭是做生意計算錯誤。對政治問題本質特點的認識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點。

自由貿易在 1846 年受到〈穀物法〉挑戰並取得勝利，八十年後再次受到同一問題挑戰，但這一回失敗了。從一開始，自給自足的問題就經常困擾著市場經濟。經濟自由主義者據此祈求趕走戰爭的幽靈，天真地把論點建基於市場經濟牢不可破的假想。人們忽略了這些論點只是揭示人們的安全只靠依賴自發調節市場這樣脆弱的制度是有多大危險。1920 年代的自給自足運動本質上是先兆：指出要適應秩序即將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戰顯示了這種危險，而人們有相應行動；但由於他們是在十年後行動，低估了因果之間的關係，視為不合理。許多當代人都這麼說：「危險已經過去，為什麼還要保護自己？」。這錯誤邏輯不僅誤解了自給自足，更重要的是誤解了法西斯主義。實際上兩者可以由事實解釋清楚：只要危險的根源沒有清除，人民一旦有了危險的印象，依然會有潛藏的恐懼。

本書堅持認為歐洲各國從來沒有克服戰爭經歷的衝擊，這種經歷意想不到地使他們要面臨相互依賴的危險。貿易恢復，多多國際會議為和平的愉悅吶喊，多國政府宣佈支持自由貿易原則，但這一切都是徒然；沒有人會忘記如果本身不是擁有食物和原材料資源或是肯定有軍事途徑可以取得資源，健全的貨幣或無懈可擊的

---

[356]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治史，一反國家至上的觀念，主張文明才是歷史的單位；他把世界歷史畫分為 26 種文明，並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現象來解釋文明的興衰與死亡。

[357] 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奧地利裔美國人，知名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作家，現代自由意志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促進古典自由主義復甦。

[358] Norman Angell (1872-1967)，英國政治家，1933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信用都不能拯救國家於無助。這些基本考慮塑造了社會政策，「到處楊梅一樣花」的一致性是有邏輯的。既然危險根源沒有消除，又怎能預期恐懼會平息？

類似的謬論捉弄了對法西斯主義的批評者；他們形成大多數，把法西斯主義描述為沒有政治比例的怪胎。據說墨索里尼在義大利阻止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而統計資料證明「進軍羅馬[359]」一年多之前，罷工浪潮已經平息。武裝工人確實在 1921 年佔領了工廠，但這是否在 1923 年解除工人武裝的理由？當時工人已經再次走下站崗放哨的護城牆。希特勒聲稱他阻止了布爾什維克主義並拯救了德國。難道不能看出在希特勒掌權之前，失業狂潮在他出任總理之前已經退卻？希特勒聲稱阻止了他掌權時已經不再存在的事情，是與因果定律恰恰相反；在政治方面也應遵守因果定律。

實際上，德國和義大利一樣，戰後時期的情況證明布爾什維克主義絲毫沒有成功的機會，但這也確實說明在緊急情況下，工人階級及其工會和黨派可能忽視已建立的契約自由和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市場經濟規律；這可能性必然對社會有不良影響：投資失去信心，妨礙資本積累，工資維持在無利可圖的水平，危及貨幣，破壞外國信貸，削弱信心和癱瘓企業。潛在恐懼的根源不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幻影式危險，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工人階級可以在法西斯恐慌爆發的緊要關頭時強行破壞性干預。

人類和大自然面對的危險是不能清楚分開。工人階級和農民對市場經濟的反應都導致保護主義，前者的形式主要是社會法和工廠法，而後者主要是耕地稅和土地法。然而，兩者有重要的分別：在緊急狀態下，歐洲農民捍衛市場體制，而工人階級的政策卻危及市場體制。雖然是保護主義運動的雙翼引發了先天不穩定的市場體制的危機，與土地有關的社會階級傾向對市場體制妥協，而廣大工人階級卻毫不猶豫公開挑戰，打破市場體制規則。



[359] March on Rome。墨索里尼不滿法西斯黨在 1921 年國會選舉中只取得兩個議席，號召三萬名支持者在 1922 年 10 月 28 日進入羅馬，成功令國王任命墨索里尼為首相，也是向外界展示法西斯黨的勢力。

第十六章
市場和生產組織

即使資本主義商業本身也不得不尋求保護，免受市場機制毫無節制運作的傷害。這應會消除「人」和「大自然」這兩個術語有時激發老於世故的人的懷疑，因為他們往往指責有關保護勞工和土地的言論是陳腔濫調，即使不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掩飾之詞。

實際上，就生產企業而言，這種危險是一如人和大自然的情況一樣真實和客觀。需要保護，是因為貨幣供應是由市場體制組織。現代中央銀行實際上是為了提供保護而發展起來的工具；沒有保護，市場會摧毀親兒：各種各樣的商業企業。然而，最終正是由於這種保護形式最直接導致國際體制的崩潰。

雖然市場大動亂威脅著土地和勞工的危險是相當明顯，貨幣制度對商業的各種威脅不是那麼容易理解為「有危險」。如利潤是視乎價格，那麼價格依賴的貨幣安排必然對受利潤驅動的任何體制發揮作用是至關重要。從長遠看，銷售價格變動並不影響利潤，因為成本會相應上落；但從短期看，銷售價格的變動影響利潤，因為改動合約的固定價格必然有時間滯後，其中包括勞動力價格和許多由合約訂立的其它價格。因此，如價格水平由於貨幣原因在相當長時間下降，企業可能陷入破產清盤以及隨後生產組織分解和資本極大破壞的危機。麻煩的根源不在於低價格，而是價格下降。David Hume 始創貨幣數量理論[360]，發現如貨幣總量減半，企業仍然不受影響，因為價格也會減半。他忘記了企業可能在這過程已解體。

這就容易理解諸如市場機制在沒有外部干預時形成的商品貨幣與工業生產不匹配的原因。**商品貨幣**[361]只是商品，湊巧起了貨幣的作用，因此原則上除了減少不發揮貨幣作用的商品總量外，商品貨幣的總量不可能增加。實際上，商品貨幣通常是黃金或白銀，其總量短期內可能增加，但不會太多。生產和貿易擴大，但貨幣數量沒有增加，必然導致價格水平下降；這正是本書提到的破壞性通貨緊縮。十七世紀的商人經常鄭重埋怨貨幣短缺。早期已發展出**符號貨幣**[362]，保護貿易免受強迫性通貨緊縮的影響；當貿易量增加，使用鑄幣就有通貨緊縮。沒有這種人造貨幣，不可能有市場經濟。

---

[360]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361] commodity money。商品貨幣是法定貨幣（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為合法通貨的貨幣，不代表實質商品或貨物）以外的另一種貨幣類型，在政府的保証之外貨幣本身也有其內在的基本價值，例如家畜、珍珠等。

[362] token money。符號貨幣的自身價值與其代表的價值差距甚大，自身價值甚至是為零，例如世界各國各地區發行沒有黃金保證的貨幣都是符號貨幣。

大約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因為要穩定外匯交易和隨後引入金本位制，真正的困難出現。穩定外匯交易是英格蘭經濟的基礎；倫敦成為不斷增長的世界貿易的金融中心。只有商品貨幣能夠滿足這目的，顯而易見的理由是符號貨幣（不管是銀行貨幣還是法定貨幣）不能在國外流通。因此，**金本位制**[363]走上歷史舞臺；這是大家公認的國際商品貨幣體制的名字。

就我們所知，如不算及國內使用，鑄幣是有缺陷的貨幣，因為鑄幣是商品，總量不能隨意增加。黃金總量每年可能會增加幾個百分點，但隨著交易突然增加，黃金總量不可能在幾星期內增加十多個百分點。缺少符號貨幣，商業不得不縮減或以非常低價格成交，從而導致不景氣和失業。

用最簡單形式表達問題：商品貨幣對國外貿易至關重要；符號貨幣對國內貿易至關重要。兩者之間有多大配合？

在十九世紀的情況下，外貿和金本位制比國內貿易需求是無可爭議更為重要。金本位制的運作要求當兌換率受到貶值威脅時要降低國內價格。因為信貸收緊導致通貨緊縮，這即是商品貨幣的運作干預信貸體制的運作。這對商業而言是持續的危險。但完全丟棄符號貨幣，把貨幣限制為商品貨幣根本上是不可能，因為這療法比疾病本身還要糟糕。

中央銀行大大紓緩信貸貨幣的缺陷。通過集中國家的貸款供給，可以避免與通貨緊縮相關商業和就業的全面混亂，可以有效控制通貨緊縮從而吸收衝擊以及在全國範圍分散負擔。正常運作的〔中央〕銀行紓緩提取黃金對鈔票流通以及鈔票減少流通對商業的即時影響。

銀行可能採取不同方法。短期貸款可以彌補黃金短期損失的缺口，避免全面限制貸款。但即使限制貸款是不可避免（情況往往是這樣），銀行的行動起了緩衝作用：提高銀行利率和開放市場運作把限制的影響分散到整個社會，把限制的負擔轉移到最強壯的肩膀。

設想一個重要案例：單方面從一國轉帳到另一國，情況可能是食品需求從國內品種改變為國外品種。原來可用於國內支付的黃金現在要運往國外支付進口食品，因此黃金缺貨一定導致國內銷售下降，隨之而來是價格下降。本書稱之為「交易型[364]」通貨緊縮，因為通貨緊縮是追隨著偶發的生意交易在企業之間擴散，最終影響出口企業，因而實現代表「真正」轉帳的外貿順差。但這對整個社會的損害將會遠遠大於實現這樣外貿順差的必要，因為總是有企業沒有出口生意，要有稍

[363] gold standard
[364] transactional

微減少成本的些許誘導使這些企業「小休後重投戰場」；最經濟的減少方法是把通貨緊縮薄薄分散到整個商業社會。

這正正是中央銀行的功能之一。央行的貼現和開放市場政策的廣泛壓力迫使國內價格或多或少均勻下降，讓「可以出口」的企業恢復或增加出口，只有最沒有效率的企業不得不破產。因此，「真正」轉帳的代價是較少混亂；如通過狹窄的「交易型通貨緊縮」傳播隨意又往往具災難性的衝擊以達致同樣的外貿順差，代價大得多。

雖然有這些減少通貨緊縮影響的方法，但結果仍然是企業一次又一次全面混亂，隨後是大量失業；這是對金本位制最有力的指控。

貨幣的例子與勞動和土地的情況非常相似。每一項成為**虛擬商品**後，實際上是有效納入了市場體制，也同時成為對社會的嚴重危害。生產企業受到貨幣的威脅，因為使用商品貨幣引致價格水平的任何下降危及企業的生存，有必要採取保護措施，結果是市場的自我指導機制停擺。

中央銀行把金本位制的自動作用貶低為虛偽藉口，這意味著由中央管理貨幣；操縱取代了信貸供給的自發調節機制，即使這手段不總是故意和有意識。越來越多人理解到如國際金本位制能夠自發調節，各國先要放棄中央銀行。Mises 是純金本位制的一貫支持者，實際上鼓吹這孤注一擲的措施；如他的建議落實，國家經濟會變成廢墟。

貨幣理論的大多數混淆觀點是由於政治和經濟分開，這是市場社會的顯著特點。百多年來，貨幣被認為純粹是經濟範疇，是用於間接交易的商品。如人們偏愛以黃金為商品，就有了金本位制。（把金本位制與「國際」屬性聯繫起來是毫無意義，因為經濟學家認為國家並不存在；交易不是在國家之間進行而是在個體之間進行，他們的政治效忠對象一如他們的髮色一樣不關宏旨。）Ricardo 向十九世紀英格蘭灌輸這樣的信念：「貨幣」這術語的意思是交易媒介，鈔票只是為了方便，其效用在於比黃金更方便使用，其價值來自確信擁有鈔票即是任何時候可以擁有商品本身（黃金）。因此貨幣的國家特點是不重要，因為各國貨幣只是代表著同一商品的不同符號。如政府想擁有黃金的想法是不明智（因為一如其他商品，這商品在世界市場會自發調節其分佈），以為不同國家的符號貨幣與有關國家的福祉和繁榮有任何關連是更不明智。

政治和經濟範疇的制度性分離從來沒有徹底完成，在有關貨幣方面這正正必然是不徹底的；國家鑄幣廠似乎只是證明鑄幣的重量，但國家實際上是符號貨幣價值的保證人，也接受符號貨幣支付稅款和其它。這種貨幣不是交易媒介，而是支付

媒介；它不是商品，而是購買力；它本身沒有效用，而是包含可購買物品的賠償支付的量化計算單位。顯而易見，分配取決於擁有這種購買力符號的社會，其結構是完全不同於市場經濟。

當然，本文不是研究實例，而是以概念模式來解釋。市場經濟不可能與政治領域分離；然而 Ricardo 以來的經典經濟學正是以這結構為基礎，而且概念和假設都是難以理解。按照這「設計」，社會是由以物易物的個人組成，各自擁有商品的裝備（貨品、土地、勞動力以及各種組合）。貨幣只是以物易物較常用到的一種商品，因此是為了交易目的才取得。這樣的「社會」可能是不真實的；然而這包含了古典經濟學家啟始結構的基本架構。

購買力經濟體系提出更不完整的實況[365]，但有一些特點比市場經濟範式更貼近我們的實際社會。想像「社會」每一個人都有具體數量的購買力，可以購買貼有價格標籤的貨物，在這經濟體系中，貨幣不是商品，本身沒有任何用途，唯一用途是購買貼有價格標籤的貨物；這非常類似我們現在的商店貨物。

商品貨幣定律要比十九世紀的敵對理論優勝，其制度符合市場模式的許多基本要素；二十世紀初以來，購買力概念逐漸得勢。隨著金本位制解體，商品貨幣基本消失，貨幣的購買力概念很自然取而代之。

從機制和概念發展為社會力量，重要的是認識到統治階級本身是支持通過中央銀行管理貨幣。當然，這樣的管理沒有被認為是干預金本位制度；相反，這是金本位制應發揮作用的部份遊戲規則。因為維繫金本位制是不言自明，絕不容許中央銀行運作令國家脫離黃金；相反的是央行最高指示是在任何情況下保留金本位制，這似乎沒有涉及任何原則，但只適用於以下情況：價格水準波動最多只是**黃金輸送點**[366]上下的瑣細 2-3%。保持匯率穩定要看國內價格水平，如國內價格水平波幅非常大，例如急升至 10%或 30%，形勢完全不同。價格水平以這幅度下調會散播苦難和破壞。貨幣管理變得非常重要，因為這意味著中央銀行措施是政策問題，政治體系要作出決定。中央銀行的制度性重要意義見諸貨幣政策被扯入政治領域，後果非常深遠。

後果有兩方面。在國內範疇，貨幣政策只是干預主義的另一形式，而各經濟階級的衝突往往聚焦於這與金本位制和平衡預算有緊密聯繫的問題。下文會提到 1930 年代的國內衝突往往集中在這問題，影響日益增長的反民主運動。

---

[365] 原註 1：F. Schafer, Wellington, New Zealand 有論述基本理論。

[366] 黃金輸送點(gold point)是指匯價波動而引起黃金從一國輸出或輸入的界限。匯率波動的最高界限是鑄幣平價（含金量）加運金費用，即黃金輸出點（gold export point）；最低界限是鑄幣平價減運金費用，即黃金輸入點（gold import point）。

在國外方面，國家貨幣有重要作用，雖然當時知之不詳。十九世紀的統治哲學是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原則上」，所有受教育的人都是自由貿易者，而在一些今天看來頗具諷刺意義的情況下，他們實際上確是如此。這觀點的源頭當然是經濟方面；以物易物和貿易領域萌生了許多真正的理想主義：人的自私欲望驗證慷慨的衝動，這是最大的悖論。但自 1870 年代以來已留意到情感有變化，但主導思想沒有相對的中斷。世界依然相信國際主義和相互依賴，但行事卻是憑著民族主義和自給自足的衝動。自由民族主義正發展為國家自由主義[367]，對國外傾向保護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國內傾向壟斷式保護主義。在貨幣範疇內矛盾最為尖銳而且也是最少為人知。人們依然無限忠誠武斷地相信國際金本位制，而與此同時以各中央銀行制度的主權為基礎建立了各種符號貨幣。在國際原則的庇護下，新國家主義以中央發鈔銀行的形式無意中建立了堅不可摧的堡壘。

說實在的，新國家主義是新國際主義的必然結果。國際金本位制本來是服務各國，所以不能由各國承擔，除非各國得到保證，確保不會因為遵守國際金本位制而受到威脅的危險。完全貨幣化的社會不能承受因為要穩定匯率導致價格水平突然改變的破壞性效應，除非有獨立的中央銀行政策可以舒緩這些衝擊。國家符號貨幣是這相對安全措施的可靠保護，因為這容許中央銀行在內部和外部經濟之間發揮緩衝作用。如**國際收支平衡**[368]受到**流動性不足**[369]的威脅，儲備和外國貸款可暫時克服困難；如需建立與國內價格水平下降有關的全新經濟平衡，信貸限制可以利用最合理方式分散負擔：清除無效率企業，由有效率企業承擔。沒有這樣的機制，任何發達國家如保留金本位制都不能避免對國家福祉（無論是生產、收入或就業）的破壞性影響。

如商貿階級是市場經濟的支持者，銀行家就是這階級的天生領導者。就業和利潤取決於企業的贏利性，但這又取決於穩定匯率和健全的信貸環境，兩者都由銀行家主事，銀行家的信念是二者不可分離。健全的預算和穩定的國內信貸環境是穩定匯率的先決條件；國內信貸安全，國家財政平衡，匯率才會穩定。簡而言之，銀行家的雙生信托任務是內部有健全金融，外部有穩定貨幣。所以如兩者失效，銀行家階級往往是後知後覺。1920 年代國際銀行家有主導影響力，30 年代影響力消減，這都不應是出人意表。在 1920 年代，金本位制仍然被認為是回到穩定和繁榮的先決條件，因此只要專業監護人（銀行家）承諾確保匯率穩定，他提出的要求都不會被認為麻煩；1929 年之後，這證明是不可能的；當時急切要求國

[367] 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 也稱為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政治哲學家相信不排外的民族主義與自由，寬容，平等，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兼容。國家自由主義(national liberalism)是自由主義的流派，結合民族主義和一些自由主義政策，特別是有關教育，政教關係以及現代化，高效率，官僚化的管理。

[368] balance of payment，國家的國際收支淨額，即淨出口與淨資本流出的差額。

[369] illiquidity，商品難以轉為現金，或有關公司欠缺現金。

內貨幣穩定，而銀行家是最沒有資格滿足這要求。

市場經濟崩潰，貨幣崩潰最為突然。農業稅干擾了國外農產品進口，破壞了自由貿易；勞動力市場萎縮和受管制，談判被限制在法律容許各方自決的範圍。但勞動力或土地的市場機制沒有貨幣領域那樣全面和突然轉變。其它市場沒有什麼可以比得上 1931 年 9 月 21 日英國放棄金本位制，甚至也比不上 1933 年 6 月美國隨後的同樣行動。美國經濟大蕭條始於 1929 年，當時已沖走了大部份世界貿易，但這沒有影響方法，也沒有影響主導思想。但金本位制的最終失敗就是市場經濟的最終失敗。

起始於百年前的經濟自由主義一直受到保護主義的抵制，後者正攻打市場經濟的最後堡壘。一套新的管治理念取代了自發調節市場的世界。魅力領導和主張獨裁的孤立主義各種勢力出乎意料突然出現，把社會鑄成新的形式，令大多數當代人感到吃驚。



第十七章
自發調節被削弱

在 1879-1929 年這半個世紀，西方社會發展成為組織嚴密的單位，內部潛藏著極具破壞力的緊張關係。這發展的較為直接源頭是市場經濟的自發調節功能受到削弱。由於社會要順從市場機制的需求，所以這機制運行的各種缺陷對社會本體產生了累積性緊張關係。

自發調節功能受到削弱，是保護主義的效應。當然，有認為市場總是自發調節，因為市場往往產生**市場出清**[370]的價格；然而這適用於所有市場，無論市場是否自由。但上文已指出，自發調節市場機制有非常不同的含義：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市場。由於這些市場運作具有破壞社會的潛在危險，社會的自我保護行動阻礙了這些市場的建立，或即使市場建立後也會干擾其自由運作。

經濟自由主義者引用美國作為市場經濟有能力發揮作用的例證。百年以來，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可以在美國完全自由地交易，似乎不需要社會保護措施；除了關稅，政府沒有干預工業生活。

解釋當然是簡單：勞動力、土地和資本是自由的。一直到 1890 年代，邊疆開放，無主權土地取之不竭；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低水平勞動力供應自由流動[371]；一直到世紀之交還沒有保持匯率穩定的承諾。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繼續有自由供應；因此不存在有自發調節的市場體制。只要這些條件仍然存在，人、大自然和商業組織都不需要政府干預才能提供的保護。

一旦這些條件不存在，社會保護介入。由於無窮無盡的移民不能再自由填補下層勞工，高層勞工不能在土地上自由定居；由於土地和自然資源變得稀有，必須節約；由於為了把貨幣從政治中分離和把國內貿易和世界貿易聯繫而引入金本位制；美國趕上了歐洲一個世紀的發展：保護土地和耕種者、通過工會主義和立法為勞工提供社會保障，以及中央銀行；以上都以最大規模逐一出現。貨幣保護主義首先現身：建立**美國聯邦儲備系統**[372]，目的在協調金本位制的和地區需求；隨後是勞工和土地的保護主義。1920 年代的繁榮足以導致嚴峻的經濟蕭條，要由「**新政**[373]」為勞工和土地建立起護城河，其範圍要比歐洲更廣泛。因此，美國為

---

[370] market clear 是重要的經濟學概念，假定通過價格機制可以自動實現市場出清：即價格波動決定了消費者的購買量和廠商的生產量，並使供給量與需求量相等。
[371] 原註 1：Penrose, E. F., *op. cit.* 馬爾薩斯定律只在土地供應受限的假設才成立。
[372] Federal Reserve System
[373] 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是指 1933 年實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其核心是三個 R：救濟(Relief)、改革(Reform)和復興(Recovery)，因此也稱為三 R 新政，以增加政府對經濟直接或間接

本書的理論提供了鮮明的正反證據;本書認為社會保護是所謂自發調節市場的附屬物。

同時，保護主義四處產出社會生活新單位的外殼。新的實體以民族國家形式鑄造，但與以前的逍遙自在民族國家只有少許相似。新的甲殼類民族國家以國家符號貨幣表達身份，這類型主權國家是前所未見的處處提防和絕對專橫。符號貨幣受到國家保護，也受外間世界關注，因為國際金本位制（世界經濟的主要手段）是建基於這些貨幣。如金錢已公然支配世界，這種金錢是打上了國家的印記。

自由主義者不可能理解對民族國家和貨幣的重視，因為他們習慣性忽略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真正特徵。如民族國家被自由主義者視為不合時宜，國家貨幣更不值得關注。自由主義時代的任何自重經濟學家從來沒有懷疑鈔票只是不同政治界限對不同紙製品的不同稱謂，並不是重要的事物。利用交易市場把一種貨幣面額兌換成另一種貨幣面額，只是簡單操作；交易市場能夠發揮作用，因為很幸運交易市場是不受國家或政治家控制。西歐正經歷新啟蒙運動，其怪誕事物包括國家的「部落式[374]」概念；自由主義者認為所謂「部落式」主權國家是狹隘思想初露苗頭。一直到 1930 年代，經濟入門手冊陳述貨幣只是交易的工具，因此是無關緊要。市場思想的盲點同樣漠視了國家和貨幣現象。自由貿易者對這兩方面是以**唯名論**[375]觀點視之。

這聯繫非常重要，但當時為人忽略。時不時有人批評自由貿易學說和貨幣的傳統學說，但幾乎沒有人理解兩種學說是用不同術語陳述相同的事情，如其中一種學說是錯誤，另一學說也是錯誤。Cunningham[376]或 Wagner[377]揭露了國際自由貿易的謬論，但沒有與貨幣聯繫；另一方面，Macleod[378]或 Gesell[379]攻擊經典貨幣理論，但又遵守時尚的貿易制度。自由主義啟蒙運動的作家完全忽略了貨幣在建立國家作為當代決定性經濟和政治單位時的建構重要性，一如十八世紀的前人完全忽略了歷史的存在。從 Ricardo 到 Wieser，從 John Stuart Mill 到 Marshall 和 Wicksell

---

干預的方式，大大緩解了大蕭條所帶來的經濟危機與社會矛盾。

[374] tribalistic

[375] 唯名論（Nominalism），中古歐洲的哲學學說，認為現實事物沒有普遍本質，只有實質的個體是存在的。與此相對的是「實在論，Realism」。

[376] William Cunningham (1849 – 1919) ，英國經濟學家和著名經濟史學者，鼓吹經濟學要用上史學方法，反對自由貿易。

[377] Adolph Wagner（1835- 1917），德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和公共財政學先驅，他主張保護主義的論點是這樣：任何有剩餘食物和原料的國家都渴望發展國內生產和禁止外國製造商進入；世界各國正踏上自給自足之路，那些不能養活自己的國家注定要餓死。

[378] Henry Dunning Macleod (1821 – 1902)蘇格蘭經濟學家，他首先提出信貸理論，從貨幣理論創建信貸理論，而不是通常的反向路徑。他認為貨幣和信貸本質上是相同；貨幣是一般形式的信貸的最高形式。

[379] Silvio Gesell (1862-1930), 成功的德國商人，後研讀經濟學，對貨幣和利息理論有卓見。凱因斯惋惜他是滄海遺珠。

這些最偉大的經濟思想家都支持這立場，而一般受教育的人被教導全神貫注國家或貨幣的經濟問題是次等人的烙印標記。把這些謬論合併為荒誕的命題：即國家貨幣在文明的社會的制度機制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會被認為是空洞的悖論，毫無意義。

實際上，新的國家單位和新的國家貨幣是不可分離的。正是貨幣為國家和國際體制提供結構力度，並引入一些導致突然崩斷的特點。信貸所建基的貨幣制度已成為國家和國際經濟的生命線。

保護主義是三方面的驅動力。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各自發揮作用，但土地和勞動力是與有限（雖然廣泛）的社會階層（諸如工人或農民）聯繫，貨幣保護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國家因素，往往把不同利益合併為整體。即使貨幣政策也可以分開和合併，但客觀上貨幣制度是組合國家的最強大經濟力量。

勞動力和土地分別主要導致社會立法和穀物稅。農民反對讓勞工受益和增加工資所帶來的負擔，而勞工反對食品價格的任何上漲。但一旦落實穀物法和工匠法（自 1880 年代以來的德國），很難廢一法而不廢除另一法。農業稅和工業稅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自卑斯麥在 1879 年把全面保護主義的思想變得普及，地主和實業家政治組成聯盟以爭取對大家有好處的關稅保護措施；這是德國政治的特徵；從關稅中得到個人好處，一如建立壟斷聯盟佔便宜一樣普遍。

國內和國外的社會和國家保護主義往往會融合。[380] 由穀物稅引起的生活成本上漲導致生產商要求保護性關稅，而且利用作為壟斷政策的補充。工會自然堅持要求高工資以補償生活成本上漲，因此不能反對這些關稅，因為僱主要靠此應付工資上漲。但一旦社會立法的計算方法是基於受限於關稅的工資水平，要求僱主承擔這種立法的負擔是不公道，除非僱主確信將來會繼續受到保護。順提一下，指責集體主義陰謀論要為保護主義運動負責，這說法的事實依據不是很充份，只是把結果誤解為成因。保護主義運動的起因是自發性而且擴散範圍廣泛，但運動一旦開始就必然會建立致力維持保護主義運動的並行利益團體。

比利益集團口味相投更重要的是這些措施的綜合結果所建立的實際環境是均勻地擴散。如不同國家有不同生活（實情總是如此），這種差異現在可以追溯到有保護目的的具體立法和行政法規，因為生產和勞工的環境現在主要取決於關稅、稅收和各項社會法律。甚至在美國和英國領土限制移民之前，雖然英國失業嚴重，英國移民出國的數目已減少，顯然是因為祖國的社會環境已大大改善。

但如關稅和社會法律營造了人為氣候，貨幣政策營造名副其實的人為天氣，天天

[380] 原註 2：Carr, E. H.,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1940.

不同並且影響社會每一個人的直接利益。貨幣政策的整合力量遠遠超過其他類型保護主義的整合力量，因為後者緩慢笨重，而貨幣保護是永不停止和風起雲湧。商人、工會工人和家庭主婦左思右量，農夫計劃耕種、父母為子女打算、籌備婚禮的戀人等等在考慮當時取捨時，與其它任何單一因素相比，他們全都直接受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影響。貨幣穩定時情況確是如此，貨幣不穩定時情況更是如此，所以必須做出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重大決策。政治方面，國家身份是由政府建立；經濟方面是授權中央銀行。

國際方面，如可能的話，貨幣制度更為重要。非常荒謬的是貨幣自由是對貿易限制的結果。由於商品和人員過境流通的障礙越來越多，所以必須更有效保護自由支付。短期貨幣一瞬間在全球點對點傳遞；政府之間、私企之間和個人之間的國際支付方法有劃一監管；即使落後政府拒付外債或企圖竄改預算保證，會被認為是暴行，沒有信用的〔國家〕被掃到黑暗角落。就世界貨幣制度的各種問題，各地建立了類似制度，例如代表團，成文憲法定義了國家司法管轄以及管理發佈預算，頒佈法律，批準條約，承擔財務責任的方法，公共會計法規，外國人權利，法庭司法權，匯票本籍，因此也暗喻發鈔銀行、國外債券持有人以及形形色色債權人的地位。這涉及劃一使用銀行紙幣和鑄幣，郵政法規，證券交易所和銀行業務要一致。或許除了最強大國，沒有政府能夠承擔忽視貨幣禁忌的後果。從國際角度看，貨幣就是國家，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任何時段脫離國際體系。

與人員和商品對比，貨幣不受任何措施阻礙，繼續發展其全地域全天候的交易能力。實物流通變得越困難，傳達實物的支付變得越容易。當商品和服務貿易放緩以及貿易平衡非常危險地來回擺動，在全球流竄的短期貸款幫助國際收支平衡幾乎自動保持流動，也為與可見貿易幾近沒有關係的作業融資。對商品交易建立的障礙沒有影響支付、債務和索賠；國際貨幣機制的快速增長的靈活性和普遍性，在某程度上正在補充一直在萎縮的世界貿易管道。到了 1930 年代早期，世界貿易量只是小溪流水，國際短期貸款取得前所未聞的流動性。只要國際資本流動機制和短期貸款發揮作用，實際貿易的不平衡不會超出會計記帳的能力。有了信貸流通的幫助，得以避免社會混亂；金融手段糾正了經濟不平衡。

作為最後手段，市場自發調節被削弱導致政治干預。當貿易周期未能周轉和恢復就業，當進口不能產生出口，當銀行儲備監管法令威脅商界陷入恐慌，當國外債務人拒絕還款，政府必須對壓力作出反應。在緊急情況下，社會整體通過干預措施表達本身。

促使國家採取多大程度的干預取決於政治領域的制度和經濟困難的程度。只要投票〔權〕受到限制和只有少數人有政治影響力，干預主義的緊急程度不及有普選權的國家；有了普選權，國家成為百萬人民的工具——這百萬人民在經濟領域中

往往要承擔被統治者的痛苦。只要就業充分，收入有保障，生產持續，生活標準可信賴，價格穩定，干預的壓力自然是少於當持續低潮使工業成為閒置工具和徒勞努力的廢墟。

國際方面，以政治方法補充市場自發調節的不完善功能。Ricardo 的貿易和貨幣理論可惜忽視了由於各國的財富生產能力、出口設施、貿易、運輸和銀行經驗之不同，各國地位有差異。根據自由主義理論，英國只是貿易宇宙中的小小原子；準確地說，英國的地位與丹麥和瓜地馬拉屬同一水平。實際上，世上的國家為數不多，分類為債權國和債務國，出口國和幾乎是自給自足的國家，進口和外國貸款依賴多種出口商品國家和單一出口商品（小麥或咖啡）的國家。理論可以忽視這些差異，但實際上不能同樣忽視這些差異的後果。海外國家往往沒有能力清償外債，或貨幣貶值危及償付能力；有時這些國家決定以政治手段恢復平衡和干預外國投資者的財產。經濟自我恢復的過程不能依賴任何這些情況，雖然經典學說指出這過程必然能夠償還債務、恢復貨幣和保護外國人免受重覆的類似損失。但這要求有關各國多多少少是世界勞動分工體制的平等參與者，但必須強調情況並非如此。預期貨幣暴跌的國家會自動增加出口從而恢復國際收支平衡，或對國外資金的需求會迫使該國賠償外國人和重新還債，以上都是空想。例如，咖啡或硝酸鉀的銷售增加，可能使整個市場混亂不堪，而拒付高利率的外債似乎比國家貨幣貶值更可取。世界市場機制不能承擔這樣的冒險。取而代之的是即時派遣炮艦；拖欠債務的政府，不管是否欺詐，要面臨兩種選擇：要麼遭受炮轟，要麼償清債務。沒有其它辦法可以有效強制支付，避免更大損失和保持體制運轉。如殖民地土著不掌握貿易對雙方有利的無懈可擊理論，類似的方法會勸導殖民地人民理解貿易的好處。如當地碰巧有歐洲生產商需要的豐富原材料，而之前沒有和諧關係確保土著會改變完全不同的口味追求歐洲產品，情況明顯需要干預措施。當然，所有這些困難不會在所謂自發調節體制出現，但越是要有武裝干預的的威脅才迫使對方支付，越是要依靠炮艦保持貿易路線暢通，貿易越是跟隨國旗之後，而國艦是服務入侵國政府的需要；越加明顯的是必須使用政治手段以維持世界經濟平衡。



第十八章
破壞性的緊張關係

這些一致性基礎制度安排衍生了 1879-1929 年那半個世紀各種事件模式的有趣相似性。

許多國家有無盡的各種人物和背景、思想和歷史經歷，各國的變遷各有本國特色和局部重點，但世界文明的更多部份卻具有相同結構。這種密切關係超越了人們使用類似工具、享受類似娛樂，以類似獎品獎勵成就的共同文化特性。類似性反而是關乎生活的歷史背景中具體事件的作用，關乎集體存在的有時限組成部份。分析這些典型的強大壓力可以揭示在當時產生獨一無二歷史模式的機制。

這些強大壓力可以按照主要的制度範疇分類[381]。國內經濟方面，「失業」這典型的苦難根源是失衡的最多變徵兆：如減產、就業率下降和收入減少。國內政治方面，壓力來自各種社會力量的鬥爭和僵持，本書歸納為「各階級的緊張關係」。國際經濟領域中有環繞著國際收支平衡的各種困難，包括出口減少、不利的貿易條款、缺乏進口原材料以及外國投資減少；本書把這些特點形式的壓力定名為「匯率壓力」。最後，國際政治方面的緊張狀態分類為「帝國主義敵對」。

設想一個國家處於商業蕭條又遭受失業打擊；很容易看得出銀行為了創造就業機會而可能決定的措施是受限於穩定匯率的緊急情況。除非求助中央銀行，銀行不能向產業界擴大或延續信貸，而中央銀行由於貨幣安全，需要相反方向的政策，不會滿足銀行的需求。另一方面，如壓力從產業界蔓延到國家，任何救濟政策或公共工程的範圍受到要求預算平衡的制約，預算平衡是穩定匯率的前題；而工會也許促使相關政黨在國會提出問題。因此，金本位制會一如發鈔銀行一樣制約財政部的行動，而立法機構要面對產業界面對的相同制約。

當然，國家範圍內的失業壓力可能由產業界或政府部門承擔。如在特定情況下，工資的通貨緊縮壓力克服了危機，即是主要由經濟領域負擔壓力。但如借助稅款資助公共工程從而避免這痛苦措施，緊張壓力的主要負擔將落在政治領域（如政府措施漠視已有權利而強令工會削減工資，情況也是一樣）。在工資承受通貨緊縮壓力的情況，壓力依然保留在市場領域內，以價格變化傳達收入變化；在公共工程或限制工會的情況，法律地位或稅收有變化，主要影響相關集團的政治地位。

此外，失業的壓力也許會蔓延至國界之外，影響外匯；無論是以政治或經濟措施應付失業問題，這種情況都可能發生。在金本位制下（本書假定一直有執行金本

[381] unemployment, tension of classes, pressure on exchanges and imperialist rivalries.

位制），任何導致預算赤字的政府措施都可能導致貨幣貶值；另一方面，如通過擴大銀行信貸解決失業問題，國內價格會上升，打擊出口，從而影響國際收支平衡。無論是哪種情況，匯率會暴跌，國家感受到貨幣壓力。

或許失業的壓力會引發與外國的緊張關係，可能損及弱國的國際地位：地位轉弱，權利被忽視，受外國強加控制，國家欲求被挫敗。強國的壓力可能轉變為爭奪國外市場、殖民地、勢力範圍和帝國主義敵對的其他形式。

源於市場的壓力就是這樣在市場和其他主要制度範疇之間來回移動；視乎情況，這有時影響政府運作，有時影響金本位制或勢力均衡體系的運作。各領域相對地獨立於其他領域，傾向追求自身的平衡；如不能達致均衡，就會蔓延到其他領域。正是這種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導致壓力積聚和產生緊張狀態，最終以多多少少的刻板形式爆發。十九世紀在想像中建造自由主義的理想國，而實際上是在把事情交給一定數目的具體制度，這些制度的機制正是當時的統治勢力。

1933 年，一位經濟學家在修辭上指責「**絕大多數政府**」的保護主義，可能是最接近現實現的說法。他質疑如政策被所有專家一致譴責為完全錯誤、非常不合理以及違背所有經濟理論，這樣的政策會否正確？他的答案是絕對的「不」[382]。不過大量文獻沒有什麼可以說明對這些明顯事實解釋的本質；唯一的答案是各國政府、政治家和政客不停濫用職權，他們的無知、野心、貪婪以及目光短淺的偏見恐怕要為「絕大多數」國家一貫追隨的保護主義政策負責。就這個問題很難找到有充分理由的論點。自中世紀學院派蔑視科學的實踐事實以來，從來沒有以這樣可怕的方式表達偏見。唯一的理性反應是以帝國主義狂熱的神話來補充保護主義陰謀論的神話。

自由主義論點表達清晰時，聲言在 1880 年代早期帝國主義熱情開始在西方國家蠢蠢欲動，而且情緒化利用種族歧視破壞了經濟思想家富有成效的工作。這些情緒化政策逐漸積聚力量，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後啟蒙運動的力量有另一次機會恢復理智的統治，但是帝國主義意想不到的爆發，打翻了前進的馬車，特別是新興小國以及其後如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等「無產」國家。狡滑動物（政客）擊敗了日內瓦（國聯）、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這些人類的大腦中心。

通俗的政治神學把帝國主義視為沒有慈悲的人類本性的象徵，認為國家和帝國天性帶有帝國主義性質，吞滅鄰國而毫無道德內疚。論點後半部很正確，前半部份不是。無論何時何地，只要帝國主義出現，擴張不是服侍理性或道德的理由，這是與國家和帝國從來是擴張主義者的事實相反。地域性協會不是必然急於擴充邊界；城市、國家或是帝國都沒有這樣的衝動。反對意見只是把某些典型情況錯認

[382] 原註 1：Haberler. G., *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 1933, p. vi.

為普遍原則。實際上，與流行的成見相反，現代資本主義開始有頗長時期的**緊縮主義**[383]，只是到了發展後期才轉向帝國主義。

亞當·斯密首先反對帝國主義，他不僅預見美國獨立戰爭，還預見下世紀的「小英格蘭運動[384]」。期間中斷是因為經濟原因：市場從「七年戰爭[385]」迅速擴大，使帝國變得過時。歐洲各國接連在海外「發現」新地方，但海運緩慢、遂偏向在海外成立種植園；快速通訊使殖民地成為昂貴的奢侈品。不利於種植園的另一因素是出口遠比進口重要；買方市場的理想被賣方市場取代，為求達到目的，賣方比競爭對手更低價出售，最後甚至比殖民者更低價。一旦英國喪失了大西洋的沿海殖民地，加拿大在 1837 年也脫離大英帝國；Disraeli 甚至鼓吹放棄西非領地；奧蘭治自由邦[386]提出要加入大英帝國，但沒有成功；如今被視為世界戰略樞紐的一些太平洋島嶼始終被拒諸大英帝國門外。自由貿易論者和保護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激切的保守黨人都普遍深信殖民地是消耗性資產，註定要成為政治和財政負債。在 1780 至 1880 的百年中，談論殖民地的人都被認為是舊制度擁護者。中產階級譴責戰爭和征服是王朝的詭計，迎合和平主義（Quesnay 是為自由放任主義爭取和平桂冠的第一人）。法國和德國緊隨英國之後；前者稍微放慢其擴張的速度，而法國的帝國主義是更專注歐洲大陸而非殖民地。卑斯麥不屑為巴爾幹半島付出一條人命的代價，而且全力支持反殖民宣傳。當資本主義企業滲進整個大陸，當東印度公司在急切的英格蘭棉紡業出口商堅持下被解散，當藉藉無名的布匹商取代了駐印度的英國總督和行政官時，這就是當時政府的態度：各國政府故意避開。Canning 嘲笑代表賭徒投資者和海外投機者進行干預的想法。政經分離正擴散到國際事務。英女皇伊莉莎白一世很不情願要清楚劃分她的私人收益和私掠船的收益，而 Gladstone 首相[387]斥責認為英國外交政策是為外國投資者服務的說法是誹謗。政權和通商利益融合，不是十九世紀的觀念；恰恰相反，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政治家聲言政治和經濟的獨立性是國際行為準則。只有在一些狹窄定義的情況，外交代表才會代表國民的私人利益而積極活動，但又公開否認這些偷偷摸摸的活動；如一旦被證實，相關人員會受到相應譴責。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維護國家不干預私營商業事務的原則。國內政府不應干預私營貿易，駐外機構要遵守國家方針，也應同樣處理私營利益。投資絕大部份投放在國內農業；人們仍然認為對外投資是冒險，投資者常常血本無歸，更被視為可恥高利貸條款的應有

[383] contractionism。

[384] 十九世紀中葉，英格蘭自由貿易運動出現「小英格蘭主義 Little England movement」思想，主要內容是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批評英帝國殖民政策和外交政策。小英格蘭主義者要求反思殖民地的作用，但本質上並不否定英帝國，而是從英國實際利益出發，主張建立政治文化帝國。這種思想對英國的殖民政策和外交政策產生一定影響。（錄自王本涛簡介）

[385] 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1756-63 年間，歐洲主要國家組成兩大交戰集團（一方是英國、法國和普魯士（德國），另一方是奧地利和俄國），在歐洲、北美洲、印度等廣大地域和海域開戰，爭奪殖民地和領土。

[386] Orange State，美國佛羅里達洲的別號「柑橘之鄉」。

[387]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國政治家，於 1868-94 年間四度任英國首相

報應。

改變突然而來，而且在所有主要西方國家同時發生。先有英格蘭的國內發展，德國只滯後半世紀，世界的外部事件必然同樣地影響所有貿易國家。這事件就是指國際貿易節奏加快和數量增加，以及土地完全流通，意思是以極小成本大規模把穀物和農業原材料在全球流通。這場經濟地震擾亂了歐洲農村數千萬人的生活。在幾年內，自由貿易成了昔日黃花，而在全新情況下市場經濟有進一步發展。

這些情況本身由「雙重行動[388]」制定。國際貿易模式正加速鋪開，但遇上旨在遏制市場多方面行動的保護主義制度阻擾。農業危機和 1873-86 年間的大蕭條動搖了經濟自行恢復的信心。之後，市場經濟的典型制度通常只有在保護主義措施伴隨下才有可能推行，因為自 1870 年代後期和 1880 年代初期以來，各國正組建成為有組織單位，容易因為任何外貿或外匯交易需求導致各種混亂的痛苦影響。金本位制是市場經濟擴大的最重要載體，因此也通常伴隨著同時推行的典型保護主義政策，例如社會立法和關稅。

集體主義合謀論的傳統自由主義形式在這一點也與事實不符。自由貿易和金本位體系不是被自私的販商和仁慈的社會法律任意破壞；相反的是金本位制的到來加速了這些保護主義制度的擴散；制度越受歡迎，固定不變的匯率就越難以承受。從這時開始，關稅、工廠法和積極的殖民政策都是穩定**外在通貨**[389]的先決條件（英國是例外，因為該國有巨大工業優勢，正好證明這規則）。只有具備這些先決條件才可以安全引進市場經濟的方法。如在缺少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將這些方法強行加諸無助的民眾（例如在外國和半殖民地區），難以言喻的災難接踵而來。

於此是帝國主義表面矛盾的關鍵：各國拒絕在沒有任何限制以下彼此一起貿易，這在經濟上難以解釋而且不理性；各國反而要爭取海外和外國市場。各國如此行事，原因只是一如無能為力、無法避開的民眾的一樣害怕；差別只是可憐殖民地的熱帶地區人民陷入無邊痛苦和退步，瀕臨滅絕，而西方國家受到程度較少危險的影響，但仍然足以不惜代價迴避和拒絕。以殖民地為例，威脅的本質並非經濟，但結果是一樣；除了偏見之外，沒有任何理由以各項經濟量度[390]計算社會混亂。實際上，面對失業的災難、行業和職業的變動，以及隨之而來的精神與心理折磨，預期社會漠不關心和孰視無睹，以為這只不過是長期而言可以忽略的經濟效應，這種認識其實極之荒謬。

國家既是被動的承受壓力，但又主動施加壓力。如一些外部事件重壓於國家，其

[388] double movement
[389] external currency，在發鈔國境外的該國貨幣。
[390] economic magnitudes

內部機制以通常的方式發揮作用，將經濟領域的壓力轉移到政治領域，反之亦然。戰後時期曾發生一些重大事件。對一些中歐國家來說，戰敗建立了高度人為環境，包括賠償形式的強大外部壓力。在十多年間，主導德國國內情況的是外部重擔在工業和國家之間轉移：一方面在工資和利潤之間轉移，另一方面在社會福利和稅收之間轉移。全國都要承擔賠償，國內形勢根據國家（即政府和企業結合）處理賠償的方式而改變。國家團結於是緊扣金本位制，因此維持該國貨幣的對外價值成為最重要的責任。Dawes 計劃[391]是為了保護德國貨幣特意設計。Young 計劃確定相同的條件。如不是因為有責任維持德國馬克對外價值不受損害，不可能理解這時期德國國內事務的走勢。因為對貨幣有共同責任，企業和各政黨建立不可動搖的框架，工業和國家在這框架內適應這壓力。戰敗德國不得不承受戰敗的後果，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是自願承受：即是在固定匯率的壓力下，人為地整合國家，自豪地默默背上十字架，唯一的解釋是順從市場的必然規律。

可能有人反對以上的概要是過度簡化。市場經濟不是在一天之內起動，三個市場不像三頭馬車在競跑，保護主義也不是對所有市場都有相同影響等等。這種說法當然是對的，只是這遺漏了爭論的要點。

誠然，經濟自由主義只是從頗為發達市場中創造了新機制，統一了已存在的各種類型的市場，把各自的功能協調成為單一整體。而且，勞動和土地的分離在那時進展順利，金錢和信貸市場的發展也如此。在整個過程中，現在與過去聯繫一起，而且沒有中斷點。

然而，因為制度的本質，其變化是突然而來的。關鍵階段是英格蘭建立勞工市場，如這市場的工人不遵守僱傭勞動的規則，他們就要面對捱餓的威脅。一旦採取了這種激烈的措施，自發調節的市場機制就乘時而起，這對社會的影響是如此猛烈，以致在輿論沒有任何變化之前，有力的保護性反應幾乎即時發動。

此外，雖然產業各種元素的市場各有不同本質和起源，但發展狀況是平衡前進，不可能有其他情況。保護人類、大自然和生產性組織等同干預勞動力、土地和金錢（交易媒介）等市場，因此事實上是削弱了體系的自發調節。既然干預的目的是恢復人們的正常生活和環境，給予一些地位安全感，那麼干預必然要減少工資彈性和勞工流動性、使收入穩定、生產持續、推動國家資源由公共控制以及管理貨幣，以避免價格水平有令人不安的變化。

[391]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盟軍要求德國按照條約賠償 66 億英鎊，令德國經濟嚴重衰退。1923 年，由於德國未能及時賠償，法國與比利時軍隊佔領德國盛產煤和鋼鐵的西部工業重鎮。這不但令德國人民震怒，而且增加其經濟負擔。為了解決困局，盟軍賠款委員會任命美國人 Charles G. Dawes 主持會議，尋求各方同意的方案，但後來德國還是沒有能力還款。盟軍賠款委員又任命美國 Owen D. Young 籌劃新方案，在 1930 年 1 月施行。

1873-86 年期間的經濟蕭條和 1870 年代的農業困境永久地增加這種壓力。在經濟蕭條開始時，歐洲一直處於自由貿易全盛期。新德意志帝國強迫法國接受兩國之間的最惠國條款，後者承諾免除生鐵關稅和推行金本位制。蕭條期結束，德國已樹立各種保護性關稅，建立全面的壟斷組織，設立全面的社會保險體制，以及正在實行高壓殖民政策。普魯士主義曾是自由貿易的先驅，顯然對轉向保護主義的少許責任不是多於引入「集體主義」的責任。美國的關稅比德國更高，而且有自己方式的「集體主義」，大力津貼遠程鐵路建設和發展龐大的壟斷集團。

不論其民族精神和歷史，所有西方國家都遵循相同趨勢。[392] 有了國際金本位制，最具挑戰性的市場方案付諸實施，意味著市場完全獨立於國家行政機構之外。世界貿易如今意味著在自發調節市場下，全球的生活組織由勞動力、土地和資本構成，又有金本位制作為這龐大自動系統的監護人。在這場他們完全無法控制的表演中，各國和各民族只是傀儡而已，借助中央銀行和關稅以及移民法的幫助，保護自身免遭失業和動蕩的傷害。這些措施旨在抵消自由貿易和穩定貨幣的破壞性作用，為求達到目的就要干預那些機制的運作。雖然每項限制措施有其受益者，其超額利潤或超額工資是向其他所有公民徵稅，但通常只是稅額不合理，而不是保護措施本身。從長遠看，價格曾全面下降，人人受益。

無論保護是否合理，干預的作用暴露了世界市場體系的虛弱。一國的進口關稅妨礙另一國出口，迫使後者在沒有政治保護的地區尋找市場。經濟帝國主義主要是強國之間為了爭奪把貿易擴大到沒有政治保護的地區的特權。由於狂熱生產導致搶奪原材料供應，這加大了出口壓力。各國政府支持在落後國家做生意的國民，彼此為了貿易和國旗競賽。各強國的志向是帝國主義和不經意為獨霸天下做準備，但發現越來越依賴越來越不穩定的世界經濟體系。然而嚴格保持國際金本位制的完整又是勢在必行。這是磨擦的制度性根源。

國境之內也有類似的矛盾。保護主義幫助把競爭性市場改變成壟斷性市場。市場越來越不能形容為有競爭性成份的自主與自動機制。越來越多個體被協會取代，勞動力和資本聯合結成非競爭性集團。經濟調整變得緩慢和困難。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受到嚴重阻礙。最後，未調整的價格和成本結構延長了經濟蕭條，未調整的設備阻礙了無利可圖的投資離場，未調整的價格和收入水平導致社會緊張。無論是勞動力、土地或資本市場，這種壓力會溢出經濟領域，要由政治手段恢復平衡。無論如何，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在制度上的分離是市場社會的構成，不管涉及什麼緊張狀態都要維持。這是破壞性壓力的另一根源。

本文的敘述快近尾聲，然而還未揭示部份論點。因為即使本書確確實實證明了巨變的核心是市場理想國的失敗，本書依然有責任展示這成因是如何決定現實事

---

[392] 原註 2：G. D. H. Cole 認為 1870 年代是「整個十九世紀中社會立法最活躍的時期。」

件。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歷史不是由任何單一因素塑造。雖然歷史極為豐富和多樣性，歷史長河有其周而復始的各種情況和選擇可以說明一個時代各類事件的脈絡。如在某程度上可以解釋在一般情況下主宰潮流和逆流的規律，大可不用理會不可預測的邊緣亂流。

在十九世紀，自發調節市場的機制提供了這樣的條件，國家和國際活動要滿足這些條件的需要。那機制產生了兩項文明特性：嚴格的決定論[393]和經濟特徵。當代觀點往往把這兩項特性聯繫，認為決定論源自經濟動機的本質；這動機認為人會追求金錢利益。實際上，兩項特性之間沒有任何聯繫。在許多細節上很突出的決定論只不過是有各種可預測方案的市場社會機制的產物，其嚴謹被錯誤歸因於唯物論動機的力量。無論個人動機為何，經濟動機本身對大多數人來說遠不及所謂感情動機來得有效，供求價格體系仍會始終維持平衡。

人是被新機制掌控，不是新動機。簡而言之，壓力來自市場領域，再擴散到政治領域，從而構成整個社會。只要世界經濟繼續運作，一國之內的緊張狀況依然隱而不露。一旦金本位制這個最後存在的制度消失，各國內部的壓力最終會釋放。各國對新情況的反應各不相同，但這些反應基本上是對傳統世界經濟體系消失作出的調整；當體系分解，市場文明本身也被吞沒。這解釋了難以置信的事實，即是文明正被無情制度的盲目行為破壞，這些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自動增加物質福祉。

這種不可避免的情況實際上是如何發生？如何轉化為歷史核心的政治事件？階級力量的衝突決定性進入了市場經濟垮臺的最後階段。



[393] Determinism，決定論是哲學命題，認為事件的發生，包括人類的認知、舉止、決定和行動都是因為先前的事件因而發生。決定論相信宇宙完全由因果定律的結果支配，經過一段時間，有一連串事件從未中斷地發生，任何一點只有一種可能的狀態，不可能有自由意志。

第三部

巨變

第十九章
民選政府和市場經濟

國際體系在 1920 年代瓦解，幾乎被人遺忘的早期資本主義問題再次出現。首要問題是民選政府[394]。

法西斯主義攻擊全民民主，只是重提在市場經濟歷史中常見的政治干預主義問題，因為這問題只不過政經分離的另一名稱。

干預問題在勞動力方面首次變得尖銳，一方面是由於史賓漢蘭制度和〈新濟貧法〉，另一方面是議會改革和憲章運動。干預主義對土地和資本問題的重要性不遜前者，即使各種衝突不是那麼壯觀。歐洲大陸同樣有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類似問題，但時間滯後，受各種衝突影響的環境在工業上較為現代化但社會卻不再是那麼一元化。相同類型的發展導致處處政經分離。英格蘭和歐洲大陸一樣，起點是建立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和政治國家民主化。

人們把史賓漢蘭制度恰當地描述為預防性干預主義行動，阻止建立勞動力市場。工業化英格蘭的首次戰役是為史賓漢蘭制度而戰，但暫時失敗了。在爭鬥中，古典經濟學者創造了「干預主義」的口號，史賓漢蘭制度被標籤為對實際並不存在的市場秩序的人為干預。Townsend、Malthus 和 Ricardo 在濟貧法條件的脆弱基礎建起了古典經濟學的大廈，這是對陳腐秩序最令人可畏的毀滅性概念工具。然而這補貼制度保護了下一代人的農村界限，免受城市高工資的誘惑。到了 1820 年代中期，Huskisson 和 Peel[395]擴大對外貿易的途徑，容許機器出口，解除羊毛出口禁令，廢除海運限制，放鬆移民出境，正式廢除有關學徒期和工資評估的〈工匠法〉和〈反企業聯合法[396]〉。但令人沮喪的史賓漢蘭制度仍然在各郡推行，阻礙勞工從事正當工作，使獨立勞工成為不協調的觀念。雖然勞動力市場的時機已

---

[394] popular government，中譯沒有統一，其他譯本有：民治、庶民統治、民眾政府、大眾政府、全民政府。譯者以為「民選政府」符合法律定義：「人民通過選舉行政和立法機關而控制的政府」。（參見 Black's Law Dictionary）

[395] William Huskisson PC (1770-1830)，英國政治家、金融家和歷任國會議員。他有一項另類世界記錄：1830 年 9 月 15 日，他參加利物浦和曼徹斯特鐵路的啟用典禮，被火車撞至重傷致死，是為世界首例。Robert Peel (1788- 1850) 英國保守黨政治家，兩度出任首相，在第二任期間廢除〈穀物法〉。

[396] Anti-Combination Laws

經來臨，但被鄉紳「法令」阻止，未能順產。

議會改革派立即著手廢除補貼制度。下議院通過達到這目標的〈新濟貧法〉，被稱為是最重要的社會立法。然而法案核心只是簡單廢除史賓漢蘭制度。這最能決定性證明當其時完全不干預勞動力市場對未來整個社會結構有結構上的重要性。緊張狀態的經濟根源大概如此。

政治方面，1832 年的議會改革完成了和平革命。1834 年的〈濟貧法修正案〉改變了國家的社會階層，以激進的新政策重新詮釋英國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實。〈新濟貧法〉廢除被 Burke 猛烈抨擊的「窮人」一般類別：「正直窮人」或「勞動窮人」。以前的「窮人」現分類為不能養活自己並且居住在濟貧院的「赤貧民」和通過勞動掙工資謀生的「自給自足工人」。這創造了全新的窮人類別：出現在社會舞臺的「失業者」。為了人道，赤貧民應得到救濟；為了產業，失業者不應得到救濟。失業工人對本身的命運一無所知，於此無關緊要。重點不是如失業者認真找工作是否能夠找到工作，而是除非他面臨挨餓，別無選擇只能呆在令人厭惡的濟貧院，工資制度就會崩潰，從而把社會推入悲慘和混亂的境地。這即是理解到無辜者受到懲罰。這種變態的殘酷一方面解放勞動者，而其自認的目的是利用饑餓使破壞的威脅發揮作用。古典經濟學者著作直陳荒蕪蒼涼之鬱悶情緒，使我們能夠梳理這過程。為了對被困在勞動力市場範圍內的超出編制人員安全地鎖上大門，政府陷身於自我否定的法令，用 Harriet Martineau's 的說法：國家救濟無辜受害者是「侵犯公民權利」。

當憲章運動要求被剝奪權利的人民進入國家的範圍，政經分離不再是學術問題，而是成為社會現有制度不容否定的條件。把〈新濟貧法〉連同其精神折磨的科學方法交付這套療法是為彼等設計的同一對象，這是精神錯亂的行為。Macaulay 勳爵在上議院發表偉大自由主義者有史以來最雄辯的演說，要求以一切文明建基的財產制度之名無條件拒絕憲章運動的提請，他只是貫徹始終。Robert Peel 爵士稱「憲章」侵犯「憲法」。勞動力市場越惡毒扭曲工人的生活，他們更執意叫囂要求投票權。要求有民選政府，是張力的政治根源。

在這些情況下，憲制主義有了全新意義。迄今，憲法保護產權免受非法干預只是針對來自上層的武斷行為。Locke 的遠見沒有超越土地財產和商業財產的界限，目的只是阻止王權的橫暴行為，諸如亨利八世的世俗化措施[397]、查理一世掠奪皇家鑄幣廠[398]、或查理二世時期財政部「止付」[399]。1694 年，獨立的英倫銀行取

[397] 亨利八世在 1536 和 1541 之間以行政和法律程序解散英格蘭（不包括當時不是英國部份的蘇格蘭）形形色色的修道院，收入撥歸國有，出售其資產。

[398] 1638 年，查理一世為籌集軍費，沒收倫敦商人存放在皇家鑄幣廠價值二十萬的金幣和金條；後來歸還物主，條件是商人要借出四萬英鎊。

[399] 英格蘭皇室經常入不敷出，以國王名義發行債券，但信用不佳。1702 年，查理二世即下命財

得特許狀，是達成 John Locke 促請政府與商業分離的典範。商業資本贏得反對王權的勝利。

百年之後，要受到保護的不是商業財產而是工業財產，對手不是王權而是平民。把十七世紀的意義套用在十九世紀的情況，只是錯誤的觀念。孟德斯鳩在 1748 年發明的權力分立，現被用於分離人民與自身的經濟生活。美國的領導層受到英格蘭工業景況的預警，在農民與工匠的環境中塑造了美國憲法，把經濟領域從憲法的管轄範圍完全分離，從而把私有財產置於最可能設想的保護，創造了世上唯一有法律基礎的市場社會。雖然美國選民有普選權，但對物主是無能為力。[400]

「工人階級不得有選舉權」成為英格蘭憲法[401]的不成文法。憲章運動領導人入獄；數以百萬計的追隨者受到代表極少數人的立法機構嘲弄，而要求選舉權的卑微要求經常被當局視為刑事罪行。所謂英國制度特徵的妥協精神，當時不見跡象，只是最近的發明。工人捱過了「饑餓的 1840 年代[402]」，溫順的一代人湧現和享受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好處，上層技術工人壯大工會，與人數眾多的貧窮勞工分道揚鑣，工人默認〈新濟貧法〉強加諸他們的制度；在這之後收入較好的階層才容許他們參加國家議會。憲章運動是為了停止壓榨人們血汗的市場工廠的權力而鬥爭，但是只有在可怕的調整之後，人們才獲得這些權力。在英格蘭內外，從 Macaulay 到 Mises，從 Spencer 到 Sumner[403]，好戰的自由主義者全都表達全民民主威脅資本主義的信念。

勞工問題的經歷重現在貨幣問題。1790 年代預示了 1920 年代的情況。Bentham 首先指出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是對產權的干預：前者對商業徵稅，後者擾亂商業。[404] 自此之後，勞工和貨幣，失業和通貨膨脹在政治上同屬一個範疇。Cobbett 譴責金本位制和〈新濟貧法〉，而 Ricardo 支持兩者；兩人的論點非常相似：資本和勞工都是商品，政府無權干預。例如 Atwood[405]是反對推行金本位制的銀行家，其立場與社會主義者 Owen 一樣。百年之後， Mises 仍然重申勞工和資本和市場

政部停止支付債券，只償還利息，許多商人因而破產。這是後來光榮革命的遠因。

[400] 原註 1：Hadley, A. T., *Economics: An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Public Welfare,* 1896.

[401] 和其他許多國家不同，英國並沒有成文憲法，因此稱為「不成文憲法」。所謂英國憲法是一套包含基本規範和政治體制的成文法、習慣法和慣例。

[402] Hungry Forties。1840 年代初期，英國經歷經濟蕭條，窮人受苦。1839 年，嚴重貿易不景氣導致失業人數急劇增加，農業收成又不好。隨後兩年農業依然歉收，人口迅速增加，更糟的是〈穀物法〉似乎人為提高麵包價格，人民的生活更苦。馬鈴薯晚疫病在 1845 年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出現，其後蔓延到愛爾蘭，破壞大部分作物。馬鈴薯晚疫病在 1846 年重回，導致愛爾蘭飢荒。

[403] Charles Samner (1811-74)，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爭取人類平等的政治家，廢奴運動的戰士。

[404] 原註 2：Bentham, J.,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 44, 稱通貨膨脹為「強迫的節儉」; p. 45 稱之為 「間接徵稅」Cf. also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Ch. 15.

[405] Thomas Attwood (1783–1856)，英國銀行家，經濟學家和國會議員，是伯明翰經濟學派的領導人。

的其他任何商品一樣，與政府無關。在十八世紀，美國在建立聯邦之前，便宜的貨幣等同史賓漢蘭制度，即是政府面對大眾叫囂時作出經濟上令人泄氣的讓步。法國大革命和當時發行的紙幣表明人民會打爛貨幣，而美國各州的歷史也未能驅散這種懷疑。Burke 把美國民主聯繫資本問題，而 Hamilton[406]不僅擔心派系鬥爭還擔心通貨膨脹。不過在十九世紀的美國，民粹主義的人民黨和美鈔黨與華爾街巨頭的爭吵只是地方性，而在歐洲，對通貨膨脹的指責是在 1920 年代成為反對民主立法機構的有力論據，對政治有深遠影響。

社會保護和干預貨幣不僅是類似而且是經常相同的問題。自金本位制建立以來，工資水平不斷上升和直接的通貨膨脹都幾乎同一程度危及貨幣：兩者可能導致減少出口和最終壓低匯率。這兩種干預的基本形式之間的簡單關係成為 1920 年代的政治支點。關注貨幣安全的各方抗議預算赤字，也反對廉價貨幣政策，因而反對「國庫通脹」和「信貸通脹」，或實際一些譴責社會負擔和高工資，工會和工黨。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本質；不應懷疑不受限制的失業福利會擾亂預算平衡，而利率過低導致價格通脹對匯率有同樣的可惡影響。因為 Gladstone，財政預算成為英國民族的良知。在較落後民族，穩定貨幣或許代替預算。但結果都是近乎相似。究竟是否削減工資或社會服務，市場機制已無可避免定下不削減的結果。從這分析角度看，1931 年的英國國民政府[407]以適度方式發揮與美國實行「新政」的相同作用。這兩件事都是在巨變時期個別國家採取的調整行動，但英國的情況有優勢：沒有諸如民間爭吵或意識形態轉變等複雜因素，因此更清晰顯示決定性特徵。

自 1925 年以來，英國貨幣的地位一直不穩固。回復金本位制的同時，英國貨幣明顯高於世界同等水平的價格水平沒有相應調整。很少人意識到政府與中央銀行、各黨派與各工會共同發起這進程是如何荒謬。首屆工黨政府（1924 年）的財政大臣 Snowden 是金本位制的癮君子，他不知道如要恢復英鎊的地位，工黨或是要承擔工資下降或是下臺。七年後，正是 Snowden 本人迫使工黨做了這兩件事。到了 1931 年秋季，經濟蕭條的持續流失影響了英鎊。1926 年總罷工失敗未能阻止工資水平進一步上升，未能防止社會福利的財政負擔上升，特別是無限制的失業福利。無需銀行家的「敲詐」（雖然這確實是敲詐）令國民明白無論貶值是由於高工資和出口減少所引起，可靠的貨幣和財政預算是魚，改善社會福利和貨幣貶值是熊掌；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換句話說，必要削減社會福利或降低匯率。工黨猶猶疑疑：削減社會福利有違工會政策，脫離金本位制被認為是冒瀆。工黨被趕下台，各傳統政黨削減社會福利和最終離開金本位制。有資產審

406 Alexander Hamilton(1757- 1804)，美國軍人，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美國憲法起草人之一與第一任美國財政部長，華盛頓管治時期的經濟政策的主要構思者，其中重要的有：重建國家信用的計畫、建立國家銀行、建立關稅系統、與英國建立友好貿易關係。

407 National Government，在英國政治層面泛指由部份或所有主要黨派合組的聯合政府，但歷史上主要指由各政黨在 1931-40 年的聯合政府，主要由保守黨領導。

查的失業福利取代了無條件福利。與此同時，國家的政治傳統經歷重大的轉變。兩黨制暫停，而且沒有任何衝動要恢復，十二年後依然黯然失色，所有跡象都反對早日恢復兩黨制。國家離開金本位制，沒有為福利和自由帶來悲劇性損失，在走向變革邁出了決定性一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決定性步驟還伴隨著自由資本主義的方式有改變。然而，後者並不意味著國家永久脫離危險地帶。

所有重要的歐洲國家都有推行類似的機制，後果大致相同。1923 年在奧地利、1926 年在比利時和法國、1931 年在德國，各國工黨為了「拯救貨幣」都不得不下臺。Seipel[408], Francqui[409], Poincare[410]和 Bruning[411]這些政治家都把工黨排除於政府，減少社會福利，努力打破工會對調整工資的阻力。貨幣總是面對危險，而且相當有規律把負擔集中在工資膨脹不平衡預算。如此簡化是沒有公正處理涉及的各種各樣問題，幾乎囊括了經濟和金融政策的每一議題，包括外貿、農業和工業。越仔細考慮問題，越清楚貨幣和財政預算把懸而未決的問題集中在僱主和僱員之間，而其他國民轉向支持這個或那個領導組群。

法國的所謂 Blum 實驗[412]（1936 年）是另一實例。工黨主政，但條件是不得禁止黃金出口。由於法國政府被貨幣這極其重要問題束縛，所以「法國新政」從未有機會實施。這實例有結論性，因為法英兩國同在勞工問題淡化後，中產階級的政黨痛快地放棄捍衛金本位制。這些例子表明健全通貨假設的效應對民粹政策造成甚麼破壞。

美國經驗以另一種方式給出同樣的啟示。雖然如果不脫離金本位制就不可能發動「新政」，但外匯交易實際上是重要，但重要性不大。在金本位制的情況下，理所當然是由金融市場領導人負責維護穩定匯率和健全國內信貸；政府財政很大程度上依賴這兩者。因此銀行機構可阻礙經濟領域中不為其所喜的任何國內行動，無論理由是好是壞。就政治而言，政府在貨幣和信貸方面必須聽取銀行家的建議，因為只有銀行家才知道任何金融措施是否會危及資本市場和匯率。由於美國及時脫離金本位制，所以在這事例中社會保護主義沒有導致僵局。雖然這舉措的技術優勢輕微（而一如既往，政府給出的各種理由是十分拙劣），但這舉措的結果是華爾街奪取政治權力。金融市場以恐慌為管治。1930 年代挽救了華爾街免

---

408 Ignaz Seipel (1876–1932)，奧地利主教和政治家，在 1920 年代兩度出任總理。
409 Émile Francqui (1863–1935)，比利時軍人，外交家和商人。
410 Raymond Poincaré (1860–1934)，法國政治家。五度出任總理，又曾任總統。
411 Heinrich Brüning (1885–1970)，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期 1930 至 1932 年期間出任總理，已是魏瑪共和國在任時間最長的總理。
412 Léon Blum 帶領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贏得 1936 年法國大選，隨即啟動各種社會改革。工人同年 6 月發動總罷工「歡迎」勝利，談判達成 Matignon 協議，成為法國社會權利的基石。協議包括罷工權，集體談判權，每年兩星期帶薪年假，每週工時四十小時，上調工資等等。然而，隨著經濟繼續停滯，Blum 被迫停止改革，法郎貶值。法國保守派重回政壇，Blum 和人民陣線在 1937 年 6 月下台。這為期一年的社會改革稱為 Blum 實驗。

遭歐洲大陸式的社會大災難。

然而，由於美國獨立於世界貿易之外和其貨幣地位十分強勢，所以金本位制在美國主要只是國內政治問題。在其他國家，脫離金本位制涉及的遠不止只是退出世界經濟。也許唯一的例外是英國，英國在世界貿易的份額是如此之大，可以訂立國際貨幣體系應如何運作的各種方式，從而把金本位制的負擔頗大部份推給別人。德國、法國、比利時和奧地利沒有這些條件。這些國家的貨幣一旦被破壞，就意味著脫離外部世界，從而犧牲了依賴進口原材料的工業、打亂就業依賴的對外貿易，以及沒有任何機會強迫徵購商作出相似程度的貶值，以規避貨幣的黃金價值下跌的國內後果；英國做得到，這些國家做不到。

匯率是強加諸工資水平的極有效杠杆。在匯率把事情推到最後關頭之前，工資問題通常在表面之下令緊張狀態升級。市場規律經常不能強迫加諸不情不願的工薪階層，外匯機制卻能最有效做到。貨幣指標公開展示干涉主義的工會政策對市場機制的所有不利影響（包括貿易周期這些市場機制的固有弱點，現在被認為是理所當然）。

實際上，要更好解釋市場社會的理想國本質，莫過於有關勞工這虛擬商品必然涉及社區這樣的謬論。罷工是工業行動常用的談判工具，越來越多人認為罷工不負責任干擾對社會有用的工作，同時減少最終產生工資的社會紅利。人們埋怨同情性罷工，總罷工被視為對社會存在的威脅。實際上，重要服務業和公用事業行業的罷工以國民為人質，把國民捲入勞工市場真正功能的錯綜複雜問題。勞工應在市場尋找本身價格，以其他方式建立的任何其它價格都是不合乎經濟。只要勞工承擔這份責任，其行為會一如其他商品，「勞工」商品會拒絕以低於買主仍然付得起的價格出售。如這樣的一貫堅持，這意味著勞工的主要責任就是幾乎不斷罷工。這主張極之荒唐，其他說法無出其右，但這只是勞工商品理論的邏輯推理。理論和實踐不調和，根源當然是勞工並不是真正商品，而勞工拒絕工作只是為了要確定其確切的價格（正如其他商品被壓止增加供應的情況一樣），那麼社會很快會因為沒有生計而崩潰。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討論罷工問題時少有提到這論點。

回到現實：以罷工方法來確定工資，在任何類型的社會都是災難性，更不要提我們這個以效益理性而自豪的社會。實際上，在私營企業制度下，工人的工作沒有保障，工人地位嚴重惡化。再加上大規模失業的威脅，大多數人要維持最低標準，工會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功能變得至關重要。但很明顯任何保護工人的干預方法必然阻礙自發調節市場的機制，最終減少消費者可用的資金，而這正正是工資的源泉。

因內在必要，市場社會的根源問題重浮表面：干預主義和貨幣成為 1920 年代政治的核心。經濟自由主義和社會性干預主義改變了本來答覆這些問題的不同答案。

經濟自由主義極力消除干預土地、勞工和貨幣市場自由的所有干預主義政策，以恢復體系的自發調節，並試圖在緊急情況下解決涉及自由貿易、自由勞動力市場和金本位制自由運作這三個基本原則的長期問題，實際上成為恢復世界貿易、排除對勞工流動的所有可避免障礙以及重建固定匯率的無畏先鋒。最後項目優先於其他。必要恢復對貨幣的信心，市場機制才能發揮作用，否則期待政府不要使用所有可能措施保護人民的生活是不現實的想法。就事情的本質而言，這些措施主要是關稅和社會立法，以確保食品和就業，這些措施正是使自發調節體系無法運行的那種干預主義。

首先恢復國際貨幣體系還有另一個更直接的理由：面對混亂市場和不穩定匯率，國際信貸日益發揮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資本流動（除了長期投資）僅僅是幫助國際收支平衡保持流動性，但即使這功能也受到經濟考慮的嚴格限制。只有商業上似乎值得信賴的客戶才獲得信貸。現在情況顛倒過來：政治原因造成債務（諸如賠款），出於半政治原因而發放貸款，以方便賠款。發放貸款也是因為經濟政策的理由，以穩定世界價格或恢復金本位制。不管生產和貿易的情況，世界經濟相對健全的地區正利用信貸機制彌合相對混亂地區之間的鴻溝。人們借助被認為是全能的國際信貸機制在許多國家人為地平衡國際收支、財政預算和匯率。這機制本身建立在期待回復穩定匯率的基礎，而這等同回復金本位制。經濟體系在消失中，但有無比力量的鬆緊帶幫助維持表面上的一致；但鬆緊帶能否承受壓力是取決於金本位制及時恢復。

就其本身而言，國聯的成就可觀。如不是因為目標的本質是不可能的話，可能達成目標，因為投入是如此持續和專注。就目前情況，不作干預會比國聯的努力可能帶來更為災難性的後果。只是因為這看起來總是幾乎成功了，反而大大加重了最終失敗帶來的影響。1923 年，德國馬克在幾個月內瓦解；1930 年年初，世上所有主要貨幣都使用金本位制；在 1923-30 年間，國聯運用國際信貸機制把東歐未完全穩定經濟體系的負擔首先推給西方勝利國，隨後又推向更有能力的美國[413]。美國的崩潰發生在正常的商業週期；當崩潰來臨時，國聯和西歐銀行界建立的金融網絡糾纏著全球經濟，陷入可怕的傾覆。

但這涉及更多事情。在 1920 年代，根據國聯，社會組織的問題必須完全服從恢復貨幣的需求。通貨緊縮是第一需求；要盡可能調整國內制度，甚至暫時推遲恢

[413] 原註 3：Polanyi, K., "Der Mechanismus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Der Osterreichische Volkswirt,* 1933 (Supplement).

復自由的國內市場和自由的國家。（國聯財務委員會）金本位制調查代表團[414]抨擊通貨緊縮未能「影響某些種類的商品和服務，因而未能造就穩定的新平衡。」政府不得不干預以降低壟斷商品的價格、減少已約定的工資，以及削減經濟租[415]。通貨緊縮的理想狀態是「強勢政府下的自由經濟」;「政府」這詞就是字面的意思，即是有緊急權力和暫時中止民眾的自由，「自由經濟」實際上是字面意思的相反，即是政府調整價格和工資（雖然調整的借口是恢復匯率自由和自由的國內市場）。自由資本主義的兩個基石是自由市場和自由政府，「匯率第一」意味著兩者都要犧牲。因此，國聯代表目標已改變，方法沒有改變：國聯譴責有通貨膨脹傾向的政府使穩定貨幣臣服於收入和就業穩定，而國聯扶植上位有通貨緊縮傾向的政府用上一樣多的干預措施使收入和就業穩定臣服於貨幣穩定。1932 年，金本位制調查代表團的報告宣稱：隨著匯率不穩定狀態再現，過去十年貨幣方面的主要成就已經喪失殆盡。報告沒有提到這些徒勞的通貨緊縮努力沒有恢復自由市場，但犧牲了自由政府。雖然經濟自由主義理論上反對干預和通貨膨脹，但還是在兩者之間選擇了把健全貨幣的理想高高置於不干預主義的理想之上；這是遵循自發調節經濟的內在邏輯。然而這些行動往往把危機擴散，為金融添加大規模經濟混亂無法承受的壓力，各國不同經濟體系的赤字被推至高點：國際分工的殘餘部份無可避免瓦解。在這關鍵十年，經濟自由主義服務通貨緊縮政策，頑固地支持獨裁的干預主義；這只是導致決定性削弱民主力量，否則是有可能避免法西斯大災難。英國和美國是貨幣的主人，不是奴僕，齊齊脫離金本位制而逃過此劫。

本質上，社會主義是工業文明社會的內在傾向，自覺服從民主社會，從而超越自發調節的市場。社會主義是產業工人的自然解決方案，他們覺得直接調節生產和市場應是自由社會的有用但是附屬的特徵。從社會作為整體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延續使社會成為眾人之間獨特人際關係的努力；在歐洲，這種人際關係始終與耶教傳統聯繫。從經濟體系的角度來看，這正好相反是突然與過去決裂，中斷了試圖使私人掙錢成為生產活動刺激因素的努力，也不承認個體有權處置生產的主要工具。這解釋了最終由社會主義政黨進行資本主義經濟改革的困難，即便決意不干預產權制度也是如此，因為即使只有極少可能性會這樣做已經破壞自由經濟體系至關重要的信心，即是對產權持續的絕對信心。立法可能重新定義產權的實際內容，市場體系要發揮作用，必要官方確保產權持續。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有兩項變化影響社會主義的地位。首先，市場體系被證

[414] Gold Delegation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於 1928 年成立，調查「因為黃金購買力波動對工業、農業和就職情況的致命影響」。文章引述的結論是大多數委員的意見，有少數委員不同意。（網頁資料）

[415] rent。頗為混淆的經濟學術語，詳盡說法是「經濟租 economic rent」：生產過程中要付出的生產投入成本高於某個供給的價格彈性下本來應該付出的價格，這中間的差額就是經濟租。經濟租會帶來尋租（rent seeking，佔便宜）行為。在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經濟租。經濟租與尋租的出現，代表市場失靈。

明是不可靠，幾乎完全崩潰，即使批評者也從未期盼有這種缺陷。其次，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全新的改變。雖然發生這冒進改變的環境不適用於西方國家，但蘇聯的真實存在證明這有深刻影響。西方觀念認為社會主義有三個前提條件：工業、有教育的人民以及民主傳統；蘇聯確實在沒有這些前提條件下走向社會主義。這些差別使蘇聯經驗不適用於別處，但這沒有妨礙社會主義成為世界強權。在歐洲大陸，各工人階級政黨的觀點一直是社會主義觀點，無疑使人們懷疑他們希望完成的任何改革都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在平和的年代，這樣的懷疑可能是不正確；總的來說，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政黨矢志改革，而不是用革命手段推翻資本主義。但在緊急狀態下，情況就不一樣。如正常方法不中用，就會試用非正常方法；工人階級政黨的非正常方法也許會漠視產權。在危險迫在眉睫的壓力下，各工人政黨也許會重拳出擊、搞出社會主義的措施；至少民營企業的好戰追隨者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措施。這種暗示已足以令市場陷入混亂，釀成全面恐慌。

在這樣的情況下，僱主和工人之間的慣常利益衝突有了不祥的特徵。經濟利益的分歧通常以妥協解決，而社會的政經分離卻往往為這樣的衝突帶來嚴重的社會後果。僱主是工廠和礦山的業主，直接負責組織社會的生產（除了他們的個人的利潤得益）。原則上，他們維持產業運轉的努力應得到所有人支持。另一方面，員工代表社會大部人，其利益很大程度上與整體社會利益吻合。員工是唯一階級可以保護消費者利益、公民利益、人權；在享有普選權的情況下，員工的人數使他們在政治領域中佔優勢。不過立法機構像產業界一樣在社會中要履行正式功能。議員負責形成公眾意願、公共政策的方向以及制定國內外的長期規劃。任何複雜社會都不能沒有政治類型的立法和行政機構的運作。如任何組群利益的衝突導致產業界或政府機構癱瘓（影響任一界別或兩者），對社會會構成直接威脅。

然而這正好就是 1920 年代的情況。工黨在議會有人數優勢，藉此鞏固自身的地位，而資本家把產業界構築城堡，在內管治國家。民間組織的反應是無情地干預商業，漠視產業界特定形式的需要。產業領袖策反民眾背棄他們自由選舉出來的統治者，而民主組織繼續反對人人生活依賴的產業體制。最終，經濟和政治體系同樣受到完全癱瘓的威脅。人人恐懼，那些提出不惜一切代價輕易擺脫困境的人會奪取領導權。法西斯解決方案的時機成熟了。



第二十章
社會變化齒輪中的歷史

假如有政治運動不是各種偶然因素的產物，而是對客觀形勢的要求作出反應，這就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解決方法的退化特徵也是顯而易見，為許多國家基本相似的制度僵局提出逃離的方法，然而一旦試用了這些補救辦法，就會在各處造成不治之症。文明就是這樣地毀滅。

解決自由資本主義僵局的法西斯方法，可描述為以毀滅包括產業和政治領域的所有民主制度為代價來改革市場經濟。處於瓦解危險的經濟體系因此要重振活力，而人們自身要接受再教育，旨在使個人失去本性，無法以政治實體中個人單位發揮作用。[416] 再教育包含否定所有形式的人類手足情誼觀念的政治信仰原則，以科學性折磨反抗者的方法令群眾改變信仰的行為來實現再教育。

這樣的運動出現在全球的工業化國家，甚至在許多工業化剛起步的國家，決不應歸因當代人堅持認為的當地原因、民族精神或歷史背景。法西斯主義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和約〉的關係，就如同與普魯士軍國主義和義大利人的性格一樣沒有太大關聯。這運動出現在保加利亞這些戰敗國和南斯拉夫這些戰勝國，北方性格的芬蘭和挪威以及南方性格的義大利和西班牙、英國、愛爾蘭或比利時這些雅利安種族國家，日本、匈牙利或巴勒斯坦這些非雅利安種族國家，耶教舊教傳統的葡萄牙和新教的荷蘭，普魯士的軍人社會和奧地利的平民社會，有古老文化的法國和新文化的美國和拉丁美洲。事實上，一旦條件成熟，沒有任何類型的背景（宗教、文化或民族傳統）的國家可以不受法西斯主義影響。

此外，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效能與其物質和數量優勢之間明顯缺乏關聯。「運動」一詞容易引起誤解，因為這暗示有很多人投入和參與。如法西斯主義有什麼特點，那就是與民眾的表達無關。雖然法西斯主義希望有大量信徒，但它的潛力量不是追隨者的人數而是影響掌權者，掌控當權者的的良好意願，在革命失敗後得到他們的保護，從而根除革命的風險。

接近法西斯階段的國家有各種徵兆，但不必然包括法西斯運動的存在。重要跡象至少還有非理性哲學的傳播、種族主義的審美觀、反對資本主義的譁眾取寵、非正統的貨幣觀點、批評政黨體制、普遍蔑視「政權」或任何名稱的現有民主組織。各走極端的先行者有奧地利 Spann[417]的所謂普世救說哲學、德國 George[418]的詩作

[416]原註 1：Polanyi, K., "The Essence of Fascis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1935.
[417] Othmar Spann (1878-1950)，奧地利保守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激烈反對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以通俗著作和講座推廣他的觀點。

和 Klages[419]的浪漫宇宙論、英國 Lawrence[420]的性愛生機論、法國 Sorel[421]的政治神話宗派。德國的希特勒最終被興登堡總統[422]身邊的封建集團推上臺，正像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 Primo de Rivera 被各自的君主推上臺的情況一樣。但希特勒有強大的運動支持；墨索里尼的支持較小規模；Primo de Rivera 什麼都沒有。法西斯的策略沒有發動反對合法當局的真正革命，而是與假裝被徹底擊敗的當局有默契安排偽裝革命。這只是複雜大局的粗疏輪廓，還要騰出空位給其他五花八門的人物，例如工業化的美國底特律市說話隨意的耶教舊教煽動者、落後路易斯安那州的 Long[423]、日本軍隊的陰謀家以及烏克蘭的反蘇聯破壞份子等。自 1930 年代以來，法西斯主義一直是每個工業化社會的既定政治可能性，一種幾乎是即時的情緒化反應，稱之為「動作」而不是「運動」更能顯示癥兆往往是不清楚和不明確危機的客觀本質。人們時常無法確定一場政治演講或演出、佈道或公眾遊行、一種玄學或藝術時尚、一首詩或一項政黨計劃是否法西斯主義。沒有公認的法西斯主義標準，也沒有常規的原則。然而法西斯主義所有有組織的形式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出現後突然消失，在不定期潛伏後又突然爆發。所有這些都符合社會力量依著客觀形勢而增強和減弱的圖畫。

所謂「法西斯形勢」只是法西斯主義輕易和取得全面勝利的慣見情況。大批勞工的產業和政治組織和憲制自由的忠誠支持者同時消失，而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勢力掃除民主政府、政黨和工會當時看來是壓倒性的勢力。如「革命形勢」的特點是所有抵抗力量在心理上和道德上瓦解的程度，只有少許武裝的少數暴徒已可以攻陷和突破反動份子的所謂堅固要塞，那麼「法西斯形勢」可說是與此完全匹配，不同之處是民主和憲法自由的壁壘受到同樣壯觀的攻擊。1932 年 7 月在普魯士，社會民主黨的合法政府坐在合法權力的寶座，反而屈從 Herr von Papen 違反憲制的暴力威脅。大約六個月之後，希特勒以和平手段攫取最高的權力地位，立刻發

---

418 Stefan Anton George (1868 -1933) 德國詩人，編輯和翻譯者。

419 Ludwig Klages (1872-1956) 德國哲學家，心理學家。廣為人知的是他對性格分析和筆跡的研究，也成為他的學說基礎。他構想人是肉體和靈魂的結合單位，肉體是靈魂的「現象」，靈魂是肉體的「意義」，先民依照生命原則活得開心和有韻律，但「精神」這「非宇宙 acosmic」力量阻礙和破壞了靈魂生命的和諧整體，也破壞了人類的生活，因為精神使人類走向文明，在文明的後來階段生活變得機械化，因此破壞了生活。理性主義、形式主義和機械性思想，科技和數學的發展等等都是精神的產品，干涉和限制人類的生活。他認為精神越嘗握人類的生存，最後人沒有了靈魂，破壞自然世界（過度消耗自然資源）而最終死亡。世界末日後，新的生命週期開始，精神不再佔主導地位。他極度悲觀認為文明是摧毀生命的「精神」統治。（網上參考）

420 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20 世紀英語文學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極具爭議。主要成就包括小說、詩歌、戲劇、散文、遊記和書信。他的創作基本屬於現實主義文學範疇。由於他的作品堅持不懈的描述日常生活中無休止的心靈抗爭，他的許多小說都彌漫著憂鬱的情調。其詩歌作品則通常描述壯麗的自然風光，和小說的風格截然不同。

421 Georges Eugène Sorel(1847-1922)，法國哲學家，工團主義革命派理論家。

422 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元帥，戰後魏瑪共和國第二任總統。

423 Huey Pierce Long(1893-1935)，美國政治家，1928 年當選易斯安那州長，執政期間越過州議會行使權力，大大增加對富人的稅收，加強福利事業幫助窮人，獲得優秀政績，但被一些反對者指為獨裁。

動革命襲擊，全面破壞了魏瑪共和國制度和憲制政黨。想像是運動的力量造就這樣的形勢，而沒有看到是這種形勢造就這運動；這是過去幾十年被忽略的重要教訓。

一如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紮根於未能發揮作用的市場社會，因而其範圍遍及全球、普世皆然；有關問題超越經濟範疇並引發特殊社會類型的巨變，觸及幾乎人類活動每一領域：政治、經濟、文化、哲學、藝術或宗教，而且在某一刻與當地和典型趨勢結合。要理解這階段的歷史，必要區分不同國家的基本法西斯行動和與之結合的短暫趨勢。

1920 年代的歐洲有兩種這樣的趨勢顯得特別重要，遮掩了較微弱但更全面的法西斯主義模型：反革命和民族修正主義。這些趨勢的直接起點是各款條約和戰後的革命；雖然各種趨勢有嚴格的條件並局限於其特殊目的，但是很容易與法西斯主義混淆。

政治鐘擺來回擺動，反革命通常是對事態被激烈擾亂的回應。至少自英聯邦成立以來，這樣的行動常見於歐洲，與當時社會進程的關連只是有限。1920 年代頗多這樣的情況：動蕩時勢已趕走了中歐和東歐十多位君主，部份是由於戰敗的逆流，不是由於民主的行動向前。反革命的任務主要是政治方面，而且勢所必然是由諸如皇室、貴族、教會、重工業以及有關聯的政黨這些被剝奪權利的階層和集團所推動。在此期間，保守份子和法西斯份子的聯盟與衝突主要涉及反革命事業中法西斯份子應分享的份額。法西斯主義現已是革命趨勢，對準保守主義也對準社會主義的競爭性革命力量。這沒有阻止法西斯份子向反革命提供服務而在政治領域尋求權力。相反的是他們取得支配地位，主要是因為保守主義所謂沒有能力完成任務；如社會主義被禁，這是無可避免。保守派很自然試圖獨佔反革命的榮譽，而德國實際上獨自實現了這目的，在沒有向納粹份子讓步的情況下剝奪了工人階級政黨的勢力和權力。同樣，奧地利的保守政黨（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在 1927 年在沒有向「右翼革命」作任何讓步的情況下解除了工人武裝。即使法西斯主義參與反革命是無可避免，還是建立了「強勢」政府把法西斯主義驅逐至權力邊緣；1929 年的愛沙尼亞、1932 年的芬蘭和 1934 年的拉脫維亞就是這樣的情況。1922 年的匈牙利和 1926 年的保加利亞，偽自由政權削弱了當時法西斯主義的權力。只有在義大利，保守派在恢復產業界的工作秩序時未能阻止法西斯份子有機會取得權力。

軍事上戰敗的各國以及「精神上」戰敗的義大利，民族問題沉重而且緊迫。最嚴峻的問題是永久解除戰敗國的武裝；在國際法、國際秩序和國際和平組織建立在勢力均衡基礎的世界，有一些國家變得無能為力，但沒有新制度取代舊制度。因為沒有勢力普遍擴散的先決條件，國際聯盟充其量只是略有改進的勢力均衡制

度，實際上還沒達到以前歐洲協同體的水平。初生的法西斯運動幾乎到處都身先士卒要解決民族問題；沒有這「搭便車」行為，法西斯運動不可能生存。

然而，法西斯運動只是利用這問題作為跳板，在其它時候敲出和平主義和孤立主義的音符。在英國和美國，這與綏靖政策[424]聯繫一起；奧地利的保安團[425]與耶教舊教和平主義者合作；而耶教舊教法西斯主義原則上是反民族主義。Huey Long[426]無需以州界衝突為藉口發動法西斯運動。荷蘭和挪威的類似運動無關民族主義，甚至達到叛國罪程度；Quisling[427]也許是優秀法西斯份子的名字，但肯定不是愛國者的好名字。

法西斯主義為政治權力鬥爭時，完全隨意漠視或利用當地問題，其社會性目標超越政治和經濟框架，在退行性過程中置入政治宗教，在崛起中它的樂隊只排斥極少數情緒；但一旦勝利後就嚴格限制樂隊只能表演極少數但有極端特色的樂章。一些法西斯主義在革命時期展現偽民族主義，革命後發展一套有具體帝國主義色彩的非民族主義；要理解兩者之間的細微但關鍵性區別，先要區分法西斯運動在通向權力之路時偽裝心胸狹窄和掌權時的真正心胸狹窄。[428]

一般而言：保守派的國內反革命是成功的，但很少能解決國家與國際之間的問題。Bruning 在 1940 年堅持他在「興登堡身邊小集團」決定把他趕下臺和把權力交給納粹份子之前，已經解決了德國賠償和解除武裝的問題，只是敵人不想把榮譽歸於他。[429]在有限的意義上，這似乎是無關宏旨，因為正如 Bruning 暗示，德國的平等地位問題並不局限於技術性解除武裝，而是包括同樣重要的去軍事化問題；此外，實際上也不可能漠視德國外交力量有來自誓要執行激進民族主義政策的納粹群眾。事件最後證明德國要取得平等地位，不可能沒有革命性起點，因而納粹主義把自由而平等的德國陷入邪惡軌道的可怕責任變得明顯。在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能奪得權力，是因為能夠利用未解決的國家問題作為手段；在法國和英國，法西斯主義因為它的反愛國主義而明顯被削弱。只有在本質上依賴他人的小國，屈從強國的精神才有助法西斯主義。

1920 年代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只是無意中與民族傾向和反革命趨勢聯繫一起。這是有獨立源頭的各種運動互生的情況，相互補充且造成基本上類似的印象，實際上彼此之間並不相干。

---

[424] appeasement

[425] Heimwehr：奧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地方組織。由保守農民組成，代表右翼勢力。

[426] Huey Pierce Long (1893-1935)，美國政治家，

[427] Vidkun Quisling (1887-1945)，挪威軍人與政治家；在挪威被德軍攻佔之後出任新政權的總理。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捕，因叛國罪成立被槍決。「Quisling」一詞成為英文字彙「賣國賊」的同義詞。

[428] 原註 2：Heymann, H., *Plan for Permanent Peace,* 1941. Cf. Bruning's letter of January 8th, 1940.

[429] 原註 3：Rauschning, H., *The Voice of Destruction,* 1940.

事實上，法西斯主義的角色是由一個因素決定：市場體系的情況。

在 1917-23 年間，各國政府偶爾尋求法西斯份子幫助恢復治安秩序：市場體系運作沒有其他要求。法西斯主義仍然處於未發展的境地。

在 1924-29 年間，似乎已確保市場體系恢復，法西斯主義作為政治力量就淡出。

在 1930 年之後，市場經濟普陷入全面危機，幾年以內法西斯主義成了一股世界性力量。

1917-23 年的第一階段產生的只不過是一個名稱。在許多國家，諸如芬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和匈牙利等，發生了農業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而在其他國家：義大利、德國和奧地利，產業界工人階級獲得政治權力。最終反革命勢力恢復了國內的勢力均衡。在大多數國家，農民轉而反對城市工人；在一些國家，法西斯運動由軍官和鄉紳發動，為農民提供榜樣；在其他國家，例如義大利，失業人士和小資產階級組成法西斯軍隊。最引起爭議的問題是公共秩序和法治，沒有提出激進的改革問題；換句話說，沒有法西斯革命的任何明顯跡象。這些運動只是在形式上是法西斯主義：所謂不負責任的異議份子組成民間夥團，在當權者縱容下使用武力和暴力。法西斯主義的反民主理論已誕生，但還未成為政治因素。托洛茨基[430]1920 年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夕就義大利形勢發表的長篇報告沒有提到法西斯主義，雖然法西斯已存在一段時間，要到十多年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已確立在該國的地位之後才進一步發展成為有特色的社會制度。

1924 年及以後，歐洲和美國沉醉在興高采烈的繁榮景象，淹沒了對穩固市場體系的所有擔憂。人們宣佈恢復了資本主義。除了一些邊緣地區，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已被肅清。共產國際宣告資本主義的鞏固是不爭的事實；墨索里尼頌揚自由資本主義；除了英國，所有主要國家都處於升級階段。美國享有傳奇式繁榮，歐洲大陸也不遑多讓。希特勒的政變被鎮壓；法國撤出 Ruhr 地區；德國貨幣（馬克）奇蹟地恢復；Dawes 計劃在賠償中除去了政治因素；〈Locarno 協議[431]〉在商議；德國即將開始七年的興旺年代。在 1926 年年底前，從莫斯科到里斯本再度回歸金本位制。

在 1929 年以後的第三階段，法西斯主義的真實意義變得明顯。市場體系的停滯

[430] Leon Trotsky (1879-1940)，俄國十月革命主要領導人之一。

[431] Locarno Treaties 羅加諾協議；歐洲多國在 1925 年於瑞士羅加諾簽訂七項協議。一戰中的歐洲協約國與中歐及東歐新興國家嘗試確認戰後領土界線，並爭取與戰敗的德國恢復正常關係。

狀態已是明顯事實。直至那時，法西斯主義只是義大利獨裁政府的一種特性，與那些較傳統類型的政府稍有不同，但現在成為解決工業化社會問題的方案。德國在歐洲範圍的革命帶頭而起，與法西斯主義結盟為本身的權力鬥爭提供動力，很快就席捲全球。歷史處於社會變化的齒輪中。

一次偶然但不是意外的事件開始毀壞國際體系。華爾街股市暴跌擴大範圍，緊隨其後是英國決定脫離金本位制，兩年以後美國也採取相同行動。期間，裁軍會議中止，德國在 1934 年脫離國際聯盟。

這些象徵性事件把世界組織推入驚人變化的新紀元。日德義三個強國反對現狀，破壞處於崩潰狀態的和平制度。與此同時，世界經濟的真正機構也未能發揮作用。創造金本位制的英美兩國至少是暫時讓它失效；一些國家以違約為幌子，拒付外債；資本市場和世界貿易萎靡。全球的政治和經濟的體系同時崩潰。

這些國家的內部變化也是一樣徹底。兩黨制被一黨政府取代，有些還是民族主義政府。然而，獨裁國家和保留民主輿論的國家之間有外部相似性，但只是用來強調討論和決策這自由制度的重要性。蘇聯轉向獨裁形式的社會主義。在德日義這些為戰爭作準備的國家，自由資本主義消失了，在美國和英國也有同樣情況，只是程度較少。新興的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新政」彼此相似，都是放棄了「自由放任」原則。

啟動歷史進程的是獨立於各國的事件，各國根據決心走向何方而對挑戰作出反應。一些國家規避變化、一些主動應付、一些漠然處之；各自在不同方面尋求解決方案。然而從市場經濟角度看，這些往往南轅北轍的方案只是既有的解決方案。

一些不滿足的強國決心利用這全面混亂來促進自身利益；勢力均衡體系的消亡（甚至是國聯這樣的虛弱形式）是難得的機會。德國急於為國際秩序提供立足點的傳統世界經濟加快崩潰，期待經濟崩潰方便該國爭取先機。德國故意擺脫資本、商品和貨幣的國際體系，目的是為了該國他日拒絕承擔政治責任時減少外部世界對該國的控制。德國鼓勵經濟專制以確保其長遠計劃所需的自由，又濫用黃金儲備，無故拒絕承認責任而毀壞該國的國外信貸，甚至還一度清除了對自身有利的外貿收支平衡。因為無論華爾街、倫敦金融界或國聯都沒有覺察到納粹份子實際上是指望十九世紀經濟最終崩潰，德國很容易掩飾其真實意圖。〔英國財政大臣〕John Simon 和〔英倫銀行行長〕Montagu Norman 堅信最終〔德國央行行長〕Schacht 會在德國恢復傳統經濟；如德國得到金融資助，目前受壓的德國會浪子回頭。直至慕尼克事件及以後，唐寧街一直有這樣的幻想。德國憑藉適應傳統體系混亂的合謀計劃得到極大支持，而英國卻因為堅持傳統體系而受到嚴重阻礙。

雖然英格蘭暫時脫離金本位制，其經濟和金融依然建基於穩定匯率和健全貨幣的原則，因此重整軍備是有受限。一如德國的經濟獨裁是源於其防範全面變革之軍事和政治考慮的結果，英國的戰略和外交政策受限於其保守的金融觀念。有限戰爭的戰略反映了島國市場的觀念，認為只要強大海軍可確保其健全貨幣和能夠在全球購買的物資供應，英國就可以安然無恙。1933 年，希特勒已上臺執政，死硬派的〔英國陸軍財政大臣〕Duff Cooper 辯解 1932 年削減軍隊預算是因為「國家面臨破產，這比沒有效率的軍隊更為危險。」三年多以後，〔英國陸軍大臣〕Halifax 勳爵主張經濟調整會導向和平，所以不應干涉貿易，因為這使得調整更為困難。就在〔1938 年〕慕尼克協議[432]那一年，他和張伯倫首相仍然根據「這些獨步單方」和美國給予德國的傳統貸款來制定英國政策。實際上，甚至在希特勒已越過邊境線佔領〔捷克〕布拉格之後，〔英國財政大臣〕Simon 勳爵還在下議院站在〔英倫銀行行長〕Montagu Norman 一邊，贊同他把捷克的黃金儲備移交希特勒。Simon 深信金本位制的完整比所有其它考慮更為重要，他的治國之道就是要恢復金本位制。當時人們認為他的行為是既定綏靖政策的結果，實際上這是對金本位制精神的尊重，一直主宰倫敦金融界領導人對戰略或政治事務的觀念。在戰爭爆發那星期，〔英國〕外交部答覆希特勒給張伯倫的口信時，還是依據美國給德國的傳統貸款來制定英國政策。[433] 英國在軍事上未作好準備，主要是因是堅持金本位制經濟。

德國最初獲得「毀滅註定要滅亡的東西」的優勢。只要清除十九世紀過時體系能夠讓德國保持優勢，德國就可以繼續領先。自由資本主義、金本位制和絕對主權通通被破壞，是德國搶劫掠奪的無意後果。德國在適應本身追求的自我孤立及隨後奴隸販子式遠征過程中，對變革的一些問題形成了試探性的解決方法。

然而，德國最大的政治資本在於能夠迫使世界各國結成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聯盟。德國成為變革的主要受益者，是因為在解決市場經濟問題方面起帶頭作用，這種解決方法看來在長時間贏得有產階級無條件效忠，而實際上不單單只是這些階級。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假設階級經濟利益優先，在這情況下希特勒註定會勝出。但最後證明國家的社會單位其意義比階級的經濟單位更為切合。

俄羅斯崛起也與其在變革中的作用有關連。從 1917 至 1929 年，對布爾什維克主

[432] 1938 年 9 月 29 日，〔德國元首〕希特勒，〔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Edouard Daladier，〔義大利〕墨索里尼簽署〈慕尼黑協議 Munich Agreement〉，把捷克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 割讓給德國。沒有被邀參加慕尼黑會談的捷克元首 Eduard Benes 抗議，張伯倫告知他英國不會為蘇台德問題開戰。英國民眾普遍歡迎〈慕尼黑協議〉似乎避免了與德國開戰，但被一些政治家抨擊英國政府的行為不光彩，包括丘吉爾。1939 年 3 月，德國軍隊進軍捷克，希特勒撕毀了〈慕尼黑協議〉。張伯倫才意識到不能信任希特勒，英國的綏靖政策走到盡頭。

[433] 原註 4：*British Blue Book,* No. 74., Cmd. 6106, 1939.

義的恐懼只不過對混亂的恐懼，混亂可能致命地阻礙市場經濟的恢復，而市場經濟只有在絕對信任的氛圍中才能運轉。在隨後十年，社會主義在蘇聯成為現實。農莊集體化意味著以合作社形式取代市場經濟的決定性土地因素。蘇聯一直只是針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煽動革命場所，現已成為可以取代市場經濟的新體系代表。

很少人認識到布爾什維克黨雖然是熱誠的社會主義份子，但頑固拒絕「在俄羅斯建立社會主義」，僅僅是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信念已阻止在落後的農業國進行這樣的試驗。但除了 1920 年所謂「戰時共產主義[434]」這完全意外的事件外，領導人堅持的立場是世界革命必須在工業化的西歐開始，所以認為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是自相矛盾的說法；當這情況變成現實時，老一派的布爾什維克份子全都反對。然而正是這種變奏證明是驚人成功。

回顧俄羅斯二十五年的歷史，似乎所謂俄羅斯革命實際是由兩次單獨的革命組成。第一次革命體現了傳統的西歐理想，而第二次革命構成 1930 年代全新發展的一部份。1917-24 年的革命實際上是歐洲仿效英聯邦和法國大革命模式的最後一次政治劇變；大約在 1930 年以集體農莊開始的革命是那年代改變世界的第一次社會大變革。第一次俄羅斯革命消滅了絕對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種族壓迫，真正繼承了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理想；第二次俄羅斯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概括而言，第一次革命只是俄羅斯事件，在俄羅斯土地實現了西方發展的漫長過程；第二次革命則是全球同時變革的一部份。

從表面看，1920 年代的俄羅斯遠離歐洲，忙於解救自己。進一步分析也許證明這表面現象是不真實。因為在兩次革命之間，強迫俄羅斯接受決定的諸多因素之一是國際體系失敗。至 1924 年，「戰時共產主義」已為人忘卻，俄羅斯已重建國內穀物自由市場，但國家仍然控制對外貿和基礎工業。俄羅斯一心想增加外貿，而這主要取決於穀物、木材、毛皮以及其他一些有機原料的出口，這些產品的價格在貿易全面中斷之前農業蕭條時下跌很厲害。俄羅斯沒有能力發展有利的出口貿易，這限制了機械產品的進口，因此束縛了建立民族工業；這再一次不利影響城鄉之間的所謂以物易物的「剪刀」交易，從而令農民更抗拒城市工人階級的統治。世界經濟瓦解就是這樣為俄羅斯農業問題的權宜之計增加壓力，也加快了集體農莊的來臨。歐洲傳統政治體系未能提供安全和保障，在同一方向起著作用，因為這導致軍備的需要，從而加重高壓工業化的負擔。沒有了十九世紀的勢力均衡體系，加上世界市場無法吸納俄羅斯農產品，迫使該國不情願地走上自給自足的道路。市場經濟沒有能力聯繫所有國家，導致一個國家出現了社會主義；俄羅斯的經濟獨裁只不過是資本性國際主義的消逝。

---

[434] War Communism，戰時共產主義是蘇俄在 1918 年至 1921 年國內戰爭時期推出的經濟措施，旨在最大限度保障非常時期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城鎮和軍隊的糧食與武器供應。

國際體系的失敗釋放了歷史的能量：為市場社會的各種內在趨勢鋪設軌道。

第二十一章
複雜社會中的自由

十九世紀文明不是毀於野蠻人的外部或內部攻擊，其生命力逐漸衰竭既不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也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或法西斯主義中下層階級叛亂；其失敗不是一些諸如利潤率下降或消費不足或生產過剩的所謂經濟規律的結果。十九世紀文明瓦解緣於一組完全不同的原因：社會為了不被市場自發調節的行為湮滅而採取的各種措施。除了北美開拓疆域時代的例外情況，市場和有組織社會生活的基本需要之間的衝突為這世紀提供動力和產生了最終破壞那社會的特有張力和壓力。外部戰爭只不過加速了它的毀滅。

經過一世紀的盲目「改進」，人類正恢復其「棲息環境」。如果工業化不是要消滅人類，就必須服從人性的要求。對市場社會的正確批評並不是這是以經濟為基礎（在某種意義上說，任何社會都必須以此為基礎），而是其經濟是以私利為基礎。從嚴格的「例外」意義來說，經濟生活這樣的組織完全是不自然。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假設人的經濟活動是為利潤而奮鬥，人的唯物傾向促使他選擇付出較少而不是較多努力，又期望勞動有回報；簡而言之，人的經濟活動是遵從所謂經濟理性，而所有相反的行為都是因為外部干預。因為市場是自然制度，只要人類不干擾市場就會自發形成。因此，最自然不過的是經濟體系由市場組成只受市場價格控制；因而基於這樣市場的人類社會應該是所有進程的目標。無論這樣的社會在道德上是否可取，其可行性（這是不言自明）是建立在人類不可改變的特性。

實際上，如我們所知，在原始狀態以及其後的歷史過程中，人類行為幾乎與這觀點暗喻的行為截然相反。〔美國經濟學家〕Frank H. Knight 認為「沒有具體的人類動機是出於經濟原因」，他的說法不僅一般適用於社會生活，甚至也適用於經濟生活本身。亞當·斯密對原始人傾向以物易物交易是頗有自信，但這不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共同傾向，而是極為罕見。現代人類學的證據揭穿了這些純理性建構的虛偽，貿易和市場的歷史也完全不同於十九世紀社會學家和諧教誨的設想。經濟史揭示國家市場出現，絕不是經濟領域從政府控制中逐漸和自發性解放的結果。相反，市場是政府有意識和經常粗暴干預的結果，政府出於非經濟目的把市場體制強推給社會。仔細研究，十九世紀自發調節的市場與之前的市場已有區別，因為調節是依賴經濟私利。**十九世紀社會的先天性弱點不是因為這是工業社會，而是因為這是市場社會。**當自發調節市場這理想性實驗只是回憶之時，工業化文明將會繼續存在。

但是，工業化文明轉向新的非市場基礎，這任務的危急是難以想像：害怕制度的真空，或者更糟糕的是失去自由。這些危急情況是否必然？

與這過渡期形影不離的深重苦難已是事過境遷。

社會和經濟混亂，經濟蕭條的痛苦變遷、貨幣波動、普遍失業、社會地位變化以及歷史狀態的驚人破壞，這一代經歷了最糟糕的局面，無意中為這種變化付出代價。人類還沒有適應使用機器，即將到來的變化是巨大的，但恢復到過去就如同把麻煩事轉移到外星那樣不可能。與其消滅侵略和征服的邪惡勢力，這種徒勞的企圖反而實際上確保那些力量即使軍事上徹底失敗還能倖存下來。邪惡的成因被賦予在政治上果斷的優勢，代表著事事可能；與此相反的是無論意圖有多良好，諸事不成。

傳統制度的崩潰沒有使我們處於真空。歷史上並非首次見到權宜之計可能包含重要而永久性制度的病菌。

各國的事態發展，經濟制度不再為社會奠定規則，確保了社會的地位優勝於經濟制度。這種情況可能以許多不同形式出現：民主政體和貴族政治，憲制主義和專制主義，甚至還有迄今完全沒有預見的方式。一些國家的未來可能是其它國家的現在，而另一些國家可能仍然體現著其它國家的過去。但各國都有共同後果：即使在原則上市場體制不再自發調節，因為市場不再由勞工、土地和貨幣組成。

從市場中抽出勞工，與當年建立競爭性勞動力市場是同樣激進的變革。除了次要和附加的細節，工資合約不再是私人合約。不僅工廠條件、勞動時間和合約樣式，連基本工資本身都是在市場之外決定；因此，工會、國家和其它公共團體的作用不僅取決於這些機構的特點，也取決於管理生產的實際組織。實情是工資差別必然（也應該）在經濟體系中發揮主要作用，除了與金錢收入有直接聯繫的動機，其他動機可能比勞工的財務方面更為重要。

從市場中抽出土地，等同把土地結合明確制度，例如家園、合作社、工廠、城鎮、學校、教會、公園和野生動植物保護區等。廣泛的農場個人所有權將會保留；既然市場不再管轄〔土地〕的要點，土地使用權合約只需處理一些附屬條件。同樣情況也適用於主糧和有機原料，因為這不再由市場定價。大量不同品種產品的競爭性市場繼續發揮作用不必然會干預社會制度，猶如在市場之外為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定價不必然會干預不同產品價格的成本功能。當然，由於這些措施，財產的本質有了深刻變化，因為不再僅僅為了確保就業、生產和使用社會資源而讓財產所有權的收入無限制地增多。

當今所有國家已經實現從市場中抽出貨幣控制。存款的設立無意中在很大程度上

影響了貨幣控制，但 1920 年代的金本位制危機證明了商品貨幣與代用貨幣之間的聯繫並沒有斷開。因為在所有主要國家都推行「職能財政[435]」，因此指導投資和調節儲蓄率已成為政府的任務。

市場把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和資金）視為商品，因此從市場中抽出看來是一致的行為；這是市場的角度。從虛擬商品分離而恢復人類現實的角度看，這遍及社會全方面範圍。實際上，統一市場經濟的解體已形成不同的新社會。而且，市場社會的終結並不意味完全沒有各種市場。市場仍以不同方式繼續，以確保消費者的自由，顯示需求的變化，影響生產者的收入，以及發揮財務會計的作用，但已完全不再是經濟自發調節的工具。

十九世紀社會的國際手段，一如其國內手段，是受到經濟的束縛。固定匯率的領域是與文明一致。只要金本位制和幾乎是其必然結果的憲制政權依然運作，勢力均衡就是和平的載體。這體制發揮作用是通過強國的工具性，首先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國迫切要求欠發達國家建立代議政制政府，以核查債務國的財政和貨幣以及隨之而來的有控制的財政預算；只有負責任的組織才可以做到以上的一切。但一般而言，政治人物不是有意識考慮這些問題，這種情況只是因為金本位制的要求是不言自明。貨幣和代議政制的全球統一模式是那時期嚴緊經濟體系的產物。

十九世紀國際活動兩項原則的關聯源自這情況：無政府主義主權國家和對別國事務的「合理」干預。雖然兩者明顯自相矛盾，但卻相互關聯。當然，「主權國家」純粹是政治術語，因為在沒有監管的外貿和金本位制下，各國政府對國際經濟無能為力，既不能也不想在貨幣事務上各國聯手——這是法定的立場。實際上，只有由央行控制貨幣體制的國家才算是主權國家。在西方強國，這種不受限制和約束的國家貨幣主權與完全相反的事物結合，即是持續不斷傳揚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的結構。因此，到了十九世紀末，世界人民在制度上的標準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這種體制受到本身的精確性和普遍性牽制。國際聯盟的歷史已明顯證明無政府主義的主權國家是對國際合作所有有效方式的阻礙；強制實施國內體制一致，是國家發展的自由面對的永久性威脅，特別是在落後國家，有時甚至是在發達但財政疲弱的國家。經濟合作只是限制在私營機構，一如自由貿易那樣雜亂和沒有效率；各民族之間的實際合作，即是各國政府的實際合作，想都沒有想過。

[435] functional finance。英國俄裔經濟學家 Abba Ptachya Lerner 在二戰期間開發「職能財政」理論：政府的財政預算要有目的，是為了滿足明確的目標，包括充分就業和低通貨膨脹率；稅收不是為了開支或投資。

這形勢很可能對外交政策提出兩個明顯矛盾的要求：友好國家要更緊密合作，甚至比十九世紀主權〔觀念〕更緊密，然而因為受管制市場的存在使各國政府比以前任何時候更為警惕外部干預。然而，隨著金本位制的自動機制消失，各國政府可以放下絕對國家主權最具阻礙作用的特點，即是拒絕在國際經濟領域合作，而同時較為容忍其他國家依照各自意願來設計其國內機制，從而超越了十九世紀要求在世界經濟軌道內的各國政權必要一致的有害教義。新世界的基石出現在舊世界的廢墟：各國政府在經濟方面的合作，又有隨意組織國家活動的自由；在自由貿易的約束性體制下，兩者都近乎不可能，從而排除了國家合作的許多方法。在市場經濟和金本位制的情況下，有充分理由認為「邦聯[436]」的概念是中央集權和一致性的噩夢，市場經濟體系的終結很可能意味著與國內自由的有效合作。

在兩個不同層面出現了「自由」的問題：制度層面和道德或宗教層面。在制度層面，這是增減「自由」的平衡問題，沒有全新的問題。在更基本的層面，「自由」的可能性猶豫未決。似乎維護自由的手段在攙假和破壞自由。我們這年代的「自由」問題的關鍵，必須在後一層面尋找。各種制度是體現人的意圖和目的。除非能夠理解在複雜社會中「自由」的真正重要意義，否則不能夠獲得所尋找的自由。

在制度層面，監管既擴大也限制自由；只有「自由」之得與失之間的平衡才是重要；對於法律上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都是同樣正確。生活舒適的階級享受有安全保障的自由，比諸那些收入不足、只能滿足於最低限度自由的人，很自然不急於擴大社會的自由。隨著有人提出以強制措施更公平分配收入、安逸和安全，這變得明顯。雖然人人受到限制，但特權人士往往反對，猶如約束只是單單針對他們。他們談論奴隸制度，實際上只是想把自己享受的既得自由伸延到其他人。最初可能不得不減少他們的安逸和安全，因而也減少了自由，結果會是提高全國的自由層面。但「自由」這樣的轉移、重塑和擴大，不應是斷言新情況必然比舊情況較少自由的理由。

然而要維護一些自由是最重要的。一如「和平」，「自由」是十九世紀經濟的副產品，我們已學會珍惜自由，只是為了自由本身。政治和經濟在制度上的分離，證明對社會本體是致命的危險，幾乎以公義和安全為代價換取自由。公民自由、私有企業和工資系統合併成為有利於精神自由和獨立思想的生活模式。法律上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於此再合併成為共同儲備，不可能清楚區分其中的各種要素。一些要素附屬於失業和投機者利潤這些不幸；另一些屬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最寶貴的傳統。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維護從已崩潰的市場經濟中傳承而來的高層次價值觀。這無疑是艱巨任務。這種經濟制度的目的是創造利潤和財富，不是創造和平和自由，所以自由或和平都不可制度化。如要二者兼得，必須有意識地爭取，兩者必須成為向前邁進的各種社會所選擇的目標。這很可能是當今世界的要

[436] federation

旨，以確保和平和自由。一旦源自十九世紀經濟體系對和平的興趣停止運作，和平的意願能夠如何展示本身將取決於我們成功建立國際秩序。個人自由之存在是視乎我們刻意建立保護和甚至擴大個人自由的程度。在已建立的社會，不墨守成規的權利必須在制度上受到保護。個人必須自由憑良心做事，無懼在社會生活一些領域中剛好被委以行政管理任務的權勢。科學和藝術應受文學監護。強制不應該不受限制；「反對者」應該有退隱的合適環境，讓他可以選擇「次優」的生計。這樣可確保不墨守成規的權利是自由社會的標誌。

社會整合的每一步驟，應該提高自由的程度；規劃的步驟應包含強化個人在社會的權利，必須在法律之下可以行使他的不可取消的權利，即使抵觸個人或匿名的最高權勢。要真正解決官僚濫用權力的威脅，是建立由牢不可破規則保護的主觀自由；因為雖然大量向下級授權，中央權力會加強，構成對個人自由的威脅。民主社會組織本身如是，旨在保護個人會員權利的專業和同業工會也如是。即使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大我有不良意願，渺小的小我也會覺得茫然無助；如個人觀點或行為傷害了權勢中人的脆弱感情，這情況就更甚。只是有權利宣言是不夠的，要有制度使權利生效。人身保護令不應是以法律固定個人自由的最後憲法手段。迄今未被承認的公民權利必須加進〈人權法案〉，必須是高於所有權勢當局，無論是國家、市政府或專業〔團體〕。〈人權法案〉應把個人的工作權利列為首位，無論男女的政治或宗教觀點，膚色和種族。這意味著保證〔公民權利〕不受哪怕是輕微的損害。眾所周知，產業審裁法庭一直保護公眾個人免遭即使有專橫勢力的企業集團迫害，例如早期的鐵路公司。審裁法庭面對可能濫用權力的其他例子是緊急時期英格蘭的〈骨幹工人令[437]〉或美國的「勞工凍結」，極盡歧視。凡是公眾輿論一致支持公民自由，審裁法庭或法院一直能夠維護個人自由。維護個人自由應該不惜代價，即使影響生產效率、消費經濟或行政管理的理性。工業化社會有能力承擔自由。

市場經濟逝去，可能是史無前例自由時代的開始。法律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可以比之前的範圍更廣闊和更普遍；監管和控制不應只賦予少數人享有自由，應該是人人自由。自由不是從屬於特權，在源頭已有缺陷，而是有規定的權利，突破政治範圍的狹隘局限，伸延到社會本身的直接組織。因此，舊有自由和公民權利要加入工業化社會藉著安逸和安全為人人提供的新自由儲備。這樣的社會能夠同時承擔公義和自由。

但前進之路受阻於道德障礙。規劃和控制被抨擊為否定自由，宣稱自由企業和私有制是自由的必需要素。建立在其它基礎的社會不應稱為自由社會。因監管而建立的自由被指責為「非自由」，所提供的公義、自由和福利被譴責為偽奴隸制度。手段決定目的，因此社會主義者提出的自由範圍只是空言：蘇聯利用規劃、監管

[437] Essential Works Order

和控制作為手段，一直沒有落實憲法承諾的自由；評論家補充很可能永遠不會實現…。但反對監管意味著反對變革。自由主義者因而把自由的概念退化為純粹提倡自由企業；到了今天，嚴峻現實是龐大的壟斷集團把這概念轉化成虛言。收入、安逸和安全已達最高地位的人享有完全的自由，其他人民只有一丁點自由，徒勞試圖利用本身的民主權利向財產所有人尋求保護。事情還沒完。實際上自由主義者從未成功重建自由企業，有內在原因註定這必然失敗。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幾個歐洲國家建立了大型壟斷企業，也無意中建立了各種流派的法西斯主義，例如奧地利。這些「自由」的公認敵人認為規劃、監管和控制都危及自由，反而利用這些手段徹底清除自由。然而，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成為不可避免，是由於自由主義阻撓任何涉及規劃、監管或控制的改革。

誠然，自由全面受挫於法西斯主義，是自由主義哲學不可避免的結果；自由主義哲學主張權力和強迫是邪惡，「自由」要求人類社會排除這些邪惡。這是不可能的；在複雜的社會，這情況變得明顯。兩種情況只能選其一，沒有其他：要麼仍然忠誠於對自由的幻想概念和否定社會的現實，要麼接受現實和拒絕自由的概念。前者是自由主義的結論；後者是法西斯份子的結論。似乎不可能有其他結論。

無可避免的結論是「自由」的真正可能性存疑。如在複雜社會中擴大和增強自由的唯一手段是監管，但利用這手段是與自由本身相悖，那麼這樣的社會不可能是自由。

顯而易見，這困境的根源是「自由」本身的意義。自由經濟體系把我們的理想導向錯誤方向：這近乎實現本質上是理想性質的期望。沒有權力和強迫，不可能有社會；世上的勢力不可能沒有功能。假設社會只是由人類意志和願望形成，這只是幻想。然而這是社會的市場觀念，把經濟等同合約關係，把合約關係等同自由。因此衍生了激進的幻想：人類社會的事物都是源於個人意志，因此不能以意志除掉。市場限制了人的視野，把生活「細分」為**生產者範疇**其最終部份是產品到達市場，以及市場產品源源而至的**消費者範疇**。前者從市場「自由」賺取收入，後者在市場「自由」消費。作為整體，社會是無形的。國家的勢力並不重要，因為勢力越小，市場機制越能順暢發揮作用。失業和貧困現象出現時會無情地限制自由，但選民、物主、生產者或消費者都無需為此負上責任。任何自認是「自由」的正直人士，無需對本人否定的國家強迫行為負上責任；或是為他本人沒有從中得到好處的社會經濟困苦負上責任。他「自食其力」，「沒有欠誰人的債」，沒有捲入權力和經濟價值的邪惡。他對這一切都沒有責任，似乎也見諸他以本身自由之名否定了這些事物的現實。

但權力和經濟價值是社會現實的範式，並非源自人的意志，不可能不與之合作。權力的作用是確保團體生存所需一致性的手段；其最終源頭是「意見」——任何

人都有一些意見。經濟價值確保商品的實用性，必然早於決定生產這些商品之前已存在，界定了勞動分工；其根源是人類的消費欲求和稀缺——任何人都是得一想二。意見或欲求驅使人參與建立權力和建構經濟價值。難以想像不以「自由」行事的其他方式。

本書的論證到了最後階段。

放棄市場理想國使我們面對社會的現實，分界線一方是自由主義，另一方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方之間的區別主要不是經濟方面，而是道德和宗教。即使兩方都承認經濟有相同之處，但這不僅有區別，而且實際上體現了相反的原則，最終的區別還是「自由」。法西斯份子和社會主義者都接受社會的現實，現實的終局是對死亡的理解塑造了人類意識。權力和強迫是那現實的部份；禁止社會有權力和強迫，是不能成立的理想。兩方有分歧意見的問題：有了這樣的理解，能否維護「自由」的概念；「自由」是否旨在毀掉人和他的成果的空洞詞彙、一種誘惑；或是人類可以面對這種理解，重申本身的「自由」，努力在社會實現「自由」而不致陷入道德幻想？

這令人焦慮不安的問題總結了人的狀況。本書研究的意識和內容應可提出答案。

本書引用西方社會構成「意識」的三項基本事實：對死亡、自由和社會的理解。根據猶太人的說法，《舊約全書》揭示了對死亡的理解；《新約全書》的耶穌教義發掘了人的獨特性，這是對自由的理解；生活在工業化社會為我們揭示了對社會的理解。沒有大人物與此有關；也許 Robert Owen 是最接近的媒介。這是現代人意識的組成元素。

法西斯份子對認識社會現實的答案是拒絕對「自由」的假設。法西斯主義否定耶教發現人的獨特性，這是法西斯主義退化轉向的根源。

Robert Owen 是承認耶教經文忽視了社會現實的第一人，他稱之為耶教把人「個體化」，似乎認為只有全體合作，「耶教中的一切真正有價值事物」才不會與人分離。他理解從耶穌教義得到的自由不適用於複雜社會。他的社會主義主張在這樣的社會中維護人的自由。西方文明社會的後耶教時代已開始：耶教經文已不能滿足人的需要，不過仍然是西方文明社會的基礎。

因此，社會的發現不是自由的結束，也不是自由的再生。法西斯份子任由自身放棄自由和讚美社會現實中的權力，社會主義者無奈接受這現實，但依然維護對自由的主張。人變得成熟，能夠在複雜社會中作為「人」生存。再引用 Robert Owen 的警言：「如人類即將得到的新權力不能消滅邪惡的任何起因，他們會知道這些

是必然而且是無法避免的邪惡；不會再有幼稚而無用的抱怨。」

「無奈接受」曾是人類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人接受了死亡的現實，把物質生活的意義建立在此之上。人無奈接受的事實是他的靈魂會迷失，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他的自由是建立在此之上。在我們這個時代，人無奈接受社會現實，意味著這種自由的結束。不過生命再次從最終的「無奈接受」中萌生。毫無怨言接受社會現實，讓人有了不屈不撓的勇氣和力量來消滅一切可以被消滅的不公義和不自由。只要人類確實致力為所有人創造更多自由，就不必害怕權力或規劃會對他不利和破壞他以這兩者為手段建立的自由。這就是複雜社會中「自由」的意義，給予我們所需的全部確定性。※



附錄一：評論選譯

Gregory Clark：再思《巨變》

Fred Block：沒有「自由市場」這樣的東西（回應 Gregory Clark）

Murray Newton Rothbard：打倒原始主義：徹底批判 Polanyi



再思《巨變》[438]

Gregory Clark

Polanyi 對他的信徒表明：自由市場是人類的敵人…是陌生的社會組織形式，…創建於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只因有理論家推動國家行動。自由市場取代了自然的社會狀態（一個約束和保護個人的田園詩般的相互義務制度），為公正與和平的社會帶來不平等，戰爭，壓迫和社會動盪。

《巨變》在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的分支是經典文獻，是大學生的必讀參考，但在經濟學少為人知，或是偶有討論時被痛罵。這是所謂「社會科學」的冷酷嘲諷。

Polanyi 認為自由市場會導致政治和社會崩潰，這是可以理解的。他於 1886 年維也納出生，在布達佩斯長大；在 1944 年親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家鄉匈牙利的革命和恐怖，1920 年代奧地利和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國際金本位制的崩潰，大蕭條時期，納粹主義興起，「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是現代世界中前所未有的動盪時代。這本書開筆就說：「十九世紀文明已崩潰。」

Polanyi 確定了這垂死文明的四大支柱：國際勢力均衡、金本位制、自由國家以及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至 1944 年，這些似乎都一掃而空。不過，說實話，前三項都是衍生自第四項：自發調節的市場；這才是這文明的真正根本。Polanyi 認為，書目的《巨變》是這些支柱催生了自由市場，這反過來又吞噬了這些制度，導致十九世紀文明的崩潰。Polanyi 指出：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都是自由市場的怪嬰。

---

[438]原文：Reconsideration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arl Polanyi: Review of:*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Gregory Clark, NY Sun: by Gregory Clark, June 4, 2008（節譯）作者是美國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著作有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簡體中譯本《应该读点经济史》李淑萍译，中信出版社，2009 年。

歷史沒有證實這些預言。在世界許多地方，特別是英語國家，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有彈性和穩定的系統，是許多世界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政策，威力無遠弗屆。最近已征服中國，東歐和印度的廣闊新領域。國際貿易壁壘已大幅減少。金本位制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場力量決定的浮動匯率制度。更好的貨幣管理大大降低了商業週期的嚴重程度。

此外，雖然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有本身的煩惱，但不見有激進的替代品。凱恩斯的改革式自由主義經濟已證明比 Polanyi 的救世主重臨熱情更健全。以市場的成功來衡量，十九世紀的文明似乎在復興。

因此，Polanyi 著作的預言和現代的現實脫節，實難理解這本書何以經久不衰。他的信徒似乎要回應他的一般信念，認為市場令社會腐敗，自由市場經濟離經叛道捨棄了過去的和諧社會。他大肆批評市場打破了個體之間的社會連繫，各自成為孤立的原子，因而造成以前不存在的不平等。

但是，作為歷史學家，Polanyi 也是一如他的預言不稱職。事實上，越了解歷史，越是明白自由市場不是十八世紀的創新，而是人類最古老的社會制度之一。例如，中世紀的英格蘭有精細的各種自由市場：貨品，勞動力，資本和土地。暫且忘記呻吟的農奴，過早斷奶的地主，皮鞭的抽打；考慮私有財產，領工資的勞工，市場激勵和社會流動。至 1200 年，大批失去土地的勞工轉為受僱，在市場買食物，租用住所。自由市場確實是一些現代人的自然棲息地，不是倒行逆施和非自然創新。（有證據顯示很久之前，古希臘，羅馬帝國和古巴比倫已有廣泛市場。）

英格蘭工業革命並不意味著財閥得益是以窮人的貧困和失業的慘狀為代價。相反，工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沒有技術的勞工；這真正偉大的「巨變」減少了至少在中世紀已存在的可怕不平等。現代信貸的精細聯繫最終產生了週期性失業，但工業革命也減少了前工業時代工人因為農產每年豐收或歉收帶來的巨大衝擊。

正如 Polanyi 斷言，可能狩獵—採集和刀耕火種的社會比之後的市場社會更加平等，但這是無可救藥的浪漫世界：《巨變》把市場之前的社會描繪為田園詩般的優美，教會兄弟齊齊唱誦，永遠伸出幫助之手。

自 1944 年以來，人類學家更冷靜的分析表明，這類型的社區一般是暴力和性別歧視，有顯著的地位差異，通常包括系統化奴役。緊密的社區聯繫沒有阻止司空見慣的襲擊，謀殺，暴力和性暴力。某些社會深信巫術迷信，人人活在譴責和死亡的恐懼。最近的研究對象有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山地部落，巴拉圭的叢林部落等等，顯示這些都是殘暴和仁慈，同情和冷漠的複雜混合社會，絕不是市場時代之前的伊甸園。

Polanyi 之普及，是嚮往和浪漫主義超越科學（例如社會學）的勝利。《巨變》最終是更深入解析教授階級的本質而不是他們研究的社會。作為娛樂，《巨變》有其優雅的時刻，但缺少了其他批評市場社會文獻的的威嚴和文學的火花，如馬克思的《資本論》或是的 Naomi Klein 近作《震撼主義[439]》的不疲不儶和不堪的狂熱。但這堆等待大學生的書籍證明貨物的自由市場效果優於概念的自由市場。



沒有「自由市場」這樣的東西（回應 Gregory Clark 書評）

Fred Block[440]

新保守主義的《紐約太陽報》發表 Greg Clark 對 Karl Polanyi《巨變》的書評，不足為奇。Polanyi 是上世紀最善於批評「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思想家。時至今日，美國布什政府的經濟管理是大災難，「自由市場」概念被大力抨擊。古訓有云：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Clark 的策略是改變主題，攻擊自由市場的批評者被蒙蔽，幼稚，極力拒絕「歷史現實」。

Clark 的書評有夠多的錯誤，他似乎沒有審稿。例如，他錯誤聲稱《巨變》的標題是十八世紀崛起的市場，但 Polanyi 清楚在書的第一段落點明他談論的是 1930 年代全球經濟崩潰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初市場經濟的興起。

Clark 的指責是以另一種方式攻擊他真正的目標：那些較次要的社會科學，如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發現在分析過去三十年的破壞性市場原教旨主義，Polanyi 的作品顯得格外有用。他寫道：「《巨變》在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的分支是經典文獻，是大學生的必讀參考，但在經濟學少為人知，或是偶有討論時被痛罵。這是所謂「社會科學」的冷酷嘲諷。」

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可能對最後的一句話失笑。他為《巨變》的最新版本撰寫前言。沒有嘲弄，反而認為「經濟科學和經濟歷史已經認識到 Polanyi 主要論點的有效性。」[利益申報：他的前言是我寫的。]

Clark 的書評沒有把握 Polanyi 的最重要的區分。據 Clark：「事實上，越了解歷史，越是明白自由市場不是十八世紀的創新，而是人類最古老的社會制度之一。」Clark

---

[439]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by Naomi Klein. 中譯本《震撼主義》吳國卿、王柏鴻譯；時報出版社（2009）。這是譯者的短短閱後感言。

[440]原文：Fred Block: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Market*

插入「自由」這個單詞很有問題。事實上，Polanyi 多年來一直在記錄市場的確是人類最古老的制度之一，但歷史中的市場蓬勃發展，是因為受社會制度，如親屬關係，宗教和政治所控制。所謂「創新」是十九世紀初發明的「自由市場」;Malthus（馬爾薩斯）和 Ricardo（李嘉圖）大力推廣：人類社會組織應圍繞著自發調節的市場，其集成系統包括不受任何社會控制的土地，勞動力，商品和資本。

Polanyi 堅持（Stiglitz 許多其他人同意）「自由市場」的社會是理想國的想法，因為這假設人類可以一勞永逸解除所有形式的社會規範和法律強制，市場的供求力量會自發和自由產生最佳後果。歷史事實已一次又一次證明：以市場為基的社會只有在嵌入法律和政治規則才發揮作用，防止投機和掠奪性行為，也保證土地，勞動力，資金和其他關鍵商品的供求大致平衡。依據 Polanyi，過去兩百年市場社會的實際歷史是有系統地增加國家的經濟作用，從而使市場發揮作用。

Polanyi 的框架有助區分最近的兩個時期：戰後初期（1945-1970 年）和列根一戴卓爾年代（1980-2008 年）。在較早時期，「自由市場」思想撤退，政府義無反顧發揮作用，規範營商和金融以及提供必要服務。這是世上最偉大的經濟持續增長期。在較後時期，「自由市場」思想方興未艾，政府監管和服務已向後退，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增長一直低迷。在這較近時期，美國的不平等急劇上升，世界經濟已被一系列金融危機動搖；更最近，美國房地產抵押貸款市場因監管失敗而啟發危機。

但 Clark 拒絕這些區別。他堅持認為：「在世界許多地方，特別是英語國家，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有彈性和穩定的系統，是許多世界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政策，其威力無遠弗屆。最近已征服中國，東歐和印度的廣闊新領域。」

總之，Clark 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定義是如此廣泛和沒有細分，甚至包括共產黨專政的中國。無論他是否想充當這角色，Clark 事實上成為經常利用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和反對必要監管措施的最反動全球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沖基金經理和大石油公司堅持政府增加任何監管都是違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只有當市場不受干擾獨自分配資源時，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才能發揮作用。令人費解的是時至今日，Clark 還是不明白：盲目慶祝自由市場是以巨大的經濟動盪和環境衰敗作為代價。



打倒原始主義：徹底批判 Polanyi [441]

Murray Newton Rothbard

Polanyi 的《巨變》是混亂，荒謬，謬論的大雜燴，對自由市場的歪曲攻擊。我幾乎想逐句反駁，現在決定先解釋一些哲學和經濟學的基本缺陷，然後詳細批評。

Polanyi 的基本哲學缺陷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常見缺陷：自盧梭與浪漫主義運動以來，這缺陷一直猖獗：這就是**崇拜原始人**[442]。Polanyi 記述 Kaffirs 族人時，實際用了傷感短語「高貴野人」;「崇拜原始人」的想法貫穿本書。現代浪漫主義的重大動力來自文化人類學家（許多是共產黨員或極左翼）；他們熱切參觀現存的原始部落，報告部落 X 的快樂生活：沒有私有財產，也沒有一夫一妻制的束縛。

這樣的崇拜原始人，有幾件事情可以談談。首先，像 Polanyi 那樣從分析現存的原始部落而推論西方世界之前的文明歷史是絕對不合法統。永遠不要忘記**現存**的原始部落恰恰是那些**從沒進步**的部落，一直保持原始狀態。現在觀察他們，以為先民也是這樣，確然是無稽之談，往往是真相的相反；可以設想是先民的行事方式致使他們在幾千年前跨出原始階段。參照現今原始部落的魔術和遊戲，以此嘲弄先民在原始部落狀態時以物易物，然後是金錢交易…是無以倫比的失誤。

第二，《巨變》或明或暗假設原始部落的行為方式是更「自然」，比人為的設計較為適合人的生活。這是盧梭浪漫主義的根源。原始人的野蠻行為是無知，充滿恐懼和獸性，是更為「自然」，因為比文明方式更接近「本能」。盧梭和許多其他左派認為人本來是「自然的好人」，只是被制度變壞；「自然的好人」是他們的基本思想，這基本上其實是「反人文」的概念，因為這否認人性和人必然行事的方式。動物天生已有「本能」，本質上是由感官決定的反應。動物沒有自由意志和理性意識，因此只能依循感官的感覺而適應身處的環境。但在另一方面人是可以憑著他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去改變身處的環境。

人之初，白板一塊，必須**學習**，學習如何選擇適合他的目標，學習如何選擇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所有這一切他是以理性為之。

[441]原文：*Down With Primitivism: A Thorough Critique of Polanyi*。Murray Newton Rothbard (1926-1995) 是美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自然法理論家、政治理論家，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知名學者，支持自由意志主義和無政府資本主義理論。這是作者在 1961 年 6 月撰寫的備忘錄，一直沒有公開發表。直至 2004 年，Ludwig von Mises 學院在網站發表。譯文略有刪節。

[442] *Worship of the Primitive*

文明恰恰是記錄人利用理性，發現建立他環境的自然規律，利用這些規律來改變環境以符合和滿足他的需求和慾望。因此，崇拜原始人必然是反智。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反智主義」致使有人聲稱文明是「反自然」，而原始部落較接近自然…。因為人是超級「理性動物」（亞里士多德如是說），崇拜原始人是極度反人文教義。

反人文反理性主義熱切請教目不識丁，野蠻粗野，心懷恐懼的原始人，要求我們這些二千多年最優秀文化的繼承人應以他們為榜樣。如現存的原始部落沒有私有財產，或男女濫交，我們更有理由從頭來過。

於是有了「快樂野人」的神話：原始人是真正的幸福和滿足。這神話貫穿著 Polanyi 的著作。讓我們戳破浪漫的神話，看看這些野人的真面目。首先，他們是環境的奴隸。如果樹盛開，他們也許可以採摘果實為生，但假設果樹有葉枯病，這「開心快活」的部落會發生什麼事？全都死了。難怪原始部落都只是小數目。

其次，原始人的生活幾乎時刻面對恐懼的生活：面對周邊世界的恐懼，面對一無所知和無法理解的事物的恐懼，因為他對世界的運作沒有任何形式的科學和理性的探究。我們知道雷暴是什麼回事，因此不用害怕，又可以採取合理的避雷措施；野人一無所知，因此猜測是雷神不滿，要奉獻供品（有時犧牲活人）以息雷神之怒。因為野人不理解有自然規律（要用到理性和科學的概念）把世界編織在一起，他相信世界是由一幫喜怒無常的神靈惡魔統治，魔法儀式或專職祭司巫醫只能有時取悅個別神靈惡魔。野人陷於恐懼卻無能為力，致使他無法發展個人的個性，因為個別野人幾乎沒有利用他的理性和思維。因此，野人的所作所為幾乎全被習俗控制：一成不變，完全非理性，禁忌或命令。

Polanyi 吹捧這恐懼纏身，半人的野獸是真正的「社會」生物，快樂地不受自由市場的「非人」專制主義影響；反而要求我們這些利用智慧「征服」大自然的現代人效仿這些野人。

Hobbes 形容野人的生活是「骯髒，野蠻，短暫。」野人短命，一生被各種形式的疾病蹂躪，他對此無能為力，只能向巫醫奉上食物祈求解咒。疾病後來被征服，是通過文明的進步：利用理性，利用資本主義，利用市場。

Polanyi 欽佩部落和其他種姓社會，因為「沒有人餓死。」誠然，他承認每個人都可能只是僅堪糊口，但沒有人餓死。大家一起挨餓，是否值得安慰？這是怪誕的說法。原始人的世界，即使是工業革命前的所有世界，從來飽受飢荒和瘟疫。工業革命之前，「飢荒」不斷；之後沒有聽說過有飢荒（最近在中國共產黨治下以及較早前在蘇聯有飢荒）。飢荒出現，是因為沒有本地之間的貿易；一處地方的糧食作物失收，因為與其他各地幾乎沒有貿易，大部分人餓死。自從自由市場

滲透世界各地，地區之間有了貿易，幾乎已經沒有飢荒。Polanyi 卻嚴辭指責這市場是幾乎所有罪惡的使者。

Polanyi 欽佩所有種姓和地位的社會：部落，重商主義，或諸如此類。他堅持種姓社會提供「保障」。飢荒和瘟疫是否「保障」？任何限制主義都不能提供任何經濟「保障」的必然基礎：**生產**；事實上是正好相反，因為所有種姓的限制，所有對市場的限制，只會削弱和阻礙生產，從而把人人壓抑在糊口水平。事實上，亞洲的「大家庭」制度，幾百年來一直把中國，印尼壓制在原始的貧窮和苦難。Polanyi 欽佩的「共享和以相同方式共享」的習俗迫使任何人多賺了一點錢就必須按比例分配全體遠親近戚。因為這「高貴」制度，沒有中國人有多勞多得，多產多賺的動機；因此，（共產主義之前的）中國人沒有這樣做，沒有進步。在印尼，瓜哇的（絕對 Polanyi 色彩）村公社制度意味著飢餓，大規模人口過剩，人民被更進步和資本主義的島嶼（如蘇門答臘）剝削和欺壓。

種姓制度的「保障」是家庭監獄的保障。（順便說一句，誰想在市場經濟中得到「保障」，只須犯罪入獄，就會得償所願得到 Polanyi 式保障。）這種「保障」意味著種姓社會處處瀰漫的絕望。麵包師的兒子必然最終是麵包師，雖然他有別的興趣和能力。沒有人能向上提升，沒有人可以改變職業或做任何事情，人人必須承繼祖業。這毀滅了任何人一生中是最重要，最有目的，最有活力的一切。

Polanyi 忽略了任何種姓社會另一基本缺陷：人口增長。巫醫，部落的習俗，酋長或國王和 Polanyi 教授可以自定義 X 和 X 的兒子必然是麵包師，Y 和 Y 的兒子是農民等等，但人口必然不可避免地增加，那麼小兒子可以做什麼？Polanyi 嘲笑 Malthus，但種姓社會很明顯總是面對 Malthus 的問題。當飢荒和疾病未能「自然地」發揮作用，會發生什麼事？斯巴達種姓社會的「暴露試驗」把他們的嬰兒暴露在森林，不是因為斯巴達人本質上是殘忍的民族，而是因為他們要面對在他們的社會結構背景下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如何處理人口增長。人口增長破壞了歐洲的重商主義。十八世紀英格蘭初現身強力壯的乞丐和盜賊，人口增長是原因。他們找不到工作。有待資本主義興起和資本向前邁進為這些待業人士提供就業機會，拓展市場為廣大人民群眾生產廉價商品，不僅極大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同時也為這些日益「過剩」人口提供就業機會。

再者，Polanyi 繼續反資本主義的老謠傳：工業革命之成功是得助於圈地行動迫使自耕農離開自己的土地，進入城市。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圈地行動只是圈圍了「公地」，不是人；農業生產率大大提升，為工業革命提供必要的資源和收入。圈地行動沒有迫使人們離開土地。農村人口過剩是因為**人口增長**；人口增長迫使絕望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因此，資本主義沒有如 Polanyi 所言悲劇性破壞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溫暖，有愛心的「社會」關係。資本主義照顧社會的棄兒：乞丐，強盜，過剩的農村人口，愛爾蘭移民，給他們就業和工資，從而幫助他們脫貧，達致更好的生活水平和工作。很容易為英國新工廠的勞動童工惋嘆，更容易忘記在工業革命之前，在工業革命過程中，以及在新資本主義尚未滲透的眾多英格蘭農村中，這些孩子像蒼蠅一樣死去，生活遠比童工悲慘。這時期的英、美著作讚美新工廠為婦女和兒童提供工作！我們現在覺得這種讚美是莫名其妙；這些作者不是不人道的怪物，而是在有這些勞動之前，或是在沒有這種勞動的地區，婦女和兒童生活得更差更苦。婦女，兒童，移民，畢竟不是被皮鞭驅趕進入工廠，他們是自願和樂意去做工，這就是原因所在。

Polanyi 忽略人口問題更廣泛的方面。在某種意義上，現代世界人口的龐大增長要歸因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生活水平提升，使資本主義能夠解放 Malthus 的困境，破解人口過多的嚴峻弊端，容許更多人有比以前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當 Polanyi 實際上要求我們徹底消滅市場和回到種姓或社區或部落社會，他不僅要求我們放棄文明的奢侈品和回到原始部落的糊口水平，他也要求清算和消滅世上的大部份人口。因為如種姓或部落系統能「正常運作」，甚至只是在糊口水平，這只能養活極少數人口，其餘的我們會**集體**餓死。因此，以上有關原始部落極少數人口的事實有了新的和更可怕的意義。（W.H.B. Court,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443] (1954) 駁斥圈地行動的迷思，指出關鍵是人口增長。）

Polanyi 抱怨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場，但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可能是這體制最重要的方面：自由。在自由的社會，沒有人迫使 Polanyi 或任何其他人加入自由市場。如 Polanyi 或任何其他批評家如此敵視所謂的暴政，市場的「不穩定」等等，自由社會**任由他們自由離去**。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可以離開市場：可以到叢林去，以山洞的漿果為口糧；或是可以買下自己的農場，完全自給自足，與世界隔絕；或是隨本身意願自由而為之。在自由社會，任何人可以甚至參加自願性質的公社或以色列的人民公社，享受追求的幸福共產主義生活。既然大家依然有這樣的選擇，可以選擇去荒島或加入公社，**為何 Polanyi 苦苦責罵市場？**

事實上，自由社會給大家有這樣的選擇。既然如此，人們享有自由，為何自由市場蓬勃發展，直至帶來資本主義文明？原因恰恰是在過去，在現在，絕大部分人不同意 Polanyi：他們極為傾向市場的所謂不穩定，不快樂等等，而不是公社野人的所謂的幸福糊口生活。因為，如果他們不是很喜歡，他們不會加入市場，他們會情願為了部落或自給自足的農家生活而犧牲金錢收入。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最能徹底反駁 Polanyi 哭訴「社會」失去的輝煌，莫過於觀察千百萬人已選擇市場的方式。

[443] 中譯本：《简明英国经济史》方廷钰译， 商务印书馆，1992 年。

事實上，恰恰是 Polanyi 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總是黯然神傷慨歎世界其他地方「可口可樂化」，哀嘆不發達國家的「民俗文化」據說已失去輝煌。因為世界各地人民，無論文化傳統，一有機會都放棄他們所謂心愛的文化，以適應西方的方式，西方的衣服，爭取西方型式的工作，或為西方遊客服務，賺取西方的金錢——喝可口可樂和看好萊塢電影。例如，只是幾年光景，日本人放棄了本身千年的舊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熱切接納這些所謂西方腐朽市場帶來的商品。為何如此？這是否西方「帝國主義」？美國軍隊是否下迷藥強迫大眾喝可口可樂？（P.T. Bauer, *West African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對西非當地文盲人民的市場和交易經濟的龐大增長有發人深醒的學術討論。）

即使在敵視資本主義的落後國家：如印度，加納等，這些國家沒有代表本國看似快樂的部落傳統而全部拒絕西方文明的成果。相反，他們想要西方的產品和方便，只是他們不理解要有資本主義才能得得。

若然有選擇，幾乎所有人都選擇市場經濟和它的先進文明，奇怪的是 Polanyi 教授自己最明顯沒有急於奔向一些部落或公社。

那麼，為何我們不是如 Polanyi 輕蔑質疑的認為自由市場是「自然」的？原因是（1）人們有選擇的自由時，已紛紛轉向自由市場，（2）若然人們要充分享受人的地位，滿足本身的需求，改造「大自然」以適應本身目的，人們應轉向自由市場。因為是市場給我們帶來文明的生活標準。

Polanyi 在書中不斷向我們保證他心愛的原始土著不會為個人「得益」做什麼，只為了魔術，為了他所謂的「互惠」等等。「得益」有什麼壞處，致使 Polanyi 幾乎假定是惡毒的詞語？自由市場的原則是為了互惠互利而自願交易。這種互惠互利構成得益。自由市場其實是確保各方互利的人際關係。Polanyi 為何這樣討厭自由市場？為何他在每一點似乎更喜歡只有一方得益的人際關係？如一方之得必然是另一方之失；因而 Polanyi 的理想人際關係不是相互增益，而是剝削：為求自身的得益而犧牲對方的利益。這是否我們應為之拋棄市場經濟和文明的「道德」，「社會」關係？為何社會主義痛恨和譴責雙方得益的交易關係，稱之為「計算」，「不人道」的關係？他們是否認為交易的任一方被剝削是更道德？沒錯，社會主義譴責甲方沒有在交易中無條件給錢乙方，不期望有物質或精神上的回報，實質上是呼籲甲方為了乙方的剝削作出犧牲。

Polanyi 教授討論他心愛的原始部落時說他們不是以（唉！）互利的基礎對待對方，而是以「互惠」和「再分配」為基礎。「再分配」原則當然即是「剝削」的原則。「再分配」是部落或國家脅迫生產者要分配給首領青睞的寄生階級。Polanyi

肯定不清楚「互惠原則」究竟是什麼。在少許程度上，如這過程是理性的，這只是從概念後門偷偷走進來的簡單交易或以物易物。如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不理性的，這只是遊戲或運動（幾乎無需進一步評論）或儀式性魔術（上文已有評論）。Polanyi 吹捧的「互惠」顯然是後一部分，因為他顯然是陶醉於 Kula 貿易：島民向另一島嶼的居民送贈物品，只會在幾年或幾十年後從另一島嶼的島民收到類似（或相同）的物品。Polanyi 特別喜歡這回事，因為這沒有真正的相互得益，或是這明顯的沒有意義？再次點明，我們是否必須遵循魔術纏身的野人的路徑？

我提到自由社會容許 Polanyi 或任何同路人放棄市場，追求適合他們的任何其他形式。但是，自由社會不會容許 Polanyi 做一件事：脅迫我們這些其他人。市場容許 Polanyi 加入公社，但不會讓他逼使你或我參加他的公社。這是唯一的區別，我因此必須總結 Polanyi 反對自由社會和自由市場的唯一基本投訴：不容許他或同路人以武力強迫他人以遂 Polanyi 或同路人心中所想。自由社會和自由市場不容許武力和暴力，不容許依本行事，不容許盜竊，不容許剝削。我必須總結：Polanyi 迫使我們回到的世界正是脅迫，依本行事和剝削的世界。而這一切是以「人文」之名？誠然，Polanyi 和他的同路思想家是「帶著斷頭台的人道主義」。（Isabel Paterson 的 *The God of the Machine*, 1943 是深刻討論政治理論的傑作。）

當然，赤裸裸公開宣傳暴力和剝削不會走得很遠，所以 Polanyi 回到方法論整體主義的謬論，把「社會」本身作為真正的實體，存在於個別成員利益之外和之上。Polanyi 怒吼市場擾亂和分拆「社會」，「社會要保護自己，必然要」限制市場。說得很好，直至我們質疑：誰是「社會」？「社會」在哪兒？有什麼可識別的屬性？如有人開始談論「社會」或「社會利益重於個人和個人利益」，一個良好的操作規則是：看緊你的錢包。保護自己！因為「社會」門面背後總是有一群亟求權力的教條主義者和剝削者，準備拿走你的錢，操控你的行動和生活。因為，不知何故，他們「就是」社會！

界定「社會」的唯一理性方式是自願性人際關係的陣列，其中最卓越的正是自由市場！簡而言之，市場和市場產生的相互關係就是**「社會」**，或至少是「社會」的大部份和核心。事實上，Polanyi 和其他人的陳述認為社會性和夥伴關係是在市場之前，真相幾乎是相反；而這是因為市場及其勞動分工容許眾人互有增益，從而可以有與人交往和與人為善的能力，友好關係隨之而來。叢林中的部落和種姓社會沒有互利，只有爭奪稀缺資源的戰事！

奇怪的是，Polanyi 對部落生活的田園詩般畫面似乎從來沒有提及無處不在的部落戰爭。這樣的戰爭幾乎是必要的，因為人們是為稀缺資源而戰：水源，打獵等等。部族主義（不是資本主義）是「叢林規則」，因為一些部落活命的唯一出路是戰爭和滅絕弱勢部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利用互惠互利從而增加資源，能夠

繞過叢林規則，人類才可以超越動物般的存活狀況，提升至先進文明的狀態和彼此之間的友好關係。

因此，市場是極為明顯的「社會性」，而「社會」的其餘部分是由其他自願，友好，非市場關係組成；然而，這些關係最好是建基於精神交流和互利。（雙方友好相濡以沫，是不是優勝於只是單方面示好？）那麼，市場從來沒有破壞社會；市場就是社會。那麼，Polanyi 用什麼取代市場？自願性關係之外的唯一其他關係就是強制性關係；簡而言之，Polanyi 會以武力和暴力，侵略和剝削取代市場的「社會」關係。但這不是「非社會」，而是深刻的「反社會」。剝削者以暴力寄生於生產者，這是「反社會」；因為他的生計不是按人的最好本性：本身有生產，又以產品和他人交換。他以暴力為生，單方面寄生於生產者。這是深刻的反社會，反人性關係，破壞社會市場，導致和連同文明和文明的生活水平灰飛煙滅。

Franz Oppenheimer 的大作《國家論[444]》說得非常好：有兩種可能的致富之路：一種是生產，通過個人能量把物質轉化，然後與其他人的產品交換；他稱之為「經濟手段」。另一條路是以武力和暴力奪取他人已經生產的財富，他稱之為「政治手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哪種方法是「社會性」，哪種是深刻而具破壞性的「反社會」。Polanyi 聲稱要從市場中挽救社會，在破壞市場的過程中正正是在破壞社會本身。他的著作是神化的政治手段。

從他對自由勞動力的討論可見這就是 Polanyi 會帶來的貨色。對 Polanyi 而言，勞動力「商品化」是自由市場最嚴重的罪行；Polanyi 因此建議從自由市場拿走勞動力。但是，自由勞動力有什麼其他選擇？非自由勞動力，即是農奴制。勞動力失去自由的人就是農奴。事實上，Polanyi 在歌頌（所謂典型原始部落）的無薪工作過程，他正是歌頌奴隸制度。無償的不自由勞動就是奴隸勞動。

像所有社會主義者，Polanyi 苦口婆心教導我們，沒有市場的新「社會」不可避免會到來。因此，對他來說，近百年對市場的每一項限制都是「承認」社會的需要，而**不是**某些想法和利益團體深思熟慮的選擇。為了保持這神話，Polanyi 憤怒地批評像 Mises 那些人相信是某些社會主義和限制主義的概念和利益團體帶來政府對市場的這些干預。Polanyi 設置了稻草人，命名為歷史的「陰謀論」，實情並非如此。不同的國家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無需合謀主張在兩個不同領域實施中央集權措施。（當然，Polanyi 還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實際陰謀，像 Fabians[445]）。這結果是無可避免和「自然地」源自兩派人士的論點。Polanyi 不願意討論社會

[444] Franz Oppenheimer：*The State*《國家論》薩孟武譯，臺北市東大出版，1995 年。
[445] 費邊主義者；十八世紀後期，英國的政論團體，促進非馬克思主義的進化社會主義。

主義與市場的不同和相互矛盾的概念，於是試圖把全部事情放在社會決定論[446]的平面，從而人類的意志沒有在[過程]中發揮作用。

Polanyi 拒絕理性，從而可以推論他也拒絕人的自由意志。相反的是「社會」採取行動，決定，保護，識別等等才是社會行動的真正決定因素：忘掉了個人採取和實行的意念，而聚光燈集中在所謂「社會力量」，「社會」等等。

像所有決定論者，Polanyi 最終陷入嚴重的矛盾。談到十九世紀採用了自由市場，Polanyi 聲稱這不是由社會決定，而是反映由自由放任主義理論家的錯誤觀念，他們「干預」了「自然」（種姓？部落？）的國家調控過程等等，暫時帶來了自由市場。

我可以幾乎無限地詳細批評 Polanyi，但再多說已是沒有意義。Polanyi 一再警告「現實社會」必然涉及武力和暴力，意思是「社會」是暴力和「政治手段」。（但為何暴力不能只限於打擊攻擊性暴力，從而把社會中的暴力減至最少程度？）Polanyi 刻薄地拒絕自由貿易的理想，沒有意識到他因而是拒絕國際和平，因為世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彼此的規劃不可避免會有衝突，引發利益衝突和戰爭。

看看這段引文：「（在十九世紀的自由市場）經濟合作只是限制在私營機構，一如自由貿易那樣雜亂和沒有效率；**各民族之間的實際合作，也就各國政府的實際合作，想都沒有想過。**」（留意對「民族」和「政府」的極權性識別）。Polanyi 認為舊金本位制的商品貨幣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因此他輕蔑地譴責。一如那些反金本位制，支持法令鈔票的人士，Polanyi 也同時聲稱金錢不僅是商品（不僅是「面紗」），也是遠遠低於商品（金錢「只是票據」）。另一矛盾，實際上金錢確實是商品，沒什麼爭議。Polanyi 談到企業「需要」通脹的持續劑量以加強購買力，而純粹的金本位制不能滿足這需求的說法是完全錯誤；他荒謬地認為中央銀行不是和沒有央行的純金本位制那樣有時通脹有時通縮，這也是錯誤的。央行本質上傾向通貨膨脹，但是當最後審判的日子來臨，（在金本位制度下）它必須收縮，而且往往超過本來必要的收縮。

進一步，Polanyi 似乎認為他已成功突襲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他說貿易最初是在國際和區域間的渠道發展，而不是先在當地發展，然後國際。這又如何？這在任何意義上都沒有反駁自由市場經濟。這並不奇怪，在農場和莊園自給自足的世界，最早的貿易應該是與遠方交易，這是當地農場能獲得某些農產品的唯一地方。（例如，西歐只能從近東取得香料。）事實上，這表達了貿易和分工以及市場增長的好處，而不是相反。

[446] social determinism，這套理論認為社會互動和建構決定個人行為（不是生物或唯物因素）。

最後，Polanyi 在最後一章試圖向我們保證，他預計的集體主義社會會真的保留許多「自由」；他不情願地承認是市場經濟給我們帶來了這些「自由」。這一章以近乎教科書式最混亂表達「自由」的概念，以及混淆了「自由」和「權力」之間極為不同的概念。

（F.A. Hayek（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447]》指出集體主義經常模糊這關鍵區別。）許多「自由」得到保留，甚至最大化（畢竟，錢包有更多錢的工人是更「自由」，誰在乎豪華富人的錢被拿走？），包括「工作權利」這樣的「自由」，不因為種族，信仰或膚色受到歧視。Polanyi 不僅徒勞地想像或斷言我們至少在他的集體主義社會中可能有足夠的「自由」，他也同樣徒勞的相信我們能夠保留工業化和西方文明。兩個希望是是徒勞；在這兩種情況下，Polanyi 認為他可以破壞「前因」（自由市場，私有產權等）而又保留「後果」（言論自由，或工業文明）。他的想法不僅接近〔印度〕尼赫魯和〔迦納〕Kwame Nkrumah，也類似他極度頌揚的野人的想法。

總結一下：我看過的書，只有極少數是更兇險更荒謬。



[447] *The Road to Serfdom*

附錄二

經濟行為及社會結構：鑲嵌之困惑[448]

Mark Granovetter

社會關係如何影響行為和制度，是社會理論的傳統問題。本文探討在現代工業社會，經濟行動在何種程度是鑲嵌在社會關係的結構。雖然一般的新古典學派提出「低度社會化」或原子化行動者[449]來解釋這行動；改革派經濟學者試圖以「過度社會化」重彈社會結構舊調，被 Dennis Wrong 批評。相互矛盾的「不足論」和「過度論」都忽略了社會關係的持續結構，在細緻解釋經濟行動時沒有考慮這是鑲嵌在社會關係的結構。Oliver Williamson 研究「市場和階層」，他的評論很能說明論點。

引言：鑲嵌的問題

社會關係如何影響行為和制度，是社會理論的傳統問題。因為這些關係一直存在，沒有「關係」的情況只存在於思想實驗，一如 Thomas Hobbes 的「自然狀態[450]」或 John Rawls「原初立場[451]」。效益主義的傳統觀點，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大多假設社會關係對理性又私利的行為影響不大，因而導出的理想性狀態與上述的思想實驗相差不遠。「鑲嵌論」是與此相對的極端觀念：行為和制度是如此持續受限於社會關係，要獨立建構這兩者是嚴重的誤解。

本文關注經濟行為的鑲嵌情況；長期以來，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政治科學學者和歷史學者大多認為這些行為在「市場前」社會中是極大程度中鑲嵌在社會關係，但在現代社會是頗為自主獨立。這觀念認為現代社會的經濟體系是越來越分離的範疇，經濟交易不再是由交易人士的社會或親屬關係定義，而是各自出於私利的理性計算。有一些進一步的說法是傳統情況已倒轉了：經濟生活不再鑲嵌於社會關係，而是市場現象。一般認為「鑲嵌論」關連到 Polanyi 及同道中人的人

---

[448]原文：Mark Granovetter :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93。譯文略有刪節。

[449] atomized-actor

[450] state of nature：社會形成之前的無政府、原始政治情境；人受到自身情慾支配，相互之間可謂是平等的，但因為沒有公共權威，人們乃處於彼此對立的戰爭狀態，肇因在於人人不確定自身的安全。自然狀態不會有工業、文化、和貿易等，因為「持續擔憂和對死亡恐懼，人們的生活將是孤獨、窮困、險惡、粗野、和短暫」，因此自然狀態即是戰爭狀態。（參考）

[451] original position。假設社會上人人處於無知之幕，以理性的選擇方式建立社會契約，以保證人人都能公平、合理分享社會的利益（參考）。

類學「實質論[452]」學派以及歷史學和政治科學的「道德經濟體系」；這明顯與馬克斯思想有關連。

但只有少數經濟學者同意「現代化」中斷了「鑲嵌」；大多數反而聲言早期社會的「鑲嵌」程度不是大大高於現代市場的低水平。亞當・斯密的定調說法是「人性有一定的傾向…以實物代工資，以物易物和以物換物」，又假設因為原始社會的唯一生產因素是勞動力，貨物交易必然以勞動力的成本比例計較。自 1920 年代以來，一些人類學家也有同樣立場；被稱為「形式論[453]」：即使是部落社會，經濟行為與社會關係保持相當獨立，標準的新古典分析沒什麼可以派上用場。近年來，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重拾對社會制度經濟分析的興趣，對這問題有了新見解：在早期和現今社會中被認為是「鑲嵌」在一起的行為和制度，可更好以有理性的原子化個人追求私利來解釋。

我的個人見解有別於這兩派學說。我要強調「非市場社會」的經濟行為其鑲嵌程度是低於實質論和發展理論的聲言，而且受「現代化」的影響也不是他們所說的強烈；但我也認為受影響的程度是多於形式論和經濟學家所設想。我提出「鑲嵌」概念的理解，以現代社會的問題為例闡述其價值：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交易是在市場中進行，而又沉澱在層級結構的企業之內？

社會學和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社會化或是低度，或是過度的概念

Dennis Wrong 在 1961 年抱怨「現代社會學對人類行為社會化的概念是過猶不及」；當時的主流觀點是人們對其他人的意見極為敏感，因而順從了大眾同意的習俗和價值（經社會化而內部化），並不以為服從是負擔。他同意個人鑲嵌於社會的概念彌補了 Hobbes 的「人人各自為事」概念的不足，但強烈指出不應過度強調「鑲嵌」的程度，以為這可以排除糾紛矛盾。

在另一極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從功利角度看人類行為，形成「原子化，低度社會化」的概念。這概念排除了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對生產、分配或消費有任何影響：在競爭性市場中，任何生產者或消費者對總合供求的影響不可能顯著，因此對價格或交易的其他條件的影響也不可能顯著。Albert Hirschman 已指出：「數目眾多的買家賣家，各自有完整信息，在雙方沒有見面或社交接觸的情況下發揮著承價的功能。完美的競爭沒有討價還價，談判，抗議或相互調整的空間。參與契約的各方無需涉及彼此要持續認識的關係。」

完美競爭的理想化市場一直承受多方學界的抨擊而不倒，是因為「自發調節的經濟結構」有政治吸引力，但少有人提到和理解另一理由：經濟分析如不涉及社會

[452] substantivist
[453] formalist

關係，至少在經濟範疇不用顧及社會安寧。Hobbes 的論點認為社會交流和經濟交易如沒有衝突，人們必需有互信，社會沒有不法之事；但如「自然狀態」中人們沒有社會關係或制度背景，這願景是不可能之事。他的解決之道是在這之上設置獨裁權威。古典自由主義（因而古典經濟學）的對立說法是競爭性市場排除了壓制性政治結構，因此無需用到武力或不法手段。「競爭」決定了不由個人操縱的貿易條件。如生意人遇上彼此猜疑或不法之事，大可以另覓願意以市場條件做交易的生意人；社會關係和相關枝節因此帶來摩擦。

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觀點認為人們彼此之間的社會關係拖了競爭性市場的後腿。亞當・斯密抱怨「行家之間少有來往，但每有對話都是針對大眾的陰謀，或是合謀抬價。」他的放任自由政治觀未能對這問題提出很多解決辦法，但有反對要求行業人士登記在案，因為這方便了行業人士從不相識到彼此有聯絡。這樣的辦法頗見兒戲，但看得到他了解完美的競爭必先要社會原子化。

一些經濟學家最近評論「社會影響」建構了人們習得自動和機械式追隨的習俗、習慣和常態的過程，沒有理會這會如何影響理性的抉擇。James Duesenberry 取笑「經濟學研究人們如何理性選擇；社會學研究他們如何沒有選擇。」Wrong 認為這是「過度社會化」。

「低度社會化[454]」與「過度社會化[455]」之間明顯有差異，但應留意兩者有共通之處：行動和決定是取決於原子化的行動者；這在理論上至關重要。「低度社會化論」認為「原子化」是因為私利主義狹隘地追求功利。「過度社會化論」認為行為模式已內部化，社會關係對行為的影響只是有限；即使行為內部化有其社會性根源，但這論點其實與功利主義大同小異。功利功能的源起沒有定論，因此大眾同意的習俗和價值完全指導了行為；這與「過度社會化論」雷同。兩個論點解決社會秩序的辦法都是把行動者在周邊背景中原子化。Hobbes 的名著《巨靈[456]》描述「自然狀態」中的人民在原子化後深受社會秩序失控之苦，樂意向權威巨靈奉獻本身的權利，以後快樂地過著順民的生活；人民以「社會契約」為名，從「低度社會化」直接走向「過度社會化」的狀態。

現代經濟學家解釋「社會影響」時，一般提出「過度社會化」是如何和怎樣的論點，即是扭轉了「社會影響只是邊緣」的說法。Michael Piore 強調在分級的勞工市場中，不同勞工市場有不同的決策風格：理性選擇、習俗以及匹配各自背景的命令結構。Samuel Bowles 和 Herbert Gintis 指出不同社會階層有不同的認知過程，因為各自有不同的教育。下層勞工學會要遵守法紀，精英份子的四年大學課

[454] under-socialized
[455] over-socialised
[456] *Leviathan*. 有中譯為《利維坦》。

程強調「與生產高級階層匹配的社會關係…之後或是更上層樓，或是走進適當的生產階層。」

這些社會影響的「過度社會化」概念頗為機械化：一旦知道個人的社會階級或勞工市場階級，一切行為都是自動化，因為行為已經深度社會化。這論點認為社會影響是諸事安排妥當的外部力量，一如有神論的上帝，深入人們的心靈和肉體，改變人們如何決定的方式。一旦知道人們如何被影響，社會關係和結構已是無關重要。所有社會影響都是在個人的腦袋，因此在作出決定時，他是一如任何「經濟人」一樣原子化，或許遵守不同的決策規矩。較為深入（也較少社會化）的文化影響分析認為文化的影響不是一次性，而是持續的過程，在互動中持續建立和重建。文化影響人民，人民也重塑文化，部份原因是由於他們本身的策略原因。

即使有些經濟學家重視社會關係，但必然糾纏於這些關係與其他關係的定位，可稱之為「關係的歷史性和結構性鑲嵌」。其論點描述的人際關係是極為一成不變和平均而言，沒有具體內容、歷史或結構性定位。行動者的行為是出於他們的角色的定位和規範；因此論點闡明夫妻之間、顧傭之間、罪犯與執法者之間如何互動，但沒有假設這些關係有角色以外的個別內容。結構社會學批評這是把個人關係的具體內容貶低為整體概念的次要角色;比對從最終價值取向得出的規範性角色描述，這只是偶發現象。在經濟模式中，如此看待社會關係有其自相矛盾的效果：即使決策似乎不止涉及個人，但依然承認原子化決策。因為被分析的個體群集（一般是二人關係，但有時是較大的組群）是提取自社會背景，個人的行為被原子化，脫離其他組群的行為和本身關係的歷史。這沒有清除原子化，只是轉移到分析的二元或較高層次。留意這是利用「過度社會化」概念（行動者的行為只依據本身的指定角色）補充原子化的「低度社會化」概念。

要有用分析人們的行為，就要避免這兩極端論點隱含的原子化。行動者的行為或決策不是在社會背景之外，也不是亦步亦趨依循他們剛好身處社會類別的特定階層寫下的劇本。他們的有目標行為是鑲嵌於具體和持續的社會關係。下文說明「鑲嵌」概念如何改變研究經濟行為的理論性和實證性方法。首先要收窄範圍集中在經濟生活的信任和不當行為，然後以「市場和階層」的問題說明如何利用「鑲嵌」概念來分析問題。

經濟生活的鑲嵌、信任和不當行為

自從 1970 年，經濟學家對以往忽略的信任和不當行為問題重拾興趣。Oliver Williamson 指出現實中的經濟行動者不僅追求私利，也利用「機會主義」：即是以詭計追求私利，懂得掩飾的行動者取得交易優勢。因此，經濟人不是一般假設的追求私利，而是更為細緻和轉彎抹角。

這是現代經濟學一項特別的假設：追求經濟利益只是以相對比較文質彬彬的手法而為之，避開了 Hobbes 揭示的問題，即是為何人們不多以暴力和欺詐追求本身利益。Hobbes 已清楚指出「私利」的本質意義沒有排除暴力和欺詐。這項假設得以成立，部份原因是可以想像自發調整市場的競爭力量能壓制暴力和欺詐。這樣的概念足以說明「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這兩概念彼此互補：競爭性市場的原子化行動者已把行為的規範性標準內部化，得以保障交易有序。

近年來，這份信心有了動搖，因為對不完全競爭市場有較精密的研究。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少數參與者有已支付成本和具體人力資源投資；在這些情況，所謂競爭性市場的紀律未能壓制欺騙行為。因此，日常經濟生活有沒有被暴力和欺詐搗亂這老問題重浮上面。

經濟學文獻提出兩項基本答案，各自關連「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這兩概念。「低度社會化」論認為以前認為借助法律、歷史、社會或政治力量的社會制度和措施應被視為針對某些經濟問題的有效解決辦法。以前認為這些制度沒有經濟功能，但因為安排得法，不當行為要付出成本，因此不當行為受到壓制。但這只是「信任」的功能性代用品，不能產生「信任」。這類型的主要措施有旨在減少偷懶、怠工或盜竊專利機密動機的明明暗暗合約（包括延遲支付和法定退休計劃），以及以法令這些權威制度壓抑機會主義。這些是「低度社會化」的概念，因為這不容許具體的個人關係及其內含的裙帶關係鼓勵不當行為。以這些措施取代信任，實際上是 Hobbes 式難題：任何理性的個人會有動機逃避措施，很難想像這些逃避行為不會禍及日常經濟生活。

其他經濟學家理解到「信任」必然有發揮作用，因為只靠制度措施不足以完全阻止暴力或欺騙。「信任」從何而來？有學者提出「一般道德」的解釋：社會演變，會產生某些隱性協議，關係到社會存活或至少有助社會運作。大家都接受「一般道德」的存在，這可見於日常經濟生活的大小事情；但若稱之為普及和自動的反應就有些「過度社會化」的特色，因為經濟生活中的道德行動根本不是自動或普及。

經濟學家在遠離家居的餐廳用餐，結帳時留下小費。這在三方面違反了經濟人的理性行為：（一）雙方並不認識；（二）彼此以後有交易的機會極為渺茫；（三）不留小費這回事也不會傳到雙方以後可能有交易的其他人。這例子不涉及暴力或欺詐，只能以「一般道德」來解釋。但如涉及昂貴成本，「一般道德」是否發揮作用？

「鑲嵌論」反過來強調具體個人關係和這些關係的結構（網絡）產生信任和壓制不當行為。人們普遍偏重與有信譽的人交易，可見大多數人實際上不放心只是信

賴一般道德或制度措施。經濟學家已指出：不弄虛作假，其中一項動機是不想傷及本身名譽；但這是把名譽視為一般商品的「低度社會化」概念，把弄虛作假作為機會的機率計算。實際上，人們只是在沒有更好資訊的情況才接受這些一般性資訊；如有可信任的人曾與對方交易，他的評語比一般資訊更好更可信；如之前曾與對方交易的經驗，那才是最好最可信。個人經驗是較好資訊，因為（一）成本低，（二）更相信本人的資訊：內容較豐富，較多細節和較準確；（三）為維持長期交易關係，對方有動機贏得你的信任；（四）持續的經濟關係在經濟動機之上添加了社會內容，加強了對信任和不佔便宜的期望。

沒有人懷疑在親密關係中會有上一句的效果；親密關係讓行為變得更容易預見，免除了陌生人彼此懷疑的恐懼。電影院失火，人人匆忙逃生，往往造成慘劇。群眾心理學研究認為這是不理性，但 Roger Brown 指出這情況是涉及 n 人的「囚犯困境」：每個逃生的人都很理性，因為沒有什麼擔保人人會冷靜逐一步出災場。家中失火不會導致人踩人的慘劇，因為家中各人彼此有信心。

在商業關係中，信心的程度更為參差，但個人關係的力量往往可以避免「囚犯困境」；這力量不是交易者的特質，而是建基於彼此的紮實關係。一般的標準經濟分析忽略了個別交易者的身份和以往的關係，但理性的個人清楚知道可以依賴這些關係。較之於一般信譽，他們更依賴以往的交易經驗來預期對方會否忠誠交易。

至此為止，本文指出經濟生活中的信任源自社會關係，不是制度性措施或一般道德。但這可能是以一項樂觀功能主義取代另一項；關係網絡在前者發揮了維持秩序的功能，不是道德或措施。要減少風險，一是要理解作為解決秩序的辦法，鑲嵌式立場不是強於其他論點，因為社會關係網絡在經濟生命的不同範疇有不定期、不同程度的滲透，因此一些劣根性，例如不信任、機會主義有機可乘；所以總會有失序的時刻。

二是堅持社會關係可能確實是信任和可信任行為的必要條件，但不足以確保這兩者，甚至可能比沒有社會關係更有可能為不當行為和衝突提供機會。理由如下：

（一）基於其本質，人際關係衍生的信任有更多不當行為的機會。在人際關係中，大家都知道會「傷害心愛的人」，而對方因為對你的信任可能更容易（比對於陌生人）受到傷害。（在「囚犯困境」的場景，甲方知道合謀者乙方肯定會否認控罪，就更有動機認罪。〔這樣，甲方從輕發落，乙方處以重刑。〕在這情景，利用人際關係解除困境是利用了受害一方的不對稱訊息。）社會生活中這簡單事實是信心的基礎；「信心」為了隱藏的目的，培養了一些關係，有時是長期關係。在商業世界，有些罪行（例如騙案）是要先培養信任關係才有機可乘。信任程度越高，不當行為做成的損害越大。這些不當行為並不常見，足以說明人際關係和

信譽的重要性；但不當行為偶有發生，也說明人際關係和信譽不是完全可信。

（二）暴力和欺詐往往是小組行事，小組各人要有一定程度的內部信任，這一般承傳自現有的關係。例如，收受回扣和合謀圍標不是個人罪行，一旦東窗事發，大家都奇怪涉及這麼多人的罪行怎能長期以來不被揭發。執法人員要費盡心思打開缺口：先找住一個人，然後憑借他的供辭揭露其他人的罪行，之後雪球越滾越大。

人際關係導致信任，也導致不當行為。制度經濟學的功能學派強調正當的一面，指出「因為持續關係，即使追求私利，不擇手段的精明之士也會有看來是愚蠢或純粹利他的行為。鑽石市場的大額交易只是雙方握手就成交。」這種交易可以成立，是因為交易行為不是原子化，而是鑲嵌於鑽石商人的緊密群體，他們緊密監察彼此的行為。一如其他緊密群體，行內人有清晰定義的行為標準，容易監察；不當行為很快傳遍群體。但這樣的信任程度有很大的誘惑；鑽石交易往往有「內鬼」大案。

（三）暴力和欺詐造成失序的程度相當取決於社會關係網絡是如何構成。Hobbes 過於強調原子化自然狀態中可能的失序程度：在沒有持續社會關係的情況，只會有斷斷續續的二元關係。範圍較大的失序是因為搗亂鬼合謀，他們不可能之前沒有關係。不同的結盟導致各自歸邊；如雙方沒有足夠的跨界聯繫，未能形成足以防止衝突的利益，這就是「戰爭」。商業世界也是如此：除非衝突雙方能夠召集頗大數目的同路人，否則衝突不會一發不可收拾；例如偶爾發生的敵意收購事件。

即使沒有社會關係，不必然會有失序和不當行為。上文提到社會關係防止不當行為。在真正原子化的情況，不當行為的程度往往是低度，只會是偶發，互不關連和小規模。Hobbes 提出的問題確實是問題，但若是以社會結構來理順這問題，那就要承認可能觸發比「自然狀態」中更大規模的失序。

鑲嵌論解說經濟生活的信任和秩序問題，是在「過度社會化」的一般道德和「低度社會化」的非人性制度措施之間分析和追隨社會關係的具體模式。有別於 Hobbes 的立場或其他論述，鑲嵌論沒有對普世秩序或失序一錘定音，而是假設社會結構的細節決定會發現的事物。

市場和層級的問題

Oliver Williamson 對經濟生活的鑲嵌論提出有力的論點；他質疑在什麼情況下，經濟功能在層級式企業界限內發揮，而不是在跨越這些界限的市場程序中發揮。他的答案與新制度經濟學的論點一致：在任何情況觀察所見的組織形式是最能有效應付經濟交易的成本。層級式組織的企業常見有一些組織形式未能保證最後成

果，時常重複，經常要為專項交易投入未能用於別處的金錢、時間和能量。反之，市場界面的企業之間的交易一般是簡單，不重複和不需要專項交易的投入，例如一次性購買標準貨品。

在這樣的說法，前一種的交易是在層級之內已內部化。理由之一是「受限的理性[457]」：經濟行動者未能預測可能適用於長期契約的複雜偶發事態。如交易已內部化，就無需預測複雜偶發事態，無需繁複的談判，交由企業的管治結構解決就可以了。另一理由是「機會主義[458]」：經濟行動者為了私利的理性行為，會用盡可能的手段，包括詭計和詐騙。如在同一企業，容易找到對方，這種權威性關係能較有效防止機會主義行為。

以權威性關係克制機會主義似乎是重提 Hobbes 的分析論點，但只是限於經濟範疇。Williamson 論點的 Hobbes 式分析是這樣的：內部組織不用面對自主企業之間自動契約有衝突時萌生的經驗，企業內部的爭執一般不用上法庭解決；這是解決歧見的有效方法。複雜和時常重覆的交易，雙方要有長期關係，而機會主義危及長期關係。市場環境經常改變，其中關係既複雜和不能預測，一些初期契約根本不能全面顧及，又沒有強制執行契約的權威性關係。推崇權威性關係是反映 Hobbes 的「過度社會化」國家政權的分析，「市場」類似 Hobbes 的「自然狀態」以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原子化和匿名市場，但缺少了全面競爭性環境的規律。Williamson 也理解他的詮釋有不足之處，承認市場的群體壓力培養可信任的行為，而且預期客人可能回頭會打消佔便宜的念頭，以不當手段謀私會被行家和社會孤立；「公平交易」的商譽是企業的資產。有很多實際例子說明社會結構對市場行為的影響，但 Williamson 以為這些只是例外，未能認識到這些二元關係是鑲嵌於較廣泛的社會關係。

本文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模型的匿名市場在經濟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而任何交易都關連社會關係。企業內部的社會關係網路可能比企業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和長期，而企業之間交易的社會層次也使人質疑 Williamson 的說法：複雜市場類似 Hobbes 的「自然狀態」，只有層級性組織的內部化才可以解決問題。

常見社會上的商業關係與社會關係互有關連。Adam Smith 不喜歡的商業協會發揮重要作用，而大大小小的企業透過高層管理人員「交換式」出任對方的董事職位而維繫著緊密關係。這些商業關係滲入了社會元素，反之亦然，尤其在商場精英階層。很多商業糾紛以「人情」解決，不是上法庭，甚至無需依合約辦事。

人際關係不只限於精英高層，交易涉及的多重層次都有人際關係。有研究發現買

[457] bounded rationality
[458] opportunism

手絕少如古典理論所說的在「現貨市場[459]」購買，而是光顧有長期關係的賣家。只有嚴重突發事情才會打亂這買賣關係。這樣的行為有幾個明顯的理由：尋找新賣家和建立新關係要花成本，人是慣性動物，與相熟的賣家交易風險較低，以及買賣雙方已建立個人關係，或許從中得到市場訊息。商業行為鑲嵌於社會關係，致使較容易解決紛爭。如交易有阻延或出錯，雙方不會立即拿出合約，找律師出頭，而是直接聯絡解決問題。

某些社會文化尤其注重社會關係，例如日本。日本人經常在公餘時間與同事和外人聚會，形成個人關係。一旦關係鞏固，就不容易動搖。外商到日本做生意，經常埋怨這些關係促使日本商人的決策不是基於經濟考慮，而是首先考慮人際關係。

類似的人際關係亦常見諸許多行業的分判制度，特別是建造業。總承辦商與分判商保持密切關係，致使工程分判無需競爭性投標，不受制度性規則監管。Eccles 認為這種「半企業」組織是在純粹市場和縱向式結構企業之間。本文認為這「半途模式」不完全成立，因為實證而言，純粹市場極為罕見。比諸許多買賣關係，分判制更近乎縱向式結構，因為分判商通常與總承辦商一起在同一工地作業。況且分判合約一般是固定價格契約，因此有明顯動機想辦法降低表現要求。

雖然有這樣的情況存在，但沒有衍生一些縱向式整合企業的層級結構來解決「問題」。本文認為這是因為總承辦商與分判商有長期關係，大家都在同一行業，這樣會保障行為標準，因此無需權威性關係已可阻嚇不當行為，而且更為優勝。有研究亦發現即使行業中有很多企業，總承辦商同一時間只會聘用兩三個分判商。這可以用「投資」角度解釋：雙方從持續工作關係中得到不同尋常的好處，也可能是參與雙方的人員從日常社交和工作中得到滿足。若然雙方都是現貨市場中交易，每次要建立關係，這很累人的。一如經濟生活的其他部份，社會關係的界面可能衍生自純粹經濟交易，日後漸趨重要。

在勞工市場方面，Williamson 斷言層級式企業優勝於市場交易，是在於能夠向員工傳達準確訊息。與單一企業比較，市場企業之間的溝通往往沒有豐富的共識語言。在層級管理中，如上司熟悉員工脾性，傳達訊息尤其準確。員工的個人資料和評價不是只局限在企業之部，也會傳到外間。除了不同企業員工之間的個人關係，（以美國為例）員工跳槽是閒事，方便了人事資料的流通。

本文認為 Williamson 過度強調組織之內的層級權力。例如，他以為企業內部的審計人員較容易得到企業員工的合作；但內部審計可能避重就輕，流於表面。Dalton 和 Eccles 的研究也指出企業之內的人際關係和辦公室政治屢屢影響表面看

[459] spot market

來是純粹的行政管理措施，例如成本會計，內部價格轉移。縱合式管理本應解決問題，但因為上述原因，有些管理人員埋怨內部交易比外部交易更為困難。

這些「過度社會化」實證研究有力反駁了企業內層級式管理的所謂「優點」：員工更為服從、僱員先顧全企業而抑制本身的利益等等。況且有深厚個人關係的中層管理人員會「合作」逃避總部的審計。大企業的員工流動性較低，內部勞工市場職級分明，各有進升渠道，致使這些逃避性合作行為變得更為容易。Weber 提出的理想官僚架構明確職位之間的關係，不受人事調動影響，本來可以避免這類問題。但 James Lincoln 的研究指出如員工流動性低，官僚架構的人際色彩越濃烈，最終改變了網絡和組織的方向。

至此為止，本文強調要為經濟生活帶來秩序，企業之間的社會關係比企業之內的權威更為重要；這論點不同於市場論和層級論。較為持平的看法是要同時顧及企業之內的「市場」關係和社會連繫，要留意權力關係，否則本文的論點是忽略了社會關係在市場發揮解決衝突的平順功能。衝突是現實，從大眾津津樂道的法律訴訟到偶爾發生報章報導的「割喉式」減價競爭。因為企業之間有效行使權力可防止公開爭端，可以假設公開爭端只是企業爭端的小部份。只有在雙方勢均力敵時，爭端才會公諸於世。Hobbes 曾提出在「自然狀態」中可能「全民開戰」就有著這粗略均勢的意味。但如爭議雙方有一方有明顯勢力優勢，另一方會早早投降減少損失。

強勢企業的論題還有許多論述之處，但有關互任董事、工業企業的財務安排等等的研究文獻已足以說明不能忽視權力關係。這也間接引證要解決複雜的談判，把雙方置於同一層級組織並不是萬應良方；解決這些複雜談判往往借助企業之間的明明暗暗權力關係。

最後要提到工業和組織社會學認為在企業內部至關重要的社會關係網絡。研究文獻著重要區分企業的「正規」和「非正規」組織：天真的社會學者才會相信官方的組織圖。層級式組織和企業內部化有關連，但不是最好的解釋。內部化的效應可能催生比之前獨立的市場實體有更密切的社會關係網絡。

Williamson 的市場及層級論和本文提到的鑲嵌論對解釋和預期有什麼區別。對經濟生活中抑制機會主義或不當行為和社會一般有序和彼此合作，Williamson 的解釋是縱向式層級的企業已接掌複雜的經濟活動。但上文提到的實證指出即使是複雜交易，跨越企業的市場也能維持高度有序，反而企業之內會高度失序。這是否會發生（而不是 Williamson 預期會發生）取決於人際關係以及企業內外關係網絡的性質。本文主張「有序和失序」與「忠誠不欺和不當行為」是與這些關係的結構有關，而不是組織形式。

市場企業可能縱向組合而不是相互交易，這情況有某些後果。如其他因素相同，但交易企業沒有連繫彼此的個人關係或最終導致矛盾、失序、機會主義或不當行為的網絡，可以預期有偏向縱向整合的壓力。在另一方面，如有穩定的關係網絡調解複雜的交易和導致企業之間的行為標準，這些壓力應不會發生。

Williamson 的假設隱喻最有效的組織形式就是當前的企業形式，為了避免機會主義，企業必然依隨上文描述的縱向整合方向；本文則視之為壓力而矣，因為 Williamson 的假設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必然要有追求效率的強大選擇壓力；以及（二）有些行動者必然要有為了「解決」效率問題，可以建構縱向整合式企業的能力和資源。

Williamson 沒有清楚交代確保交易有效組織的選擇壓力。新制度經濟學無言默認，似乎是隱含達爾文的論點：無論源頭為何，有效方案得以持續，亦類似生物世界的「天擇[460]」。因此雖然不是全部商企家能夠準確掌握和利用商機，但縱向整合方案在交易成本和經濟規模效應方面有較理性的特性，因而有更好的生存特性；這是 Williamson 的論據。但如此引用達爾文觀點也可適用於任何制度分析：所謂「選擇壓力」的運作既不是研究主題或可證偽的命題，這只是自家之言。

即使能夠解釋「選擇壓力」有助某種組織形式有較高生存機會，但依然不能說明如何造就這些形式。引用生物演化論解釋這些情況是「突變」、只是避重就輕；一如其他功能性說法，這也是不能自動假設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必然可行的。縱向整合要有資源，包括一些市場力量、取得資本（通過利潤投資或資本市場），以及與法律和監管機構的適當聯繫。

如「選擇壓力」薄弱（尤其是 Williamson 聲稱會導致縱向整合的不完美市場），資源不足，上文提到的社會—結構性組合依然關連到交易成本的效益，但不足以保證必然有效的解決方案。一些與效率沒有關連的綜合動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更為重要，例如高層企管的個人決心。

本文提出的論點指出未來對市場和階層組織的研究，要仔細和有系統研究促成經濟交易的個人關係實際模式；這樣才能更好理解縱向整合的動機，更能明白在原子化市場和完全整合企業之間的各種整合形式，例如上文提到建造業的半企業形式。這類型的中間形式與個人關係網絡息息相關，如不重視則不能充份理解個人關係網絡如何影響組織形式。這方面的資料數據比科技和市場組織的相關資料難找得多，也因為經濟框架的主導形式是原子化的個體參與者，因此以為個人關係網絡並不重要。

[460] natural selection，亦稱「自然選擇」。

討論要點

本文提出大多數行為緊密鑲嵌於人際關係網絡，避開了人類行為「過度社會化」和「低度社會化」的極端論點。本人認為這適用於全部行為，但本文只集中經濟行為，理由有（一）一般專業研究極大程度集中於行動的原子化理論，忽略了這方面的研究；（二）社會學極少研究新古典經濟學的主題，無形中默認經濟學者假設「市場過程」不是社會學研究的課題，因為社會關係在現代社會中只有磨擦性作用，不是核心作用。即使少數社會學學者有研究以市場為核心的過程，其後的分析也會避而不談。例如社會學文獻描述個人的背景和收入，但不分析決定工資的勞工市場。

本文指出全部市場過程都可付諸社會學分析，這些分析可揭示這些過程的核心作用。本文以「信任」和「不當行為」為例，也提出 Williamson 的「市場與階層」論點，說明「鑲嵌觀點」如何不同看待經濟學者的觀點。新制度經濟學視制度為解決經濟問題的有效方法，避免從社會、歷史和法律角度分析制度；如此功能性分析忽視了社會結構的仔細分析，而本文則認為這是現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研究重點。

「理性選擇論」只是狹隘地集中於原子化個體和經濟目標，與本文的「鑲嵌觀點」截然不同。若是廣義地看，兩者其實有許多共通之處。上文有多處抨擊經濟學的社會化「過度或低度」論點其背後的基礎是「心理修正主義[461]」，試圖不以理性選擇來解釋經濟學理論。我反而認為雖然「理性選擇論」總是麻煩多多，但依然是很好的假設，不應隨手放棄。要分析一些看來是「非理性行為」，如能置之於環境的局限（例如鑲嵌論），就可以容易明白。全面分析「非專業勞工市場」的社會局限，可以明白他們似乎不完全是對「文化」規則的自動反應，而是對所處環境的理性反應。從嚴格的經濟動機來看，管理人員參與「默許定價」的行為損及企業利益，是愚蠢的行為；但如從個人位置和網絡關係分析，這種行為有適當的意義。如暫且放下經濟目標，另外從社交、認可、地位和權力層次考慮，這些行為是否理性或只是工具性就有了另一方面的解讀。經濟學少有認同後列的因素是理性，因為他們往往把「利」與「情」劃分得清清楚楚，只考慮「利」這一個經濟因素，又假設其他動機只見諸不同和「非理性」組織的範疇，因而經濟學者傳統上對經濟活動沒有社會分折，沒有引用心理學。我認為經濟不止忽略了心理學，更重要的是忽略了社會結構。

最後必須指出「鑲嵌論」的因果分析是頗為粗疏；「鑲嵌論」對宏觀歷史和宏觀結構的含義及其社會—結構特色，我知之不多，因此對現代社會或政、經改變的源頭如何可以解答大問題，愚見未及這水平。我一再提到「鑲嵌論」的近因關係，

[461] psychological revisionism

因為要了解大改革，必先要了解改革的機制，而最少為人了解的就是這些改變對經濟活動鑲嵌其內的社會關係的影響。不了解這些關係就無從建立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關連。

「市場和層級」案例最能說明「鑲嵌論」分析宏觀利益模式的因果關係。縱向組合的規模和市場充斥小型企業，不僅是研究業界組織的小課題，而是研究資本主義現況制度的大課題，例如對二元經濟、依賴發展和現代商界精英的研究。對小企業是否被大企業「泰山壓頂」的研究，一直是以泛泛而言的宏觀政治和宏觀經濟論點出之，沒有引用社會結構的成因。

例如，對二元經濟的研究往往以為大量小企業是生存在大企業的「邊緣」，承擔了後者面對不穩定商業循環和科研的風險，小企業失敗不會影響大企業的利益。我認為小企業得以生存是因為企業之間的經濟關係之上還有緊密的社會關係，減少了整合的壓力。這沒有抹殺轉移風險的解釋，但「鑲嵌論」可以解釋有這麼多沒有衛星和附屬地位的小企業，尤其是有緊密關係的小企業，但不足以解釋為何市場有這樣多類型的社會結構。這問題涉及較宏觀的分析，因此先要理解市場中社會結構的重要性。

「市場和層級」的分折固然重要，而本文提出只是作為說明例子。我深信「鑲嵌論」廣泛適用於其他範疇，而經濟學不應忽略社會學觀點，社會學家也應参與經濟研究，不應固步自封，以為經濟行為只是社會行為的特例。。

（譯文省略了引文，請參見原文。）



附錄三：參考閱讀

（推薦）顧昕〈中國大轉型之自由主義之路〉2010 年

湯志傑：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考察：以鑲嵌的問題史為主軸（上）（下）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30 期 2009 年 9 月

許甘霖：健康虛構與生活形態醫療市場：一個博藍尼取向的嘗試
許雅淑：台灣金融研究的下一步：經典研究的啟發——尋找金融市場中的靈魂

本文整合 Braudel 與 Polanyi 兩者的經典論述，指出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鉅觀圖像，在看似變化萬千的國際資金流動中，勾勒出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與資本主義的多樣性、並且發掘台灣作為一個小型經濟體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與能動性、揭露失去靈魂的自律市場運作機制對社會造成的摧毀性力量並對其提出持續性的批判。最後提出未來社會學的金融研究必須朝向兼顧整體性、鉅觀視野的歷史分析；具體的制度性討論，然而這個「制度」意義並非狹隘的國內單一政策意義，而是更廣泛國際性的金融體制問題之探討；最終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須把制度結合抽象的概念與理論分析，那是賦予制度價值與意義的關鍵所在。

靜止時刻：讀 Polanyi 的《鉅變》和 Foucault 的《規訓與懲罰》
Polanyi 的「社會鑲嵌」觀
再讀鉅變
三讀《鉅變》

顾昕：中国大转型的自由主义之路 2010 年

王绍光：大转型：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
王绍光：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上）（中）（下）
磊爷：何去何从？——我们时代的走向——喜读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王小钢：博兰尼的经济人类学和市场社会观
何艳玲："回归社会"：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构调适
毛勒堂："经济时代"与经济正义
杨雪冬〈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解读博兰尼〉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博兰尼的《巨变》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視頻）王绍光：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 从哈耶克与波兰尼说起。

王绍光有專著：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三联书店，2012 年）。

（視頻）邓正来“市场，社会与法律” 2012 年 11 月 25 日（录音整理讲稿）

市场和市场规范的价值交涉，侵蚀了广大的公共领域、道德、法律，甚至人们的生命;市场侵蚀了人们的生命的态度;市场侵蚀了公民观念；市场把穷人和富人分开，阶层关系没有调和的机会和领域。市场逻辑侵蚀的政治逻辑，导致买官盛行，共产的官位，成了投资的驿站，公仆观念已不复存在。邓正来在演讲中特别指出波兰尼提出的“双向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此一思想对中国当下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